

强制、资本和 欧洲国家

(公元 990 — 1992 年)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2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2012.12.04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是对在近千年里欧洲国家的演化的一个即时的解读和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自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巨大差异。

蒂利教授展示了权力的运用者和资本的操纵者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三种国家的形成，其中每一种都在欧洲流行了很长时期——收取贡赋的帝国、分裂主权的体系和民族国家。他认为，把欧洲国家的发展设想为一种简单的非线性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在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中是一个重大因素。本书的最后部分接着把这些洞见运用于1945年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中。

作者为本平装本整体作了较小的修改并且增加了另外的部分来论述最近在中欧和东欧发生的迅速的变化。

查尔斯·蒂利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著名教授，他在那里指导了社会变化研究中心。

一种重要的、激动人的理论，有着许多创新和丰富的文献……它写得非常好，尽管既包含理论又包含大量的经验信息。它轻松地包括大量知识。

——迈克尔·曼 《美国社会学杂志》

极好的……有思想性的和小心谨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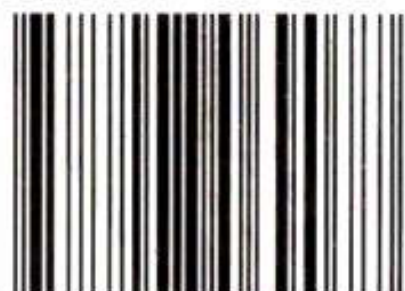
——巴塞尔·戴维森 《国际事务杂志》

欣赏查尔斯·蒂利关于欧洲历史研究的人们现在会有甚至更多的东西欣赏——又一个天才的突破……率直、启迪而且有力。

——杰克·A·哥德尔斯通 《当代社会学》

上架建议：政治学理论

ISBN 978-7-208-06907-7



9 787208 069077 >

定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强制、资本和 欧洲国家

(公元 990 — 1992 年)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2

CHARLES TILLY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美)蒂利(Tilly, C.)著;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990~1992

ISBN 978-7-208-06907-7

I. 强... II. ①蒂...②魏... III. 欧洲-历史-研究-990~1992 IV. 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0776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公元990—1992年)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75 插页 4 字数 283,000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907-7/D·1192

定价 30.00元

作者简介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是兴趣广泛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是研究欧洲政治变化的权威，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特聘的约瑟夫·L·伯滕威泽 (The Joseph L. Bottenwieser) 社会科学教授。他 1958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蒂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自己所说的终生的三大关怀上，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特别关注大规模的社会变化及其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发生在 1500 年以来的欧洲的社会变化。他对欧洲历史考察入微，对许多政治现象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著述丰硕，也是政治学领域著名的学者。

**纪念聪明的热心人、管理者、
创造者和朋友斯坦·罗坎**

中文版序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并没有试图去覆盖整个世界历史,也没有提供一个能够解释当今世界各地的国家演化的模式。它致力于这个具有充分挑战性的工作,即解释从 990 年(欧洲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处于边缘地位之时)到 1992 年(欧洲及其周边地区持续两个世纪的霸权显然开始动摇之时)的欧洲国家形式的转化和演变。本书偶尔提及中国,但主要是为了指出欧洲经验中的不同之处,而非出于系统比较和解释的目的。

本书主要承继并修正了更早时期的一次集体努力。1975 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作者有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加布里埃尔·阿丹特(Gabriel Ardant),鲁道夫·布朗(Rudolf Braun),戴维·贝利(David Bayley),彼得·伦德格林(Peter Lundgreen),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和我;我还担任了该书的主编。那本书是对当时常见的用诸如“现代化”、“政治发展”之类的观点,用目的论的方式解释国家变迁的倾向的反击。那类观点不仅消除了不同国家的历史道路的差异,模糊了它们的起源,而且暗示着:那些走着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不同路线的国家是不太发达的,而且它们最终或者重演西方国家的经历,或者永远落在后面。

我们小组将精力集中于用实际的西欧国家史来回应上述一系列错误观点。实际的西欧国家史过去常常被当作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和那些模式相反,我们仔细地考察了许多镇压、榨取、控制和冲突的过程。总之,我们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那些被其他人视为通过较高的国家机构有

意地解决问题的史实:我们将之描述成对权力的争夺,而国家正是这种权力争夺的副产品。我们也比通常更多地关注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作为孕育所有具体国家历史的母体(matrix)的地理政治。

我们在这方面的大量灵感都来自我们的合作者之一,斯坦·罗坎。我谨以该书的 1992 年版来纪念他。罗坎是一位挪威政治科学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追求两个明显矛盾的智力目标。一方面,罗坎力图去理解地方政治(包括他出生的斯堪的那维亚)中的分裂及意识形态的细节。另一方面,他描绘了综合时间和空间的辽阔的欧洲政治地图,在其中法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只不过是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罗坎通过把地方历史看成对涉及更大范围(甚至是横跨大陆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创造性回答,把这两种显然矛盾的努力综合到了一起。这种观点应该对中国学者有吸引力,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把地方历史部分地理解成为和帝国、世界经济相联系的产物。

1992 年的版本修正了 1975 年版的一些缺点。无意之间,作为对政治发展理论的反动,我们 1975 年的小组形成了某种反理论。在发展理论强调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的地方,我们的反理论则强调强制和冲突是政治变化的动力。这使得我们的论点有很大的解释价值,但是这也使我们不必要地陷入了认为国家形成取决于在国家层面上集中武装力量的单一途径的观点。《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通过有意识地讨论强制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差异,以及通过更多关注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来纠正这种错误。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书籍中覆盖上千年的历史,其结果依然是提纲挈领的,但是肯定会比对强制、冲突和国家创始的平铺直叙要复杂得多。

此书对研究中国长期的国家演化的学生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差异。作为有着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延续了约两千多年的统一国家;作为有着丰富多彩的原创文化的历史和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拥有地球上最庞大的武装力量的国家,中国对研究国家演化的学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挑战有四个主要含义。第一,中国仅幅员辽阔和历史悠久就让其他政权相形见绌,以致所有分析者都不知道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什么样的比较才有意义。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放弃把中

国和本书中描述的其他小得多、时间也短得多的国家进行比较,只是为了比较 a) 整个大陆或者 b) 大帝国和它们的后继者? 和什么其他的历史,我们才能合理地、有益地比较中国的政治史?

第二,尽管有不断发生的反叛、征服和内战,绵延不断的中华帝国不知怎么地通过文职官员(他们和所控制的人口的比例按西方的标准是非常之低)统治着这个次大陆——大多数时间只有一到两万帝国官员,这意味着比每 1 000 个帝国臣民一个官员还要少。帝国是怎样实现这管理奇迹的? 然而,以同样的方式,是否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经历了从 1911 年到 1949 年的漫长奋斗之后,也设法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以大约相同的规模重新实施中央控制? 中国长期的由上而下的控制的经验的特色是什么?

第三,中国国家近来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强制和资本(借用本书标题中的关键术语)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何暗示? 在欧洲历史中,我们能够合理地把国家经营的军事力量的创始和商业资本的形成描述成部分独立的过程。在所对照的欧洲地区和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这些过程有着不同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诸如中国武装力量在最近几十年里在商业——企业的创始和运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些现象?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尽管中国国家的武装力量庞大,但自从最早的中华帝国开始军人通常就服从文官控制? 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强制和资本在中国已经融合在一起? 或者至少已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经验中常见样式的相互作用的形式?

最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的重新崛起对于本书中所说的“国家体系”有何暗示意义?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大国及其殖民地附庸(colonial offshoots)一直称霸世界国家体系,不仅在全球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建立了广受模仿的国家组织模式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模式。我们是否应该把中国的崛起简单地看成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权力的又一次转移? 或者看成一次体系特点的根本转变? 我们是否应该期望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会带来一个国际关系的全新时代?

我并不企望你面前的这本书能立即回答上述四个深刻的问题。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考上述问题的便捷方式。例如,本书的最后一章,为欧洲之外的国家和本书所考查的千年欧洲历史之外的国家的演化

提出了这些有用的假说：

- 强制和资本的相对分布对国家演化道路(不管这种演化发生在哪里)的重大影响；
- 有无大城市群的显著不同的变化方向；
- 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结构的创造和改变的强烈作用；
- 通过 a) 财政结构和 b) 武器和军事人员的来源对上述作用的思考；
- 国家权力通过创造中央官僚政治的市民化, 日益增长的对用于购买军事手段的信用和税收的依赖, 以及和臣民们就这些手段的讨价还价；
- (1992 年后的时期) 国家组织形式的从“内部”决定到“外部”决定的趋势的持续。

这些对于从 990 年到 1992 年的欧洲历史的概括并不足以当作规律。但是它们在欧洲史方面则是非常可靠的, 在作为和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国)进行比较的初始假说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有些概括在和其他地方比较时结果不对, 那就更好(so much the better): 它们将起着指证欧洲国家演变的特点的作用, 从而可用于澄清进一步比较的术语。我最大的希望是, 中国学者做出的严肃的历史比较工作将不仅刷新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也能刷新我们在全球时空范围内对国家演化的理解。

查尔斯·蒂利

2007 年 4 月于纽约城

英文版序

创造性神经病,我称之为把一个人的强迫症和恐惧症引向丰富结果的艺术。本书展示了这种艺术在写作中的应用。在本书中,我的希望从复杂事件中发现或创造简单对称性的强迫症,和想通过承担另一项不太困难的任务来逃离沉重责任的冲动交织在一起。在本书中,任何一位读者都不难看出追求秩序和简单化的强迫症的迹象。然而对于后一冲动,我要稍加解释。以前有很多次,为了避免一些痛苦的或者困难的工作,我却投身到了另一些困难的工作。这一次,在和温·布洛克曼(Wim Blockman)合作征集文章编辑有关欧洲城市和国家相互作用的论文集之后,我开始着手一部格外“野心勃勃”的,比较公元1000年后的欧洲的几个地区的具体的城市和国家之间联系的著作。

我希望此书能充分地回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s)的挑战:“今天,当‘来自下层的历史’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的口号,并且给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带来了比较大的收获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世俗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上最终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只要阶级存在,正是国家的建构与解构保证了在生产关系方面的最基本的转变。”(Andersons 1974:11)我希望此书能将我终生的三大关怀融为一体:它们是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这样一本书,需要熟练掌握陌生的(exotic)资料 and 语言,更不用说要一步一步地编辑宏大的目录和统计资料。我开始

了写作,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忙于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寻找新的资料,而且在学习新语言和捡回旧语言方面考验自己的能力。康奈尔大学 1987 年的信使讲座(Messenger Lectures)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检验本书中所形成的某些观点;尽管伊萨卡岛(Ithaca)的讨论证明了这些观点是多么的粗糙,但是它也使我认识到这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值得为它作出长期的努力。

当我在 1988 年 2 月和 3 月致力于本书的写作时,我在巴黎的政治研究院(d'Etudes Politiques)开设了一系列的讲座[我感谢阿兰·兰斯洛特(Alain Lancelot)和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为我安排了这次机会,而且要感谢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为我争取的人文科学院(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对我在法国期间的资助]我原计划在讲学之余利用一下巴黎档案馆。但是在讲座系列之初我又讲到了欧洲的城市和国家。当我思考报告所引起的生动提问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有另一本书可写:一本比我手头已经开始写作的那本书更加提纲挈领、更加综合、更加简明、更加实用的书。写作这样一本书将给我以借口从那艰难的宏大计划中体面地(如果说是暂时地)抽身出来。我没有去档案馆,而是在住所的键盘边开始兴奋地写作新书。我把在康奈尔大学和研究所讲学的修改稿都纳入了这个计划,因此当我在 3 月底回到纽约时,我已经完成了本书主要部分(main chunks)。

暂时放下了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慷慨资助的一年休假的其他计划,我在电脑边“奋笔疾书”。[在此期间,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波林·罗思坦(Pauline Rothstein)和她的助手在图书馆资源方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聪明的帮助,卡米尔·耶齐(Camille yezzi)在日常工作方面提供了便利,埃里克·万纳(Eric Wanner)和彼得·德雅洛西(Peter de Janosi)提供了友好的支持,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维瓦纳·泽利泽(Vivaana Zelizer)则鼓励我去研究大框架、大过程和大比较。]到 1988 年 7 月,一本完成了(如果说还是不平衡的)的手稿开始流传。那本手稿以及后来几稿依次以书名《国家-强制和资本》、《白银-刀剑和权杖》以及不太甜蜜但更为准确的书名《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流传。本书的现在这一版包含和选用了以前出现在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伦纳德·霍克伯格(leonard Hochberg)编撰的

《1500年以来的欧洲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European State making and Capitalism Since 1500)、《历史中的地理透视》(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当今世界的战争制造者和市民》(Warmakers and Citizen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CSSC(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Working Paper 42, 1987)、《战争如何导致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战争》(How War Made States and Vice Versa)(CSSC Working Paper 42, 1987)、《国家、强制和资本》(States, Coercion, and Capital)(CSSC Working Paper 75, 1988)和《法国的国家和反革命》(State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Social Research* 56 (1989), 71—98 中的材料。]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朋友和同事阅读过或听说了本书的不同片断;我不断地要求讨论和修改,使得他们繁忙不已。珍妮特·阿比—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温·布洛克曼斯(Wim Blockmans)、布鲁斯·卡罗特斯(Bruce Carothers)、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ing)、卡门扎·加洛(Carmenza Gallo)、托尔瓦尔德·格兰(Thorvald Gran)、马乔林特·哈特(Marjolein't Hart)、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安德鲁·科比(Andrew Kirby)、约翰·林(John Lynn)、佩里·马斯(Perry Mars)、马特恩·普拉卡(Maarten Prak)、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韦恩·特·布雷克(Wayne te Brake)和翁宾(Bin Wong)给了我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仔细地审阅了前几稿的整个手稿,而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乔·赫斯本兹(Jo Husbands)和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在某些具体的部分添加了尖锐的评论。我应该深深地感谢阿黛尔·罗特曼(Adele Rotman)的关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明白易懂的建议。尼基·阿杜巴(Nikki Aduba)用尽善尽美的细心和智慧编辑了该书的手稿。当我致力于本书时,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正忙于完成她自己的著作,但是她非常大度地容忍了我的“废寝忘食”,并给予了策略上的建议。

伯根(Bergen)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Irvine)分校、芝加哥大学、日内瓦大学、莱登(Leiden)大学和西渥太华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哈佛大学和爱沙尼亚科学院的听众对部分的分析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新校(the New School)关于国家形成的研讨班以及他们集体的活动在阐述本书论点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我深深地感激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同伙们(co-conspirators)[特别是莉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戴维·坎那戴恩(David Cannadine)、马丁·加吉乌诺(Martin Gargiulo)、丹尼斯·杰克逊(Denise Jackson)、杰拉尔斯·马韦尔(Gerals Marwell)、萨尔维多·皮特鲁茨泽诺(Salvatore Pitruzzello)、凯特·罗伯茨(Kate Roberts)、赫克托·沙米斯(Hector Schamis)、卡莫尔·谢哈迪(Kamal Shehadi)、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克莱尔·厄尔曼(Claire Ullman)和罗南·范·罗塞姆(Ronan Van Rossem)],他们组织了愉快的讨论会来仔细检查本书手稿中的某些章节。在这些大力帮助的批评者中还没有一个人阅读了本书这一版本的所有手稿,因此他们也没有必要为我的错误负责。

错误当然在所难免。跨越上千年,我毫无疑问会忽略某些重大观点,遗漏某些关键事件,忽视某些重要矛盾,搞错某些重大事实,以及错误地解释某些变化。我只是希望读者能指出我的错误和疏忽,希望他们在立刻拒绝本书之前思考一下我的那些错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总体论点。我乐观地希望本书会继续已故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开始的工作,希望它能积累力量并纠正斯坦和我合作的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中的错误,希望本书会成为我在早期著作中曾经倡导的在历史基础上探索大规模变化过程的研究方案的范例。这些早期著作有《大结构、大过程和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和《当社会学遭遇历史》(*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我还希望本书能继续致力于历史偶然性的理论。说明历史偶然性理论的有 Anthony Giddens, Allan Pred, Arthur Stinchcombe 和 Harrison White 的近作。果能如此的话,强迫和恐惧症会再度对知识作出建设性贡献。当然,我面临的问题是:大部头的著作仍然在等待着我。

查尔斯·蒂利

目 录

中文版序 / I

英文版序 / V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城市和国家 /1

第一节 历史中的国家 /1

第二节 现有的答案 /6

第三节 资本和强制的逻辑 /19

第四节 战争促使国家形成和转变 /22

第五节 长期的趋势和相互作用 /32

第六节 展望 /37

第二章 欧洲的城市与国家 /42

第一节 欧洲形成之前 /42

第二节 国家和强制 /49

第三节 城市和资本 /52

第四节 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 /56

第五节 国家生理学 /59

第六节 危险的关系 /64

第七节 国家的另类形式 /68

第三章 战争如何促成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

战争 /74

第一节 暴力的分野 /74

第二节 国家如何控制强制 /76

第三节 战争 /78

第四节 过渡 /84

第五节 夺取、制造或者购买强制 /93

第六节 偿还债务 /97

第七节 帝国结实的长臂 /101

第四章 国家及其国民 /106

第一节 从黄蜂到火车头 /106

第二节 讨价还价、权利和集体行为 /109

第三节 直接统治的机制 /114

第四节 法国革命：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 /118

第五节 国家扩张、直接统治和民族主义 /126

第六节 未意料的负担 /129

第七节 军事化=平民化 /134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谱系 /140

第一节 中国和欧洲 /140

第二节 重新审视国家和城市 /144

第三节 强制的轨道 /151

第四节 资本主义的轨道 /158

第五节 资本化强制的轨道 /167

第六章 欧洲国家体系 /179

第一节 欧洲国家的联系 /179

第二节	战争的目标	/184
第三节	该体系的成员	/189
第四节	国家联成的世界的形成	/203
第五节	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206
第六节	六个突出的问题	/209
第七章	1992年的军人与国家	/214
第一节	政治的歧途	/214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遗产	/219
第三节	军人的崛起	/226
第四节	历史视野中的今日军队	/228
第五节	军事的积累	/232
第六节	掌权的军人	/235
第七节	军人如何获取权力?	/241
第八节	结束语	/248
	参考文献	/253
	译后记	/295

第一章

世界历史中的城市和国家

第一节 历史中的国家

大约 3 800 年前,一个小小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的统治者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城邦国家,并使得他们臣服于他自己城邦的神——马杜克*。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至高无上的国王。通过征服,他获得了为所有人制定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在他著名的法律的前言中,汉谟拉比声称受到来自伟大的神祇阿努(Anu)和恩利尔(Enlil)的教诲:

阿努和恩利尔召唤我把安宁赐予人民,
我,汉谟拉比,恭顺的、畏惧神灵的王子,要使正义出现在大地,
要消灭邪恶和坏人,使强者不能伤害弱者。
我像太阳一样升起,普照黎民百姓,
照亮整个大地。(Frankfort 1946:193)

在神圣召唤的伪装下,汉谟拉比可以满怀信心地把那些反对其统治的人称为“邪恶”和“坏人”。他诽谤受害者,消灭异己联盟,夷平敌手城

* Marduk,古代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译者注

市,声称神圣的正义就在他身后。汉谟拉比建立起自己城市的强权,从而建立起国家;他的众神以及他们对正义的具体看法将会永远流传。

五千多年来,国家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强有力的组织。让我们把国家定义为不同于家庭和亲属团体运用强制的(coercion-wielding)组织,它在大片的领土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实施着明白无误的对其他所有组织的优先权。因此这一术语包括城邦国家、帝国、民主国家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政府,但是同样地不包括部落、宗族(lineage)、公司和教会本身。唉,这样的定义是会引起争议的;许多政治学的学生在此组织含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有的学生把此术语扩展到存在于大的邻近的(contiguous)人口中的任何结构的政权,而其他人则把此术语限制在相对强有力的、集权的、有偏见的(differentiated)主权组织——大致上限制在我将要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范围。而且,我将通过包括像今日的摩纳哥*和圣马力诺**这样的实体(虽然它们没有“大片的”领土)来最后修正我的定义,因为我是根据其他明确的国家把它们当作伙伴国家这一事实的。

让我们暂时地坚持一下上述组织的定义。根据这一标准,考古发现的遗迹表明最早的国家存在于公元前 6000 年,而文字和图片的记录则表明它们存在于两千年之后。在随后的八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仅仅占据了地球上居住空间的小部分。但是随着几千年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统治日益增长。

城市起源于与此相同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 8000 年到公元前 7600 年间。后来称为杰里柯(Jericho)的村落有一座庙宇和几幢石头房子;在以后的一千年里那里有了厚墙和不同的建筑。到那时,人们可以合理地把杰里柯(Jericho)称为城市,而其他中东村落也开始出现城市化的迹象。在阿纳托利亚(Anatolia)、卡塔尔休尤克(Catal Huyuk)的遗址中有豪华的房子、神殿和公元前 6000 年的艺术作品。此时成熟的(fully-fledged)城市和可辨认的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此时也正是人类的创造能力和破坏能力极度扩张的时候。确实在几千年里,我们所谈

* Monaco,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 San Marino,位于欧洲南部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到的国家主要是城邦国家,常常包括一个神父统治的首都和周边缴纳贡赋的穷乡僻壤。然而,到公元前 2500 年,某些美索不达米亚的(Mesopotamian)城市,包括尤尔(Ur)和拉伽什(Lagash),正在建立由武士统治的用武力和贡赋使之结合在一起的帝国;汉谟拉比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统一出现在早期帝国在那里形成的几个世纪之后。从此时开始,实际的国家 and 大量的城市并存标志着几种伟大的文明,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到欧洲。

在城市和国家开始出现后的八千或一万多年里,城市和国家一直在爱与恨之间摇摆。武装的征服者常常夷平城市、屠杀城市居民,只不过是為了在原址上建立起自己的都城。城市居民们支持城市的独立,抱怨皇室对城市事务的干涉,只是为了防止匪徒、海盗和竞争商人群体的侵害才寻求国王的保护。在很长时间和很大范围内,城市和国家一直是相互依赖的。

在大部分历史中,民族的国家——即通过中央集权的(centralized)、有偏向的自治结构来治理众多相邻地区和城市的国家——出现的很少。大多数国家是非民族的:帝国、城邦国家、或其他类型的国家。遗憾的是,民族国家这一术语并不一定指民族-国家,即其人民共有一种很强的语言、宗教和象征的身份(identity)的国家。尽管一些国家比如瑞典和爱尔兰非常接近那种理想,很少有欧洲民族国家可以算作民族-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典型的民族国家——当然从没有满足这一检验标准。伴随着爱沙尼亚(Estonia),亚美尼亚(Armenia)和其他地方的好战的民族,苏联痛苦地保留着这种差异直到它寿终正寝。有着近三千年的连续的民族国家的经验(但是,考虑到它众多的语言和民族,没有一年可以被看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例外。只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民族国家才在地图上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划进他们相互排斥的各自的领土(包括殖民地)里。只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世界才被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所占领,它们的统治者或多或少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存在的权利。

当世界最终分裂成具体国家这一过程展开时,两个重大的逆流开始出现。首先,许多没有形成与众不同的国家中的民众代言人已经要求独立的国家身份。不仅仅是以前的殖民地的居民,而且在早已建立的古老的西方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也异常频繁地要求自己的国家。当我写道,一

些美国人、巴斯克人(Basques)、厄立特里亚人(Eritreans), 卡拉克人*, 库尔德人(Kurds), 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 锡克人(Sikhs), 泰米尔人(Tamils), 西撒哈拉人(Western Saharans)和许多没有国家的民族正在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得到这种权利付出了生命。在长期看成坚如磐石的苏联内部, 立陶宛人(Lithuanians), 爱沙尼亚人(Estonians), 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s), 乌克兰人(Ukrainians), 亚美尼亚人(Armenians), 犹太人(Jews), 以及许多其他“民族”成功地争取到不同程度的特殊, 甚至是独立。

在过去的几年里, 布列塔尼人(Bretons), 佛兰芒人(Flemings), 法语加拿大人(French Canadians), 门的内哥罗人(Montenegrins), 苏格兰人(Scots)和威尔士人(Welsh)也企图在现在控制他们的国家的内部或外部获得独立的政权。而且, 追求自己的国家的少数民族, 如果得不到目前正统治他们所要求的领土的国家的倾听(hearings)的话, 常常得到来自第三方的同情的倾听。如果所有的民族(近来有人代表他们要求独立的国家身份)真正获得了自己的领土的话, 世界将从现在承认的 160 多个国家分裂成上千个像国家的实体, 其中大多数很小, 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

第二个逆流也来势凶猛: 国家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国家集团如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共同体、非法贵重商品(如毒品和武器)贸易商的全球网络、财经组织如巨大的国际石油公司——都对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1992 年, 欧洲经济共同体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经济壁垒, 以致会大大地限制成员国在货币、价格和就业方面采取独立政策的能力。这些迹象表明, 正如我们所知, 国家不会永远存在, 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其难于置信的霸权(incredible hegemony)。

在 C. N. 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的一条组织行为的讽刺“规律”中, 他揭露说“计划安排的完善只有当一个机构到了崩溃时才能达到”(Parkinson 1957:60)。恰当的例子包括圣·彼得的教堂(basilica)和罗马教廷(the Vatican)的宫殿(完成于 16、17 世纪, 在教皇们失去了大部分世俗权力之后)、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促和(peacemaking)宫殿

* Kanaks, 西南太平洋上群岛上的土著人。——译者注

(完成于1937年,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殖民地新德里的计划,在此“英国撤退的每一阶段都精确地伴随着在城市设计上的又一个胜利的完成”(Parkinson 1957:68)。也许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此。国家也许遵循着一个古老的常规,即一个机构变得完善之日也就是它陷入崩溃之时。然而,在此同时,国家依然如此强大,以致任何梦想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的人都是一个粗心大意的空想家。

国家形成体系,在一定范围内它们相互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每一方的命运。由于国家总是产生于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的竞争,它们总是成群出现,通常形成体系。在欧洲目前几乎流行于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的国家体系是在990年后形成的,五个世纪后这种体系开始把它的控制延伸到欧洲大陆之外。它最终吸收、遮蔽或者说消灭了它的对手,包括那些以中国、印度、波斯和土耳其为中心的国家体系。然而在千年之际,欧洲本身并不是一个连贯的存在;它包括曾经一度被罗马帝国占领的地中海北部的领土,加上大片未被罗马帝国征服的,但是大部分被作为解体的帝国留下的纪念品的基督教会使徒所渗透的东北边疆。与此同时,穆斯林帝国控制了欧洲南部的大部分。

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大陆确实有某些统一的潜在基础。一个不平衡的城市贸易网联结着这片领土的大部分,提供了从地中海延伸到东亚的更为繁荣的生产体系和商业体系的联系。这一地区的人口大部分是农民而非猎人、牧民或者经商的城市居民。即使是在像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集中地区,庄园主也统治着大多数人口,农业在经济活动中也是主流的。宗教、语言和罗马占领留下的影响可能使得欧洲人比中国之外的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可比地区在文化上更为相近(homogeneous)。而且在以前罗马征服的地方,罗马的法律和政治组织的痕迹仍然保留在主权的碎片(splinters of sovereignty)当中。

这些特点最终对欧洲历史会有重大的影响。让我们以990年作为一个任意的参考点。在世界舞台上,一千年前的欧洲并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单一的独立的演员。因为这个原因,任何试图根据其独特的精神气质或社会结构来解释这一大陆的后来的变迁会有“事后诸葛亮”(reasoning backwards)的风险。而且,个别国家如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还没有作为

连贯的实体存在;作为本书追踪的过程的结果之一,它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才逐渐形成。从“德国”或“俄罗斯”的独特的持续的特点开始的观点歪曲了欧洲国家的杂乱无章的、偶然的历史。

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军队的成长和长期的欧洲霸权的出现确实如此自然,使得学者们很少有人会问为什么它们会有似是而非的(plausible)另外的选择——比如到 990 年之后还在亚洲、非洲和美洲昌盛的联系松散的(loosely-articulated)区域性帝国的体系——并没有在欧洲流行。当然部分的答案在于在 990 年后的几百年里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城市的辩证法(dialectic)。因为是密集的不平衡的城市网络和欧洲分成许多边界清楚的、独立程度不一的国家的巧合最终把欧洲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在变化着的城市和国家的地理后面是资本(它所偏爱的区域是城市)和强制[它主要是在国家内明确的(crystallized)]的动力(dynamics)在起作用。对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探究很快就成了对资本和强制的考察。

一系列惊人的强制和资本的结合在欧洲历史中此起彼伏。帝国、城邦国家、城市联盟、庄园主、教会、宗教秩序的网络(networks)、海盗联盟(leagues)、骑士帮派以及其他形式的统治在过去的几千年的不同时期在欧洲的不同地方盛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算作这一类或那一类的国家:它们是在确定的领土内控制着主要的集中的强制资源的组织,而且在某些方面行使超过在此领土内活动的其他任何组织的特权。但是只是到后来民族国家才慢慢地成了主要的形式。因此关键的两个问题是:怎么解释自 990 年以来在欧洲盛行的国家类型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成为民族国家的不同变体?为什么变化的方向如此相似而变化的道路却如此不同?如果说这一问题不能完全解决的话,那么本书旨在于弄清这一问题。

第二节 现有的答案

已往做出的对这一大问题的回答都难以令认真的欧洲史学生满意。

现在可供选择的答案在两个问题上的地位非常不同。首先,在多大程度上和多么紧密地,国家的形成依赖于经济变化的具体形式?这范围包括从直接的经济决定论到断言政治的完全自主(autonomy)。第二,任何具体国家的外部因素对它的变化道路有多强的影响?答案差异很大,从强烈的内部主义解释到极力强调国际体系的解释。并非巧合,战争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彼此不同:从经济决定论到政治决定论,从内部决定论到国际决定论(internationalist)。

尽管很少有人持有极端观点——例如,完全从经济中得出国家及其变化——在可能的路向(approaches)上的分歧仍然非常之大。图 1.1 用图解的方式展示了对这两个问题的可能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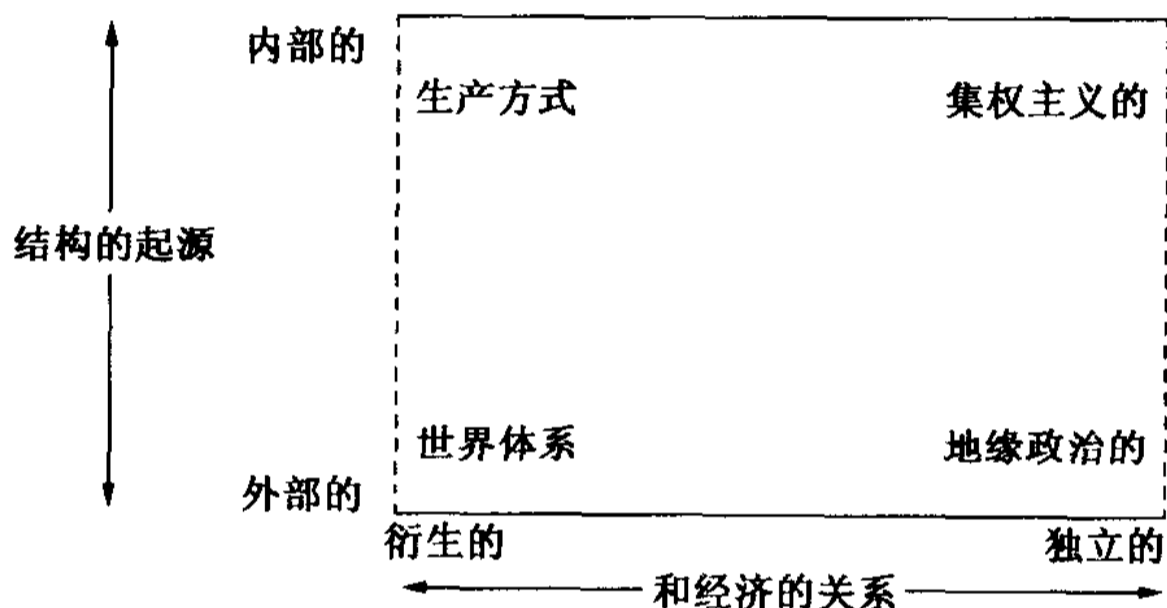


图 1.1 国家形成的其他观点

集权主义的分析

因此战争、国际关系和国家形成的中央集权主义者的模式把政治变化看成部分地独立于经济变化的发展,而且将此发展主要看成在具体国家内的各种事件的结果。许多国际关系的分析家常常采取了主张中央集权主义的视角,假设单个国家总是根据自己确定的利益行动;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主义的,而且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还原成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演员的防御与进攻。近来有关经典类型的最流行的理论都带有“结构实证主义”或“理性选择”的标签;他们考虑到霸权的、两极或多极的国际体系的影响,但是他们把对国家行为的分析建立在单个国家的利益及其定向(orientation)方面。(例如, Bueno de Mesquita 1988, Gilpin 1988,

Waltz 1988;关于阐释与评论,参见 Holsti 1985, Gervis 1988a)

在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的学生中,用中央集权主义来解释国家的变迁的看法绝不是最流行的。他们继承了现在声名狼藉的(now-discredited)政治发展的传统,寻找有关产生强大、高效、稳定的国家的条件的线索,并且假定只有一组这样的条件存在。他们典型地把个别国家当作他们的参考点。当他们不能还原为个别国家的具体历史时,他们就常常假定欧洲国家形成的单一的主要道路和一系列的用低效率、弱点、运气不佳、地缘政治的位置、或经济增长及其伴随物的时机选择(timing)来解释对此道路的偏离;因此,我们有少数成功的例子(如法国或英国)和大量失败的例子(如罗马尼亚或葡萄牙)。例如,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和皮埃尔·伯恩鲍姆(Pierre Birnbaum)把法国看成充分实现了的欧洲国家:“普鲁士、西班牙和意大利遵循着不同的相关的道路,但是他们的演化和制度化过程从来没有走得[像在法国]那么远。”他们把英国看成“国家化不足(under-statization)的典型”(Badie and Birnbaum 1979:191, 217)。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稍微大方一点:把欧洲和美国相提并论,他区分了在政府制度方面的三种现代化模式:大陆的权威的理性化和王权(crown)下统一的君主政体(sov­ereign body)结构的区别(differentiation),英国的代表议会中的权力中央集权化和美国的主权(sov­ereignty)的分裂(fragmentation)。(Huntington 1968:94—98)然而不久,亨廷顿就放弃了在英国和大陆之间的区分(distinction)而赞成宽泛的欧洲—美国的比较。在以上两种分析中,亨廷顿选出战争对国家结构的作用,但是他认为战争在整个欧洲大致有相同的作用。他的分析强调内部原因,对经济决定因素不大重视。

集权主义的(statist)分析的第二种不同的说法更接近上面图表的中心。这种说法把国家放入国际环境中,但是仍然把它们看成或多或少单独起作用的;这种说法从欧洲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的(sociocultural)差异(新教的或天主教的,斯拉夫人的或德国人的,封建的或自由的,农民的或牧民的)来回答关于国家形成的不同道路这一问题,并从广泛的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统治者完成相同目标的努力中寻找差异。因此在欧洲的东南

部,理论家们不断地声称发现了本土的(indigenous)斯拉夫人的、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的和罗马人的村落传统,正是这些传统把这个地区的国家命运和东面的俄罗斯国家、西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命运区分开来。(Berend 1988, Hitchins 1988, Roksandic 1988)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一本明白易懂、广泛流传的书中提出了集权主义的论点的另一种老练的带有重大的经济暗示的说法。他的《大国的兴亡》和(他没有引用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国家的兴衰》不仅仅在标题上十分相似;两者都认为正是经济和政治扩张的过程造成了最后使它减速的事情(commitment)。然而,奥尔森集中在当代,打算建立起一个总的模型,选出在一个国家内形成的为了获取增长益处的联合——如卡特尔(cartels)、工会和其他。相反,肯尼迪主要注意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希望标示出宽阔的历史道路。

根据肯尼迪的说法,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获得和失去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这些优势他们通常是通过军事力量的支持来寻求保证的。然而那些在此类竞争中胜出的国家发现它们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资源份额投入到陆军和海军中去。“然而,如果过大比例的国家资源不是用于财富创造而是分配用于军事目的,那么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削弱。”(Kennedy 1987: xvi)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却在积聚大量的财富,不断地投资于新财富的创造,从它们军事力量开支的较少义务中获益。尽管肯尼迪开始的陈述只是给出了(renders)可能的衰退和灭亡,他所分析的所有情况——早期的中华帝国、莫卧儿(Mughal)帝国、土耳其帝国、哈勃斯堡(the Habsburgs)、大英帝国和美国——使得它看上去似乎是必然的。肯尼迪在对这一论点进行论证时,他提供了自从1519年以来的欧洲国家体系的有用的年表:哈勃斯堡的关于统治权的命令(a Habsburg bid for mastery)(1519—1659年),群龙无首的大的权力争夺(1660—1815年),英国霸权(hegemony)不确定时期(1815—1885年),另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期(1885—1918年),美国上升到暂时霸权(1918—1943年),苏联美国两极体系(1943—1980年),以及另一斗争转移时期(1980年—?)。虽然肯尼迪的分析只提供了不同类型国家组织起源的模糊的指向,但他对战争、经济权力和国际

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强调却指向了任何对此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的一些因素。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追求权力》甚至更为引人注目地揭示了变化的战争形式和规模在欧洲国家体系演变中的中心作用。麦克尼尔的《强权之旅》(tour de force)展示了公元 1 000 年以来的整个世界的战争全貌——特别是战争的主要技术方面。他极其清晰地追溯了火药、攻城火炮(siege artillery)、反攻城工事(antiseige fortifications),以及其他伟大技术革新不仅对战争本身,而且对国家财政,对把时间约束引入市民生活,和其他许多事物的影响。我相信,麦克尼尔低估了像军事的商业化和海上战争变化的影响等组织革新的重要性,但是他创造了对某种战争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结构的重要性的一个又一个洞见。然而,他没有尝试系统地分析军事组织和国家形成的不同类型之间的关系。

和麦克尼尔一道,我们进入了对国家形成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和地缘政治学分析的领域;在他解释中光是战争中心就使得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成了任何具体国家组织史的关键决定因素。大多数集权主义者对这一主题的处理非常充分地适合对这一术语的传统使用,他们把法国的、土耳其的或瑞典的国家解释为在它们自己疆域内发生的事件和过程的结果。

这类国家形成的集权主义解释——包括专题论文的和综合的——提供了许多原始材料,从中我制造出本书的论点。然而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为本书的主要论题提供有效的答案:即为什么欧洲国家经历了如此多样的道路却最终殊途同归到民族国家?在解释为什么某一国家的“现代”形式出现在某种民族人口和经济的特点之上时,它们分裂成了特殊神宠论和目的论。此外,集权主义解释者忽视了几百个曾经一度繁荣然后又消亡了国家,如摩拉维亚(Moravia),波希米亚(Bohemia),勃艮第(Burgundy),阿拉贡(Aragon),米兰(Milan),塞维亚(Savoy),还有很多。为了系统地分析,我们必须超越集权主义的文本。

地缘政治的分析

如果大多数研究国家形成的学生采纳了集权主义的视角,把任何具

体国家的形成看成主要是在它自己领土内发生的非经济事件的结果,那么另外其他三个视角都有有分量的提倡者。国家形成的地缘政治分析非常重视国际体系,把国际体系看成该体系内国家的塑造者。地缘政治观点一般都主张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它们自身的逻辑和影响,因而国家形成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当前体系有很强的对应。在一个典型的努力中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区分了四种“国家适合国际政治的类型”:默许的、不妥协的、促进的、保存的(acquiescent, intransigent, promotive, and preservative)。例如,不妥协的国家“能力求使它的环境和它的当前的结构一致”,而促进的国家“能试图塑造它当前结构和当前环境的相互的需求”(Rosenau 1970:4)。在罗西瑙看来,这些类型对于行政的特征、党派体系的特征、立法的作用、军队的作用以及更多的方面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后果。(Rosenau 1970:6—8)同样,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pson)称之为“全球社会”的对战争和国际关系的视角赋予政治以极大的自主权,把单个国家视为严格对应所有国家间关系结构的東西;因此,它清楚地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毫不奇怪,我们发现地缘政治的国家形成、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模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Thompson 1988:22—27;也可参见 Waltz 1979)这一著作的主体,正如我所读到的那样,对集权主义分析的内部主义(internalism)提供了有价值的矫正,但是对于把特殊形式的国家和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特别地位相联系的机制的探索却给出了不清楚的指导。

生产方式的分析

生产分析的模式通常清楚地表现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某些其他生产组织的逻辑,然后几乎完全从那个逻辑中得出国家及其演化,好像那逻辑就在那国家的领土上操纵着一切。(Brenner 1976, Corrigan 1980)戈登·克拉克(Gordon Clark)和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在一个独特的声明中宣称:“我们把国家设想成为来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履行的相等的经济和政治命令。国家最终包含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之中,因为国家要寻求对自己权力和财富的支持。”(Clark and Dear 1984:4)因此对国家结构的解释大部分来自那些在同一国家的司法中起作用的

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marxisant)的对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分析者同样地从总体上展开了某种版本的帝国主义(即国内经济利益向国际领域的延伸)的理论,这一说法把他们归入了图示的生产模式一类。

在一种最广泛和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中,佩里·安德森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在近代早期的典型的西方国家群是建立在非农奴的和优越的城镇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贵族专制主义;典型的东方国家群是建立在农奴和征服的城镇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贵族专制主义。对比之下,瑞典的专制主义是建立在独特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它结合了自由农民和作用不大的城镇;换句话说,结合了普遍分布在贵族割据的大陆上的两个“矛盾的”变量。(Anderson 1974:179—180)

安德森同样把在意大利没有出现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归结为城镇的贵族政权和周边附属领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贵族政权表现得既像统治者又像掠夺的地主。他坚持认为:“正是西方专制主义既统治着更为先进社会的更为强大的封建贵族的政治机构迫使东方的贵族采取相同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Anderson 1974:198)这一看法使得他描述的图景更为复杂。因此,在(欧洲的)易北河两岸羽毛丰满的专制主义国家反映了使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封建地主地位现象,但是在东方和西方,军事威胁却在不同地冲击着封建地主的地位。安德森着重于更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把他的注意力瞄准 16 到 17 世纪,但是他的对欧洲千年跨度的总的路向值得仔细注意。与此同时,它对欧洲国家形成又太缺乏广泛的解释。当生产方式说在总体上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的同时,它对于如何解释那些有着相同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形式和活动上的差异,确实只给出了最模糊的线索。

世界体系分析

国家形成的世界体系分析把国家形成道路的差异解释为世界经济的作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把经典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和劳动的分离扩大到了世界范围,从而把分析推进到世界体系领域——仍然从经济结构中找出国家间的关系,但是把单个国家的结构看成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结果。(参见 Taylor 1981)沃勒斯坦对1500年以来的欧洲历史的宏大考察(Wallerstein 1974—1988)总体上遵循着国家形成的螺旋道路: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源于某种国家的某种阶级结构;那个国家的特点以及那个地区的生产者、商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关系决定着该地区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核心、边缘,还是半边缘。而这一地位又随之极大地影响那国家的组织。在这种有希望的分析中,国家出现主要是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工具,作为在世界经济中为那个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然而,世界体系的分析至今为止都未能产生出一种表述清晰的把国家的实际组织结构和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相联系的理论。因此,沃勒斯坦对17世纪荷兰霸权的解释(wallerstein, volume II, chapter 2)没有为荷兰的国家结构提供解释——特别是未能解释该国家的作为一个模糊的民族国家的繁荣,而与此同时,它的邻居却创造出大量的市民阶层和常备军队。

对于我们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迫切问题,这四条解释路线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四者的结合则更难以令人满意。大多数可行的解释都失败了,因为它们忽视了这个事实:在欧洲历史的不同阶段许多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是可行的,因为他们是在国家的个别特征上而不是在它们之间关系上寻找对国家与国家之间差异的解释,因为他们含蓄地假设了某种建立在19和20世纪支配着欧洲生活的众多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有目的的努力。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较强的指导,但是迄今为止它们对于把世界地位和具体国家的组织和实践相联系的实际机制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特别是他们没有抓住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形成的整个过程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集权主义的分析则做得更好。

我和我的同事在出版于1975年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就希望能弥补现有文献中的这些缺陷。在一系列强调国家形成的榨取和压制方面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自觉地关注战争、治安、税收、食物供应的控制和相关的过程,自觉地和当时流行的政治发展模式保持距离。在回溯中,我们的批判,在指出解决问题的政治发展的分阶段模式中的缺陷方面比作为

对欧洲国家形成的另一种解释更为有效。事实上,我们隐约地用一种新的分阶段说法——一种从战争到榨取和压制,再到国家形成的说法——替代了老的说法。我们或多或少毫无思考地继续假定欧洲国家遵循着一条主要道路,一条由英国、法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作为标志的道路,以及其他国家的经历就构成了相同过程的减弱的或失败的版本。这是错误的。本书打算纠正前一书中的错误。

幸运地是,对于这一计划我们有着重要的榜样。三位伟大的学者——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和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虽然他们最终未能形成对欧洲国家形成差异的综合解释,但他们摆脱了标准文献的某些理论缺陷。小巴林顿·摩尔在他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试图解释(正如他的标题所暗示的)为什么在 20 世纪某些国家继续实行代议制而其他国家却具有这种或那种的独裁统治的特征。虽然他对单个国家的所有解释是范围广泛且有细微差别的,但当他涉及国家命运的差异时,他把存在于 20 世纪 40 年代政府形式作为参照点,而且把在该国家的农业开始广泛的商业化时流行的阶级联合(coalitions)强调为“起源”。根据摩尔的说法,大的剥削性质的地主经受了向密集的经济作物的农业的过渡,在此范围,独裁政府也延续到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相适应的是某种形式的民主也保留了下来。

摩尔的有见地的分析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的分析集中于某一历史时刻的政府条件的解释,因而未能解释在此重要时刻前后相同的民族所经历的政府的不同形式。他的分析有意地忽视了较小的国家、附庸国和那些灭亡了的国家,对于把某种形式的阶级权力转化为政府的特殊模式的实际机制也说得很少。但是他的分析用了很大的力气来提出本书的问题。它指出了认真对待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国家中占优势的阶级联合方面的变化和差异的解决办法。

斯坦·罗坎在他的早期生涯中对欧洲政治体制的可变性和邻近国家发展出相似政治结构的趋势着迷。他最终走向用图解地图来表现欧洲国家中的差异,这些地图包括反映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不同影响的南北维度,一条东西向的区分沿海地区(seaward peripheries)、沿海帝国国家、

城邦国家地带、近陆的(landward)帝国国家和内陆缓冲国家的分隔线,加上在此两个维度内的更细微的差异。

罗坎在拿出概念地图(Conceptual map)的满意版本之前就过世了。他原封不动地留下了他未完成的工作。他的图解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国家形式方面的显著的地理差异的关注。他的图解突出了欧洲中部城市化的地带的国家形成的特色,而且暗示了在统治者、相邻大国、统治阶级和宗教机构之间关系的长期变化的重要性。但是他的图解也留下了一个把这些变化和可选择的国家轨道相联系的关于实际社会过程的糊涂观点。很难看出,罗坎如果不把他的地图撤到一边并集中精力于国家形成机制的分析,他怎么能够走得比此更远?

刘易斯·芒福德做出了不太显著的贡献。他形成了一种城市主义的门槛和平衡的理论。在芒福德看来,两种大的力量促使城市成长:政治力量的集中和生产方式的扩张。在最低水平的权力和生产结合的门槛之下,只存在一些村落和区域(bands)。在此门槛之上,城市的特点取决于相对的和绝对的权力和生产的水平:节俭的、平衡的权力和生产水平赋予古典城邦(classic polis)和中世纪城市以凝聚力;政治权力的过分增长预示着巴洛克(baroque)城市;生产的过度膨胀创造了19世纪的工业城镇(Coketowns),而在两个方向上高度集中则产生了今日的压倒一切的城市。图1.2用图解的方式表现了这种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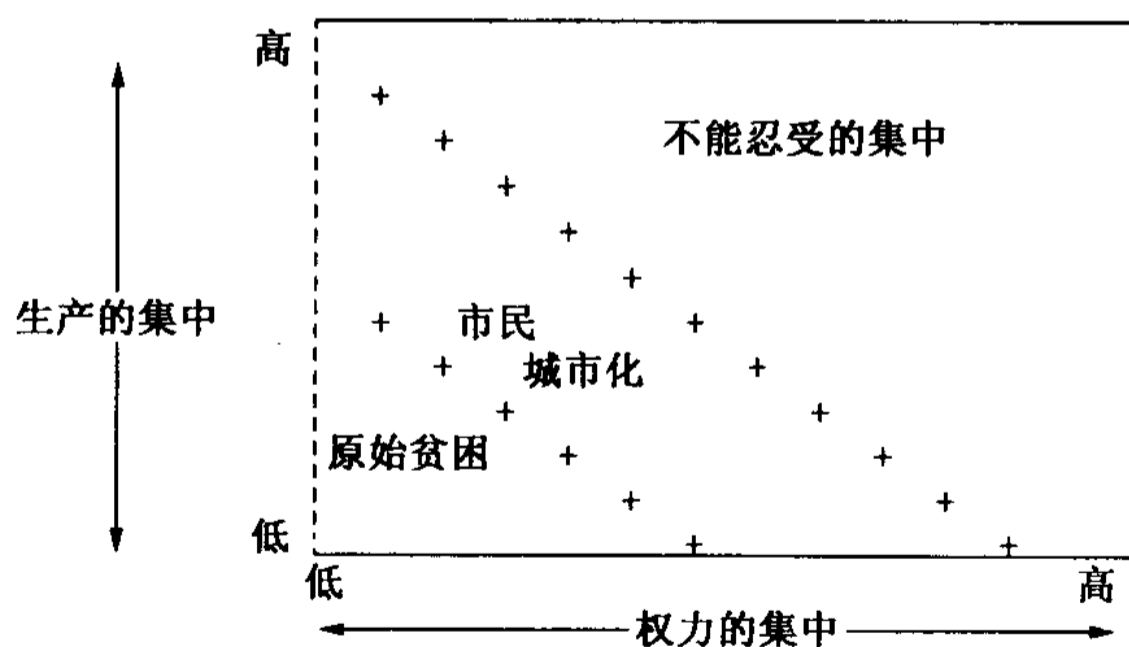


图 1.2 刘易斯·芒福德暗示的城市化模式

芒福德指出了在国家层面上的相同效果。他在1970年写道:“很少有人怀疑,至少在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庞大的技术联合体(the Megate-

chnic Complex)现在正处于它的权力和权威的顶峰,或者正在迅速接近顶峰。用可以客观测量的物质的术语[能量单位、商品产出、‘亏损’(bads)投入、大范围的强制和大面积的破坏能力]来说,这种体制几乎完全实现了它的理论的维度和可能性;而且如果不是用更为人性化的标准来评价的话,它就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成功。”(Mumford 1970:346)芒福德良方的直接来自这一分析:他主张,降低生产和政治权力的规模,更为人性化的城市就会出现。

由于芒福德从未详细地阐述这一分析的论点,他没有指出这一论点对于国家形成的暗示。他在大多数时间把统治的形式看成是流行的技术,特别是战争技术的结果。但是他的分析清楚地指向取决于生产和权力的主要结合的国家形成的另一轨道。

因此,本书着手从下述几点继续小巴林顿·摩尔、斯坦·罗坎和刘易斯·芒福德留下的问题:在认识欧洲不同地方的国家在连续的时代里所遵循的变化道路上的决定性差异这一点上;在认识某一时期盛行于某一地区的阶级联合极大地限制了供统治者或可能的统治者选择的措施的可能性方面;在特殊假说方面,即有着活跃的资本家的早期城市占优势的地区会产生出和那些大地主及其地产占优势的地区不同的国家方面。它在两个方面大大地超过了摩尔、罗坎和芒福德:首先是把强制的组织和战争的准备恰当地放进了分析的中心,提出在紧急关头国家机构似乎主要是作为统治者获取战争工具的努力的副产品;其次是主张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战争和战争的准备,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整个过程。因此在本书中我从积聚的资本、集中的强制、战争的准备和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中得出了国家形成的另类历史。

本书的主要论点并没有太多地进行重复摩尔、罗坎和芒福德分析的综合。即使在它最简单的形式上,此论点也必然是复杂的;它指出在欧洲的经验中:

控制着集中的强制资源[陆军、海军、警察部队、武器和其他等价物(their equivalent)]的人通常企图使用这些资源来扩大对其运用权力的人口和资源的范围。当他们没有遇到相当的也掌握强制的对手,他们就获胜了;当他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他们就进行战争。

某些征服者对辽阔领土上的人群成功地实行了稳定的控制,并且有权常规利用部分在这领土上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就成了统治者。

每一种统治形式都面临着在某一特定环境内对它的作用范围的重大限制。超越这一范围的努力产生出战胜或控制的分裂,伴随结果是大多数统治者同意接受征服、防范强大的敌手、与合作的邻国共存的结合。

在某一特定地区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为大家制定战争的规范;而弱小一些的统治者则面临着在使自己接受强大邻居的要求或者为准备战争做出异常的努力之间进行选择。

战争和准备战争就使统治者参与从那些拥有必要资源(人员、武器、供应或者购买这些的金钱)的其他人或者那些如没有强大的压力或补偿就不愿意投降的人处榨取战争的资源。

在其他国家的要求和回报所确定的范围内,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争夺就产生了国家的中央组织结构。

在国家领土上的主要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它们和国家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统治者用来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由此引发的斗争,榨取和斗争确定了持久组织的类型,因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

从欧洲的强制密集地区(即城市很少且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在那里直接强制在生产上起着主要作用)到欧洲的资本密集地区(即有许多城市且商业占优势的地区,在那里市场、交换和市场导向的生产盛行),主要社会阶级的组织及它们和国家的关系差异很大。主要阶级对国家提出的要求及他们对国家的影响也作相应的变化。

因此不同榨取策略的相对成功、统治者实际运用的策略从强制密集地区到资本密集地区有很大的变化。

结果,国家的组织形式在欧洲的这些不同地方有着显然不同的轨道。

到底哪种类型的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欧洲某一地方流行,这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到了一千年(millennium)的后期,民族国家才展示

出比城邦国家、帝国和其他常见的欧洲国家形式明显的优越性。

然而,日益增长的战争规模以及欧洲国家体系通过商业的、军事的和外交的交往形成的交织,最终把进行战争的优势给了那些能够把常规军队投入战场的国家;能够利用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经济相结合的国家胜出(won out)。它们制定战争规范,它们的国家形式在欧洲也成了主流的形式。最终欧洲国家都集中到这种形式:民族国家。

在此的某些概括(例如,战争建立起国家结构的趋势)适用于大部分的世界历史。其他的概括(例如,在强制密集地区和资本密集地区的鲜明对比)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我们在追寻摇摆于有点特殊和格外一般之间的历史。在这两个方面,我将试图提供足够的具体的历史证据使得这些原则易于理解和可信,但并不会多得把这些原则掩埋于细节之中。

如果我们解释了欧洲国家所经历的不同道路,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当今非欧洲的国家。并非非洲国家或者拉丁美洲现在正在重演欧洲的经历。相反:欧洲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然后把自己的强权强加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事实确保了非欧洲的经验将是不同的。但是如果突出欧洲人首先建立的体系的持续的特点,确认欧洲经验中变化的原则,我们将会处于更好的地位来详细说明关于当代国家什么是与众不同的,它们正在什么样的历史强加的限制下运行,以及在国家特色中的什么关系可能在我们自己时代延续。心中确切带有这一目的,本书的最后一章从对欧洲经验的分析转向对今日第三世界军事力量的考察。

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在欧洲国家存在的早期几个世纪里,欧洲国家在地中海周边的庞大的穆斯林强国和雷电般越过欧亚大平原向西挺进的游牧民族征服者留给它们的空间里迅速地增长。当穆斯林、蒙古人和其他外来者攻城掠地之后,他们通常会设立军事统治者和设立能带来重大收入的贡赋制度;然而他们并不会决定性地干涉当地社会安排。在他们自己的空间里,欧洲人耕作、制造、贸易,特别是相互交战。他们从而几乎不经意地创造了民族国家。本书将要阐述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和为什么要创建民族国家。

第三节 资本和强制的逻辑

本论述主要涉及资本和强制。它阐述在民族国家的创建中起主要作用的强制的运用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资本操纵者(它们的活动产生了城市)的方式。当然这两种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图 1.3 代表着一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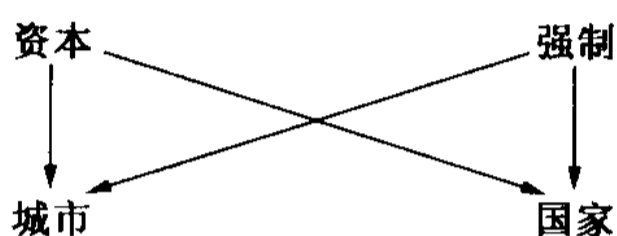


图 1.3 资本和强制如何产生城市和国家

尽管国家强烈地反映了强制的组织,它们实际上也展示了资本的作用;正如本书其余部分将要证明的,资本和强制的不同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国家。此外,城市特别反映资本的变化,但是强制的组织也影响它们的特征。刘易斯·芒福德的巴洛克城市像同类城市一样建立在资本之上,但却在宫殿、检阅场、军营中展现了超过其他城市的更加显然的高贵权力的迹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地方迅速地增长,与此同时,(伪装成治安和国家干预的)强制的影响也在扩张。

资本-城市-剥削

然而在进入这些复杂解释前,分别探讨一下资本和城市、强制和国家的关系是有益的。让我们充分地思考一下资本,包括所有有形流动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可实施的所有权。那么资本家是擅长于资本的积累、购买和销售的人们。他们占据剥削的领域,在那些领域里生产和交换的关系本身就产生出剩余价值,资本家攫取那些剩余价值。资本家常常存在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是指雇佣工人用资本家拥有的物质来生产产品的制度。在大部分历史中,资本家确实主要是作为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而不是作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出现的。在资本的历史中,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出现很晚。在欧洲它是在 1500 年后(当资本家夺取了生产的控制权时)才成长起来。它在 1750 年后(当资本集中的制造业在许多国家成了繁荣的基础时)达到了自身的顶点——根据你的视角,或者说最低点。在此前的 1 000 年里,资本家迅速崛起并没有太多地干预生产。

积累和集中资本的过程也导致城市的产生。在本书的分析中,城市作为资本家喜爱的场所和本身作为组织力量显得非常突出。家庭的存在,通过雇佣、投资、重新分配或其他密切的联系,取决于资本的存在,在这个程度上说,人口的分布追随着资本的分布。(然而,资本有时追随着廉价劳动;这种关系是相互的。)贸易、仓储、银行业以及紧密依赖它们的生产都从相互接近中受益。在农业生产力确立的界限内,这种接近促进了密集的有着广泛的外部城市联系(outside connections-cities)的不同的人口聚集。当资本在一片领土内积累和集中时,在这片领土上就会出现城市的增长——在集中的最高点比较剧烈,其次在其他地方(参见图 1.4)。然而在城市增长的形式取决于集中和积累之间的平衡。在资本积累表现非常一般,但集中保持相对较低的地方,发展出许多更小的中心。在资本单独集中的地方,城市人口以此为中心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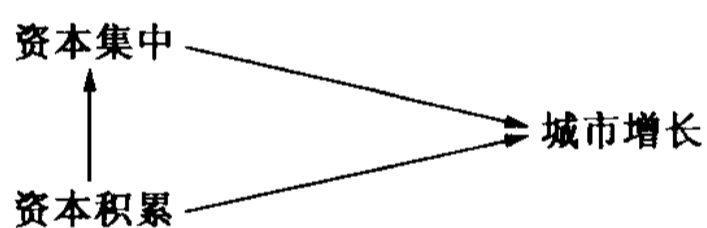


图 1.4 资本如何导致城市增长

那么,恰当地说,城市代表地区的经济;在每一城市或城市群周围都有一个和该城市有着密切相互作用的农业和贸易区(有时也是制造业区)。在积累和集中前后相随的地方,一个从小中心到大中心的等级趋向形成(参见图 1.5)。这些趋向总是在重要的界限内起作用。城市人通常总是依赖他人来获取大部分或者全部食物和燃料;为大城市运输或储存这些生活必需品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直到最近,世界上大部分农业地区,包括欧洲的农业地区,产出太低,以致不能支持附近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离开土地生存。而且,不能通过低成本的水上运输方便地到达农业地区的城市面临着令人生畏的昂贵的食物费用。柏林(Berlin)和马德里(Ma-

drid)提供了很好的例子:除非它们的统治者用武力来支撑它们,否则它们不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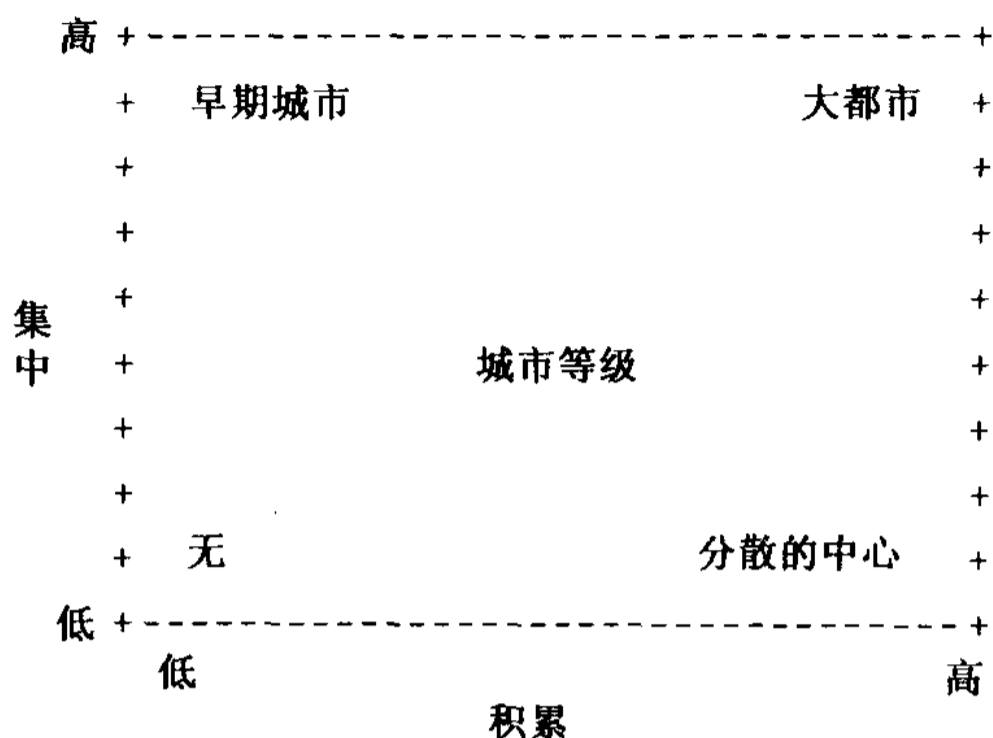


图 1.5 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函数的城市增长的不同形式

健康也很要紧。在过去的几乎整个一千年里,尽管它们不同比例地招募处于工作年龄的身体强壮的移民,城市比起远离城市的地方有着高得多的死亡率。只是在 1850 年后,随着城市卫生和营养的改善,这一天平转向有利于城市居民。结果,只有当农业和运输变得相对高效率或强大的压力驱使人们离开土地,城市才迅速地增长起来。

然而纯粹的城市增长在所有这些方面产生了一条变化的螺旋线(spiral)。在活跃的城市附近,人们在农业上更加精耕细作,并把更高比例的农业用于经济作物;例如在 16 世纪的欧洲,高产的农业集中在两个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同样,城市的生长刺激了水路和陆路运输的产生和改进;荷兰人的优良的运河系统和可通行的河流水系降低了在城市群之间交往的成本,并提高了交往的速度,从而在城市化方面起了原因和结果的双重作用。(de Vries 1978)而且正如当城市的地主从偏远地区驱赶小业主或者城市需求支持了偏远地区的农业资本化时,迫使人们离开土地的压力常常部分地来自城市化。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支持了城市的生长,并同时改变新的城市群落周围的地区。

强制-国家-统治

什么是强制? 强制包括对某种行为的所有有关的(威胁的或实际的)

运用,这种行为常常给清楚这种行为及其潜在损害的某些人、某些个人的财产或某些群体带来损失或伤害。(这种繁琐的定义排除了无意的、间接的或隐含的损害。)在资本确定剥削范围的地方,强制确定统治的范围。强制的资源以武装力量为中心,但延伸到用于监禁、剥夺、羞辱和发表威胁的设施(facilities)。欧洲创造出了两个相互重叠的大的强制专家集团:军人和大地主;当他们结合在一起并得到来自国家的头衔和特权形式的认可,他们就转化为贵族,然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成了欧洲的主要统治者。强制资源,比如资本,既能积累又能集中:某些集团(如僧侣界)强制资源不多,但是那些不多的强制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其他人(如武装的边疆居民)有许多广泛分散的强制资源。在相同对象(如救济院)为剥削和统治服务的地方,强制资源就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然而,就大部分情况而言,强制资源和资本仍然相互区别足以让我们分别对它们加以分析。

当强制资源的积累和集中一起增长时,它们就产生了国家;它们在非常明确的领土上产生出明显的组织,这些组织控制着强制集中的主要资源,而且在某些方面行使着超过在那些领土上的所有其他组织的优先权(参见图 1.6)。使邻居臣服和击退更远处对手的努力产生了国家结构不仅仅以军队的形式而且以文职人员的形式,这些文职人员聚集资源支持军队和组织统治者对其他市民阶层日常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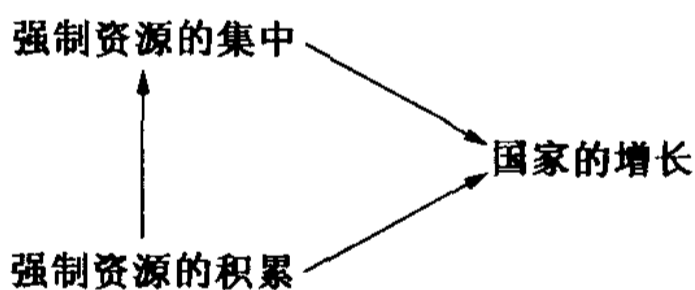


图 1.6 强制如何促使国家的增长

第四节 战争促使国家形成和转变

在战争和国内控制中强制资源的部署给军人们带来了两个困境。首

先,强制的运用者在他们宣称的领土内外成功地征服了敌手,在此程度上,他们却发现自己必须管理他们所获得的土地、货物和人;他们陷入了资源的巧取豪夺、物品、服务和收入的分配和争议的仲裁。但是管理使他们在战争中分心,并且产生出有时说来是不利于战争的利益。在5世纪的基督教军人对穆斯林西班牙的征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困境。从1064年攻占哥因布拉(Coimbra)开始,标准的攻城做法是像这样进行的:

在攻城时迅速投降的城镇居民在征服之后可以保留全部自由。如果穆斯林在攻城一段时间之后才投降,他们只能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东西离开。如果他们等到城池被武力攻破,他们将面临死亡或被奴役。(Powers 1988:18)

三种回答的每一种都给征服者提出了难题。第一种回答(至少是暂时的)带来了建立相应统治的义务。第二种回答需要重新分配财产和住地,需要管理人口减少的城市。第三种把奴隶置于胜利者手中,提出了重建生产和人口这一甚至更尖锐的挑战。这些问题在更大规模上尾随着整个伊比利亚(Iberia)的再次被征服。它们以不同的形式标志着整个欧洲的征服历史。

第二个困境不亚于第一个。准备战争,特别是在大规模上,使得统治者不可避免地陷入巧取豪夺。它建立起需要维持自身和常常比它所服务的陆军和海军增长快得多的税收、供应和管理的基础机构;那些管理基础机构的人获得权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和权力极大地限制了任何具体国家能进行战争的特点和强度。欧洲蒙古人的和鞑靼人的国家用袭击和掠夺而不是建立持久的行政部门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但是他们的策略给他们的权力带来了内在的局限,并最终使得他们易于受到资金充足的大部队的攻击。相反,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如热那亚,通过出借或签约转让榨取战争资源所需要的机构解决了这一难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欧洲国家找到了几个协调战争、巧取豪夺和其他重大活动的其他方式。

考虑到他们显著的活动和组织,欧洲国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在990年以来的时期中的主要时间段里,在欧洲的不同地方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迅速地增长:接受贡赋的帝国、如城邦国家和城市联盟的主权分裂的

体系、民族国家。第一种建立了庞大的军事的和掠夺的机构,但是把大部分地方的管理留给保持高度自治的地方豪强。在主权分裂的体系里,在战争和榨取中暂时的联盟和商议机构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很少有持久的国家机构以民族的规模出现。民族国家在相对协调的中央机构中联合了大量的军事的、榨取的、管理的、和有时甚至是分配的和生产的组织。三种类型的长期存在和共存,反驳了任何把欧洲国家的形成说成是单一的直线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成作为自然的优越的政府形式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的主张——虽然民族国家最终流行起来。

许多世纪以来,接受贡赋的帝国在国家的 world 历史中一直占优势。帝国主要出现在可用资源高度集中而强制资源积累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当皇帝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积累起重要的强制资源时,或者说当皇帝失去了部署大规模的强制的能力时,帝国常常分崩离析。尽管有着大规模的持久性的表象,中华帝国不断地遭受着起义、侵略和自治运动,并且长期把大部分财力用于给蒙古人和其他的游牧掠夺者进贡。欧洲的帝国也没有享有更大的稳定。例如,拿破仑 1808 年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入侵打碎了西班牙海外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几个月内,独立运动在西班牙属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风起云涌,实际上在十年之内整个地区都分解为独立国家。

联盟、城邦和主权分裂的其他形式几乎在每个方面不同于帝国。它们依赖于强制的相对高的积累和相对低的集中;14 世纪西欧广泛存在的城市武装民兵就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在这些国家里,名义上的国民相对小的联盟可以和统治者的军队抗衡,而个人、团体及至整个人口都有大量的机会叛逃到对手的管辖区域。

14 世纪的普鲁士(Prussia)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提供了一种相反的生动的对照:在当时由条顿骑士(Teutonic Knights)统治的普鲁士,没有大的君主能与骑士统帅(Knights' Grand Master)匹敌,城镇拥有很小的权力。但是只要税收能流到骑士们的口袋里,骑士支持的地主在他们自己大片的领地内就有很大范围的处置权。在附近的波美拉尼亚(较小规模的德国征服者及其联盟同时建立起公爵领地(duchy),正如城镇在公爵领地的阶层中占优势并提供战时主要的武装力量,许多武装的反对公爵的敌手出现了,较小的贵族则转向了彻头彻尾的盗匪活动。

1326 到 1328 年的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公爵之间的战争中,波美拉尼亚的城镇通常都支持他们的公爵,而贵族们则和梅克伦堡结盟。当波美拉尼亚王室赢了,在其城市有许多发言权的贵族阶层“被授予广泛的特权:对小公爵的保护权,新的公爵(ducal)城堡是否要建或者要拆毁的决定权,选择新国君的权利(如果公爵不遵守诺言或欺骗了他的国民)”(Carsten 1954:90)。城市给予或拒绝支持的能力给了它们很大的讨价还价的力量。

介于收受贡赋的帝国和城邦国家之间的是民族国家——像其他国家一样它们也是围绕战争、国家建设(statemaking)和榨取建立的,但是它们还受到国民们为了更多地投资保护、仲裁(adjudication)、有时甚至是生产和分配而转让强制资源的讨价还价的压力。普鲁士的晚期历史说明了这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在 14 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条顿骑士在那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在 15 世纪,受到瘟疫、农民的迁出和军事失败震动的骑士们开始解体,而以前受他们控制的地方权贵凭借自身实力成了普鲁士政治豪强。他们运用自己的权力给留在他们土地上的农民强加越来越多的限制;伴随着强制劳动,日益强大的地主转向了庄园农业和向西欧出口谷物。

在此同时,随着城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和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自身调停能力被削弱,以前受到公爵们和富裕市民们(burghers)联盟所削弱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波美拉尼亚的统治者们开始在他们和城镇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获胜。接着那些统治者们不得不和以贵族为主的阶层(noble-dominated estates)讨价还价,它们拥有批准或者拒绝把皇家收入用于战争和王朝扩张的基本权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霍亨佐伦(Hohenzollern)的伯爵们在后来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的地方为了出人头地奋勇拼搏,在此过程中吞并了原来的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公爵们订立婚姻的和外交的联盟,这些联盟最终把他们的领域扩张到了邻近的地区,扩张到了莱茵河下流的资本丰富地区;他们和贵族订立协议,把特权和权力转让给他们地区的地主,但是给予君主享用常规税收的权利。

从战争、谈判、条约和世袭权力(inheritances)中诞生了民族国家,在

这个民族国家中普鲁士、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大地主在从未被国王剥夺的领域内有很大的权力。在 18 世纪,君主们,如费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把农民和地主都征入军队,从而把这种结构的最后部分并入了受其他因素控制的地位。普鲁士的军队酷似农村,贵族当军官,自由农民则当军士,农奴就做普通士兵。农民和农奴都付出了代价:许多农民降为农奴,而且“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旧普鲁士的军队的义务削弱了农奴相对(vis à vis)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法律权利和财产权”(Busch 1962:68)。在这一方面,普鲁士走了一条不同于英国(农民成了领取工资在农村工人)和法国(直到 19 世纪,农民拥有大量的财产)的道路。但是普鲁士、英国和法国都受到了君主和主要阶级在战争资源上斗争的震动,都看到了随后的持久的国家结构的产生。

作为军事同盟和对手,普鲁士、英国和法国也塑造彼此的命运。这种情况在本质上,民族国家总是出现在相互竞争中,并从和敌国的对比中获得它们的身份;它们属于国家体系。图 1.7 系统表现了在国家结构的主要类型之间的大的差异。就在 990 年后,有关国家的所有四种类型的成熟例子存在于欧洲的不同地方。羽毛丰满的帝国繁荣昌盛直到 17 世纪,分裂的主权国家的最后的主要区域在 19 世纪晚期变成了民族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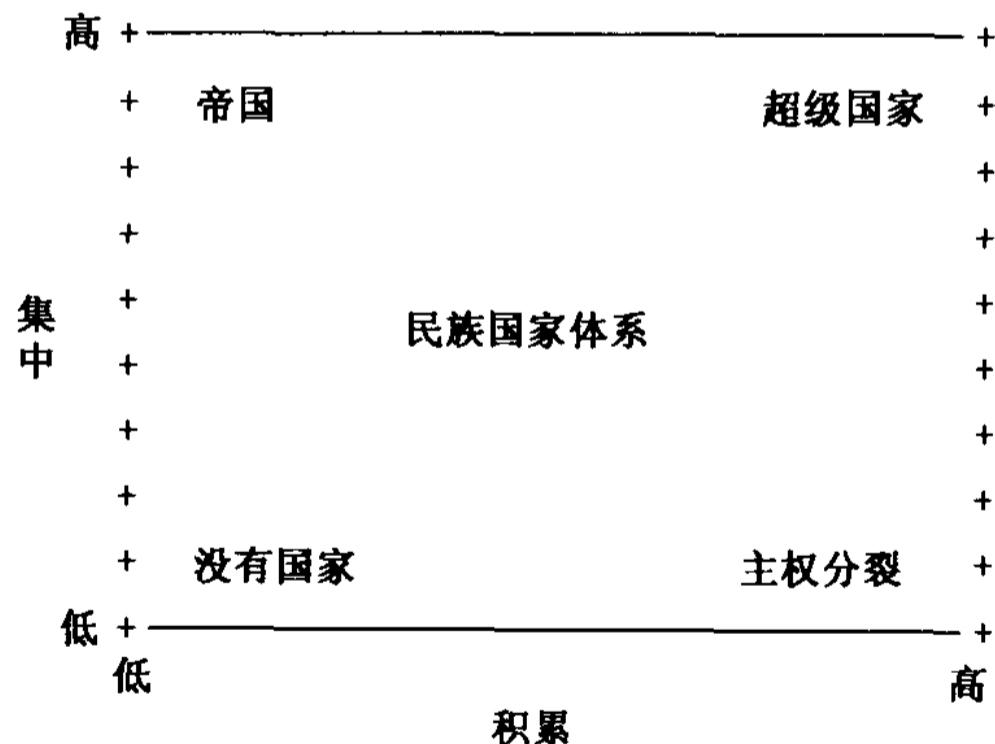


图 1.7 作为强制积累和集中功能的国家增长选择性条件

三种类型的统治者面对着某些共同的问题,但是以不同的方式面对。他们必然地把强制的资源不平衡地分布在他们寻求控制的领土上。他们

最经常地把力量集中在中心和边疆,企图在中心和边疆借助于第二级强制群、忠诚的地方强制实施者、四处游荡的巡逻队和广泛的情报收集等手段来维持他们的权威。例如,土耳其帝国创造了两个重叠的系统,一个是由卡迪斯(kadis)统治的由卡扎斯(kazas)和市民管理的其他单位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由军事头目统治的由桑卡克斯(sancaks)和封建骑士的地区组成的系统;在战时,军事系统以财政上的损失为代价兼并市民系统。(Pitcher 1972:124)

然而,国家越大,强制和资本的分布差异越大,抵制中央控制和在国家的不同的(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的)敌人之间形成联盟的刺激也越大。在19世纪土耳其的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桑卡克斯(sancaks),为帝国服务的权贵们

逻辑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能够通过创造自己的再分配系统而不是简单地当再分配管家(stewards)使自己致富。他们在农民的生产中夺取一份,对牲畜的通行征收非法的通行费,获取一部分关税站收取的费用,那些关税站大多设在萨瓦(Sava)和达鲁比(Danube)的贸易中心(entrepôts),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因为舍瑞斯(Serres)和萨罗尼克(Salonik)运往维也纳和德国的棉花出口必须经过贝尔格莱德。他们特别坚持对九一税的权利,即在收税官(作为对国家的骑士服务的交换)收取了什一税(the deseto or tenth)之后的显然不合法的农民收成九分之一的贡赋(tribute)。通过这种行为或者其他对个人或财产的暴力行为,从众多塞尔维亚农民处榨取的此类款项突然增一倍或增两倍。(Stoianovitch 1989:262—263)

这类的权力转移广泛地发生在19世纪的土耳其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但是在一种说法或另一种说法中,在欧洲的每一处的间接统治代理人都面临着模仿他们的塞尔维亚表亲的诱惑。考虑到通讯的成本和君主的地区代理人通过规避来自中央的需求或者通过当地或个人目的使用委派代表的国家工具可能获得的好处,所有统治者都面临着对其霸权的不断的挑战。

帝国的统治者们通常试图在不彻底改变他们权力基础的前提下指定地方和地区的权力执掌者,试图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皇家仆人集团(通常

是现在或过去的军队中的战友),他们的命运依赖于君主的命运。一个极端的例子,马穆鲁克*的苏丹们(sultans)有着一个成为武士和管理者的被奴役的外国人等级;然而除了直接用于奉养官员的封地(fiefs)外,马穆鲁克在他们的领域都留下当地的显贵。在这种体制下,自 1260 年到 1517 年奴隶们被实际统治在埃及及其中东的邻近地区。(Garcin 1988)民族国家的统治者通常努力建立一个纯粹管理的等级制度,消除权力自治的基础。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选帝侯**和国王们转让了很大的权力给拥有土地的容克***,但是通过官职(offices)、免税和兵役(military service)等手段把他们紧紧地和君主联在一起。

那些在城邦国家、联邦和其他主权分裂的国家内进行统治或者声称进行统治的人经常设法对一个城市和它的紧接的内地实施严密的控制。然而,超出那个范围,他们就不得不和抗衡中心的当权者们讨价还价。对地方的控制通常不仅依靠城市的强制力量,而且也依靠城市统治阶级对农村土地的广泛占有。在 14 世纪一旦佛罗伦萨(Florence)开始其超出城市范围(municipal level)的侵略扩张,它的专制统治者就会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人来替换被征服城市的统治者,但是还是从当地的显贵中挑选替代者。

所有这些安排给地方当权者留下了很大的权力和处置空间,只要他们抑制君主的敌人并保持财政收入流入该国首都。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上,直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也许,除了瑞典)作出过认真的努力来构建一个从上到下的直接统治。在此之前,除了最小的国家外,所有国家都依赖某种版本的间接统治,从而冒着严重的不忠、欺骗、腐败和反叛的风险。但是间接统治使得不用建立并在财政上支持和豢养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统治成为可能。

转向直接统治使得统治者能通过户籍税、大的征募、人口调查、警察系统和许多其他对小范围的社会生活的入侵来接触他们所控制的市民和

* Mamluk, 中世纪埃及的军事统治阶层成员。——译者注

** electors, 德国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译者注

*** Junkers, 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译者注

资源。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以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和市民权利和额外补贴的建立为代价的。这种渗透和讨价还价在扩大政府预算、人员队伍和组织结构的同时奠定了新的国家结构。我们时代的什么都管的国家开始成型。

很容易把国家的形成看成某种工程,把国王和他们的大臣们看成设计工程师。四种事实构成了可靠设计的形象。

1. 很少有欧洲君主在心目中有一个关于他们创建的某种国家的准确模式,甚至他们很少有效率地努力来创建一个如此模式的国家。例如,就像豪特维勒的诺曼·罗吉尔(the Norman Roger de Hauteville)在1060年到1075年间从阿拉伯的控制下夺取了西西里(Sicily),他通过收编现存的穆斯林机构的残余拼凑了一个政府,把穆斯林士兵收入自己的军队,并且保留了穆斯林、犹太教和希腊基督教的教堂,但是攫取了大片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并把其他土地瓜分给他的下属。曾经属于西西里的加勒布利尔(Calabria)在文化上和政治风格上依然保留着希腊遗风(remained very Greek),拜占庭(Byzantine)的官职和仪式被整个地引进到诺曼政府。但是阿拉伯的体制也有其一席之地:罗吉尔的主要大臣有着奇妙的头衔——埃米尔的埃米尔(Emir of Emirs)和阿肯特的阿肯特(Archonte of Archonte)*。导致的国家当然是与众不同并且新颖的,但是它并不是来自一个连贯的计划。豪特维勒的罗吉尔和他的下属们创造了一个改编和即兴拼凑的拼图(mosaic)。(Mack Smith 1968a:15—25)

2. 没有人设计了民族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库、法庭、中央政府等等。它们通常或多或少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通常它们来自执行更为直接任务的努力,特别是为了创建和支持武装力量的努力。在17世纪30年代当法国国王极大地扩大了它对欧洲战争的参与,把它的信誉推到了崩溃的地步,通常为国王的大臣们筹集资金的地方当局和地方官员们停止了合作。在此时刻,首相里奇留(Richelieu)在绝望当中开始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强迫或者绕过地方当局。(Collins 1988)那些特使们是皇家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成了在科尔伯特(Colbert)和路易十四

* Emir 和 Archonte 均为穆斯林国家的官职。——译者注

统治下的法国地区的国家政权的主要依靠。只有在错误的回顾中,我们才会把地方行政长官想象成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有意设计的工具。

3. 其他国家——最终整个国家体系——极大地影响了任何具体国家遵循的变化道路。从 1066 年到 1815 年,和法国君主的大战形成了英国国家,法国的干涉使得英国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企图变得更加复杂,法国的竞争刺激了英国采取荷兰的财政改革。从 16 世纪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的战争的解决经常会重新组合欧洲国家的疆界和统治者;德国的分裂,苏联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的吞并以及大多数欧洲的海外帝国的分崩离析,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直接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无法合理想象一种自我引导、自己运行的国家。

4. 和国民(subject population)中的不同阶级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极大地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例如,流行的起义通常都失败了,但是每次大的起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特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些形式如镇压的政策、支持或反对国家的阶级重组、规定所影响党派权利的明确的解决。在 1378 年的佛罗伦萨工人(人民党, the Ciompi)激烈的起义中,在起义当中形成的三个新羊毛工人行会中的两个投向政府,从而破坏了在城里夺取了有效权力的统一战线;在解决当中,仍然在起义(更多是无产者)的行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权利,而那两个合作者就加入到自诩为或者被看作官方市政府的一部分的行会。(Schevill 1963:279; Cohn 1980:129—154)

在更小的规模上,骑士、金融家、市政官员、地主、农民、工匠和其他成员的反抗和合作,从长远的观点看,创造了或重新创造了国家结构。因此属于某一具体国家管辖范围内百姓的阶级斗争大大地影响了那个国家的组成,而从欧洲某个部分到另一部分的阶级结构的差异在国家的特点上产生出系统的地理差异。不仅是统治阶级,而是所有那些其资源和活动影响了战争准备的阶级都在欧洲国家(特点)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例如,有两个事实深深地影响了瑞典国家的形成:第一,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的大量存在;第二,地主在形成大的地产或强迫自己土地上的农民方面相对无能。那种例外的农村阶级结构阻碍

了皇室为了换取贵族在从农民身上榨取财富和军事服务方面的协作,授予贵族财政和司法特权,及在迫使农民服从贵族意志方面给予贵族帮助的策略——即使这样的策略在邻近地区,如普鲁士和俄罗斯也十分流行。这也有助于解释实际上对政府行为有某种权力的独立的农民地产的存在,也有助于解释这一事实:在其帝国扩张时期,瑞典迅速地从雇佣欧洲市场的外国雇佣兵转到创建民兵组织——其成员获得土地或者获得来自土地的收入作为他们服务的回报。在瑞典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周围的阶级结构束缚了统治者创建武装力量的努力,从而在国家的这一组织上留下了它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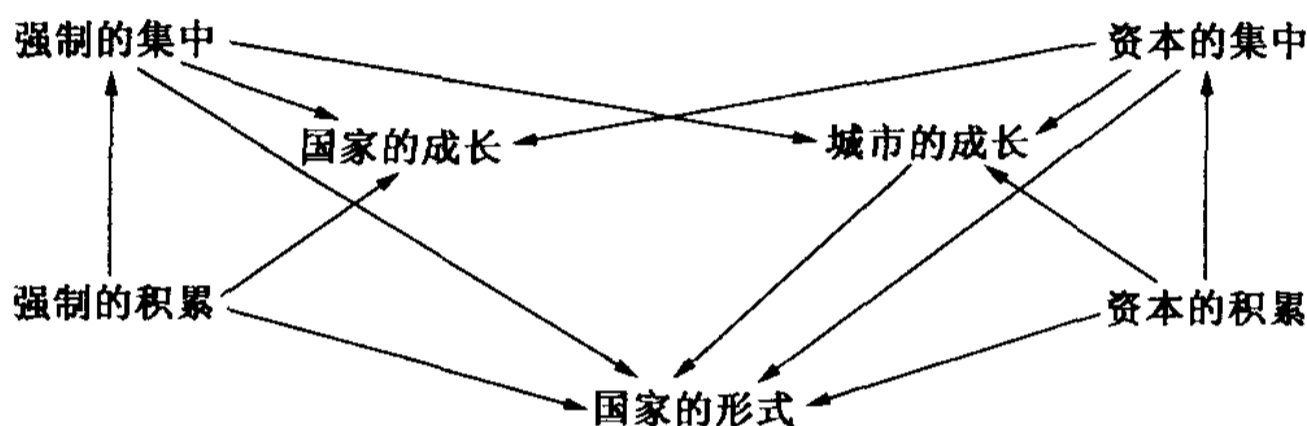


图 1.8 强制、资本、国家和城市的关系

在图 1.8 给出了基本关系的一个更一般的更系统的说明。这个图呈现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前面所调查的理由:战争和战争准备使得统治者要从拥有必要的战争资源(人力、武器、装备或购买武器装备的钱),但没有强大压力或补偿不愿意交出那些资源的他人那里获取战争手段。主要社会阶级在一个国家内的组织、它们和国家的关系都极大地影响了统治者所采用的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抗、所引起的斗争、榨取和斗争造成的持久的组织类型,从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在由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回报所设立的界限之内,对战争资源的榨取和斗争产生了国家的中央组织结构。主要社会阶级组织及其和国家的关系从欧洲的强制密集地区(城市很少且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在那里直接强制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到欧洲的资本密集地区(城市很多且商业占优势的地区,在那里市场、交换和市场导向的生产比较流行)变化很大。因此主要阶级对国家的需求,那些阶级对国家的影响和统治者实际运用的策略也相应变化。因此,不同榨取策略的相对成功和统治者实际运用的策略从强制密

集地区到资本密集地区变化很大。结果,在欧洲的这些不同地方,国家的组织形式遵循着一条显然不同的轨道。这样的情况 and 下列观点是不相符的,即欧洲的君主们只不过采纳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国家形成模式并努力遵循它。

第五节 长期的趋势和相互作用

另一个错觉也必须消除。到目前为止,我表述了这样的关系,就好像资本和强制总是走向更大的积累和集中。对于我们在此讨论的一千年来说,上述关系一直是主要的趋势。然而即使是在欧洲的经验当中,许多国家在两个方面经历了紧缩;波兰在资本和强制方面遭受了多次反复,前后相继的勃艮第的(Burgundian)、哈勃斯堡的(Habsburg)帝国崩溃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严重消耗了欧洲资本和强制资源的储备。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在总的方面朝着更大的积累和集中方向上向上发展,但是也经过了参差不齐的顶峰和深谷。

积累大概对于欧洲经济史有着较大的长期的影响。但是强制的集中、分散、再集中在国家形成的故事中划分出了主要的章节;集中变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中资本的可利用性。准确地说,为什么和怎样会是这样的思考将贯穿本书的后面部分并把我们将引入财经政策的复杂问题。但是中心的联系是简单的:长期以来,战争和准备战争导致了欧洲国家的主要构件的产生,这种活动远比其他活动的影响要大得多。战败的国家一般都缩小,而且常常不再存在。无论大小,拥有最大强制资源的国家易于赢得战争;效率(投入产出比)变得仅次于效果(总产出)。

通过竞争、技术变化和纯粹的最大的交战的国家规模的相互作用,战争和强制资源的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昂贵。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越来越少的统治者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日常资源中创造出军事手段;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短期的借贷和长期的税收。在资本集中已经存在的地方,上两种活动更容易开展。但是它们在所有地方都在政府组织方面产

生变化。

战争变化和国家组织是如何彼此相关的？作为一个开始的近似，根据从欧洲某个部分到另一部分的短暂变化的限制，我们可以把 990 年以来的时间分成四个阶段：

1. 世袭制(patrimonialism)阶段：在此时期(直到 15 世纪，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部落、封建兵勇(levies)、城市民兵和类似的常规力量在战争中起着主要作用，君主通常从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土地和人口(以贡赋或者租金的形式)榨取他们所需的资本。

2. 经纪人制(brokerage)阶段：在此时代(大约 1400 年到 1700 年，在欧洲的重要地方)由签约人招募的雇佣兵(mercenary forces)在军事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统治者主要依靠正式独立的资本家提供贷款、管理获利的(revenue-producing)企业、建立和征收税赋。

3. 民族化(nationalization)阶段：在此时期(特别是在 1700 年到 1850 年左右，在欧洲的大部)国家逐渐地从它们自己的民族人口中招募人员，创建了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在此同时统治者直接把武装力量纳入国家管理机构，与此类似地接管了财政机构的直接运作，大大地削减了独立签约者的参与。

4. 专门化(specialization)阶段：在此时代(大约从 19 世纪中叶到近年来)军事力量成了民族政府的强有力的专门化部门，财政活动和军事活动的有组织的分离增强了，军队和警察之间的劳动分工加剧了，代表机构开始对军费开支有着重大影响，国家承担了范围大大扩展了的分配的、常规的、补偿的和裁决的活动。

很清楚，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资本和强制的关系有很大的变化。

战争导致国家的改变，转过来改变战争的利害关系。在整个世袭制时期，征服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求贡赋而不是放在寻求稳定地控制他们所蹂躏的领土内的人口和资源；所有帝国都是在这一原则上成长起来的：从众多地区的统治者那里榨取租金和贡礼而不深入地渗透到他们的统治体制中去。在转向经纪人制然后转向民族化阶段，一片管理严密的领土成了值得为之而战的财富，因为只有这样的领土才能提供支持武装

力量的财政收入。但是在专门化时代,国家迅速地积累起它们服务的需求者,以致战争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成了通过获取对其他国家资源的利用来满足统治联盟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欧洲国家体系扩展到整个世界以及伴随的国家疆界的固定,这一手段逐渐意味着给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而不在实际上把它们领土吞并到更为强大的国家版图内。

那些都是大的趋势。但是,资本和强制的不止一次的结合出现在欧洲国家的成长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我们也许可以区分出国家形成的强制密集、资本密集、资本化强制的道路。它们并不像差异巨大的生活条件那样代表可选择的“战略”。处于非常不同的环境中追求类似目标(特别成功的战争准备)的统治者通过和他们统治下的主要的社会阶级形成与众不同的关系来应对外部环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产生出新的差异巨大的政府形式,每一形式或多或少都为适应社会环境做出了调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勃兰登堡和俄罗斯(特别在它们作为收取贡赋的帝国阶段)就是说明强制密集类型的最好例证。在此类型的极端情况下,武装的地主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建立起对其他人的持久的控制;有几个世纪,波兰和匈牙利的贵族们实际上选举自己的国王,而且当国王过于追求超级权力时又把他推下宝座。

在资本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依靠和资本家——统治者小心翼翼为其利益服务——的契约来租借或购买军事力量,从而不用建立庞大的永久的国家机构来进行战争。城邦国家、城市帝国、城市联盟和其他主权分裂的形式通常都归入这一变化道路。热那亚(Genoa)、杜勃留夫尼克(Dubrovnik)、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和曾经一时的卡它罗尼亚(Catalonia)是展示资本密集类型的最好例证。正如荷兰共和国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极端时期,这一类型产生出很大程度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盟以及它们之间的经常的关于国家政策的协商。

在中间的资本化强制模式中,统治者采取上述每种模式中的某些行

为,但是把比他们资本密集的邻国更多的精力花在直接把资本家和资本的来源吞并到他们的国家机构中去。资本和强制的拥有者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相互作用。法国和英国最终遵循着资本化强制模式,比强制密集的和资本密集的模式更早地建立起成熟的民族国家。

在国际竞争(特别是在战争和准备战争)的压力的驱使下,所有三种道路都以和 990 年主要的模式成不同比例的方式最终都汇聚到资本和强制的集中。从 17 世纪以来资本化强制的形式被证明在战争中更为有效,从而为起源于强制和资本的其他结合形式的国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模式。而且,从 19 世纪到近年来,所有欧洲国家比以往更加努力地致力于建设社会基础结构、提供服务、规范经济活动、控制人口的流动和保障公民的福利;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作为统治者努力从他们的国民中获取财政收入和服从的副产品,但是具有它们自己的特性和理论基础而开始的。平均来说,在对人口和分配实行更为直接的有自我意识的控制方面,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和那些在过去一千年里欧洲存在的国家范围相比时,不难看出它们属于和它们的资本主义邻国相同的类型。它们也是民族国家。

在它们最近的汇聚之前,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强制道路导致了非常不同的国家类型。甚至在汇聚之后,国家仍保持着清楚地反映了它们早期历史经历的某些特点——例如,它们代表机构的特点。国家的所有这三种类型在欧洲以往不同时期实际上盛行的某种条件下都是非常可行的。确实,在 1555 年查理五世退位时,欧洲的大部分正处在帝国的霸权之下,而不是处在任何较强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控制之下。

在那个时候,庞大的土耳其帝国舒列曼(Suleyman)[在统治小亚细亚(Anatonia)和中东大部之外]占据了巴尔干岛的大部分,臣服了从伏尔加河到亚德里亚海的所有国家。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皇帝、西班牙的皇帝、哈勃斯伯格斯的长者(the Elder),当时统治着西班牙、荷兰、米兰、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岛(Sicily)、撒丁岛(Sardinia)、奥地利、波希米亚(Bohemia)、勃艮第、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和(更加可争议地)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德国的领土上的众多国家。再往东,波兰、立陶宛、莫斯科和也是以帝国风格组织起来的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s)。在 1555

年,北部意大利、瑞士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重要部分仍然是主权高度分裂的地区,而只有法国、英国像我们民族国家的传统模式。到那个时期,相对于国家的其他形式,城邦国家和其他小规模的组织正在日益丧失地盘。然而,荷兰共和国很快就证明了城市和相邻地域的联盟仍然保持着自己世界强权的地位。而且帝国正在发展。此时没有什么能保证民族国家的最终胜利。

教训是清楚的。用 20 世纪的实力作为有效的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准(正如许多分析家所为)意味着屈服于目的论的诱惑,误解了欧洲过去的城市、国家、资本和强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追寻国家创立者的选择和这些选择的结果,从早期(在此随意地定在 990 年)追寻到现在来避免这些缺陷。

这种向前看的策略会使我们得出对本书关键问题的某些暂时性答案。这一关键问题是:怎么解释 990 年以来在欧洲主要的国家类型上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成不同种类的民族国家?虽然问题是令人生畏的宏大,它可转换成如下的意义更窄、更易处理的问题:

1. 怎么解释欧洲国家形成的总体上的大致同心圆模式?像土耳其帝国和莫斯科这些早期形成的大的但控制较弱的国家围绕在外围,较小的但统治更为严格的国家如法国和勃兰登堡群集于大约中间地带,中央地带包括那些只是在 1790 年后才合并成较大国家的城邦国家、公国、联盟以及其他主权高度分裂的形式。

2. 尽管利益显然相反,为什么统治者常常接受那些代表处于该国管辖之下的国民中的主要阶级的机构建立?

3. 考虑到城市寡头集团和机构合并到民族国家结构中、荷兰共和国的国家实际上显然不同于它的众多的市政府、波兰国家几乎没有城市机构以及许多介于这两极之间的其他类型,为什么欧洲国家差异如此之大?

4. 为什么政治和商业的权力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和城邦帝国转到大西洋的实质的国家和相对依附的城市?

5. 为什么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和宗教组织失去了作为在欧洲主要的国家形式的重要性?

6. 为什么战争从追求贡赋的征服、武装的贡赋征收者间的斗争转向了庞大陆军和海军持久的战争？

这些问题仍然很大,但是并没有大到要求总体上解释欧洲国家所遵循的另类轨道。那么,挑战在于要通过仔细考察 990 年来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国家所遵循的不同道路来回答这一巨大的问题及其更多的易处理的附属问题。这将涉及辨明改变国家的主要过程,并把它们分类成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强制的不同种类。

关于这些问题的书必须在漫无目标和目的论之间走出一条狭窄的道路。一方面,在漫无目标的空白墙上,每一段历史似乎都是独特的,一个国王接着一个国王,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另一方面,在目的论的裂缝中,国家形成的结果似乎都说明了它的整个路线。我将试图避免这种空白墙和裂缝,并通过指出下述观点来达到这一努力:国家形成的道路是众多的但不是无限的;在任何具体的历史关头有几个显著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国家、统治者和市民有着深刻的相互作用;系统的问题和过程连接着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它们的关系。如果成功的话,下面的章节将会讲述一个关于统一中的差异、差异中的统一、选择及其结果的故事。

第六节 展 望

我必须承认:我对欧洲过去历史的阅读是非传统的、未证实的并充满着裂痕的。总而言之,欧洲国家的学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一千年规模上的综合。那些做了这一跳跃的人们通常要不就是寻求解释关于整个西方什么是与众不同的,要不就是提出一条国家形成的标准道路,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通常回溯历史,寻找我们现在知之为德国或西班牙的国家的起源,忽视那些在发展道路上消失了的国家,而不是试图计划说明国家形成的整个范围。

通过把多种道路的存在声称为资本和强制集中的相对容易度的函数(function),在主张国家的形式和它先前的资本途径之间的很强的相互独

立方面,通过寻求用国家结构变化的向前分析来替代回溯分析,我正在放弃知名学者的可靠方法,在反思过去方面做一次冒险。进一步说,在 200 页稍多一点的篇幅里来讨论一千年的跨度,我所能希望做到的只是辨明某些重要关系,并说明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本书论点的充分展开的版本就会把比后面部分更多的笔墨放在欧洲经济的动力上去。首先,我认为关于价格、生产力、贸易和人口增长的涨落说得太少,在其他因素中忽视了在 13 世纪、16 世纪和 18 世纪的价格上涨和在这些世纪之间的萧条对于不同类型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对于商人、农民、地主、官员和其他社会阶层相对权力的可能的重要性。(Abel 1966, Frank 1978, Kriedte 1983, Wallerstein 1974—1988)

第二,我将仅仅粗略地处理变化的生产组织及其导致的阶级结构。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忽视。相反:地主和耕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建立、保护和榨取的顺序有巨大的影响,正如在匈牙利、佛罗伦萨和英国之间的对比立即证明了这一点。例如,17 世纪普鲁士国家,就带有普鲁士早期历史的痕迹: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的十字军征讨命令,条顿骑士,把军事控制扩展到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征服了先前占领这些地区的斯拉夫人,引诱了德国骑士进入并组成大的阶层,并通过那些骑士招募农民来清理和耕种那些将可能是他们的土地(作为他们应付款和服务的回报)。这样在家庭、村庄或地区层面的安排影响了不同种类税收、征兵和监控的适应性。但是我的任务已经足够复杂。为了集中精力于国家形成的机制,我将不断地老调重弹或者说把地主、农民、农业无产者和其他主要的农村演员间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的。

而且,为了把重点放在决定性关系上,我不会去回顾国家形成的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理论。我也不会去声明关于本书结构的观点的起源。让我们把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加布里埃尔·阿丹特(Gabriel Ardant)以及其他人的显然对本书主题有影响的分析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鉴赏家们(cognoscenti)将肯定会注意到他们几乎在每一页的影响。毫无疑问,评论家们将会在试图把本书归入这个或那个流派上面浪费他们的口舌。要同时处理那些分析、它们

背后的理论和国家形成的历史现象将会使这种分析步履维艰并且加倍它的长度但没有大的进展,本书将集中于国家形成的实际过程。

为了简洁表达,我将照样地在一页又一页上求助于转喻(metonymy)和具体化(reification)。在转喻中我将不断地谈到“统治者”、“国王”和“君主”就好像它们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个决策机构,从而把一组复杂的可能社会关系归纳为一个点。在转喻中城市实际代表生产和贸易的地区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大的定居点是其焦点。在具体化中,我将经常把单一的兴趣、基本原理、能力和行为归之于国家、统治阶级或者屈从于这两者联合控制的人民。如果没有一个应用转喻和具体化的简化模式,我们就没有希望在欧洲国家形成的复杂过程中分辨出主要的联系。

在大多数时间里,含蓄的模式将包含这些成分:一个集中国家高层官员们的共同决策的统治者;一个和统治者结盟的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领土上控制着生产方式的统治阶级;其他从他们和国家的联系中享受特殊利益的依附者(clients);反对者,敌人和在国土内外的国家以及它的统治者、统治阶级、依附者的竞争对手;处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其余人口;一个包括在国家控制之下的陆军、海军和其他集中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强制机构;和国家的市政机构,市政机构中特别包括在国家控制下运行的独特的财政、管理和司法组织。

下面的大多数论证必然包括 990 年以来的欧洲历史中统治者、统治阶级、依附者、反对者、普通百姓、强制组织、市民政府用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描述和解释。这些论证偶尔会打开某个或另一个具体化的类型——最显著的是通过确定什么时间、为什么和带着什么效果,资本家(肯定地,他们本身是具体化的阶级)归入某类或者另一类。但是通常这些论证的展开,就好像每个类型都是真实的、单一的、没有问题的。我们为在上千年的大陆的规模上展开操作付出了代价。

最后的道歉。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我必须这样来处理历史事实:就像掠过水面的石头,从一点迅速地旋转到另一点而不会有时停顿片刻。我并不知道圆满地撰写本书所需的所有历史,而且提供我以为我知道的历史的所有文献会给本书带来无法估量的负担。例如,关于国家活动的最近增长,任何负责任的作者都会引用雷恩哈德·本迪克斯(Rainhard

Bendix)、沃尔特·科比(Walter Korpi)、西达·斯考切波(Theoda Skocpol)、戈兰·塞博恩(Goran Therborn)以及更多的其他人。我没有如此照搬,通常保留引言是用于直接引语或深奥的或者有争议的信息。很清楚,专家们将必须仔细检查我对欧洲历史的诠释并且思考其错误是否会损害我的论证。

考虑到它们的宽广、综合和思辨的特点,本书的论证并没有直接进入证实或者反驳。然而我们可以在下列程度上判断它们是错误的:

1. 然而,当和资本和强制有着非常不同关系的统治者试图建立武装力量和国家政权的时候,他们追求着类似的策略,有着类似的效果。

2. 具体的国家和作为整体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增长和变化,并不是和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应。

3. 聚集武装力量资源的努力并未产生国家结构的可持续特征。

4. 根据预先设想的设计,统治者有意去建立国家并且在那些设计中取得了成功。

5. 我声称的某些或所有的经验规则——特别是(a)国家形成的地理学,(b)城市寡头政治和机构结合成民族国家结构的不同。(c)尽管统治者的利益相反,代议制的发展,(d)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e)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和宗教组织的衰退和(f)战争向庞大陆军和海军的持久战争的转移——事实上经不起历史的考究。

6. 另外的说法对那些经得起历史考究的经验规律性提供了更为经济的和/或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这些当中某点是对的,那么我的观点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果它们所有都是对的,那么我的观点就肯定是错的。

重要理论问题正遭遇危险。例如人们也许会期望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的追随者主张君主们国内调停活动的出现比我解释中所建议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那些活动在人们对国家的接受方面起了比我解释中所建议的更大的作用,从而赞同大多数的反对本书分析的检查清单(checklist)的指控。人们也许会期望道格拉斯·罗斯(Douglass North)的追随者声称国家的建立和财产权的保护构成了许多我归之于准备战争的变化的基础。人们也许会期望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追随者主张国家

的活动以比我所说地更大的程度促进了资本家的利益,以及佩里·安德森的追随者会反责(至少对我分析的中期)我的观点大大地低估了欧洲贵族们在庞大的“绝对主义”的国家的建立中的分量。这样确定我的观点正确与否的方法取决于广泛讨论的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不一致。

这种核实提供了把对本书的可能的批评分成合理的(legitimate)、半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证实所列条件之一或者本书观点隐含的一个相同条件确实适用于大量的欧洲经验,这就是充分合理的。表明本书观点未能解释某些具体国家的重大的持久的特征,这就是半合理的。(说它仅仅是半合理的标准是因为只表明了观点的不完备——这一点我愿意提前承认——但不是说观点是错的。)

说本书观点忽视了某个批评者偶尔认为是重要的变量:物理环境、意识形态、军事技术或者其他因素,这就是不合理的。只有当这种批评指出了对某一变量的忽视引起了对确实出现在论证过程中的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的误读时,这种缺失变量的批评才成为合理的。关键不是要给出一个“完备的”解释(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解释),而是要使得主要联系正确。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下一章集中致力于在所探讨的一千年里的欧洲城市和国家的地理变化。第三章主要讨论国家统治者获取进行重大活动(特别是创建武装力量)的手段的机制,以及那些机制对国家结构的含义。第四章集中探讨国家和市民的关系,通过大量的多功能的国家的交易来追溯它的形成。第五章讨论国家形成的另类道路,寻找和资本、强制不同的关系的作用。第六章考察作为相互作用组织体系的欧洲国家,这种体系的运行限制着其成员的行动。第七章把故事延续到现代,反思当代资本与强制的关系,以求理解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如此之多的国家军人执掌了权利,希望洞悉欧洲经验以何种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时代的动荡的国家。

第二章

欧洲的城市与国家

第一节 欧洲形成之前

在一千年前，欧洲并不存在。在一千年前的头十年里，生活在欧亚大陆板块西端的约三千万人并没有有力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由历史和共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一群民众。他们也没有这样认为。事实上，罗马帝国的解体留下了一大块由道路、贸易、宗教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称之为欧洲的地方。但是那个曾经一度的罗马世界忽略了莱茵河以东和黑海以北的大片地区。后来的皇帝专权的欧洲亦是如此；它从地中海一直扩张到了亚洲和非洲。

从贸易和文化接触的观点看，千年的“欧洲”分裂成三或四个松散联系群落：大约和今天欧洲俄罗斯对应的，和拜占庭以及跨越亚洲的主要贸易路线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东部条块；和中东、亚洲的大城市有着更加紧密联系的由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拥有的地中海；一个罗马之后的（最密处是从意大利中部到佛兰德的一个弧形，但是又辐射到德国和法国的）城市、集镇、道路和河流体系；也许一个显著的北部群落包括斯堪的那维亚和不列颠群岛。〔肯定地说，所有这些标签都犯了年代错误；没有采用一整套的地理学惯例，我们别无选择，不得不使用诸如“德国”和“不列

首领的皇帝们、国王们、王子们、公爵们、哈里发们、苏丹们以及其他君主们。而且,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竞争对手和表面上的附庸通常运用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很少顾及他们名义上的统治者的利益。私人军队遍布大部分欧洲大陆。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的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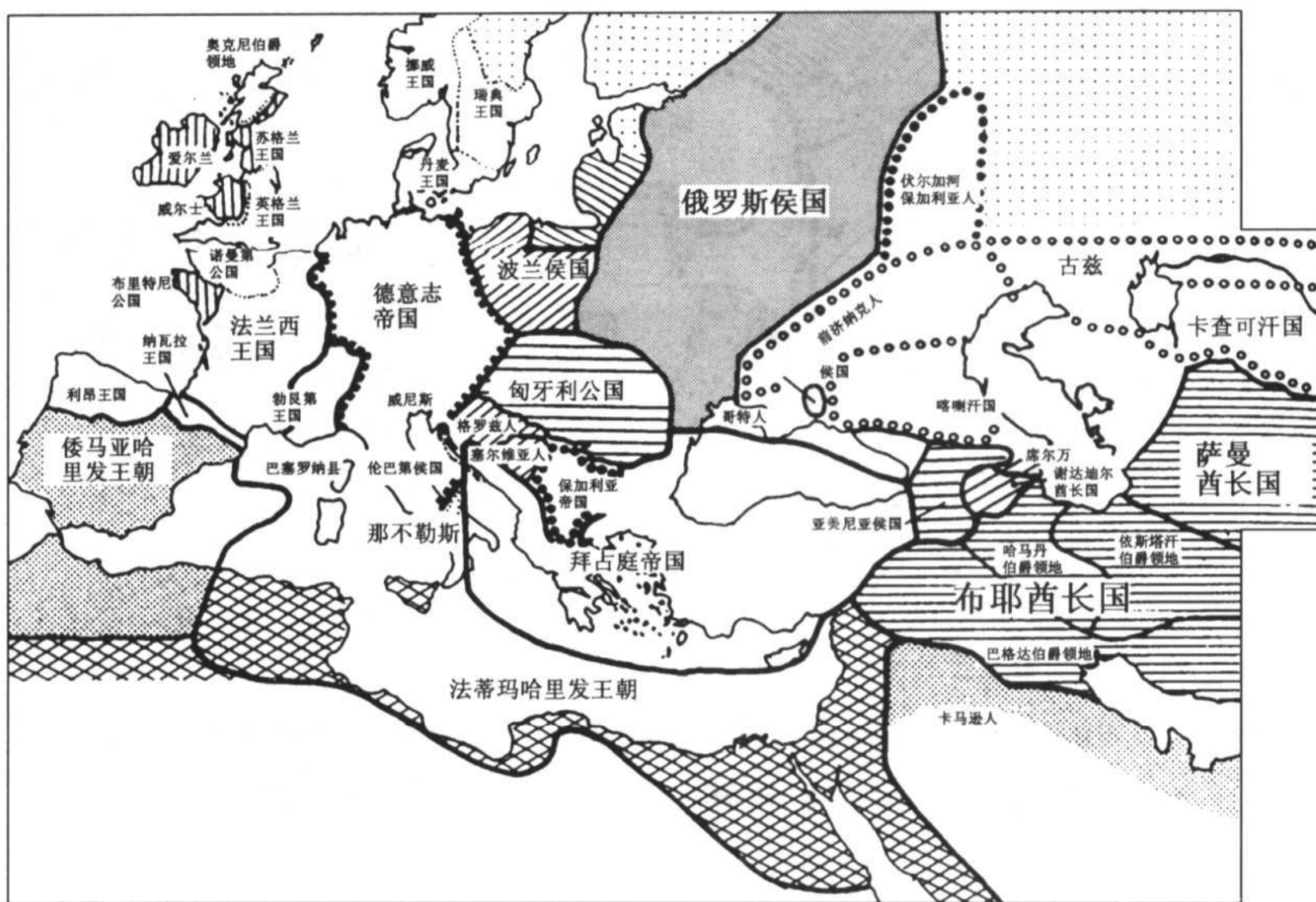


图 2.2 998 年的欧洲(引自柯林·迈克伊夫迪:《企鹅中世纪历史地图》,企鹅丛书,1961 年。柯林·迈克伊夫迪 1961 年版权。)

在这些蔓延的短暂的国家形成的圈内,统治权分裂更为严重,上百个公国、主教辖区、城邦国家和其他当权者在他们首都外的周边地区实施着重叠的控制。在千年之际,教皇、拜占庭皇帝和神圣罗马皇帝占有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一重要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都是作为自由政治代理人运行。(在 1200 年,光意大利半岛就有 200 到 300 个不同的城邦国家:Waley 1969: II)除穆斯林领土的相对城市化外,国家大小和城市密度的关系是相反的:城市众多之处,统治权越分裂。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过去一千年里城市和国家变化的大致的编年史。然而,在此同时,为了了解变化有多大,让我们先做一下以五百年为间隔

的随意的比较。到了1490年,地图和现实已经变化很大。武装的基督徒正在把穆斯林统治者从他们在欧洲大陆西半部——格拉纳达(Granada)的最后的大片土地上赶走。在亚得里海和波斯之间,一个伊斯兰的土耳其帝国取代了基督教的拜占庭。土耳其人正在地中海东部致力于威尼斯强权(Venetian power),并挺进到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s)(在和格拉纳达结盟同时,它们也在地中海西部开始了早期的冒险)。在几个世纪内欧洲战争仍然是地区性的、在地中海只是偶尔的十字军东侵才会在军事上涉及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国家。在那几个世纪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们开始在意大利争夺霸权。



图 2.3 1478 年的欧洲(引自柯林·迈克伊夫迪:《企鹅中世纪历史地图》,企鹅丛书,1961 年。柯林·迈克伊夫迪 1961 年版权。)

在欧洲的外围(periphery),在 1490 年,有着统治着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不仅有土耳其帝国,还有匈牙利、波兰、立陶宛、莫斯科公国、条顿骑士团的领地、斯堪的那维亚联盟、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这些强国主要依靠租金和贡赋生存,通过在当地拥有很大自治权的地方权贵进行统治;这些权贵常常抵制甚至拒绝皇家权力。然而总体上说,

1490 年时的大的国王和公侯正在加强和扩大他们的地盘。

那么,在更大的国家的不连续的圈内,欧洲仍然是一片统治权高度分裂的土地。确实,分散的哈勃斯堡帝国正在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威尼斯统治着重要的亚得里亚海的弧形地区。但是从意大利北部到佛兰德,东到匈牙利和波兰的不确定的边界的地区分裂成上百个正式独立的公国、公爵领地、主教领地、城邦国家和一般只能在其首都附近行使权力的其他政治实体;光南部德国在它的众多的主教领地、公爵领地和公国外就包括 69 个自由城市。(Brady 1985:10)“尽管绘图员能够在 15 世纪中叶被看成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内地区画出边界,那主要是在法国和匈牙利、丹麦和北意大利之间的德意志地区。”黑尔(J. R. Hale)这样想:“他无法在那些自认为是实际地或者潜在地独立的众多城市、王子飞地和好战的基督教会领土上着色,而不会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他正患有视网膜疾病。”(Hale 1985:14)欧洲的 8 000 万人被分成了 200 个国家、潜在的国家、小国家和类似国家的组织等诸如此类的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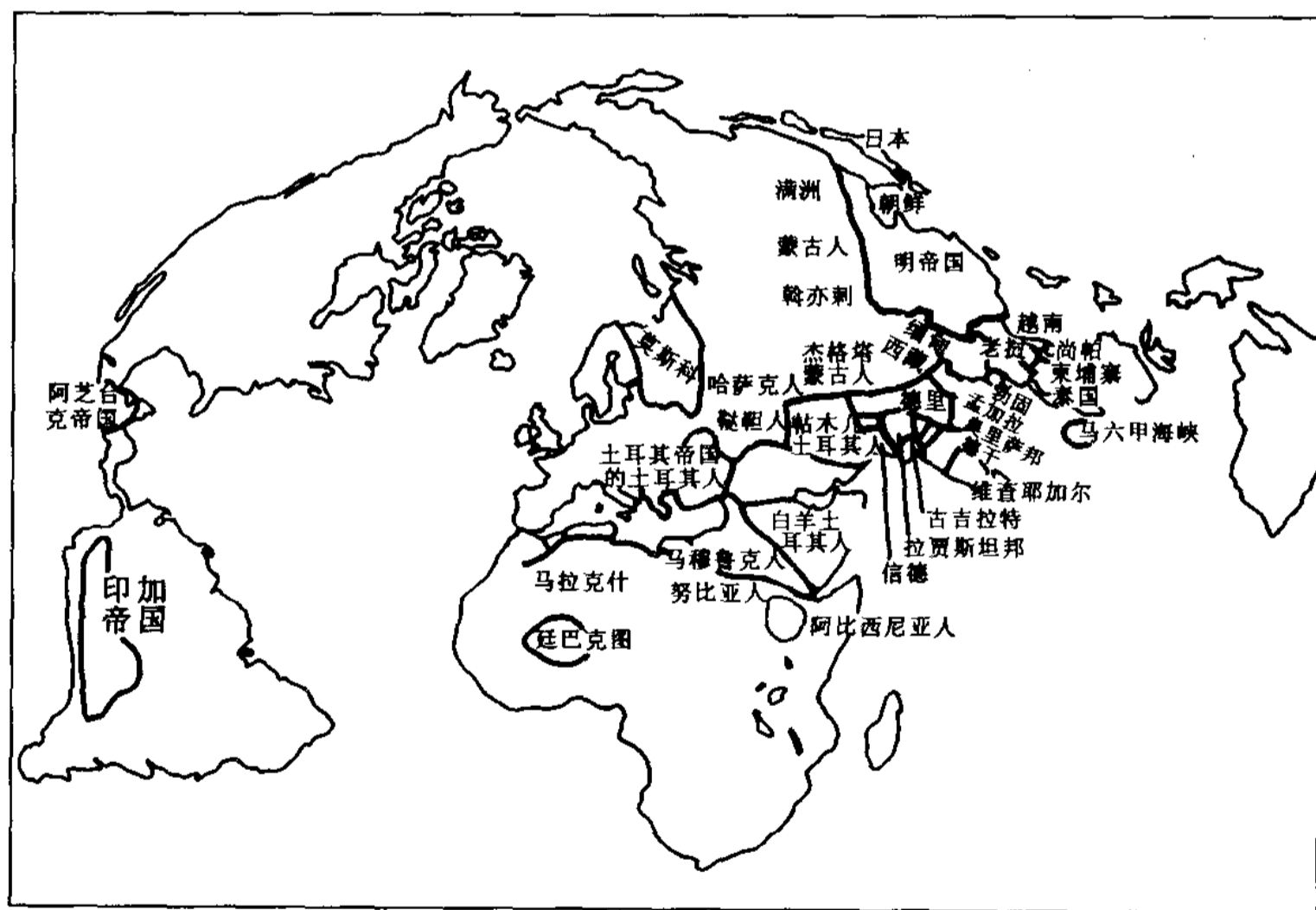


图 2.4 1490 年的世界(引自柯林·迈克伊夫迪:《企鹅到 1815 年的现代历史地图》,企鹅丛书,1972 年。柯林·迈克伊夫迪 1972 年版权。)

到 1990 年,另外 5 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已经大大地延伸了巩固的工

作。现在有 6 亿人生活在这个大陆的边界线内。尽管一个强大的伊斯兰世界引起争议地矗立在欧洲的南面和东南面,以及穆斯林文化的残余还留存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没有穆斯林国家留在欧洲大陆。巨大的俄罗斯国家在东部形成并一直伸展到北极和太平洋,而幅员辽阔的土耳其跨过亚洲边界进入欧洲东南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归入了占据至少 40 000 平方英里的许多国家(不包括殖民地和属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希腊、意大利、挪威、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和尚未分裂的苏联。微型国家,如卢森堡(Luxembourg)和安道尔(Andorra),尽管比 1490 年存在的许多政治实体要大得多,已经成了珍品。根据这些计算规则,整个欧洲已分成只有 25 到 28 个国家。

民族国家(相对集中的、程度不同的、自治的组织成功地取得在大片毗邻的边界清楚的领土上使用武力的优先权)花了很长时间才在欧洲版图上形成优势。在 990 年,在那充斥着庄园、地方豪强、武装入侵者、堡垒村庄、贸易城镇、城邦国家和修道院的世界里尚无迹象预示民族国家的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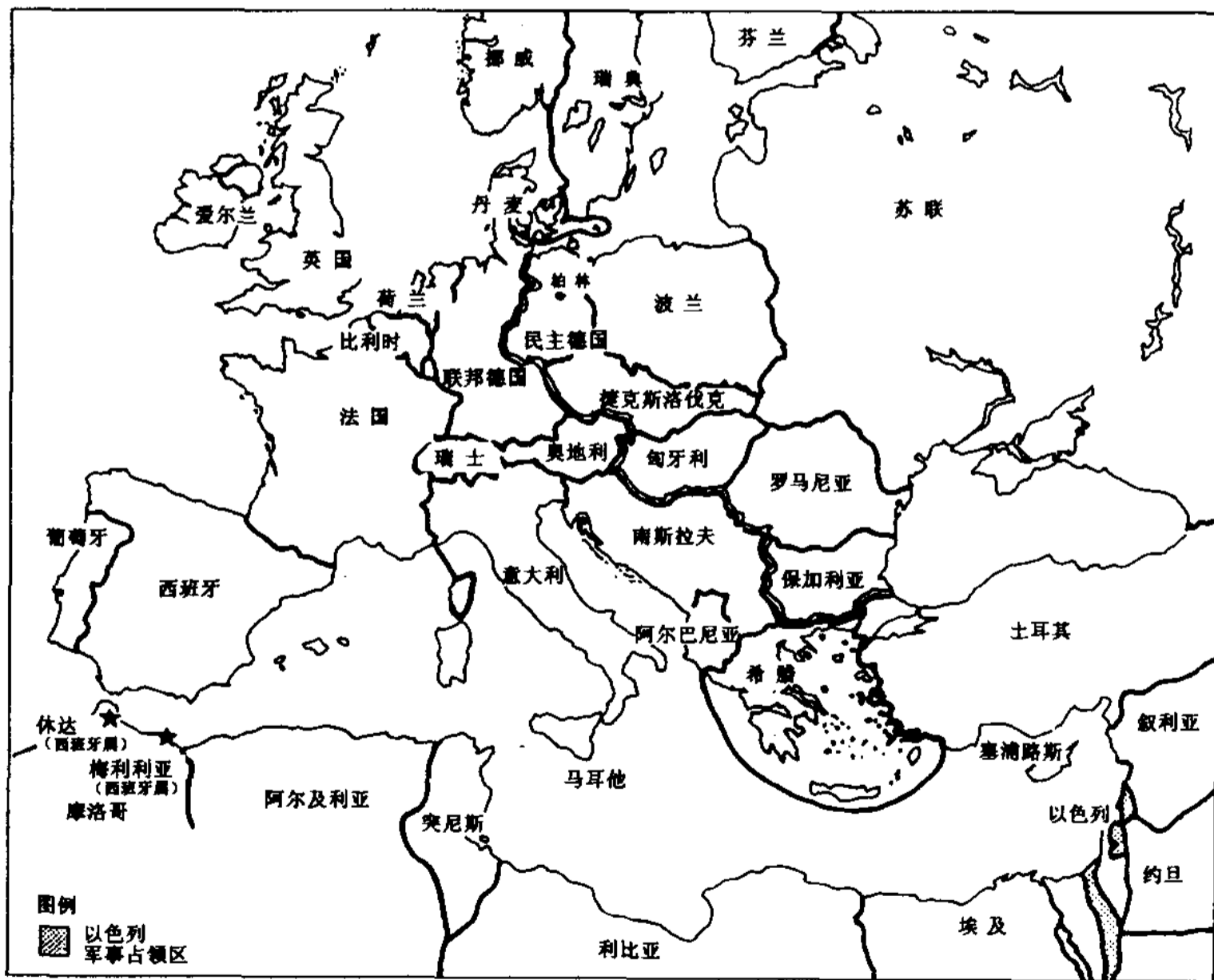


图 2.5 1990 年的欧洲

兴,在 1490 年,未来尚不确定;尽管频繁地使用“王国”这一词语,各种各样的帝国占据了欧洲大部,而且在欧洲大陆的有些地方各种联邦依然十分活跃。1490 年之后,欧洲人排除了其他选择机会,明确地向着创造一个几乎完全由相对自治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体系进发。

另一方面,国家在数量上减少但在地域上增加。为了勾勒出这种变化的地图,我们必须在广义上使用“国家”这一术语,以包括那些掌握大量强制手段并且至少在某一边界确定的领土上成功地拥有超越所有其他强制运用者的持久优势的组。在 990 年,相对大的穆斯林国家统治了地中海的西部,包括西班牙南部和非洲的北部沿海。其他大的国家包括法兰西王国、撒克逊帝国(the Saxon empire)、丹麦王国、基辅俄罗斯(Kievan Russia)、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拜占庭帝国。总体上看,这些政治实体的统治者从名义上在他们统治之下的领土收取赋税。但是一出他们自己的领地,他们几乎就不能管理他们名义下的地域,他们的权威不断受到来自竞争的权贵们,包括他们自己设定的代理人和诸侯(vassals)的竞争。

以从欧亚大草原侵入欧洲的众多武装游牧民族之一的马尔扎人征服后形成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在 10 世纪,大量的马尔扎人从伏尔加河流域迁入,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匈牙利的喀尔巴阡盆地(the Carpathian Basin)的以农耕为业、居住在森林的斯拉夫人。(Pamlenyi 1975:21—25)一旦掠夺的游牧民族迁徙到喀尔巴阡的西部,自然草原的缺乏就会迫使他们后退,减少他们的数量,或者说离开马背(Lindner 1981)。在一个世纪的掠夺之后,那些现在已基督教化了匈牙利人在几乎没有城市的地域逐渐地转到了农业。

他们的农业基础并没有妨碍匈牙利贵族们与他们的邻居开战、争夺皇位继承权或者玩弄欧洲的联姻游戏。而且,他们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把奴隶和自由民都变成普通的农奴。随着封建农业的繁荣、矿山出口金属到欧洲其他地方、该地区的贸易路线和欧洲中部、西部交织在一起,城镇发展起来了。德国的资本开始统治匈牙利的商业和工业。然而,匈牙利的城镇仍然紧紧地服从于它们的贵族地主,直到 15 世纪君王开始对它们行使控制权。

在15世纪晚期,雅诺什·亨耶迪国王(King Janos hunyadi)和他的儿子马赛厄斯·科维纳斯国王(King Matthias Corvinus)建立起相对集中的高效的战争机器,击退了东南面的好战的土耳其人和西面的饥饿的哈勃斯堡人(Habsburgs)。然而,随着马赛厄斯的死亡,贵族们发起了反攻,剥夺了他的继承人拉迪斯拉斯(Ladislas)保持自己军队的手段。1514年发动另一场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的努力激起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对他们的镇压转过来肯定会减少服劳役的农民而且废除他们变换主人的权利。在伴随着解决农民战争的权贵们的斗争中,伊斯特万·弗波齐(Istvan Verboczi)律师记下了关于匈牙利风俗的贵族观点,包括惩罚农民的法律以及下列条款:

贵族享有如无预先的法律判决免受逮捕的权利;贵族只服从合法加冕的国王;贵族任何情况下都不缴税;只有在保卫该地区时可以被要求提供军事服务。最后,当国王以任何形式侵害了贵族的权利,贵族有反抗的权利。[Mcneill 1975 (1964) 17]

弗波齐的论文成了匈牙利法律的标准的权威,成了“贵族圣经”(Pamlenyi 1975:117)。到1526年,匈牙利有不止一位而是两位当选的国王,而且这两位国王处于相互交战状态。毫不奇怪,在后来的半个世纪,土耳其人能够侵占一半匈牙利领土。这很清楚,在这个时代,大国并不必然是强国。

第二节 国家和强制

到1490年,穆斯林正在从他们最后的伊比利亚前哨——格拉纳达(Granada)撤退,但是在东地中海周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对巴尔干进行袭击。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并把司法和财政控制权延伸到大片领土上的国家正开始出现在欧洲边缘,城邦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投入土地战争。1490年的欧洲地图把大量地区归于英格兰、瑞典、波兰、俄罗斯和土耳其帝国,但也划分出许多的公爵领地、公国、主教领地、城邦国家和

其他的袖珍国家。

我们能区分出多少欧洲国家,这取决于建立在某一时代的国家特性之上的可争论的决定:瑞士的 13 个行政区划(如 1513 年)和土耳其帝国的 84 个自由城市(如 1521 年)能否算作独立的实体?阿拉贡(Aragon)和卡斯迪尔(Castile)的学术上自治的属地如卡他罗尼亚(Catalonia)和格拉纳达是否值得认可?是否低地国家的整个混杂体构成了一个处于哈勃斯堡霸权下的单一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部分)?是否处于土耳其控制之下的纳贡国家各自属于那时的欧洲国家体系?没有一套似乎有理的定义会产生出低于 80 或者多于 500 个独特的单元。我们可能随意地把 200 作为中间数。这大约 200 个正式自治的欧洲政治实体控制着平均数为 9 500 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萨尔瓦多(El Salvador)、莱索托(Lesotho)和卡他耳(Qatar)的面积。

在 1490 年大约六千二百万欧洲人口分成平均每个国家三十一万人。当然平均数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如众多的欧洲较小国家及其人口就很适合俄罗斯的辽阔的领土。然而,欧洲正在从领土上合并成围绕着永久性的军队建制组织起来的不同国家,军事的优越正给予较大的国家更好的生存机会。

肯定地说,仅仅是开始。在 1490 年,军队主要由通过招募来的雇佣兵、大地主的客户和市民民兵组成。在法国和勃艮第常规军已经取代了城市民兵,但是在其他地方则很少如此。皇家财政收入中贡赋和个人的租金仍然显得很重要。在较大的国家内部,社区、行会、教会和地方显贵保持着大片的免税和自治的区域。管理主要涉及军事、司法和财政事务。欧洲的中央地区继续充满着小规模管辖权。由于只在名义上约束于较大的君主和帝国的城邦国家、城市联盟、王朝帝国、公国和像条顿军团的基督教会实体都共存于(不管争议多大)欧洲大陆,人们并不清楚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民族国家会成为欧洲主要的组织。直到 19 世纪,随着拿破仑的征服以及随后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几乎欧洲所有地方都合并到相互排斥的有着永久性的职业武装力量、对 40 000 平方英里或者更大地区的人口实行实质性控制的国家。

在随后的四个世纪,许多战争的解决和几个有意的联盟急剧地减少

了欧洲国家的数量。在 19 世纪,国家的数量基本稳定。例如,在 1848 年初,根据如何看待 35 个德国联盟成员国、17 个罗马天主教教会国家、22 个瑞士的在学术上自治的部分和几个不独立的但在形式上显著不同的单元,比如卢森堡、挪威[在《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中,贵族和政治家的名册(完全按字母表顺序的清单)那时是先以小字安哈尔特-贝恩堡公国(Anhalt-Bernburg)、安哈尔特-笛所公国(Anhalt-Dessau)和安哈尔特-科然公国(Anhalt-Kothen)开始,然后才标注更大的奥地利、巴登(Baden)和巴伐利亚(Bavaria)],欧洲有着 20 到 100 个国家。

大的兼并是伴随着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的形成而出现的。到了 1890 年初,国家名单下降到大约 30 个,其中有 9 个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国。在 1918 年底,可以数出大约 25 个独立的国家。虽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边界有很大的变化,但 20 世纪欧洲国家的数量和大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如果,根据斯莫尔(Small)和辛格(Singer),我们仅仅计算那些大的有独立军事力量的国家的话,我们实际上发现和长期趋势有点相反: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有 21 个竞争者,在 1848 年有 26 个,在 1980 年有 29 个[现在包括马耳他(Malta)、塞浦路斯(Cyprus)和冰岛(Iceland)]。(Small and Singer 1982:47—50)

和 1490 年的 9 500 平方英里相反,1890 年的 30 个国家控制着平均 63 000 平方英里,使得它们面积上和今天的尼加拉瓜(Nicaragua)、叙利亚(Syria)和突尼斯(Tunisia)差不多。不是 1490 年的 3.1 万个居民,1890 年普通国家有大约 7.7 百万人口。设想一个圆圈,国家的平均半径从 55 英里延伸到 142 英里。在 55 英里半径处,由单一城市的统治者直接控制腹地常常是可行的;在 142 英里处,没有专门的监督干涉机构就没法管理。尽管一些袖珍国家,如安道尔(Andorra, 175 平方英里)、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 61 平方英里)、圣马力诺(San Marino, 24 平方英里)甚至摩纳哥(Monaco, 0.7 平方英里)幸免于大兼并,此外,大小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急剧地下降。

总而言之,欧洲最后并入大的民族国家的地方是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周围,沿着莱茵河(Rhine)到盆地国家的城邦国家地带。德国和意大利的不断的创造把那些繁荣的但是争争吵吵的小自治区及其腹地纳入

到国家的控制之下。就好像欧洲发现了自 1790 年以来流行的条件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需要至少 100 英里的半径,而且也不能轻松统治超过 250 英里的半径。

第三节 城市和资本

为了更清楚地弄清地理模式,我们应该分清城市体系和国家体系。欧洲的城市体系代表了资本集聚中的变化的关系,而欧洲的国家体系则代表强制集聚中的变化的关系。欧洲的城市形成了松散的商业和工业优先程度不同的等级,在此等级中的任何时间上的任何一点少数几个城市(通常围绕着某一霸权中心)明显地统治着其他城市。(无可否认,欧洲的等级仅仅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城市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一网络在这一时期开始时深入到亚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到非洲和美洲。)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有用的简化中,从 14 世纪到 20 世纪,威尼斯、安特卫普(Antwerp)、热那亚、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伦敦、纽约先后在欧洲城市体系中独占鳌头。

就占优势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情不仅是大小而是在欧洲贸易、生产和资本积累网络中的中心地位。然而,资本集中和城市人口的集聚紧密相连,以致占优势的城市群也总是最大的城市之一。J. C. 拉塞尔(J. C. Russell)用一个大小等级标准和相当随意地勾画边界的略图,描述了以佛罗伦萨(Florence)、巴勒莫(Palermo)、威尼斯、米兰、奥格斯堡(Augsburg)、第戎(Dijon)、科隆(Cologne)、布拉格(Prague)、马格德堡(Magdeburg)、卢贝克(Lubeck)、根特(Ghent)、伦敦、都柏林(Dublin)、巴黎、图卢兹(Toulouse)、蒙彼利埃(Montpellier)、巴塞罗那(Barcelona)、科尔多瓦(Cordoba)、托莱多(Toledo)、里斯本(Lisbon)为中心的中世纪地区。这些城市分布比较密集,这些地区在从佛罗伦萨到根特的地带,特别是在它的意大利那一端面积相应较小;正如在它们中的十大城市总人口的测算中,威尼斯地区(357 000 人口)、米兰(337 000 人口)和佛罗伦萨(296 000

人口)独拔头筹。(Russell 1972:235)在1490年,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对“城市潜力”的比较精确的计算挑选出大约以安特卫普、米兰、那不勒斯(Naples)为中心的作为欧洲城市体系的最高峰,而在1790年伦敦周边地区(包括英吉利海峡两岸地区)显然占优势。(de Vries 1984:160—164)

在整个欧洲版图上,城市体系和国家体系的扩展非常不均衡,而且以相反的方式。在990年,城市很小,分散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几乎每个地方。然而,在从博洛尼亚(Bologna)、比萨(Pisa),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到根特、布鲁日(Bruges)和伦敦的地带,城市分布较密集,它们之间的联系较紧密。城市集中的第二层次出现在西班牙的南部和意大利的南部。地中海周边的陆地上有着比大西洋沿岸或波罗的海沿岸多得多的城市。那时欧洲的两个最大的城市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科尔多瓦,它们不仅是主要的商业中心而且分别是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和乌马亚哈里发王朝(the Umayyad caliphate)的所在地;每个城市都有接近50万的人口。(Chandler and Fox 1974: II)在以后的一千年里,中心地带仍然是欧洲城市最密集的地区,但是它更宽了,它的重心向北朝着较大的大西洋港口转移。从1300年起,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相互联系的城市带不成比例地增长。

有无城市群落对某一地区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可能性。在19世纪前欧洲盛行的生产和运输条件下,大城市在一直延伸到农村的贡赋地区刺激了经济作物(cash-crop)农业。接着,商业农业一般地促进了商人、较大的农民和较小的地主的繁荣,另一方面削弱了大地主统治处于农村环境的人们的能力。(然而,有一个大的例外出现,在城市统治阶级在内地地区也占有大量土地的地方,正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内就常常如此;在此农民深受地主的沉重压迫。)

此外,城市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的人口。直到最近,大多数欧洲城市经历了自然的减少:它们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结果在增长的城市激起巨大的移民潮的同时,甚至停滞的城市也从附近的小镇和村落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这股移民潮比城市的生育不足和城市增长速度要大得多,因为所有移民活动都有大量的往返运动;小贩、商人、佣工和工匠一年

又一年或一季又一季地在城市和农村间摇摆。从农村到城市的净流入通常是女性比男性更多,结果是性别比例(每 100 个女性的男性比)在农村特别地高和在城市非常地低。因此城市在和它周边村民的婚姻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城市的商业、人口影响对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把城市统治阶级和城市里资本家作为扩大国家权力努力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重要性暂时放在一边;在后面他们将得到大量的注意。农村-城市密集贸易的存在为统治者通过海关筹集财政收入和征收税赋提供了一个机会,而相对商业化的经济又使得君主们更容易越过作为他们皇权延伸的大地主直达集镇和村庄。

而且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影响着士兵的潜在供应:他们是农村富豪的农奴和佃户,还是来自高流动率、低婚姻率的雇佣兵、城市民兵或者被武装小分队扫荡来的无地的工人? 税收的机会、地主的权力和军队的供应深深地影响了国家形成的形式。通过食品供应、移民、贸易、通讯和就业机会,大城市群在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从而影响了试图把国家权力扩展到这些地区的统治者的策略。城市增长时期只是着重强调了这些影响。

带着一定的风险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地区差异,我们可以把 1000 年以来欧洲城市的生长分成五个阶段:到大约 1350 年的大扩张时期;在 1350 年到 1500 年间的下降然后毫无方向的波动时期;16 世纪的加速时期;17 世纪的减速时期和最后 1750 年后的巨大加速时期。(Hohenberg and Lees 1985:7—9)14 世纪毁灭性的瘟疫的蔓延标志着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过渡,伊比利亚人航行到美洲标志着第三阶段的开始,1600 年后的家庭手工业的增长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资本、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在城市爆炸式发展标志着从第四到第五阶段的迈进。

从 16 世纪到 17 世纪,许多欧洲地区,包括米兰、里昂(Lyon)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经历了早期工业化:包括家庭在内的小制造作坊的增长和把制造作坊和远方市场相联系的小商人的增长。在工业大扩张时期,资本走向劳动力而不是相反;在毅然朝着使用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为工资而工作,但是仍然留在家庭和小作坊里的方向转移的意义上,

农村劳动力开始贫困化。资本大量地聚集,但还没有高度地集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资本急剧增长,制造业和工人涌向城市,广阔的农村地区开始削减工业能力。逐渐地,制造商住在他们能降低获取原料的成本和使他们的产品接近市场的地方,可以正确地假定,工人们将会以他人为代价到制造商所在地方去。最后一波的集中极大地加速了欧洲的城市化,产生出我们现在所知的城市化的大陆。

城市和欧洲总人口一起增长,因此即使在人口中的城市份额保持不变时,城市地方数量也急剧地增长;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并不知道在1350年前欧洲人口实际上是否更加城市化。无论如何,直到19世纪,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并没有急剧上升。根据现有的最好的估计,在一万人以上的地方,其中居住城市人口的比例,和今天的几乎60%相比,在990年是约5%,在1490年是6%,在1790年是10%,在1890年30%。(Bairoch 1985:182, 282; de Vries 1984:29—48)

城市化的时间表反映了欧洲资本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大量的欧洲流动资本掌握在小商人的手里,这些小商人分散在整个欧洲大陆,交易其他地方生产的货物或者指导在村庄、集镇和小城市的形式上独立的生产者制造加工。大资本家,像在热那亚、奥格斯堡、安特卫普的那样,在把欧洲联系起来以及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相联系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所有流动资本中只占很小的份额。

在1490年前,分散的证据使得我们难以提供任何更为详细的数量的说明。保罗·白罗奇(Paul Bairoch)的估计和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最近的关于1500年以来欧洲城市化证据的汇编使得我们能够做出某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计算。表2.1说明了1490年前的城市的长期的细微增长,16世纪的加速,17世纪的减速和1790年后的不寻常的城市化。到1980年,10 000的界限已经失去其意义(因此表中推测的数字),整整390个城市有100 000以上的居民。事实上,198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34.6%的人口居住在至少有100 000人的城市里。城市增长的巨大加速是在1790年后到来的,伴随着19世纪的资本的集中、工作场所规模的增大和大规模运输的产生。但是在1490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城市的特有的内地地区的规模在缩小。

表 2.1 从 990 年到 1980 年俄罗斯以西的欧洲的城市化

	990	1490	1590	1690	1790	1890	1980
1 万人以上的城市数	111	154	220	224	364	1 709	5 000?
1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的 人口(百万计)	2.6	3.4	5.9	7.5	12.2	66.9	250?
每年比上一年增长的 百分比	~	0.1	0.6	0.2	0.5	1.7	1.5?
1 万人以上的城市人 口的比例	4.9	5.6	7.6	9.2	10.0	29.0	55?
每个城市的平方英里 (千计)	17.1	12.3	8.6	8.5	5.2	1.1	0.4?

资料来源:de Vries 1984:29—48, Bairoch 1985:182。

第四节 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

城市和国家分散的趋势改变了某些关键的比例。在 990 年,欧洲有好几千个国家般的单位,每 20 或 30 个“国家”可能只有一个 10 000 人口的城市。在 1490 年,每一或两个国家就有一个那么大的城市。到 1890 年,神话般的普通国家就有 60 个 10 000 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光这一变化就意味着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改变了的控制技巧,改变了的财政策略,改变了的对服务的需求,改变了的政治。

城市主要通过作为资本的容纳者和分配地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借助于资本,城市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城市内地地区,遍布广泛的贸易网络。但是城市在它们的寡头控制到底多少资本方面是各不相同的;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使得一度辉煌的布鲁日(Bruges)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城市是资本积累的地方,这一事实给予它们的政治当局获得资本、信用和对边缘地区的控制。那些边缘地区,如果是夺来的或者吸收的,也能为君主的目的服务。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力地表述了这重要事实:

一个充满商人和制造商的国家……必然充满许多人总是在力所能及地推动它,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大量的金钱就会涌向政府。

[Smith 1910 (1778): II . 392]

如果他们在这样做的话:在合格者的背后隐藏着几个世纪的资本家和国王之间的斗争。然而亚当·斯密强调在资本充裕地区运行的国家的财政优势是绝对正确的。

国家本身主要是作为强制手段,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容纳者和部署者运行的。现在福利国家的发展、管理国家的发展、致大力于干涉经济事务的国家的发展减轻、掩盖了强制的集中性。然而在我们考察的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军事开支通常消耗了国家预算的大部分,武装力量通常构成了政府最大的单独的部门。

欧洲国家形成的地理和城市建设的差异向任何可能的统治者提出了尖锐的问题。采用保罗·霍恩伯格(Paul Hohenberg)和林·利斯(Lynn Lees)的说法,我们可以在作为中央地区的城市 and 作为城市网点的城市做出大致的区分;所有城市都属于这两个系统,但是不同城市的两种关系的相对重要性有很大的区别。(Hohenberg and Lees 1985: chapter 2)等级制的中央地区体系协调着诸如食品、衣物等普通商品在毗邻地区定居点之间的流动;原材料和粗加工产品倾向于沿着中央地区的等级朝向更大的为更广泛市场服务的定居点向上流动,而精细的专门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在地区系统外生产的产品——倾向于从更大的地方向更小的地方向下流动。在我们所考察的大部分历史中,初级生产者、地方商人、小贩、周期性的公共市场把大部分商品卖给他们的消费者。

在另一方面,城市网络联系单独地区系统(有时相隔几千公里)的更高层次的中心。虽然在1500年前的欧洲,木材、小麦、盐和酒已经从很远远运来,城市网络长期擅长于轻而贵重的产品,像香料和丝绸的交换。手中有大量资本的商人和金融家在欧洲的城市网络中显得非常重要。几个世纪以来,菲利普·柯廷丁(Philip Curtin)所谓的贸易扩散有着关键的作用;地理上分散的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血缘关系,(有时)有共同地理来源(geographic origin)的商人集团,比如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或者热那亚人,通过相互给予信任、市场信息和优惠待遇减少了国际

贸易中的不确定性。(Curtin 1984)即使在遥远的地方贸易扩散没有构成关键联系,分散的商人通常通过航海、私人通信、地方代表的维持以及和共同的熟人接触来和他们的同行保持着良好关系。

运用强制的统治者,经过一定的努力,能够攫取一个或更多的中央-地方层次的整片领土,甚至重新形成层次来和他的国家限制大致保持一致;到 16 世纪,一个粗略的一致出现在英格兰和伦敦的中央-地方体系、法兰西和巴黎的中央-地方体系之间。但是很少也很难把国家和很长距离的城市网络的轮廓相匹配。像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那样的联盟和像威尼斯、葡萄牙那样的海上帝国曾经一度接近,但是它们总是发现自己在和那些对它们的这个或那个贸易的边区村落(outpost)提出领土要求的区域统治者进行竞争和讨价还价;横跨威尼斯获利最丰厚的贸易路线的土耳其帝国的巩固预告了威尼斯人在 12 和 13 世纪期间编织起来的巨大的贸易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在其商人们致力于长途贸易的地方的国家总是发现自己面对着其外部关系它们永远不能完全控制的强大的经济演员,而后者发现如果统治者的需求变得无法容忍,带着资本逃到其他商业地区是相对容易的。强制和资本的地理上的长期持续的差异保证了围绕着它们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会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演化。

在整个欧洲,从 900 年到现在,在国家控制资本和强制方面的变化沿着两条并行的弧线。起初,在世袭制(patrimonialism)时代,欧洲君主们一般从他们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以贡赋和租金的形式,榨取他们所需的资本——他们所能要求的数量常常在严格契约的限制之下。在经纪人时代(特别是在 1400 年到 1700 年左右),他们大量地依靠形式上独立的资本家来获得贷款,获取对产生财政收入企业的管理和税款的收取。然而到 18 世纪,民族化的时代到来了;许多统治者把财政机制(fiscal apparatus)直接并入国家机构,大大减少了独立签约人(contractors)的参与。大约最后一个世纪,即专门化时代,带来了财政组织和军事组织更大的分离以及国家日益增多地参与到对固定资本的监督。

在强制方面,相似的演化也在发生。在世袭制时期,君主们从家臣、诸侯和应服个人劳役的民兵中召集武装力量——但是还是受到重要的契约限制。在经纪人时代(还特别是在 1400 年到 1700 年间),他们逐渐转

向由拥有很大行动自由的签约人所提供的雇佣兵。接着,在民族化时期,统治者们把陆海军直接吸纳进国家管理机构,终于摆脱了外国雇佣兵,从他们自己的国民中雇请或招募(conscript)大量军队。自从19世纪中期,在专门化的一个阶段,欧洲国家巩固了由大的官僚机构(bureaucracies)支撑的市民军队体制,分离出专门使用战争之外的强制力量的警察。

到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内部都有了武装力量和财政机构;从而缩小了政府作为交税的农民、军事立约者和其他独立中间人的角色作用。因此它们的统治者们继续和资本家以及其他阶级为了信贷、财政收入、人力和战争必需品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接着又对国家产生了许多新的要求:养老金、救济金、公共教育、城市规划以及更多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国家从放大的战争机器转化为多重目的的组织。它们仍在努力控制强制和资本,但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制订规章、补偿、分配和保护的活动。

在19世纪前,国家在变化的两个主要过程的相对时间的选择和强度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荷兰国家在一个世纪里或更长时间里雇佣了大量的陆军和海军,过早地采用了国家管理财政,但是仍然长期依赖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商业城市的资本家们。确实,有时荷兰国家会融入到它的大的自治城市的政府中去。另一方面,在卡斯迪尔(Castile),陆军——通常是从西班牙以外雇佣的——占有优势;在那里,君主政体(monarchy)通过把商人们转化成食利者(rentiers)以及通过依靠殖民地财政收入来给他们以补偿来夺取商人们的信贷。葡萄牙、波兰、意大利城邦国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遵循着这两种弧线的其他结合,从而创造出显著不同的国家结构。

第五节 国家生理学

为什么欧洲国家遵循着如此不同的轨道,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朝着资本和强制更加集中的方向?两个秘密解释了大部分复杂性。第一个秘密就是在变化着大小不一的国家中的对贸易和领土的持续不断的侵略

性竞争,这种竞争使得战争在欧洲历史上成了一种动力。第二个秘密在于加布里埃尔·阿尔当(Gabriel Ardant)所说的国家的“生理学”(physiologies):那些它们赖以获得和分配进行重大活动的手段的过程。就在此和我们有关的大部分历史而言,决定性的手段是特别强制的,即战争的手段。强制手段显然在进行战争(攻击外部对手)、国家建设(攻击内部对手)和保护方面(攻击国家服务对象的敌人)起着作用。强制手段也在国家榨取活动(即从它的国民中获取国家活动的手段)和裁决(adjudication)(即在国民中解决争端)中起作用。只是在涉及生产和分配时,强制手段才不是国家活动的主要支柱——即使在这里不同国家的强制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在国家在盐和武器的生产或烟草产品方面建立起自己的垄断的地方,它们通常都是通过武装力量做到这一点。非法买卖(contraband)通常是当统治者决定垄断某种商品的销售时才成为非法买卖。

强制手段把武器和懂得使用武器的人们结合在一起。(我这里说的是男人;在西方经验中,妇女在强制组织的建立和运用方面起的作用令人惊讶地小,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说明她们在国家内的从属地位。)国家代理人有一段较容易的时间来集结强制并防止他人这样做,因为在此范围:(a)武器的生产涉及深奥的知识、稀有的物质,或者大量的资本;(b)很少有群体有独立动员大量人力的能力;(c)很少有人知道把武器和人结合的秘密。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利用了所有这些条件来走向对在他们领土上的强制手段(军队、警察、武器、监狱和法庭)的更大集中的垄断。

国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使用集中的强制。在 990 年后的早期几个世纪,在国王们直接控制之下的武装力量很少比他们的主要追随者的更多。供给和维持武装人员的后勤保障使得常规军队的建立惊人地昂贵。皇家军队通常包括国王少量的常设军队,加上在其追随者召集下仅仅临时来自平民百姓中的军队。国王的参与增强了武士中个人的联系:“通常国王应该亲自指挥每一重大战役。年龄没有关系;当奥托三世(Otto III)指挥军队征讨撒克逊人时(991 年),他只有 11 岁;当亨利四世(Henry IV)在 1063 年和匈牙利人交战时,他只有 13 岁。”(Contamine 1984:39)活动中的皇家军队主要依靠征用(理论上以后从皇家国库中偿还)和抢劫(无需偿还的)来生存;当然,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差别并不明显。

城市一般组织市民组成的民兵(civilian militias)来保护城墙、巡逻街道、干预公共冲突,偶尔参战抗击城市的敌人或王国的敌人。西班牙的地方自治民兵(municipal militias)是个例外;他们在基督教国王征服穆斯林的伊比利亚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反映在光复运动(the Reconquista)之后属于贵族统治区的大国当中,反映在骑兵和步兵之间区分的固定成持久的一般的社会部门中。(Power 1988)在其他地方国王们总是设法限制城镇人掌握的独立的武装力量,为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城里人非常可能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运用武装力量,包括抵制皇家的要求。

这些多种多样的军事力量面临着许多不是在直接的皇家控制之下的武装集团:其中有:通常不是为了皇家事务而调动的某个主人的家臣,匪帮(他们常常是遣散的士兵,在没有皇家的同意下继续他们的抢劫)和海盗(他们常常在皇家或市民的保护之下行事的)。强制手段的集中是谨慎的但是非常广泛开展的;集中是轻微的。即使如此,统治者们正在比任何他人更加努力地集中强制。

终于,国家开始运用多重武装力量,所有武装力量都官僚体制化而且或多或少整合到国家管理当中。即使以不断把国家权力分散给其代理人和贵族而臭名昭著的西班牙,也在不断地努力把它的武装力量从其市民环境中分离开来。例如,菲利浦二世(Philip II)有意把武装力量放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到1580年止,在他父亲查理五世(Charles V)统治时期,武装力量的指挥几乎都是贵族们的私有财产]。

整个军事组织都交还给皇家并由皇家大臣们管理;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军舰在1546—1547年一次短暂的不成功的回归签订契约后,又回到了皇家管理之下,地中海舰队和北非驻军的物资供应由皇家在塞维尔(Seville)的军需部门控制,武器制造业和硝酸钾(saltpetre)制造者处于皇家严格的监督之下,而且火药的制造是皇家的垄断。(Thompson 1976:6—7)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筹措资金和管理的吃紧使得西班牙又回到广泛地签订契约和地方控制;然而,武装力量从此就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的分化的分支运作。确实到19世纪,西班牙军队获得了如此大的独特性和自治权,以致其不断地作为独立力量干涉国家政治。(Ballbe 1983)

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在陆军和海军之间显著的区别出现得很早,并且持续很久。在国家的层面上,军队(通常擅长于和其他武装力量作战)和警察(通常擅长于控制非武装的或者轻武装的个人和小团体)的区别仅仅在很晚才变得普遍——在大多数国家里,是在 19 世纪。到那时,强制力量的积累是较大的、集中的,因此也是不平衡的。到了 19 世纪,国家给人深刻印象地是成功地武装起自己并且解除了平民百姓的武装。

图 2.6 系统表达了作为资本和强制相互作用的城市和国家的关系。在对角线以上,强制比资本集中得更快;在对角线以下,资本比强制集中更快。这一区别适用于单个城市;欧洲港口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巴塞罗那淹没在资本之中,但拥有相对弱的强制机构;在另一方面,君王之都如柏林和马德里(Madrid)在强制方面就比在资本方面要强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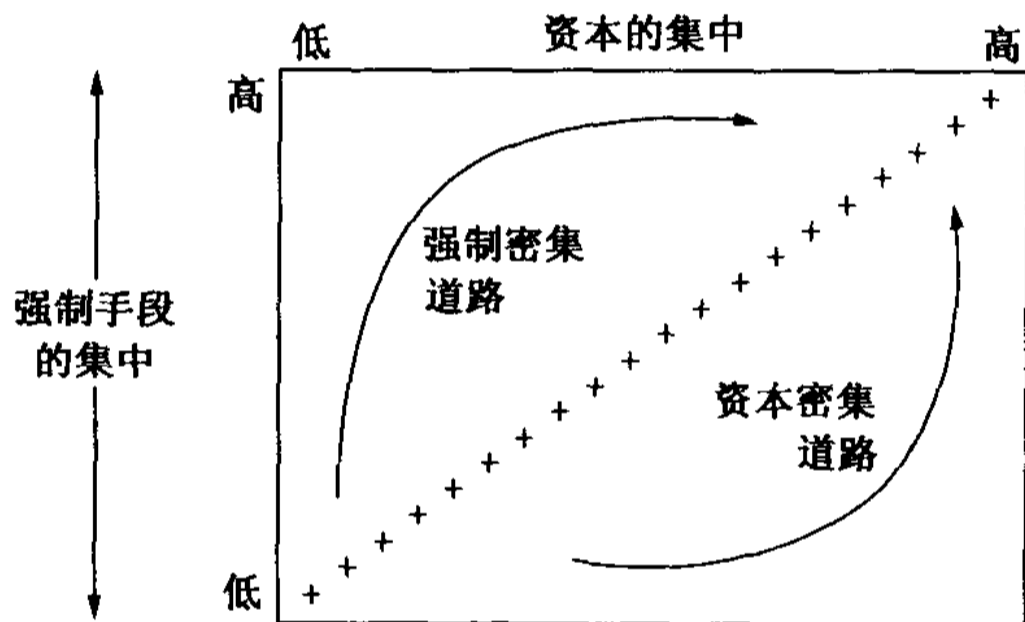


图 2.6 1000—1800 年的欧洲集中的资本和集中的强制变化的另一个途径

这一区别也适用于国家的周边环境。在此千年里欧洲变化总的方向无疑是沿对角线而上,朝着资本和强制的更大的集中。但是在这相同的总方向上,不同的国家遵循着不同的道路。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在富有强制、缺乏资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即使当它把自己的控制扩展到莱茵地区(Rhineland)的资本主义城市时还带着它早期环境的痕迹。丹麦通常比斯堪的那维亚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资本集中在手中,而且把更少的精力投入到军事力量建设上。

条顿骑士团(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遵循着一条不规则的道路:从 12 世纪末在圣地(the Holy Land)做海盗的十字军战士(因此深陷于海洋

商业的海盗世界)到13世纪的大片的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管理者,到异教的普鲁士的征服者和殖民者,在此从1300年到16世纪他们以大地主的方式统治着。在大约30年里,骑士们跨越了从资本密集到强制密集的国家形成的界线。马耳他的骑士团(也先后被称为圣约翰骑士团和罗德骑士团)同样蜿蜒而上,但是终止于不同的地方:

……接近1100年时在圣地一个宗教秩序产生了,但是在保护东部的拉丁国家中几乎立即转变成了军事秩序,之后在其撤退到塞浦路斯(1291年)和后来的罗德岛(Rhodes)(1309年)后转向了海上事业,最后被迫完全致力于1530年在马耳他的建立作为在西西里国王的宗主权(suzerainty)下的主权国家的事业。(Fontenay 1988a:362)

通过致力于从其马耳他基地出发进行的合法化的海盗行为,该骑士团沿着一条比在圣地的曾经一度的其他邻居资本更加密集的路线。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图表想象成一幅欧洲不同国家在其领土上和城市多种多样的作用中所走的多重道路的地图。

这一资本——强制图表体现了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论点:在每一具体地区的最强有力的统治者为大家设立战争的条款;较小的统治者则面临着在满足强大邻居要求或者投入额外努力准备战争之间进行选择。战争和准备战争使得统治者需要从那些拥有必要资源——人力、武器、供应或者购买这些的金钱——或者没有巨大压力或补偿就不愿意拿出所需资源的其他人那里榨取战争手段。在由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回报所确立的限度内,对战争手段的榨取和争夺造成了国家的中央组织机构。在一国家领土内的主要社会阶层的组织,以及它们和国家的关系,大大地影响了统治者用来榨取资源的策略、他们所遇到的抵制、导致的斗争、榨取和争夺造成的持久组织的类型,以及从而影响资源榨取的效率。

主要社会阶层的组织以及它们和国家的关系从欧洲强制密集地区(城市很少而且农业占优势的地区,在此直接强制在生产中起着主要作用)到资本密集地区(有许多城市而且商业占优势的地区,在此市场、交易和市场导向的生产盛行)有很大的变化。主要阶层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对国家的影响,也相应地不同。因此不同的榨取策略和统治者实际应用的策略的相对成功度从强制密集地区到资本密集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

结果,在欧洲这些不同地方的国家的组织形式遵循着显著不同的轨道。在某一时代哪种国家形式在欧洲的某一地方流行有着很大差异。只是到了这一千年的后期民族国家才展示出比城邦国家、帝国和欧洲常见的其他的国家形式明显的优越性。然而,日益增长的战争规模和通过商业、军事和外交相互作用交织到一起的欧洲国家体系最终把发动战争的优势给了那些能够运用大规模常规军队的国家;能够结合大量农村人口、资本家和相对商业化经济的国家获得了成功。他们确立战争的条件,他们的国家形式在欧洲也成了主要的形式。最后欧洲国家汇聚到那种形式:民族国家。

在资本——强制图表中所标示的每一道路内部,较早的步伐限制着后面的步伐。如果城市统治阶级在某一国家开始增强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正如他们在荷兰所做的那样),在以后的很长时期国家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方面留有他们的印记。如果一个国家起源于对大量农村人口的征服(正如先后的普鲁士帝国所为),它为那些诸如在它中心成长起来的城市只提供很少空间;在这样的地区,随着君主把财政特权和大部分地方司法权授予拥有武器的地主以换取他们断断续续的军事服务,大量的贵族成长起来了。

第六节 危险的关系

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城市和国家持续发生着一系列危险的关系(*liaisons dangereuses*)、爱恨交加的事件(*love-hate affairs*) (在其中每一方对另一方来说成了必不可少但又无法忍受的)。城市和资本家们从管理国家的强制专家那里获取对商业和工业活动必不可少的保护,但是正当地担心对他们赚钱的干涉和把他们的资源导向战争、准备战争或者支付过去战争费用上去。国家和军人依靠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家提供财政手段来招募和支持武装力量,但又适当地担心其对(受到城市、它们的商业利益和工人阶级危害的)国家权力的抵制。城市和国家找到

了交换保护和使用资本的不稳定的契约的基础,但是直到 19 世纪这种契约还是很脆弱。

目前很难想象 17 世纪的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岛最商业化的城市]的诡计。西西里岛已经成了这样一个落后的象征,我们很容易忘记西西里岛作为光辉王国、地中海人的粮仓和大国竞争的对象在许多世纪的辉煌。西西里岛——曾经属穆斯林,后来属诺尔曼(Norman)——在 1282 年归到阿拉贡人的统治之下,伴随着 16 世纪统一的君主的形式又成了西班牙的属地。墨西拿(Messina)的商业巨头在西班牙统治下感到恼火,西班牙统治限制了他们接近外国市场,特别限制了他们对西西里岛丝绸出口的控制,有利于王朝的利益。在 1674 年,西班牙(和荷兰松散地结盟)正在和法兰西(暂时和英格兰松散地结盟)交战。墨西拿的统治者将西班牙军队拒之门外,向法兰西、英格兰和土耳其帝国求援,许之以一个由来自墨西拿的外国国王统治的独立的西西里岛,要求他们港口免征关税,并欢迎法兰西的西西里岛统治者和他的军队。

然而,三年之后,墨西拿人厌倦了法兰西人的占领,因为法兰西失去了在背信弃义的人们中维持一支军队的热情。当法兰西人撤走了,统治家族逃离了,留下的商人组成了一支市民卫队(civic guard),欢呼西班牙统治的回来。(Mark Smith 1968a:225—230)在西西里岛和其他地方,当外部事件改变了国家的军事地位或者城市的商业地位,当一方或另一方把自己的利益推进得过远时,国家和城市的协定很容易破裂。统治者和资本家经常重新协商他们相对的地位。

然而,并非每一对国家和城市保持着不变的关系。远非如此:从欧洲的一个部分到另一部分,关系的模式急剧地变化,而且几个世纪中变化很大。威尼斯创造了它自己的商业帝国,只是到后来才从事对大陆地域的征服,波兰地主阻碍了他们城市的发展,而在巴黎,在所有的起义中,则为法国君主服务得很好。

回到资本——强制的图表,我们也许能够勾勒出在图 2.7 中的许多不同的欧洲地区的故事。因此,根据这个图表,波兰国家生存在一个富于强制、资本不足的环境,并且当大贵族们夺走了其强制和资本的份额时,在两者的集中方面实际上面临着下降。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通常从

强制的相当大的集中开始,最终走向对集中的资本更高程度的控制。相反,规模很小的德国国家、意大利城邦国家、荷兰共和国在有着资本的大量集中、弱小的断断续续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开始它们的轨道,只是逐渐地朝向持久的集中的军事机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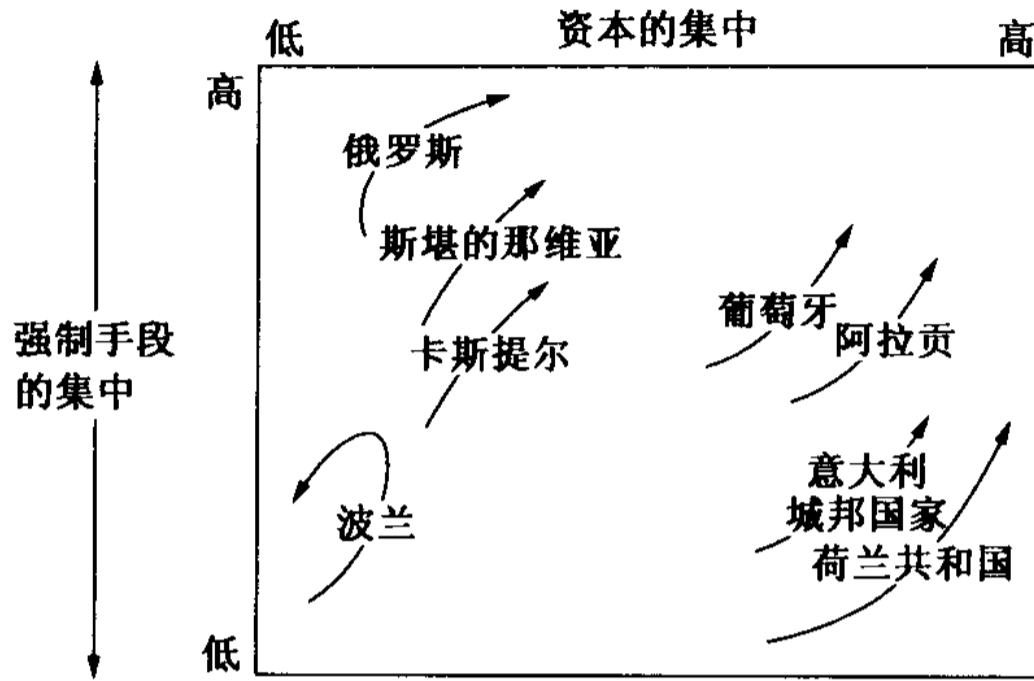


图 2.7 不同国家的假设的轨道

城市在市场等级(国际市场、地区市场、专门的地方市场等等)中的地位大致和它们的大小、它们对内部地区的人口上的影响、它们资本积累的程度以及它们建立和控制影响延伸区域的能力相关。这些因素接着深深影响不同城市作为军队建设和国家形成的资本的来源的相对吸引力,影响它们统治阶级相对可能的和实际的国家建立者的自治,影响它们代表机构的力量。平均来说,一城市的市场地位越高,一个城市的寡头政治集团,在其和国家统治者的关系中,作为必不可少的拥有广泛代表权的对等物就越有可能。

结果,大的贸易城市和城邦国家比主要在农业地区的城市对民族国家的渗透构成了更有效的抵制。最经常地,只有当大的贸易城市开始在国际市场中失去了它们的优势地位时,民族国家才获得了对它们的真正的控制权。即使这时,重要的贸易城市设法把比当地和地区市场中心有更多地方自治权力的机构引入国家内部,因此它们的大量存在通常延缓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另一方面,在缺乏现存的资本情况下,统治者建立起庞大的机构从不情愿的市民中榨取资源。

也有较大的例外,新教改革集中于欧洲的城邦国家地带,起初为抵制

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威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这些例外包括罗马教会从未失去它的巨大影响的天主教的北意大利,以及新教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早在新教改革前就已经产生出基督教的民粹主义变种(populist variants)的根深蒂固的农业地区。在许多地方,尤其在英格兰和北欧国家,统治者促进和推出了新教改革的自己的版本,对宗教机构建立起广泛的国家控制,在僧侣和地方政府的世俗官员间建立起亲密合作。在其他地方(如在荷兰),新教教义为抵制帝国权威,特别是抵制受到主张上帝认可的皇家特权所支持的权威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学说基础。面对通俗的新教的传播,统治者有三种选择:信奉它、同化它,或者反对它。

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在官方的新教的和天主教的公国之间的划分和追求王朝目标、宗教安慰或者抵抗皇帝基础的统治者可能会改变信仰的威胁,在16世纪成了常见的争论的根源。在1648年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有着一个规定,即任何转变信仰的统治者将会丧失他或她对皇位的权利。从这时开始,宗教的分歧在欧洲国内政治中依然十分重要,但是作为战争支柱的作用迅速地下降。

总之,在国家本身在集聚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市政的和军事的官僚机构的地方,庞大的国家教会(无论是新教的、天主教的还是东正教的)形成了。在资本集中的地方的人们通常成功地抵制了对国家指定的崇拜形式的强迫接受,就像他们阻碍了民族国家的早期发展那样。

伦敦和英格兰构成了对理论上反对资本主义活动和国家权力的明显挑战。在英格兰,尽管有强大的贸易城市的存在和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教会一直维持到19世纪,稳固的国家形成相对较早。然而,注意英国经验中的几个关键特点。在伦敦成为重大国际中心前君主制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在这一方面,比起和荷兰的相似,英格兰更像斯堪的那维亚。然而血缘关系、贸易和财政赋予伦敦商人和该国的贵族和绅士阶层更加密切的联系;伦敦的城市在议会中获得了直接的代表,以及通过伦敦同业公会(Livery)在皇家事务中获得了半自治的声音。在其他方面,比起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相似,英格兰更像荷兰。最后,从17世纪开始,出现的国家见证了皇家权力逐渐地受到地主、资本家和议会的联合代表的限制。因此

英格兰在国家形成的两条主要道路上成功地走了很远。

第七节 国家的另类形式

其他地区的经历表明,关于战争所需资金的争论的焦点深深地影响了产生出的代表性的形式。在葡萄牙,皇家收入高度依赖海外贸易,除了里斯本(Lisbon)的市政府作为对话者的强硬的存在,我们很少看到任何种类的代表机构。在 16 世纪的阿拉贡,我们注意到巴塞罗那和皇家有着相同的关系;它的有势力的百人议会(*Consell de Cent*)可以绕过总督,直接和在马德里的国王对话,但是它从来没有权力统治整个阿拉贡,更不要提整个西班牙。在卡斯提尔(Castile),我们看到了在议会所授予的权力,是大地主和 18 个城市的寡头政治的工具。总而言之,在资本家占优势的地方,城市机构本身似乎就更容易成为国家组织的一部分。

当涉及为了昂贵的战争迅速转移资本时,资本家们和中产阶级协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国家有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它们仍然很容易受到撤回资本和要求商业保护的伤害。荷兰共和国清楚地说明了资本家统治的代价和益处。另一方面,荷兰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为战争筹集资金——短期则通过向其富裕市民贷款,长期则通过征收海关关税和对从象牙到酒类的每一商品征收销售税;(’t Har 1986, 1989a, 1989b, Schama 1975)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不必建立起永久性的国家机构。庞大的荷兰舰队,包括东西印度公司的私人海军,很快地转化成了强大的海军。但是只有当主要的省份[特别是荷兰]同意支付费用时,共和国才可以从事战争或者任何其他大的计划;而且那些大省常常不同意。这些国家的军事优势随着战争的主要的形式不同而变化:海战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炮兵和骑兵重要性就要弱些,一个长期的弱点是在大兵团战术上。

永久性的军事力量减少了(但是绝没有消除)对军事手段需求的浪潮,从而增加了有着长期贷款和很大税收基地的国家的优势。国家,如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常常被视为有效的国家形成的典范——整合地主

和商人的合作,在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的大兵团战术时代建立起常规军队(以及海军),从而创建了实质性的中央官僚机构。然而在这些教科书事例中的反例在整个欧洲国家形成的光谱中只占窄窄的一小部分。

当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动员起来的时候,它们迅速地扩张和集权化。在战争结束时它们所有的国家都不知何故地缩小——要是通过遣散 1815 年服役的成千上万的军队就好了——但是它们的预算、人员和活动保持在比 1790 年高得多的水平上。在欧洲和在海外的战争继续对国家经费的增长提供最大的刺激。然而在 19 世纪发生了在国家形成方面的几个关键的变化。资本和劳动力向城镇爆炸性的涌流为统治者提供了他们前所未遇的威胁和机会:集中的劳动阶级集体行动的威胁,从未有过的榨取和控制的机会。国家活动的范围无限地扩展到整个欧洲;改善航海、修建公路和铁路、维持治安、兴办学校、创建邮局、规范资本和劳工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国家的常规活动,都成了把专家纳入到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职业的市政服务形成了并且迅速地增长。

与此同时,随着统治者直接和他们的国民们商议庞大的税收、军事服务和在国家计划中的合作,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两个有着深远重要性的进一步的步骤:一个朝向减少地方或者地区支持者的统治、把民族国家的代表深入到每个社区的更直接的统治的运动,以及以选举、全民公决(plebiscites)和立法形式的受欢迎的征求意见方式的扩大。它们也促进了民族主义,既在大众确认国家目标(popular identification with state ends)的意义上(对大多数人而言),也(对少数人而言)在以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群体的名义抵制一致性和一体化要求的意义上。无处不在的国家、有关国家统治者和政策的斗争、在财政预算上武装力量的激烈的竞争者的形成以及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的许多其他特点都出现在 19 世纪把平民百姓吸收到国家中来的发展中。欧洲国家,尽管在国家与经济关系方面有着那么多的差异,开始汇聚到官僚机构、干预和控制的模式上来。根植于资本——强制图表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形成的多种道路和最终向有着高度集中的资本和强制的国家的汇聚。这种分析有助于重新表述和回答开始的问题:怎样解释自从 1790 年以来盛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汇聚于民族国家的不同变种?有三个答案: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集中的资本和集中的强制手段的相对可获得性大大地影响了交战的组织结果;只是到最近,只有那些在与其他国家交战中能够支撑得住的国家幸存下来;最后,从长远来看,战争变化的特点赋予那些能够从自己的人口获取大量的持久的军事力量的国家以军事优势,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是民族国家。

这种资本——强制推理也为来自这个一般问题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某些可能的解答。怎样解释欧洲国家形成的大致的同心圆模式?它反映了资本的不平衡的空间分布,从而把环绕着欧洲大陆的相对大的但资本缺乏的国家同那些在接近大陆中心迅速增长的较小的资本丰富的类似国家的实体群区分开来。这种对比区分了外部国家(例如经历了强制相对大的集中和资本相对小的集中的形成年代的瑞典和俄罗斯)、内部国家[例如和前面国家相反的热那亚和荷兰]和中间国家(例如资本的集中和强制的集中并驾齐驱的英格兰和法国)。

为什么统治者们,尽管明显利益相反,常常接受代表在他们管辖范围(jurisdictions)内主要阶级的代议制机构(institutions)的建立?事实上,统治者们总是试图避免代表他们阶级以外群体的机构的建立,在较长的时期内有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机构是为了国家活动,特别是战争手段的必要的资金和国民中不同成员讨价还价的代价和结果。英格兰的国王并不想形成一个国会来承担更大的权力;他们在劝说其为战争筹钱的过程中,先向男爵们让步,然后向僧侣们、贵族们和资产阶级让步。

为什么欧洲国家在结合城市寡头(oligarchy)和代议制机构(institutions)方面有那么大的差异?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和城市寡头和行会作斗争的国家常常会把那些城市寡头和代议制机构结合到民族权力结构中去。代议制机构通常最早出现在欧洲,出现在地方的、地区的或者民族政府和有足够力量来禁止政府的行动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取而代之的国民们讨价还价的时候。(Blockmans 1978)在所说的政府是或多或少自治的国家、国民是城市寡头时,地方自治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s)和类似的机构常常成为国家机构的构成整体所必需的成分。在单个城市占优势的

地方,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形式——城邦国家或者城邦帝国——就出现了。然而,一旦从国家自己的人口中招募的大量军队成为成功战争的关键,城邦国家和城邦帝国就输掉了。

为什么政治和商业的权力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和城邦帝国流入强大的国家和大西洋的相对次要的城市?它们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贸易超过了地中海的贸易,而且是由于大量的永久性的武装力量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变得越来越关键。在16世纪晚期,当西班牙、英格兰和荷兰都开始把武装舰船开入地中海进行贸易和海上抢劫(这两者相差并不大),城邦国家如拉古萨(Ragusa)、热那亚和威尼斯发现它们以前对速度、关系和工艺的依赖已不再足以避免大量的商业损失。适宜远洋航行的大船的主人在商业和军事时期逐渐胜出。(参见 Guillerm 1985,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

为什么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和宗教组织会失去其作为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的重要性?这里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在较大国家内的商业化和资本积累减少了较小的商业国家的优势,那些小国以前曾能够广泛地借贷、高效地收税和依靠自己的海上力量使一些陆地大国望尘莫及。第二,战争最终向着这样的方向转变,使得较小国家的小规模和分裂的主权成了明显的劣势,输给了较大的国家。佛罗伦萨的共和国和米兰的共和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军事需求的重压下崩溃了。确实,雇佣军的职业组织者弗朗契斯科·斯佛尔扎(Francesco Sforza)在1450年成了米兰的公爵,后来他的后代把他的公爵领地输给了法国(1499年)和西班牙(1535年)。

在佛罗伦萨,复兴的共和国持续到了1530年,但是后来教皇和查尔斯五世皇帝的力量合作占领了它的现款现货交易,迫使该城投降[尽管有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chiavelli)领导的委员会建议的、在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otti)指导下建筑的防御工事(fortification)],扶植麦第奇家族(the Medicis)为公爵。威尼斯和热那亚是部分的例外,它们作为海上强国保持着某些差异,大规模的军队、巨大的炮兵部队、广泛的防御工事的时代使得所有的意大利城邦国家走向灭亡、臣服或者在大国的缝隙之间危险地幸存。

为什么战争从为了贡赋的征服和武装的贡赋争夺者间的斗争转向大量陆军和海军的持久的战争? 由于本质上相同的理由: 伴随着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战争的组织和技术革新, 能够获得大量人力和大量资本的国家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它们或者击退贡赋争夺者, 或者迫使它们进入建立更加持久的国家机构的榨取模式。在 15 和 16 世纪, 当伊万三世(Ivan III)和伊万四世(Ivan IV)用奖励土地的方式来使官吏和士兵长期为国家服务。在 18 世纪, 像英国和法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从自己市民中招募大量军队的能力给予它们超越小国的手段。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话, 它本身带来疑惑: 例如, 为什么支离破碎的神圣罗马帝国在兼并的好战的君主中支持了那么久? 为什么它没有消失在强大国家的腹中? 而且, 有什么逻辑预见商业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 一个其贵族对他们自己的大片内地贸易区行使着控制权的贸易城市, 会让位于君主的莫斯科? 地理政治的位置和大国间的距离肯定起了比我简单的表述所暗示的更大的作用。它们会显著地出现在后面的几章里。然而, 在资本——强制图表中概括出的推理的线索引起我们根据城市和国家的相互作用重新思考欧洲国家的形成, 从而抓住在国家形成中的某些宽泛的规律。它明显改进了对英格兰、法国或者普鲁士国家形成作为核心过程的描述(或者说三者的某些概括), 以及所有其他的作为遵循相同道路的减弱的或者失败的努力的描述。

然而, 在 19 世纪前的几个世纪, 由于国家在非常不同的资本和强制的关系情景中形成军事力量, 它们长期有很大的分歧。国家形成的其他道路, 结果导致不同形式的抵制和反抗、不同的国家结构和不同的财政体制。如果这样的话, 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的标准的讨论就过分地集中在法国、英格兰和少数其他几个大国的经验, 而忽视了国家实际特征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兰, 大地主大大超过了资本家和国王, 但在荷兰实际上就不存在。佛罗伦萨的“封建主义”及其现款现货交易和匈牙利的“封建主义”有如此大的区别, 似乎不值得用相同的术语来包含它们两者。

比其他任何东西影响都大, 在国家形成的区域里的城市、金融家和资本的相对重要性较大地影响了在那形成的国家的类型。根据有无大量的

资本和资本家,战争动员有着非常不同的效果。仔细考察欧洲国家的实际运行——下一章的商业——将会解释为什么资本的可利用性和形式在准备战争方面造成这么大的差异,以及战争接下来又如何塑造了国家的持久的组织结构。

第三章和第四章将忽略欧洲范围内地理上的差异,赞成把战争、政治结构和国内斗争方面的主要变化确定地归到时间上去。在第七章把欧洲历史经验和当代世界的国家形成的特点加以对比之前,相反,第五章和第六章(关于国家形成的其他道路和国际国家体系的演化)将会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到不同类型国家的变化上去。

第三章

战争如何促成国家以及 国家如何导致战争

第一节 暴力的分野

尽管在世界强国间的公开战争中有当下 40 年的间歇,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好战的。根据一个详细的计算,自从 1900 年,世界上已经有 237 场新的战争——国内的和国际的——其战场已经每年至少死亡 1 000 人;到 2000 年,这一可怕的数字估算为大约 275 场战争和一亿一千五百万战争死亡人数。平民死亡数能够很容易达到这个总数。血腥的 19 世纪只带来了 205 场这样的战争和 800 万的死亡人数。喜欢战争的 18 世纪也只有 68 场战争和 400 万的死亡人数。(Sivard 1986:26; 也可参见 Uralnis 1960)这些数字转换成每一千人口的死亡率,18 世纪大约是 5,19 世纪是 6,20 世纪是 46——8 或 9 倍高。从 1480 年到 1800 年,每两年或三年在某地就出现一个新的大的国际冲突,从 1800 年到 1944 年,则每一年到两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每 14 个月左右。(Beer 1974:12—15; Small and Singer 1982; 59—60; Cusack and Eberwein 1982)核时代并没有减缓走向更频繁更致命战争的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趋势。

西方人通常不这么想大概是因为这一事实:在大国间,战争已经变得

更稀少了：在 1500 年的法国、英格兰、奥地利、西班牙和土耳其帝国；在不久的过去的法国、英国、苏联、联邦德国、美国和中国；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平均来看，自从 16 世纪以来，直接涉及大国的战争在频率、持续时间和参与国家数上已经有所下降。在痛苦的赔偿方面，战争也变得更加激烈——特别是如果我们计算每月或者每年的死亡人数时。（Levy 1983:116—149）在更弱小的国家间，战争越来越多，但是规模非常小；在大国之间，战争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致命。

我们能够乐观地或者悲观地读到大国的战争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战争经验的对照的情况。乐观方面，我们可能假设大国最终找到了解决它们差异的损失较小而不是频繁的战争的方法，而且相同的事情最终也会发生在其他国家。悲观方面，我们可能得出结论；大国已经把战争出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节约了它们自己的能源以用于在集中爆发中相互毁灭。从任何一种情绪出发，我们看到一个日益好战的世界，在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在自己的地域里部分地免受战争之苦，也许变得对战争的恐怖不大敏感。

然而，问题并非普通百姓变得更加好斗。当世界变得更加好战，国家范围之外的个人之间的暴力在总体上下降了。（Chesnais 1981, Gurr 1981, Hair 1971, Stone 1983）至少对西方国家似乎是如此，它们是我们至今有着很长的连续证据的仅有的国家。尽管在我们每天的报纸中有关谋杀、强奸和集体暴力的报道可能给出相反的说法，但是死于某些其他平民之手的暴力死亡的机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例如，在 13 世纪的英格兰的他杀率大约是今天的 10 倍，大概是 16 和 17 世纪的 2 倍。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谋杀率特别迅速地下降。（因为美国在西方世界至今有着国家最高他杀率，美国人也许比他人更难理解在其他地方个人之间的暴力已经变得稀少；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自杀是谋杀的 10 或 20 倍，而美国人口他杀率接近它的自杀率。）如果不是由于战争、国家镇压、汽车和自杀，任何种类的暴力死亡的可能的机会在今天的大多数西方世界比在二、三百年前是无法相比地小得多。

有些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马文·贝克尔（Marvin Becker），把部分变化归结为精神方面的巨大变化也许是对的。

但是有个重大的贡献肯定来自国家日益增强的监视、控制和垄断暴力的有效手段的趋势。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国家活动已经在国家范围的暴力和远离国家的市民生活的相对非暴力之间创造了一个惊人的对比。

第二节 国家如何控制强制

欧洲国家领导了上述“对比”的建立。它们通过建立起自己的可怕的强制手段,同时剥夺平民百姓接近这些手段的途径来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它们大量地依靠资本和资本家作为它们重新组织的强制。然而不同的国家以显著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不要低估这一变化的难度或者重要性。在欧洲的大部分历史中,普通人(再次强调,只有这个词的阳性形式才有意义)通常有着致命的武器在手中;而且,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地方的或者地区的掌权者通常都控制着暴力手段,如果结合起来可能赶上或者甚至超过国家手中的暴力手段。长期以来,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贵族有合法的权利来进行私人战争;12世纪加泰隆尼亚(Catalonia)的尤萨基斯(Usatges)或者说海关特别记载了这一权利。(Torres I Sans 1988:13)在整个17世纪,盗匪(常常由遣散的私人的或者政府的军队组成)横行于欧洲大部分地方。在西西里岛,那些叫做黑社会(*Mafiosi*)的控制和保护暴力拥有者威胁着农村人口直到我们自己时代。(Blok 1974, Romano 1963)国家之外的人们常常从他们私下部署暴力手段中获利匪浅。

然而,自从17世纪以来,统治者成功地决定性地扭转了局面来反对自己国家内的个体市民和竞争的权力拥有者。他们使得大多数市民携带武器成了犯罪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行的;他们宣布私人军队是非法的,并使得国家的武装人员对付手无寸铁的市民看上去是正常的。通过坚持平民拥有武器,现在的美国使自己和所有其他西方国家区别开来,并为此付出了比它的欧洲伙伴高出几百倍的枪击死亡率的代价;在私人武器的扩散方面,美国比英国或者荷兰更像黎巴嫩(Lebanon)和阿富汗。

解除平民百姓的武装是以许多微小步骤实现的：在反叛结束时全面没收武器、禁止决斗、控制武器生产、引入私人武器的执照制、禁止公开展示武装力量。在英格兰，都铎王朝时代的人（the Tudors）镇压了私人军队，减少了沿苏格兰边界的大地主的君主权力，抑制了贵族的暴力、消灭了一度展现英格兰大富豪的权力和自治的要塞城堡。（Stone 1965:199—272）17 世纪的君主路易十三（Louis XIII）在黎塞留（Richelieu）和马萨林（Mazarin）的帮助下重建法国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许拆毁的要塞比他兴建的要多。但他是在边境建，在内部拆。在征服抵抗他统治的富豪和城市时，他常常拆毁他们的要塞，减少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从而降低任何未来大的叛乱的可能性。

在此同时，国家自己武装力量的扩张开始影响它任何国内对手可用的军备。在“内部”和“外部”政治之间的区别，一度非常不清楚，开始变得清晰和关系重大。进行战争和国家结构间的联系加强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国家的有历史争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在某一地域内（成功地）获得了合法使用物质力量的垄断权”（Gerth and Mills 1946: 78）——终于对欧洲国家有了意义。

到底平民百姓解除武装是怎么进行的取决于它的社会环境：在城市地区，常规警察的设立、市政和国家当局间的协议的谈判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大地主占优势的地区，私人军队的遣散、有围墙壕沟的城堡的拆除、族间仇杀的禁止在选举和内战之间交替。伴随着国家武装力量的持续的建设，平民武装的解除大大地增加了相对于国内对手掌握的或者当前执掌国家权力者的反对者所掌握的强制手段的在国家手中的强制手段的比例。结果对于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来说，如没有国家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某些部分的积极协作，要夺取一个西方国家的权力几乎变得不可能了。（Chrley 1943, ussell 1974）

统治者武装力量的创建产生了持久的国家结构。它做到这一点，既因为在国家内部军队已成为重要的组织，也因为军队的建设和维持催生了辅助性的组织——财政部、供应服务、征兵机构、税务局等普鲁士君主的主要税收机构是作为总的战争军需部产生的。在 17 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先后的共和国的和国王的政府，决心反抗法国和荷兰的海军，把皇家的

造船厂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集中工业(concentrated industries)。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帝国建立的组织成了对他们民族政府有巨大影响的因素。(Duffy 1980)从 990 年开始,大的战争动员为国家的扩张、兼并和创造新的政治组织提供了主要的机会。

第三节 战 争

为什么战争会发生?主要的悲剧事实是简单的:强制在起作用;那些对同伴使用大量武力的人们得到了顺从,从那些顺从当中,他们得到了众多的金钱、货物和尊敬的优势,享受到较弱小的人们享受不到的快乐。欧洲人遵循着一种标准的挑起战争的逻辑:每个控制着大量强制手段的人力图保持一个在其中他能够享受从强制中得到回报的安全区,加上一个增强了的(可能以亏本来运行的)缓冲区来保护安全区。警察或者相当于警察的人们在安全区部署武力,而军队则在缓冲区内巡逻,在缓冲区外冒险。最具侵略性的君主,如路易十六(Louis XIV),把缓冲区缩小到一个狭窄的重兵把守的边境,而他们的较弱的或者更爱好和平的邻居依赖着更大的缓冲区和水路。当缩小缓冲区的行动暂时成功了,那缓冲区就变成了安全区,这激励着强制的运用者在旧的缓冲区周围获取新的缓冲区。只要毗邻的强国奉行相同的逻辑,战争就随之而来。

然而,某些战争条件是不同的。每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具体标志取决于三个紧密相关的因素:该国主要竞争对手的特点、它的统治阶级的外部利益和统治者代表自己和统治阶级利益所进行的保护活动的逻辑。在竞争对手是商业航海家的地方,无论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的常规状态,海盗行为和掠夺商船的现象一直持续着,而在地主占优势的农业强权肩并肩地存在的地方,为了控制土地和劳力的争端(特别是在有争议的继承的时刻),促进了更加频繁地诉诸武力。当小的海上强国拥有了大的海外帝国时,对利益的保护驱使它们在海上航线上巡逻,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与其他垂涎同一行业的国家的战争。由于竞争对手的群体、统治阶级的特性

和保护的需求在我们考察的一千年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争的特殊原因也发生了变化。

强制总是相对的;当他的邻居积累起自己的手段时,任何控制着集中的强制手段的人都有失去优势的危險。在1400年前的欧洲,家族群对大多数国家的控制和竞争混杂在一起。在统治者形成家族群的地方,昌盛的家族群的扩张和为日益增多的继承人寻求地盘的趋势激发了征服,从而激化了竞争。统治家族内部的通婚进一步增强了强大的王朝对空缺王位的覬覦。在欧洲分裂的主权中,竞争对手(不管是不是同族人),总是就在眼前,但是为了防止任何具体的中心无限地扩张,联合也总是可达到的。

此外,长期以来,较大的国家如勃艮第和英格兰总是隐藏着当时统治权的内部竞争对手、也想争夺统治权的武装集团和外部敌人的隐蔽的或者公开的同盟。在中国,一旦庞大的帝国机构形成,扩张的帝国有大量的敌人,但在它的领土内外没有真正的敌手。蒙古人常常在中国的北部边界构成威胁,不时地对帝国发动破坏性的袭击,然而只有一次实际上的接管。总之,比起亲自管理国家机构,蒙古人更擅长于榨取贡赋。当帝国的管理范围超出了它的掌握,当军阀在帝国的空隙中组织起来,当流动的侵略者横扫了帝国的疆土并且夺取了权杖时,中国王朝崩溃了。中国成了起义和内战而不是许多国家间的战争的最大的疆土,至于后者,欧洲是记录保持者。

长期以来,欧洲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但发生的频率减少。利用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先驱工作,杰克·列维(Jack Levy)编撰了从1495年到1975年的涉及大国的(欧洲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较大战争的一览表。(参见表3.1)他的一览表,需要每年至少1000例战场死亡数,比伊万·卢阿德(Evan Luard)试图全面地列出在相应时期内的所有实际战争的努力要小得多,但是列维确立了更为清楚的涵盖标准,而且为他所涵盖的战争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参见Levy 1983, Luard 1987)几个世纪以来,大国战争的数量、它们平均持续的时间以及那些战争进行的所有年份的比例,都急剧地下降。(Levy 1983:88-91, 139)威廉·艾克哈特(William Eckhardt)列出了所有的战争——大国和其他国的,国际的和国

内的,都在一起——包括 18 世纪的 50 场战争,19 世纪的 208 场和 20 世纪到 1987 年的 213 场。(Eckhardt 1988:7; Sivard 1988:28—31)

表 3.1 涉及大国的战争

世纪	战争数	战争平均持续时间(年)	战争进行年份的比例(%)
16	34	1.6	95
17	29	1.7	94
18	17	1.0	78
19	20	0.4	40
20*	15	0.4	53

* 直到 1975 年。

资料来源:Levy 1983, Luard 1987。

此外,战争的强度有很大的变化。图 3.1 通过一种借助于走向分析的图示反映了某些变化:一个立方体(solid),其体积代表每年大国战场发生的死亡人数的总数,其三个维度表示战场总死亡数的组成成分。这三个组成成分是:每个参与大国战争国家的平均每年战场死亡数;平均每年参与那些战争的国家数;每年每个国家参与的平均战争数。因此:

每年战场死亡数 = 每个国家战场死亡数 × 每场战争的国家 - 年数 × 每年战争数

这就是立方体所表示的。

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我们看到每个国家的大国战场死亡数从 16 世纪的每年 3 000 人到 20 世纪的 223 000 多人。参与大国战争的国家数的平均数从 16 世纪的 9.4 个上升到 18 世纪的 17.6 个,只是在 20 世纪才回落到 6.5 个(这上升和下降揭示了在大多数或者所有大国之间的普通战争的发展,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受到西方国家在西方之外挑起或者干预地方冲突的趋势的弥补。)。最后,每个交战国在某一年进行的战争数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有所下降,然后保持稳定:0.34、0.29、0.17、0.20 和 0.20。也就是说,在 16 世纪,曾经参与大国战争的国家在三年中大约有一年处于战争中(0.34);在 20 世纪,五年中有一年(0.20)。

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每年大国战争死亡数的净值(sheer volume)从 16 世纪的 9 400 人剧增到 20 世纪的 290 000 人。如果我们能够计入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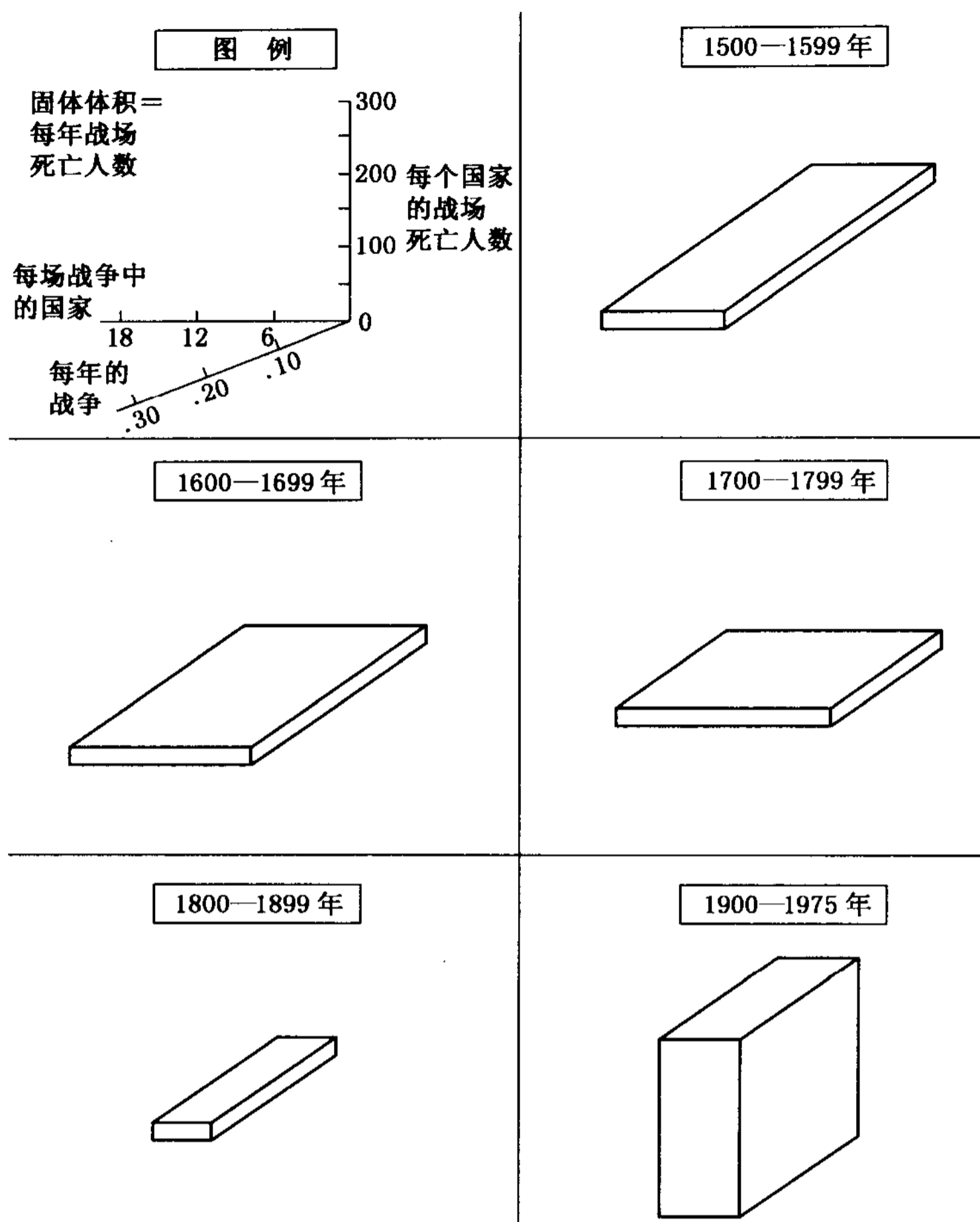


图 3.1 1500—1975 年,按世纪考察的大国大的权力战争的数值

的死亡数和小国军队内的死亡数,这种增长肯定会更快。伴随着飞机、坦克、导弹和核弹,20 世纪战争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以前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

这些数字只是近似的,但是它们反映了欧洲国家(它们,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一直是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国)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深陷战争之中。它们也说明在所考察的整整五个世纪里,统治者们一门心思全放在准备战争、支付战争费用和弥补战争损失上。而且,在 1500 年前的五个世纪,欧洲国家甚至更为专注于战争的进行。在整个一千年里,战争一

直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活动。

国家的预算、税收和债务反映了这一事实。在 1400 年以前,在世袭制(patrimonialism)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有现在理解意义上的国家预算。税收存在于欧洲比较商业化的国家,但是每个地方的统治者都是从贡赋、租金、收款(dues)和收费中获取他们大部分财政收入。个别君主借钱,但是通常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而且依靠不动产抵押(against real collateral)。在 16 世纪,由于战争大大地增加了在欧洲大陆上大部分地方的国家的开支,欧洲国家开始规范化和扩大预算、税收和债务等。国家未来的财政收入开始成为长期债务的担保。

当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 16 世纪 20 年代开始把城市未来的财政收入作为担保,向巴黎商人借钱时,法国的公债具有很大的比例。(Hamilton 1950:246)他把这钱用于反对哈勃斯堡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的宏大战役。尽管法国的国债作为战争努力和财政政策的函数之一上下波动,总而言之它飞速上涨——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了 18 世纪战争的借款覆没了这个国家,破坏了它的信用,直接导致了 1789 年的国民议会(the Estates General)的严重呼吁。预算和税收相应地膨胀:法国税收从在 1600 年的相当于一个普通劳动者每人每年工资的 50 个小时(工资)上升到 1963 年几乎每人 700 小时(工资)。(Tilly 1986:62)

直到威廉(William)和玛丽亚(Mary)统治时期英国都没有大的国债。奥格斯堡同盟(the League of Augsburg)战争(1688—1697 年)把英国长期债务提高到 2 200 万英镑。到 1783 年,在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和美国独立战争(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之后,英国的债务增长了 10 倍,到 23 800 万英镑。到 1939 年,当英国重新武装时,公债达到了 83 000 万英镑。(Hamilton 1950:254—257)从 17 世纪晚期以来,预算、债务和税收随着战争的节奏而上升。所有的欧洲参战国都有这相同的经历。

如果说战争驱使着国家,它并没有耗尽国家的能动性。相反:作为准备战争的副产品,统治者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开始活动和组织,这些活动和组织最终都具有自己的生命:法庭、财政、税收系统、地区政府、公众集会,等等。在对 16 世纪的记载中,艾略特(J. H. Elliott)写道:

如果在西班牙在查理五世(Charles V)和菲利普二世(Philip II)统治下的历史中战争是一个占优势的主题,那么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就是另一个主题……武士-国王查理五世被惯于久坐的菲利普二世替代,他在成堆文件所包围的书桌边度过自己的工作日,恰当地象征了西班牙帝国走出西班牙征服者时代,进入公务员时代的转变。(Elliott 1963:160)

不仅仅装备陆军和海军的任务导致扩大的政府机构。如没有得到几乎所有他的国民们的默许和至少一些关键人物的积极合作,没有君主能够进行战争。君主们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军队去加强贡赋、税收和人力或者物资的征集。但是他们也允许地方通过及时地支付他们的债务来赎买沉重的军队负担。在这一方面,统治者就像敲诈勒索者:以很高的代价,他们提供保护来防止他们本身可能以另外的方式造成的或者至少允许造成的邪恶。

在国家层面上,旨在进攻外部敌人的武装力量(军队)和旨在控制国内民众的武装力量(警察)的组织上的区分只是缓慢地发展,但从未变得完备。维持治安的困难在农村地区(原因之一是很大比例的土地往往是政府当局不能进入的私人空间)和在城市地区(其大多数土地是任何人都可进入的公共空间)有体制上的不同;随叫随到的维持治安的军队模式适合大多数农村地区,而系统的巡逻和监控在城市变得可能。(Stinchcombe 1963)由于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差异,城市发展出独特的警察力量一般比农村早得多,而把警察力量和其他军事组织分离开来在相对城市化的国家发生得更早。

进入17世纪后,通过依靠武装的和部分自治的地区权贵(magnates)来进行国内统治的大多数大的欧洲国家面临着不断发生权贵们拿起武器来反抗统治者的内战威胁。在从1400年到1700年的危急的几个世纪里,统治者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努力用于缴械、孤立或者选派国家权力的挑战者。尽管市政当局和农村管辖者很早就创造出自己的小规模警察队伍,只是在19世纪欧洲国家才建立起专门用于控制平民百姓的穿制服的、领薪水的、官僚化的警察力量。因此它们减轻了军队负担,使之集中于外部征服和国际战争。

第四节 过 渡

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1500年前后的几年是关键。接近14世纪中叶时欧洲已经开始在战争中大量地使用火药。在以后的150年里,枪炮的发明和传播使得军事优势转向那些支付得起铸造大炮和建造新型的不会轻易地被炮火粉碎的要塞的君主们。战争从在空旷平原上进行的战役转向了对重要城市的包围。在1500年前后,当移动的攻城大炮和伴随它的步兵进入广泛的运用时,费用又一次上升;在16世纪早期便携式毛瑟枪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明的步兵部队的重要性。在此同时,载有大炮的帆船开始在海战中成为主流。阿尔卑斯山脉北部的较大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哈勃斯堡帝国,有这样大的规模来吸收增加的费用并且利用它。

确实,在两个多世纪里,一些集中精力于海军的国家持续繁荣;根据某些标准来看,有着很小规模地面部队的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成为欧洲的领先国家。葡萄牙和威尼斯同样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地位直到17世纪。海岛的英国在18世纪建立起陆军之前,享受着作为海上强国的繁荣。(Modelski and Thompson 1988:151—244)这些国家从其殖民地掠夺财富,从增加的国际贸易中获利,并且利用海军力量很容易保卫的国内基地。然而,最后,那些从自己国内资源中招募和维持庞大军队的国家——法国、英国和普鲁士是突出的典型——胜过了所有的其他国家。

那么,在欧洲的规模上,15世纪晚期标志着一次重大的转折:当时大的军事国家开始感到资本主义扩张的刺激,小的商业国家的优势开始消失。地理政治起了作用: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的结束使得相对统一的法国能够在周围寻找征服的空间。伊比利亚的刚刚完成把穆斯林势力从这半岛上赶走的众多国家感到了法国的压力;在1463年,路易十一世(Louis XI)吞并了鲁西永(Roussillon)和塞尔达尼亚(Cerdagne)

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国家。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婚姻(1474年),通过把阿拉贡和卡斯迪尔的君主们联合起来,回应了法国的威胁,而且反过来威胁了法国。从此,法国和西班牙的竞争开始贯穿整个欧洲政治。

意大利最早感觉到那种变化的影响。当然,教皇国家、共和国和意大利的小的君主国曾经长期涉足于这个半岛之外的政治。脆弱平衡的联盟、向外部调停者呼吁和适时的联姻在它们政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11到14世纪,教皇们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制约、控制或者甚至操纵位于德国的神圣罗马的皇帝的选举。接着那些皇帝们象征性地拥有大部分意大利的宗主权。简而言之,意大利的政治长期地和其他地方的政治联系在一起。

战争和国际竞争在这半岛上也不是新鲜事。在13世纪,阿拉贡、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罗马教皇都在意大利争夺优先权。那个世纪的许多重大战役就发生在那里。而且,到15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主要国家——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教皇国家断断续续地相互交战了几十年。但是,它们的战争一直以一种彬彬有礼的、有限的方式进行。那时米兰的篡位公爵鲁多维科·斯福扎(Ludovico Sforza)邀请法国的查理八世(Charles VIII)来镇压他的家族对那不勒斯王国的王位要求。

随着查理八世(Charles VIII)对那不勒斯包围,不只一个而是两个灾祸进入了意大利。在1494年前,梅毒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从哥伦布的第一次美洲之行归来的在美洲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非常可能把这种疾病传入了西班牙。包围那不勒斯(1494年到1495年)的西班牙雇佣兵患有一种几乎肯定是梅毒的传染病,从此梅毒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随着这瘟疫传播,法国人常常称之为“那不勒斯人的病”,而那不勒斯人则喜欢称之为“法国人的病”(Baker and Armelagos 1988)。不管那最早的传染病的准确的来源是什么,意大利人很快知道,法国人和他们的雇佣兵带着复仇回到了这半岛上。如果法国人到了,西班牙人会接踵而来。

因此15世纪90年代不同于以往。这个年代不仅仅把使臣、王子和皇家军队带到城邦国家的意大利,而且带来了来自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民族国家的大量军队。而且,北方人来了,带着移动的攻城大炮和随之而来

的战略战术,这些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和毁灭性。法国 1494 年的人侵使得这半岛成了欧洲的战场,结束了在城邦国家间的小规模战争的巡回,震惊了意大利的思想者。

他们的震惊来自这一事实:野蛮的武力又一次蹂躏了文明的故乡。正如赫尔(J. R. Hale)这样描述道: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为了证明民兵(militiamen)相对雇佣兵(condottieri)的优点的论题过分地夸大了在 1494 年后发生在战争性质上的变化[正如奎夏第尼(Guicciardini)为了在意大利自尊的伤口转动刀子时所做的夸大那样],但是变化肯定是有的,人们带着普遍的恐惧面对着这种变化。然而,这种恐惧不是直接指向诸如此类的作为早期小规模战争的对立物的大规模战争,甚至也不是指向长期的此类战争;它也不是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指向战争变化了的性质——更加血腥、更加全面(total)、更加昂贵。它是由这些战争提供的道德的失败、意大利人接受挑战的性质的失败的证明引起的。(Hale 1983:360)

马基雅维利文章中关于军事事务的很大部分来自他思考意大利国家系统所发生的事情并想知道对其怎么办的努力。

意大利国家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形成中的民族国家,通过竞争在意大利的霸权,在猛烈地把这国家系统融合到横跨欧洲大部的更大的系统。后来不久,土耳其帝国扩张深入到欧洲领土,从东南面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的统治(1520—1566 年)把土耳其人带到了他们在欧洲权力的顶峰。土耳其帝国的推进接着引发了它和俄罗斯四个世纪的斗争,使得地处战略要地的克里米亚鞑靼人(the Crimean Tatars)第一次和土耳其人结盟来反对俄罗斯人。

在意大利,战争的变化有着破坏性的后果。到 16 世纪 20 年代,哈勃斯堡和瓦罗亚(Valois)正在意大利领土上进行他们的王朝战争。1527 年,哈勃斯堡皇帝的雇佣兵洗劫了罗马。正如 1540 年,米兰和伦巴第(Lombardy)落入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占领了沙埃禾(Savoy)和裴德芒(Piedmont)的大部分地方,佛罗伦萨成了美第奇家族(Medici)统治的

名义上服从帝国的公国,那不勒斯是西班牙皇室的一块封地。在意大利的强权中,只有最强的海上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保持着寡头政治的制度,即使它们失去了它们地中海优越地位。

当北方国家把它们战争普遍化,把意大利拖入它们的斗争之中,陆地上的战争变得更为重要,部署大规模军队的能力对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在1494年法国有18 000军人在服役,在1525年有32 000人,在1552年有40 000人。西班牙的军队扩大要大得多:从1492年的20 000个士兵到1532年的100 000个士兵。到1552年,查理五世皇帝有148 000军人在服役,这个总数是罗马时代以来史无前例的。(Parker 1988:45)在西班牙顶峰时期,大约1630年,有30万人在它的旗帜下服务。军队和总人口的比例大大地上升。表3.2的数字需要许多限定。这些数据是近似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是指在1600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1700年的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后来的英国(the United Kingdom)。在这整个时期所有这些国家的边界不断地改变,频繁地雇佣外国雇佣兵意味着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此表中所展示的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国家服役人口的比例要大得多。而且,军队的官员和实际力量常常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1800年以前。最后,因为本章所探讨的理由,军队数每年变

表 3.2 欧洲 1500 年到 1980 年的服役人数

国家	服役的军队数(千)					作为国家人口比例的军队				
	1500	1600	1700	1850	1980	1500	1600	1700	1850	1980
西班牙	20	200	50	154	342	0.3	2.5	0.7	1.0	0.9
法国	18	80	400	430	495	0.1	0.4	2.1	1.2	0.9
英格兰 威尔士	25	30	292	201	320	1.0	0.7	5.4	1.1	0.6
荷兰		20	100	30	115		1.3	5.3	1.0	0.8
瑞典		15	100	63	66		1.5	7.1	1.8	0.8
俄罗斯		35	170	850	3 663		0.3	1.2	1.5	1.4

资料来源是根据下列资料编制:Ballbe 1983, Brewer 1989, Corvisier 1976, Flora 1983, Jones 1988, Lynn 1989, Mitchell 1975, Parker 1976, Parker 1988, Reinhard, Armengaud and Dupaquier 1968, Sivard 1983, de Vries 1984,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化很大,取决于公共财政和战争状态;例如,接近 1700 年时,在法国,和平时期的军队就达大约 14 万人,但是路易十四在他的大战当中把这扩大到 40 万人。(Lynn 1989)然而,这些数字雄辩地说明了那些国家的主要要点。特别是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军队扩张了。军队成了大的行业。

国家的预算、税收和债务也相应地增长。卡斯提尔的税收从 1474 年的不到 90 万里勒(*reales*)上升到 1504 年的 2 600 万里勒(Elliott 1963: 80)。在此同时,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借债来支付他们在格拉纳达(Granada)和意大利的战争费用。随着西班牙对意大利控制的加深,意大利的税收成了皇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荷兰同样为卡斯提尔的财政收入贡献了重要的份额。相反,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阿拉贡和巴伦西亚(Valencia)的议会成功地抵制了皇家要增加它们对国家参战贡献的要求。到 16 世纪中叶,西班牙的意大利和荷兰省份不再提供实质性的增加;查理五世和菲利浦二世日渐转向卡斯提尔(在此,他们的前辈更为有效地使贵族、僧侣和城市服从皇家意愿)和美洲寻求财政援助。(Elliott 1963:192—193)他们也通过对财政收入的预期向卡斯提尔和美洲借贷。结果到 1534 年,65% 皇家常规收入用于支付养老金(*annuities*)。(Elliott 1963:198;更详细的情况,参见 Fernandez Albaladeio 1989)毫不奇怪,1557 年皇室破产,拒付其债务。

在此同时,瑞士人——在那时仍然是一个征服者民族——发展出了迅速地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性的新的纪律非常严明的步兵战术(*infantry tactics*)。瑞士人在 15 世纪 70 年代从不断地打败勃艮第的大胆查理(Burgundy's Charles the Bold)中建立起他们的军事勇气。不久几乎每一个强权都需要它自己的瑞士兵,瑞士人开始用雇佣兵的训练和出口来替代他们自己的战争行为。(Fueter 1919:10)在此过程中,瑞士的各行政区本身也进入提供雇佣兵的服务。(Corvisier 1976:147)像其他的雇佣兵出口国一样,瑞士已经有大量的贫苦的流动的半无产者化的晚婚的高原人(*highlanders*),他们成了远离家乡的军事服务的有吸引力的候选人。(Braun 1960)瑞士和其他地方的雇佣兵取代了客户的军队和市民武装(*citizen militias*)。

在小规模上,有几个世纪,雇佣兵在欧洲战争中起了自己的作用。从

十字军时代、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掠夺的士兵们向君王们兜售他们实际的和鼓舞人的服务，直到地中海。当没有人雇佣他们时，他们就自行敲诈勒索和抢劫。(Contamine 1984:158)在14世纪，意大利城邦国家开始使用少量的雇佣军队。例如，14世纪20年代，当佛罗伦萨加速它对相邻领土的暴力兼并时，它开始经常依靠雇佣骑兵。在14世纪80年代，民主的佛罗伦萨雇佣了——或者说收买了——伟大的英国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爵士(Sir John Hawkwood)，他曾经掠夺了托斯卡纳(Tuscany)，因为米兰和教皇之间战争的结束使得他的公司无事可干。霍克伍德以前曾经为英格兰、塞维亚、米兰、比萨和教皇服务。对佛罗伦萨民主人士来说，不幸的是在他们1382年成功地兴起时，霍克伍德却支持寡头政治；霍克伍德“把佛罗伦萨公民的稀少的爱好和终生的养老金和免税联系协调在一起；当1394年他去世时，感恩戴德的政府不仅用公众的费用举行了辉煌的葬礼来纪念他，而且还把他穿戴着战争盔甲骑在马背上的形象画在大教堂的正面墙上来纪念他的服务”(Schevill 1963:337)。今天的旅游者仍然能看到这幅奇怪的世俗的壁画。

在强大的海上强国威尼斯，贵族居民长期为它提供了自己的海上和陆地的军事指挥官；他们招募士兵和水手，而且大部分来自威尼斯居民。但是到14世纪末，威尼斯，像它的意大利邻国一样，也在租用雇佣兵头目。那些船长招募自己的军队，为了可观的价钱为城邦国家打仗。由于雇用合同是为某一特定君主打仗的合同，雇佣兵头目在本质上就意味着签约者。德语词汇“*Unternehmer*”包含了(conveys)相同的商业意味。雇佣兵头目是他们时代的石油大亨，从一宗买卖到另一宗买卖转变着效忠中，有时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在雇佣兵老板巴托洛米奥·科勒奥尼(Bartolomeo Colleoni)在1475年去世时，他的财产“可以和当时的最大的银行家科西莫·麦迪奇(Cosimo de' Medici)的财富相比”(Lane 1973a:233)。到1625年，弗里德兰(Friedland)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公爵管理着他自己的2000平方英里地盘，并且把此用作他代表神圣罗马帝国部署的军队的有利可图的供应基地。他不是允许其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而是组织起警戒骚乱，迫使被占城市为了免受放纵士兵之苦而付款。(Malland 1980:103)在华伦斯坦的领导下，战争成了喝醉了的生意。

战争不仅仅是包括招募军队和支付军队报酬。从事战争的国家必须为其提供军需物质。在 17 世纪晚期,一支典型的 60 000 人、有着 40 000 匹马的军队每天几乎消耗 100 万磅的食品——一部分随军携带,部分贮藏在军需库内,不管军队位于哪里,大量的军需物质就地取得,但是所有的军需物质都需要大量的花费和组织。(Van Crevels 1977:24)以当时的价格和工资,100 万磅的谷物价值相当为 9 万个普通劳动者的每日工资(根据 Fourastié 1966:423 计算)。除了食物外,军队必须获得武器、马匹、衣物和住处;军队越大,让每个人自我供给则越不可行。从华伦斯坦到路易,17 世纪的伟大的战争组织者们投入到供给上的精力和投入战场的一样多。这使得他们的大事业变得更大。

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欧洲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部署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军队主要由大地主和军事首领招募的雇佣兵组成。同样,国家海军(特别是得到保护国授权掠夺敌人船只的海盗们)通常聚集着来自欧洲大陆所有地方雇佣来的水手。(Fontenay 1988b)确实,每个国家在依赖雇佣兵的程度、时间上是各不相同的。较大、较强国家的统治者努力限制他们的依赖程度:法国、西班牙、英格兰、瑞典和 7 省联合共和国(the United Provinces)在雇佣军团和公司的同时保留自己的将军,但是较小的国家通常租用从将军到士兵的整个军队。德国的哈勃斯堡依靠地方征兵直到 30 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在战争中雇佣了伟大但是贪得无厌的雇佣兵头目华伦斯坦,然后在 17 世纪后半叶转向创建一支常规军队。

由于战争是根据军队双方相对的大小而不是根据在其后方的每个人的努力决定胜负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相对繁荣的较小的国家常常到国际市场去雇佣军队。海军也混杂着私人武装力量和公共武装力量。安德森(M. S. Anderson)说道:

直到 17 世纪 60 年代,法国大帆船舰队(galley-fleet)的很大部分是由私人企业主(常常是马耳他骑士)提供的。这些私人企业主拥有舰队指挥的大帆船并且为了特定的金额根据合同为国王服务某一确定的时期。在 1616 年的西班牙,当海军处于低潮时,舰队中 17 艘船只就有 5 艘是私人所有的、只是夏季(海上和陆地交战季节)租用的,而在下一年为了使来自美洲的运送银子的船队(flotas)安全入

港,又要租用另外6艘或者7艘船只来提供护航服务(escort)。在英格兰,组成德雷克(Drake)在1585年的到西印度群岛的考察队的25艘船只中,只有2艘是女皇提供的;尽管他是作为伊丽莎白(Elizabeth)的舰队司令,而且有着正式的命令,用于这次考察的费用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由政府提供的。(Anderson 1988:27;也可参见 Fontenay 1988a, 1988b)

17世纪海战中繁荣的武装民船,从定义上看来自特许的非政府武装力量。

租赁的陆军和租赁的海军主要依靠他们所服务的皇室代理人所支付的或者批准的报酬生存。从词源来看,“战士”(soldier)一词就有“为了报酬而战斗的人”的含义。“Söldner”和“Unternehmer”相互补充。这个体制的特性很早就变得很清楚,当在1515年“两支瑞士军队,一支是为法国国王服务,另一支是为一个意大利男爵服务,在意大利北部的马里尼亚诺(Marignano)的一个战场上作为对立双方相遇,几乎彻底同归于尽”(Fischer 1985:186)。这一事件使得瑞士人懂得了避免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们把雇佣兵运送到其他人的战场上去。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发现这种通过税收中利润来租借-购买的体制是建立武装力量的一种方便的方式。在雇佣兵产生的国家专门化作用的极端的例子毫无疑问是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它是一个18世纪的保持着其全部人口的整7%服兵役的小国,其中12000人在参与地方经济的国内卫戍部队(garrisons),另外12000人在伯爵领主(the Landgrave)租出去谋取利润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中。(Ingrao 1987:132)当英国需要额外的军队用于对付反叛的美国人的战争时,它就求助于黑森。结果,在美国民间历史中“黑森的”意味着愚钝的和不爱国的——简而言之,唯利是图的。在军队生意的基础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1760—1785年)建立起一种包括扶贫和妇产医院的开明的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然而,在美国战争结束和欧洲国家转向招募自己的国家军队时,大多数的计划都失败了。(Ingrao 1987:196—201)那时雇佣兵的时代正在结束。

欧洲较大的国家长期以来努力把雇佣兵保持在由它们自己的国民指

挥、自己的公民控制的军队内。而且,伴随着 18 世纪,大规模雇佣兵力量的费用和 risk 导致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征召越来越多的他们自己的公民,在可能的地方用他们来替代外国雇佣兵。在借助雇佣军队的军事扩张的早期阶段,统治者发现从自己的人口召集军队费用很大而且政治上有 risk;国内抵制和反叛的危险还很大。法国革命和帝国的战争战胜了这种倾向,结束了雇佣军队的优势。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拿破仑失败后反思道:

同时,根据通常看待事物的方式,在 1793 年所有希望都放在非常有限的军事力量上,没有人了解的这种力量出现了。战争又一次突然成了平民百姓的事情,成了高达三千万人的事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通过这种平民而不仅是一个内阁、一支军队参与战争,整个国家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从此以后,可以使用的手段——可能唤起的努力——不再有任何确定的限制;进行战争的能量不再有任何平衡,因此敌人的危险上升到了极端。[Clausewitz 1968 (1832):384—385]

随着一个国家武装起来,这个国家的榨取能力正如公民对他们国家的要求那样极大地提高。尽管保卫祖国的号召刺激了对战争努力的额外支持,对大规模征兵、征用税收和生产向战争目标转换的依赖,使得任何国家前所未有地易于受到大众的抵制和要对大众的要求负责。从此开始,战争的特点发生了变化,进行战争和市民政治的关系根本地改变了。

考虑到货币化(monetization)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总的趋势,雇佣的武装力量的消失发生得有些奇怪。究竟为什么国家停止购买士兵和水手,而是代之以建立在招募基础上的常规军队?几个因素集中在那个结果上。对君主的义务纯粹是庞大的契约的军队的创立,对政治权力来说,提高了拖后腿、反叛和甚至敌对的危险;由它自己的统治阶级成员指挥的一个国家自己的公民常常战斗得更好、更可靠、更便宜。统治者通过雇佣军队以及支持军队的基础组织的建设所获得的对国内人口的权力最终改变了平衡;由于雇佣兵本身变得昂贵和危险,国家居民方面有效抵制的可能性下降了。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昂贵,光由它们的大的对手确立的战争的费用程度就超过了除最商业化的国家外的所有国家的财

政资源。在 18 世纪,农业产业的广泛扩张为曾经向欧洲其他地方输出士兵和家庭仆人的主要地区的人们,如高原瑞士(highland Switzerland),带来了另外的经济机会,从而挤压了雇佣兵的供应。法国革命和拿破仑通过主要从法国自己扩大的领土内招集大量的高效的军队,给了雇佣兵制度致命一击。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使在国内招募的常规军队也必须支付报酬和提供给养。从 15 世纪开始,欧洲国家果断地转向创建由贷款和税收支持的领取报酬的武装力量。

确实,雇佣兵制度有很大的弱点:当薪酬来得太晚或者根本没有,雇佣兵通常会立即发生兵变、以土地为生、成为强盗或者三者兼而有之;当地民众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参见 Gutmann 1980:31—71)在 16 和 17 世纪的战争中,战利品补充了军队收入,但是远不足以让军队养活自己。尽管不同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从或多或少独立的企业主那里租借武装力量在 17 世纪达到了顶峰,在 18 世纪开始衰退。然而,在三个或者四个世纪里,雇佣兵创建了军事行为的欧洲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赡养军队的老板们直接购买食物、武器、军服、住处和交通工具或者通过给下属军官发放津贴(allowances)。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在 1502 年,一位意大利战役的老兵罗伯特·德·巴尔萨克(Robert de Balsac)用对所有君主的建议结束了一篇关于战争艺术的论文:“所有当中最重要的是,在战争中的成功取决于有足够的钱来提供这一事业所需要的任何东西。”(Hale 1967:267)

第五节 夺取、制造或者购买强制

到 1502 年,大多数欧洲君主已经把德·巴尔萨克的教导牢记心头。大约说来,统治者有三种获取集中的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他们可以夺取它们,制造它们或者购买它们。在 20 世纪前,很少有欧洲国家曾经制造大部分它们自己的强制手段;它们很少拥有所需的资本或者专门技术(expertise)。像火药和大炮之类的昂贵的危险的制造一直是较大的例

外。990 年后,欧洲国家逐渐地从直接夺取转向购买。

有几个重要的变化促使它们朝着这相同的方向转化。第一,由于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和资本密集,在平民百姓中越来越少有人拥有战争手段;每一个 13 世纪的贵族家庭都拥有剑,但没有一个 20 世纪的家庭拥有航空母舰。第二,统治者们在武装他们的军队时有意地解除了他们的平民百姓的武装,因此加剧了在那些控制战争手段的人和那些君主通常希望他们为战争买单的人之间的区别。第三,国家逐渐地参与到生产战争手段中去,这换一种方式表述了在夺取和购买生产手段而不是产品本身上做出选择的问题。第四,大量的国民百姓抵制直接夺取人力、食物、武器、运输和其他战争手段,比他们反抗为这些东西买单更为有力和有效。尽管多种多样的征集形式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时代,欧洲国家在总体上转向以货币形式收税,然后用收集来的钱支付强制手段,再用部分强制手段来增强收税的体制。

这样的体制只是在两种苛刻的条件下起很好的作用:相对货币化的经济和信贷的迅速可利用性。在一种只有少量的货物和服务可购买和销售的经济中,有许多条件:收入的收集者不能准确观测或者评价资源,对于任一具体资源许多人声称有所有权,对于那个资源的损失,损失者难以得到赔偿。结果,征收的任何税收都是不足的、显而易见地不公平的,而且非常可能激起反抗。当可用信贷很少时,即使在货币化经济中,当前的开销取决于手头的现金,大量的开销只能发生在小心翼翼地积蓄之后。在这些条件下,任何不能直接从他的国民中夺取战争手段或者不能在其他地方获得战争手段而无需付款的统治者,是很难以被迫建立起他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在 1500 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获胜的手段变得越来越昂贵,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把他们大部分时间用在筹集资金上。

钱从哪里而来?从短期来看,典型地来自资本家的贷款和对那些不幸有军队驻扎在他们附近的当地人口的征税。从长期来看,来自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税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看到了在税收和武装力量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称之为现时代的社会,特别是在西方,是以某种程度的垄断为特色的。个人无权自由使用军事武器,军事武器的自由使用只能

属于不管什么类型的中央政权。同样,对财产或者个人收入的征税被集中在中央的社会权力手中。从而流入这个中央权力的财政手段维持着它对武装力量的垄断,而这反过来维持着征税的垄断。一方面对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意义的优先;它们是同一垄断的两个方面。如果一方面消失了,另一方面也会自动随之而去,虽然垄断统治可能有时在某方面会比另一方面动摇得更厉害。(Elias 1982: II, 104)

然而,埃利亚斯的二重奏(duo)实际上形成了三重奏(trio)中两种声音。缺失的成员,信贷,把军事垄断和征税垄断联系在一起。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曾经能够从当前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它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把开支的节奏和收入的节奏分开,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因为用于人力、武器和其他战争必需品的开支通常是波动的,而可能的实际的国家财政收入一般地从一年到另一年很少变动。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机会。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以前对它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贷款的筹集者和偿还贷款的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或者甚至是财政收入的筹集者,来为国家服务。欧洲资本家有时把所有这些活动结合进缴税农民非常憎恨的身份,他把钱交到预期他本人用国家的权威和军事力量所收集的税收的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甚至更常见地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图 3.2 总结了某些关键的关系。这些并非影响规划中变量的仅有的关系。例如,一个君主的容易销售的资源的直接渠道,使得它对债权人更具吸引力,偶尔为借贷提供另一渠道。只要金银从美洲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国王就能在奥格斯堡、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地方找到自愿的贷款者。在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大规模的动员和庞大的市民军队的时

代,一个国家人口的绝对规模在交战容易度方面开始起非常大的作用。即使在那时,资本家的活动、货币化、可用信贷和交战容易度的关系在欧洲国家中在很大的区别。它们给予那些能迅速接近资本家的国家以在迅速走向战争立脚点的显著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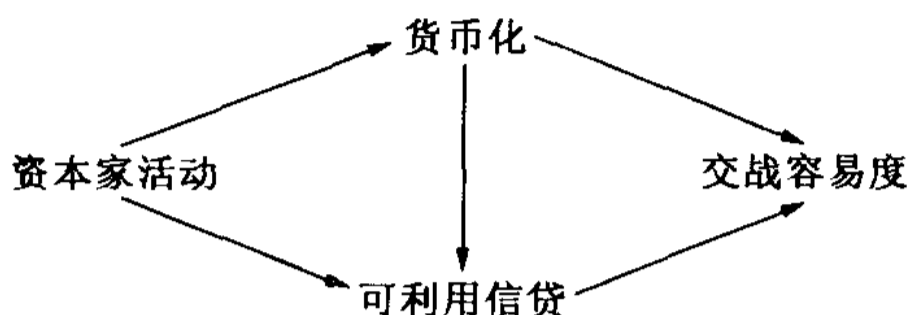


图 3.2 资本的出现如何加速了交战

因此在一个国家领土内商业城市的相对有无大大地影响了战争动员的容易度。不仅贷款和税收更容易流入有很多城市的国家保险箱——考虑到对国家领土内外的市民(burghers)利益的足够的注意力——而且城市民兵和商业船队容易被租来很快适用于防御和武装掠夺。在城市弱小和稀少的地方,统治者或者得不到大笔贷款或者求助于那些为其服务要求高价的外国银行家,谋取控制武装力量并且同样要求特权作为回报的巨头的合作,在向反抗的贫穷的人群征税的过程中建立起巨大的财政机构。

在 16 世纪,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雇佣兵使用的普及,借贷的能力对军事成功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南部德国的商人,如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s)和他们的同行一起贷款给国王。例如,富格尔家族以美洲银子的未来交付作为担保在安特卫普借款来在经费上支持西班牙战争。长期的借款使得君主们对他们不能轻易控制,但是允许他们以对地方经济有较少灾难性后果的减免债务的外国人负有义务。不利终于超过了有利,那些可以这样做的君主转向了国内借贷。当然,那些能够在国内借贷的君主特别是那些其国家包括资本家企业重要地带的君主。大约在亨利四世(Henry IV)(1598—1610 年)时代,法国从依赖其他资本中心(特别是里昂,意大利资本的渠道)迅速地转向巴黎的财政优势,从外国金融家转向法国财政家,从谈判转向强迫纳税。(Cornette 1988:622—624) 尽管在以后的两年里,破产不断地威胁着这位君主,财政权力的巩固给了

法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巨大的优势。

第六节 偿还债务

不管他们的债务沉重与否,所有统治者都面临着支付战争费用而不破坏他们资源在将来再次支付的能力的问题。他们采取非常不同的财政策略。政府的总的财政收入(广义上的“税收”)分为五大类:贡赋、租金、流通税(payments on flows)、固定资产税(payments on stocks)和收入税。贡赋包括对个人、团体或者地方征收的任意的款项;在整个人口或者在其主要人群中相同的人头税构成了特殊种类的贡赋。租金包括对由国家有条件提供给某些具体用户的土地、货物和服务的直接付款。(某些国家——例如,俄罗斯、瑞典和土耳其帝国——给予租金一种特殊的手法:指定某些军官或者市政官员享用从他们占用的皇家土地上收取的租金,只要他们还在为皇家服务。)

租金和贡赋可以同样的方法轻易地收取。流通和固定资产税就不容易收到。流通税包括传统做法、海关、通行费(tolls)、交易收费和对其他转让或者运转的收费。专家们常常称之为间接税,因为它们只是非常间接地反映了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固定资产税主要分为土地和财产税;专家们常常称之为直接税。收入税(实际上是流通收费的一个特例)涉及当前财政收入,特别是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

这五种税收根据它们对周围的经济货币化的依赖程度不同形成了一种连续体(continuum)。在收税者必须加以不断监控的程度方面它们也不相同。(参见图 3.3)总之,需要很少监督的税收比起那些包括不断的监督的税收要更频繁地依赖于公开使用武力,因而促进了估税和收税的特殊人员的发展。手中有大量武力的政府能够在相对未货币化的经济中收取贡赋和租金,尽管那里的人们支付现金的能力仍然取决于他们出售货物或者用服务来获取现金。甚至海关收入也取决于明确的防备森严的边界。走私——逃避出入境关税——正好在欧洲国家试图确定和保护它

们边界的范围内成为犯罪。确实,在世袭制和经纪人时代,国家常常依靠从战略要道、港口或者航道收取的费用而不是从所有监控的边境收取关税。(Maravall 1972: I, 129—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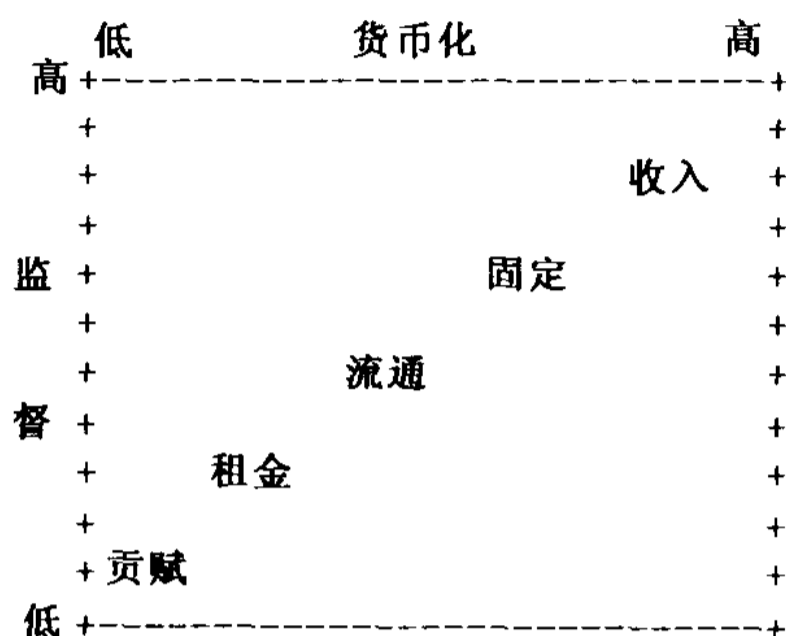


图 3.3 税收不同的形式

流通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货币化,因为货币化增加了此类流通,减轻了估税员对流通的估税工作,增加了那些可能用现金付税者的能力。固定资产税,违反直觉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化,因为缺乏一个相对所涉及的土地或者财产的活跃的市场,估税员就缺乏使税收与价值相称的手段;当此评估很差时,税收往往不足。(参见 Ardant 1965)因此货币化强有力地影响了一个国家通过税收手段而不是直接从其国民处夺取战争手段达到在财政上支持其战争努力的效率。收入税就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只是在实际上每个人都参与货币经济,大多数工人为了工资而努力工作的经济中,收入税才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持久的高效的来源。

然而,高度商业化的国家,从这些关系中获得了许多重大的好处。考虑适当的货币化程度,靠近“连续体”上端的税收是相对有效率的。它们建立在商业经济用于财产、货物和服务的衡量和可见性基础上。市场参与者已经通过对价格和交易的记录做了大量必需的监督。而且,完全社会化的市民开始把道德价值和税收的交纳联系在一起;他们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谴责逃税者为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s)。因此,对流通、固定资产,特别是对收入征收的税收对相应的收税努力产生了很高的回报,而且比贡赋或者租金更容易适应国家政策的改变。一个试图在商业化程度低的经济中收取完全等量的税收的国家会遭遇更大的阻力,收集效率更低,

并且从而在此过程中建立起较大的控制机构。如果两个相同大小但商业化程度不同的国家交战,并且试图通过相同种类的税收从它们的市民中榨取大量的钱,商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就会在打仗和支付战争支出(pays for war)的同时创造出更加庞大的国家机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平均来说,更为精简的管理组织就能应付。

在商业化的、资本充足的经济中,军队的直接供应、税收的征收和王室信贷的管理都会更加容易。然而,不管这些发生在哪里,它们都大大增加了国家公务员。一场大的战争努力通常导致一个国家的中央机构——它的全职人员数量、它的机构的规模、它的预算规模和它的债务大小的永久性扩张。1609年当荷兰和西班牙在旷日持久的关于荷兰要求独立的战争中达成了停战协定时,双方的许多观察员都希望从前十年里困扰他们的额外税收中摆脱出来。正如结果那样,债务服务、防御工事的修建和其他的国家事务很容易吸收从军队遣散中节省出来的资金。在两个国家中税收都没有大的下降。(Israel 1982:43—44)

有些历史学家谈到膨胀了的战时预算不能回到其战前水平的“棘齿效应”(ratchet effect)。(Peacock and Wiseman 1961; Rasler and Thompson 1983, 1985a)棘齿效应并非普遍发生,但是它确实常常出现,特别是在那些在最近战争中没有遭受很大损失的国家。它的发生有三个原因:由于战时的国家权力的增长给了官员们榨取资源、开展新的活动和维护自己以免削减开支的新的能力;由于战争产生或者揭露了需要国家注意的新问题;由于战时债务的积累给国家增加了新的负担。

国债主要来自为准备战争或在战争时期借贷。为军队开支借贷的能力有力地影响了一个国家开展高效的军事战役的能力。17世纪荷兰共和国对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大的贸易城市的金融家的权利使得一个小国能迅速地为其陆军和海军筹集大量的经费,一度成为占优势的欧洲强权。关键的革新发生在1515年和1565年之间,那时哈勃斯堡属尼德兰国民议会(the States General of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其中的北方数省,在1568年起义之后最终形成荷兰共和国)采取措施实行国家支持的由专门的新的税种保证的并有吸引人的利息的养老金。(Tracy 1985)结果,“在紧急的时候,荷兰共和国能够在两天之内仅以3%的利息筹集到100

万弗罗林*的贷款”。(Parker 1976:211—213)国家有价证券成了荷兰食利者喜爱的投资,他们的代表为了他们的利益向整个经济征税。确实,“资本家”这个词在它的现代用法当中看上去似乎就是来自专指那些荷兰市民的词,他们支付最高的人均税,从而为他们的财富和信誉做广告。

荷兰银行家是如此富裕、老练和独立,在 1580 年后,当荷兰北部反抗它们以前的西班牙主人的战争在进行时,那些银行家们能够通过把从西班牙舰队转移的银子海运到安特卫普(在此用于支付西班牙的战争费用)来赚钱。(Parker 1972:154—155)当 1608 年西班牙提出如果荷兰从东印度和西印度撤出就承认荷兰独立时,荷兰谈判者奥登巴恩韦尔特(Oldenbarnevelt)“反驳说,共和国里有太多的达官显贵涉足于东印度公司,以致不能解散此公司”(Israel 1982:9)。然而,商人们的富裕在总体上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荷兰国家。高度商业化的经济允许 17 世纪的荷兰国家走上一条邻居普鲁士人走不通的、17 世纪 90 年代刚刚幸运地有一位荷兰国王的英格兰人所借鉴的道路。通过采取荷兰的财政方法,英格兰人设法减少了他们以前对荷兰银行家的依赖并且最终在战争中超过了荷兰。

17 世纪的荷兰在商业化的轴线上占据了一个极端的位置。其他的资本密集国家,比如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商业强国,采取了相同的通过公共信贷和对货物流通征税来筹集军事力量的方法。在强制密集的地区,可能用于战争的资源仍然蕴藏在农业中,掌握在一些运用着很大程度自治的武力的富豪手里;在那里,军事资源的榨取明显地采取非常不同的形式:征用(expropriation)、选举(co-optation)、委托(clientage)、征召(conscription)和高压的(heavy-handed)税收的不同组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强制已资本化的地区,资本和强制的更为稳定的平衡使得统治者能够用一方来反对另一方,用购买的武装力量来制约私人武装的拥有者,用国家军队来说服私人资本的拥有者;从长远来看,随着军事需求的总量上升,这种结合赋予强制已资本化的国家统治者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优势;结果,他们的国家类型——民族国家——胜过了城邦国家、帝国、城市联盟和其他曾经一度在欧洲盛行的国家形式。

* florins, 当时荷兰货币。——译者注

第七节 帝国结实的长臂

到17世纪末,欧洲战争的很大部分——包括邻近的荷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战争——正发生在海上,远离欧洲大陆。竞争海洋帝国的努力在形成欧洲国家的与众不同的类型方面和欧洲陆地战争形成了互补。在欧洲人创造了民族国家前,他们对帝国有着丰富的经验。诺曼人(Norsemen)早在一千年前就创建了短暂的帝国。蒙古人的、俄罗斯人的、土耳其人的、瑞典人的、勃艮第人(Burgundian)的哈勃斯堡帝国长期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大的贸易城市,比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征服了或者赎买了它们自己的分散了的帝国。拿破仑建立了幅员辽阔的,但是短命的欧洲帝国。土耳其的、奥地利-匈牙利的、俄罗斯的和德国的帝国一直存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几个世纪过去,肯定地说,欧洲帝国变得越来越像民族国家。然而,在他们的不同性质和通过总督或者类似者间接统治的残余方面,它们面对着控制其国民百姓的不同问题。

始于15世纪,欧洲强权转向远离欧洲大陆创建帝国。1240年葡萄牙的基督徒从他们所在的半岛一端消灭了最后的摩尔人的王国。在另一个半世纪里,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海上注意力限制在欧洲和非洲的贸易上,但是在1415年他们对在摩洛哥海岸的休达(Ceuta)的夺取开始了两百年里没有停止的扩张。到亨利王子(Prince Henry)(所谓的航海家)1460年去世时,他的军队已经把他们的控制(政治的和商业的)延伸到非洲西部海岸,并夺取了大西洋的马德拉岛(Madeira)和亚速尔群岛(Azores)。在热那亚的雇佣军和企业家的帮助下,他们几乎立即使得新殖民地在商业上变得可行。在那个世纪结束之前,瓦斯高·达·伽马* 绕过非洲航行到卡利卡特(Calicut),从而把葡萄牙的影响延伸到印度洋和太平洋。

* Vasco da Gama, 1469年? —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首先经海路到达印度。——译者注

葡萄牙人有意寻求打破穆斯林-威尼斯人对亚洲香料和奢侈品的欧洲渠道的控制,并且在到亚洲的海上航线方面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霸权。通过伟大的精力、异常的冒险和极度的残忍,他们几乎成功了。在 16 世纪葡萄牙的军商两用大帆船支配着大部分印度洋,运送了海运到欧洲和土耳其帝国的所有香料的几乎一半。(Boxer 1969:59)在同一世纪期间,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移民巴西;他们开始出口由强迫美国印第安人劳动生产的糖,而且逐渐从安哥拉(Angola)、刚果(Congo)、塞内刚比亚(Senegambia)进口奴隶。之后葡萄牙皇室很大份额的收入来自从其殖民地的货物上征收的关税。

然而,葡萄牙有某些严重的缺陷。它国内用于帝国冒险的人力、木材和其他资源的供应仍然稀少得危险,少到在 17 世纪的“葡萄牙的”船上常常除了他们的指挥员外就没有土生土长的葡萄牙人。从 1580 年到 1640 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合并,从而继承了和可怕的荷兰人交战的西班牙战争。随着葡萄牙 1640 年反叛西班牙,这小小的王国和荷兰、西班牙交战直到 1689 年。和海上敌手的战争危害了在公海上的葡萄牙商人。葡萄牙保持了那么久的强大证明了其格外的顽强和机智。

由于葡萄牙人把一个庞大的帝国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国内基础上,葡萄牙征服者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海外统治形式,并且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在海外,葡萄牙把它的大多数殖民地建成了军事前哨(outpost),其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为皇室产生财政收入。不像荷兰人、英格兰人和威尼斯人,葡萄牙的统治者没有准许商人组织殖民地统治。不像西班牙人,他们不能容忍在他们的海外领土创建大片的自治区域。但是他们不能禁止殖民地管理者、牧师和士兵为自身利益进行贸易,或者接受非法使用他们的官方权力的报酬。因此殖民地的财政收入使得里斯本和它的国王相对独立于葡萄牙其他地方的掌权者,但是频繁依靠腐败的官员。这样的君主政治只有在黄金和货物自由地流出殖民地时才能繁荣。

和邻近的葡萄牙人相比,西班牙人是海上征服的后来者。1492 年,格拉纳达(Granada),这个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的穆斯林据点败于卡斯提尔。到此时,向南推进的西班牙人已经开始了在加拿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定居。同年,伊莎贝拉女皇批准了热那亚的雇佣兵头目克里斯

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通过加那利群岛(Canaries)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和中国。在十五年之内,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运行的殖民地,在格拉纳达垮台后的一个世纪,西班牙几乎——不管多么微弱地——统治了巴西以外的所有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并且还远征去征服菲律宾群岛。

大约在那个时期,荷兰和英格兰的海员们航行到这些地方。这两个国家的民间经营的东、西印度公司,更别提它们的海盗,侵入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南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域。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荷兰八十年里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荷兰商人通过和敌人的贸易大获其利;他们把货物从北欧运到伊比利亚,运用老的商业联系渗透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贸易网络中。这样开始了世界范围的荷兰帝国的建立。在大西洋,英国商人依附于葡萄牙贸易,并在瞒骗皇家海关官员方面成为专家。他们以寄生虫方式起家,但是很快成为在他们领土内的主要机构。

确实。在欧洲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中,一个新的阶段通常总是始于世界某一地区或者贸易路线方面的老牌强国和试图挑战霸权或者翼侧包围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新兴者之间的竞争。欧洲人攻击的早期目标通常是穆斯林,但是到了15世纪欧洲人为了通向东方的途径相互开战。在16世纪葡萄牙的冒险者在绕过控制着欧洲和东南亚陆地联系的西端的威尼斯人方面几乎成功了,但是结果发现自己一个世纪后在海上受到了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的挑战。英格兰人和荷兰人从未在自己的整个领土上驱逐过葡萄牙商人和葡萄牙总督,但是他们结束了葡萄牙直到16世纪还在享受的霸权(例如,在1647—1648年的荷兰战争中,敌人的行动从葡萄牙的巴西船队夺走了220艘船只:Boxer 1969:221)。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管理着它们自己的庞大的帝国,“依靠对市场更大的控制和保护费用的国际化”(Steensgaard 1974: II)来获得超过竞争对手的优势。在整个17世纪,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的和商业的强国。

然后英国人取代了荷兰。当荷兰的海军力量动摇时,英国的舰船开始在世界的大部分海域里称霸。到18世纪,法国海盗、军人和商人也同样在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冒险——19世纪前他们在非洲影响不大——进一步挤入航道。18世纪在巴西的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复苏了葡萄牙殖民

地经济,但是未能恢复任何像葡萄牙 16 世纪的霸权的東西。法国和英国在征服它们自己直接周边地区之外的领土方面起步较晚,但是在 1700 年后迅速地弥补了这一落后。到 18 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7 省联合共和国、法国和英国都有庞大的海外帝国和遍布世界的贸易网;英国为群龙之首。在 19 世纪帝国的征服进一步加速。“在 1876 和 1915 年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写道,“大约四分之一的地球陆地表面作为殖民地在 6 个国家中被瓜分和重新瓜分”。(Hobsbawm, 1987:5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葡萄牙和那时的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只拥有它们以前帝国的部分残余,而法国的构架,特别是英国的控制遍布整个世界。

所有这些帝国都把占领的领土和处于由当地统治者管理的土地的边缘的“工厂”、公认的贸易定居点结合在一起。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在日本保持着商业据地(enclaves):在德川幕府时代(1640—1854 年)结束的年代,荷兰在出岛*的边区村落(outpost)实际上是日本仅有的和欧洲接触的地方。(Boxer 1965:237)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模式开始转向征服和部分殖民。例如,始于 1652 年,甚至荷兰人——实际上在他们获得商业霸权的土地上殖民很少——开始在好望角附近征服、管理和殖民;Afrikaner 这个词在 18 世纪早期开始用于移民的欧洲人。(Boxey 1965:266)特别是在 19 世纪,欧洲国家企图把大部分非欧洲世界瓜分成相互排斥的殖民地。

海外帝国并未像国内的陆地战争那样建立起国家组织。然而,在国家和帝国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欧洲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欧洲之外的扩张形式,而且帝国的特性大大地影响了都市的运行。资本密集的国家如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主要是通过无情地追求贸易垄断但在军事征服和殖民上投入很少精力来扩张的。强制密集的国家如挪威和西班牙把它们更多的精力用于殖民、奴役本土的(或者输入的)劳动力和榨取贡赋。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进入帝国游戏相对较晚,但是通过资本和强制结合的策略在其中脱颖而出。

* Deshima——荷兰人在日本长崎建立的贸易殖民的人工岛屿。——译者注

资本的策略对中心国家作用相对较少，特别是当其运用于本质上是私人的组织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时。然而，这些商业巨头直接成了要与之斗争的政治力量；因此，私有化推动着国家与它的国民或者至少和占优势的商业阶层进行讨价还价。不可避免地需要持久的陆军和海军的征服和殖民的策略增加了中央国家官僚机构，更不用说它所导致的官僚作风的世界网络。在它带来财富的地方——特别是以金银的形式，如在西班牙——征服创造了对国内税收的另一选择，从而使统治者免去了其他地方有的某些关于确定市民权利和限制国家特权的讨价还价。

在国内和海外的前线，究竟有多少国家机构来源于军事机器的创立和市场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取决于几个因素：与支持人口相比的军事机器的大小，此前的经济的商业化，以及国家依赖对能提供自己军事力量的权力拥有者的战时动员和它保持在战后将其归于和平使用的能力的程度。我们也许可以想象一个从帝国俄罗斯到荷兰共和国的连续体，从俄罗斯成长出臃肿的国家机构来从庞大的但没有商业化的经济中谋取武装人员和军事资源，而荷兰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军、拥有在由城市为主的省份临时批准基础上的自己的武装力量、容易从海关和国产税上收取税款，而且从来不需创立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放入像法国和普鲁士的例子，在那里，国王们有权利用农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但是为了获得对其军事活动的支持，不得不和强大的地主们讨价还价。从长远来看，军事对人力、资金和供应的需求增长如此之大，以致统治者们也要和大多数人口讨价还价。下一章着重于这一讨价还价及其从一种类型的国家到另一种类型国家的变化。

第四章

国家及其国民

第一节 从黄蜂到火车头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欧洲国家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进化:从黄蜂到火车头。它们长期把精力集中于战争,把大多数活动留给了其他组织,只要那些组织在适当的时间内缴纳贡赋。收取贡赋的国家仍然凶猛,但是和它们庞大的后继者相比重量较轻;它们刺人但不吸干。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甚至资本密集的类型——表现为各种活动、权力和义务,对它们的特别支持限制着国家。这些火车头在由民众支持、公务人员维护的轨道上运行。离开这一轨道,这些好战的机器根本就无法运行。

一个国家最少的基本活动形成了三重唱:

国家建设:在该国家主张的领土内攻击和阻止竞争者和挑战者;

交战:攻击在已经由该国主张的领土之外的对手;

保护:在该国家主张的领土内外攻击和阻止统治者主要盟友的对手。

然而,没有一个忽视了关键的第四种活动的国家能够维持长久:

榨取:从其统治人口中榨取国家建设、交战和保护的手段。

至少,收取贡赋的国家非常接近这四种必不可少的活动系列,干预它们名义上的国民的生活,主要是为了实施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榨取财政收

人。然而,超过某一程度,所有的国家都发现自己闯入了三个其他风险领域:

管理:权威地解决在所统治人口成员中的争端;

分配:干预在所统治人口成员中的物资分配;

生产:控制所统治人口成员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和转换。

这些活动之间的主要联系大致上如插图 4 所示。相互加强的交战和国家建设,实际上确实仍然难于区分,直到国家在大片邻近的领土上形成了安全的公认的边界。交战和国家建设都导致从地方百姓中榨取资源。联盟的戏剧和从相对强大的或者流动的演员那里获得资源的企图促使了国家参与保护,制止选定客户的竞争者和敌人。随着榨取和保护扩张,它们在国民中创造了裁决争端的需求,包括使榨取和保护本身的合法地规则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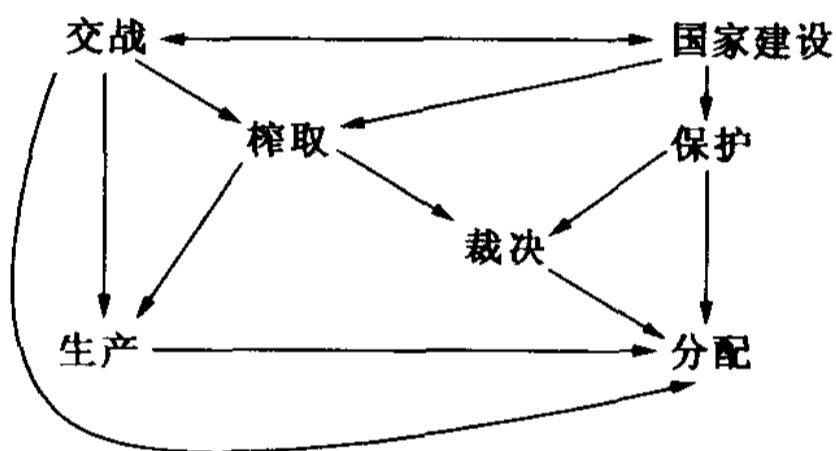


图 4.1 国家主要活动之间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图中处于较低位置的国家活动的分量和影响——裁决、生产和分配——比那些处于较高位置的活动:交战、国家建设、榨取和保护增长更快。大多数欧洲国家投入到交战(在该国主张的领土之外攻击对手)或者国家建设(在领土内攻击和阻止竞争者和挑战者)中的净量持续不规则地增长到 20 世纪;但是裁决、生产和分配从微不足道变得巨大无比。例如,甚至那些保持着广泛的私有制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在能源、运输、通讯、食品和武器的生产和/或者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随着统治者从地方经济中抽取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战争和其他强制性事业,在那些经济中的主要阶级在强制和战争领域之外成功地要求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然而,在我们在此考察的这一千年的跨度里,强制活动显然占优势。

交战常常使得国家陷入武器的生产和对货物(其垄断为国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生产(如盐、火柴和烟草)的榨取。后来,当来自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制止资本主义的无节制的呼吁变得更为有力时,所有国家都更加普遍地干预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代表了普遍倾向的极端。最后,榨取、保护和裁决交织在一起,使国家进入到对分配的控制——开始是作为从货物流通中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后来是作为对普遍要求纠正不平等和地方短缺的回应。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仅仅标志着在军事领域之外的国家活动的这一普遍扩张的一种极端的版本。

在榨取资源和安抚民众的过程中,每个欧洲国家最终在地方、地区以及在国家层面上创造了新的管理结构。例如,卡托-康布雷齐(Cateau-Cambresis)和约(1559年)创造了一个萨伏依尔-皮德蒙(Savoy-Piedmont)王国,把埃曼纽尔-菲力拜(Emmanuel-Philibert)送上了国王宝座。不久,寻求资金使得这位新的国王开始革新:首先是可获利的动用武力的食盐销售,其次是人口普查来确定对谁可以征税,然后是建立在根据每一社区生产区域的税收。税收迫使相邻的社区精确地划分它们的疆界,这使得它们准备好土地清册并创造出官员来管理这些土地清册。(Rambaud and Vincienne 1964: II)在每个地方,榨取的努力不仅从它们习惯的使用中抽取有价值的资源,也创造出政治组织的新的形式。

因此国家活动对普通百姓的利益,对集体的行为和公民的权利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当统治者们和国家代理人从事着交战、国家建设、保护、榨取、裁决、分配和生活等工作时,他们侵犯了生活在他们控制范围内的人民的明确的利益;这种影响常常是消极的,因为国家不断地夺取土地、资本、货物和以前用于其他目的的服务以供自己使用。国王和大臣用于构建武装力量的大部分资源最终都来自普通百姓的劳动和积累,代表着有价值的手段偏离普通百姓赋予更高优先权的事情。尽管资本家有时乐于投资国家财政和国家政权给予他们生意的保护,尽管地区富豪有时为了摆脱自己的敌人和国王结盟,大多数在君主企图夺取的资源上有投资的人会顽强地抵制皇家的需求。

国家需要的劳动、货物、金钱和其他资源毕竟象征性地隐含在义务的网络之中并且涉及家庭和社区重视的目标。根据普通百姓的短期观点,

我们在愉快的回顾中称为“国家形成”的东西包括残忍的税款包收人反对穷苦农民和工匠的背景,包括为了交税被迫出卖本该用来支付嫁妆的牲畜,包括对当地头目作为当地社区支付过期税收的人质的监禁,包括绞死其他胆敢抗议者;放任残忍的士兵侵害不幸的市民;征招曾经是他们父母安度晚年希望的年轻人;强迫购买污染的食盐;把已经趾高气扬的地方富豪提升为国家官员,以及以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名义强制推行宗教一致。毫不奇怪,处于弱勢的欧洲人如此经常地接受“好沙皇”被谋士们误导甚至俘虏了的传说。

国家活动的特点和重要性随着在一个国家内部盛行的经济的作用不同而系统地变化。在强制密集地区,统治者通常通过直接征用和征收榨取资源用于交战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关税和国产税(excise)在相对未商业化经济中产出回报很少,但是人头税和土地税的机制则创造了庞大的财政机器,并且把广泛的权力交到地主、村长和其他对必需资源实施中间控制的人手里。在资本密集地区,资本家、商业交换和稳固的市政组织的存在,为国家对个人和家庭直接实行控制设定了重大的限制,但是推动了对于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工商业的相对高效的和无痛苦的税收的运用。而且,信用的迅速的可用性使得统治者可以把军事活动的开支延伸到较长的时期而不是以迅速的不幸的突发形式来榨取。结果,在那些地区的国家一般都产生出微小的、分片的中央机构。在资本化的强制地区,盛行着一种中间情形:尽管如何不稳定,统治者们依赖地主和商人的默许,从土地和贸易中获取财政收入,从而创造出贵族遭遇金融家——最后和金融家合作的双重国家结构。

第二节 讨价还价、权利和集体行为

国家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激起了常见的集体行为,这些行为常常是以抵制国家的形式但是有时也打着对国家的新的主张的幌子。随着政府当局寻求从国民百姓获取资源和默许,国家当局、其他权力拥有者和普通百

姓团体协商出(不管是如何不平衡)新的关于国家能够榨取或者控制的条件以及权力的拥有者或者普通百姓对国家所能提出的要求的协定。这种协商和要求随着从世袭制到经纪人制度、到民族化、到专门化的演化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例如,在世袭制里,讨价还价通常发生在豪强领导地区叛乱,提出自己的独立国家的主张时。而在经纪人制度时期,由于以前的支持者站到了国家一边,豪强领导的叛乱让位于普通的反对税收或者征收的起义。

国家对利益、集体行为、讨价还价和权利确立的影响的实际形式和后果,作为国家形成的基础的强制和资本的相对突出的一个功能有很大的差异。在强制密集的地区,如波兰、俄罗斯,对土地和依附于土地的劳动力的控制长期是斗争的中心目标,而在资本密集的地区,如低地国家,资本和适于销售的商品在创造国家结构和市民对国家的要求方面占据了更为突出的地位。而且,在资本密集地带,国家行动得更早和更加有效地建立资产阶级财产权——减少对相同财产的多重主张,实施合同,并加强主要所有者决定财产使用的能力。然而,在任何地方,国家的军队创建会使它的代理人去和权力拥有者、普通百姓团体讨价还价。因此国民百姓的阶级结构有助于确定国家的组织:它的镇压机构、它的财政管理、它的服务以及它的代表形式。

从阶级结构向国家组织的转化是在斗争中发生的。在 17 世纪震撼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抗税叛乱起源于国王们、地区权利拥有者们、地方群体和个人家庭对不能立即用于所有目的的土地、劳动力、商品、牲畜、工具和家庭财富的竞争性争夺。当对税收的抵制把大地主的主张和地方群体的主张结合在一起时,正如 17 世纪早期在法国常常发生的那样,它就威胁了皇权的真正的生存能力。但是即使是在更小的规模上,日常的个人的和集体的反对国家榨取努力的行为对每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提出了挑战。

如果一国的人口是分割开的和不同种类的,与之相应,大规模反叛的可能性下降了,但是实施统一管理措施的困难就增加了。在同类的相互联系着的人口中,在一个地区建立的并试验过的管理革新就有合理的在其他地方成功的可能性,官员们也可以轻易地把他们的知识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从贡赋转向税收、从间接统治转向直接统治、从臣服转向同化的时期,国家通常通过推行共同的语言、宗教、货币和法律体制,以及促进相互联系的贸易系统、运输系统和通讯系统的建设,起了同化其人口和打破人口分割的作用。然而,当那些标准化的努力威胁到统治的人口赖以建立他们日常社会关系的真正的同一性时,那些努力常常引发大规模的抵制。

对国家要求的抵制通常在地方层面上隐蔽地发生,运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描述的“弱者的武器”——怠工、拖延、隐藏、逃避。(Scott, 1985)它混合成大规模的反叛主要是在下列情况下:(1)国家的要求和行为违反了市民的正义标准或者侵害了他们基本的集体同一性时,(2)被国家无礼行为所激怒的人们已经被持久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3)平民百姓在国家内外有强大的同盟,而且(4)国家最近的行为或者相互作用显示出它是易受攻击的。在这些情况下,流行的反叛不但可能发生,而且有某种成功的可能性。

17世纪40年代在许多欧洲国家有着所有这些条件,从而成了欧洲历史上反叛最频繁的年代。我们现在记忆为“30年战争”的肮脏的混战竭尽了大多数西欧国家的能力,正在它们要求它们的国民前所未有的牺牲时刻,揭露了它们的弱点。英格兰经历了一场内战,法国遭遇了投石党(the Fronde)之乱,苏格兰几乎使自身脱离了英格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葡萄牙从混合的西班牙皇室的控制下挣脱出来(前者是有条件的,后者是决定性的),而在那不勒斯,渔民马赞尼洛(Masaniello)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例如,在加泰罗尼亚皇家增加战争税收的要求使得国王[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大臣奥里维瑞斯(Olivares)]和议会(the Cortes)发生了厉害的冲突。1640年,皇家(the Crown)派遣9000人军队进入该省以加强其对赋税(payment)的征收,减少有组织抵抗的可能性,并且进行某种勒索[因为只要军队的职责依然没有报酬,卡特兰人(the Catalans)就不得不供养军队,忍受其掠夺]。没有地方省允许的军队驻扎违反了所确立的卡特兰人的权利。一场更大的一呼百应的反叛随之而来。随着起义的蔓延,议会成员们(the Diputacio)——粗略地说,议会的执行委员会——

使自己处于起义的前列,而且走得如此之远,呼吁法国的路易十三世来执掌加泰罗尼亚的主权。得益于法国分心于投石党,西班牙军队在 1652 年最终再次征服了巴塞罗那,然后征服了加泰罗尼亚。与此同时,“菲利浦四世批准了大赦,并立誓要尊重加泰罗尼亚的传统自由”。(Zagorin 1982: II, 37)

当面临着分散的或者成群的抵抗,统治者怎么办?他们讨价还价。现在,你可能会反对把“讨价还价”这一成语用于派出军队去粉碎一次抗税叛乱或者去俘虏一位不情愿的纳税人。然而,示范性惩罚的频繁使用——绞死几位头目而不是所有反叛者,监禁当地最富有的纳税人而不是所有违法者——表明当局正在和人口的大多数协商。在任何情况下,讨价还价采取许多更可接受的形式:向国会请愿,以去除税收来收买城市官员,确定同业公会的特权作为贷款或者收费的报答,规范税收的估定和收取以反对保证他们更多自愿的支付,等等。所有这些讨价还价创造出或者确定了个人和集体对国家的要求,个人和集体相对(vis-a-vis)国家的权利,以及国家对其公民的义务。它们也创造了权利——承认的可执行的要求——国家相对其公民的。确实,我们现在所称为“公民权”(citizenship)的核心包括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他们关于国家行为手段特别是交战手段的斗争过程中推敲出的多重契约。

讨价还价显然是不对称的:在摊牌(showdown)时,大炮对棍棒;国家坚定不移地解除平民百姓的武装构成了这种不对称。然而即使是对反对税收和征收的叛乱的强有力的镇压通常也包括和那些在平定中参与合作的人们的一系列的协议,以及对普通公民能够公正地寻求对国家的错误和不正义的赔偿的和平手段的公开肯定。那些手段通常包括请愿、诉讼和通过地方集会来代表。随着工人和资产阶级(或者,不太常见的,农民)组织起来,他们利用允许的手段施加压力来要求扩大的权利和直接代表。在专门化时代,国家通过派出代理人到诸如社会保险、退伍军人养老金、公共教育和住房计划中来预先考虑或者回应资产阶级和工人日益增加的要求;所有这些计划都给日益增长的市民国家增加了办公机构、官僚和预算事宜。

通过和必需资源拥有者的斗争、谈判和持续的相互作用,国家开始反

映了其被统治人口的阶级结构。优势阶级有最大的影响,所以大地主统治的国家发展出和资本家控制的国家非常不同的结构。(Moore, 1966)但是,和农民,或者工匠,或者无地的劳动者打交道的纯粹必然性也标志出一个国家的财政组织、对贸易的控制、警察部队以及更多其他事情。结束持续抵抗或者加速民众同意的专门谈判的协议在那些国家机制中形成了很大的份额。

而且我们必须想象一个经验的连续体。在一极有着那些受到存在于国家权力大扩张之前,并且幸存于扩张的强大组织(显著地如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市政当局的管理机构)影响的契约。那些契约一般把管理机构合并到国家中,把它们变成代表机构。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在有着繁华城市的地区统治者经常和代表着城市权力拥有者的市政议会打交道。这样早期加泰罗尼亚的君王们允许巴塞罗那和其他卡特兰城市的代表进入他们的市政议会坐在贵族和僧侣旁边,从而建立起三权合一的(tricameral)卡特兰议会的前身。(Vilar 1962: I, 439)

在另一极有着那些受到人口中大集团(诸如土地所有者,特别是以确立税收、征收和其他榨取活动规则的立法的形式)影响的契约。因此当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寻求用英国早期总收入税来支付部分和法国交战费用时(1799年),他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同样地和工薪阶层进行了含蓄的讨价还价:他策划了一个允许偿还不公正的旧的土地税的法案。(Watson 1960: 375—376)当和法国的和平(流产地)在1802年和(最后地)在1815年恢复了,国会很快采取措施废除这种税收;尽管首相利物浦(Liverpool)在1816年试图保留收入税来帮助还清英国战争债务的巨大积累,国会明确地宣读了这份协议,把这种税限制到战争紧急状态。(Levi 1988: 140—143)

在两极之间,我们可看到受到确定的权力拥有者群体(诸如教会官员,他们在被打败和被逐出时通常获得国家保证的津贴和保护,在抵制榨取成功时常常推动像教会议会的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承认)的影响的讨价还价。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剥夺了其国内教会的土地及其和罗马的联系,但是从此承担了永远为所有接受他的改革主张的牧师提供薪金的义务。

总之,在从意大利北部延伸到佛兰德斯(Flanders)和波罗的海(the Baltic)的贸易城市网络之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官员,发现自己接近第一极,和独立的、幸存下来并成为国家的主要部分的地方寡头集团讨价还价;城市帝国如威尼斯帝国标志着极端的例子。城邦国家区域之外形成的建立之中的国家的代理者常常发现自己在和大地主及其委托人讨价还价,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代表机构。在那些更大的国家里,作为对他们与皇家努力建立国家军队的合作的回报,贵族们经常获得对他们的特权和更高层次军事地位的垄断的批准。但是沿着整个连续体,关于国家榨取主张的讨价还价产生了以前不存在的权利、特权和保护机构。

第三节 直接统治的机制

伴随着军事力量的国有化出现了广泛的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运动。它为老百姓提供了诱人的但是有代价的机遇。在 1750 年后,在民族化和专门化的时代,国家开始主动地从几乎普遍的间接统治机制向新的直接统治的机制转化:在地方社区、家庭和生产企业的生活中没有中间干预。随着统治者从雇用外国雇佣兵转向从自己民族人口中招募战士,而且随着他们增加征税以支持 18 世纪战争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他们高价卖出和社区、家庭、企业联系的途径,在此过程中扫清了自治的中介者。

在我们已经考察的整个一千年里,自治的主教辖区(bishoprics)、小规模公国(petty principalities)和其他微型国家以相对直接的方式统治。直接向皇家负责并且根据君主意志行事的代理人收取税款,管理法庭,照看皇家财产,和归属皇家权力范围内的地方社会保持日常联系。然而,更大的国家总是选择某种形式的间接统治,指派地方权力拥有者,批准他们的特权而无需把他们直接纳入国家机构。

在 17 世纪前,每一个大的欧洲国家都是通过强有力的中介者来统治国民的,这些中介者享有高度的自治,可以抵制那些违反他们利益的国家要求,并且从代理实施国家权力中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些中介者常常是

被统治人口中享有特权的成员,他们通过向统治者确保来自被统治人口的贡赋和顺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在欧洲的东南部,由几个世纪的征服和地中海贸易混合而成的多种人口的存在,结合着穆斯林统治的典型形式,通过半自治的臣属关系产生出一个广阔的间接统治地区,其痕迹今日在地区的文化差异及其为了少数民族权利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中依然存在。举足轻重的中介者包括僧侣、地主、城市寡头和独立的职业武士,在连续体上从资本密集地区到强制密集地区按比例变化。这些不同的中介者标示着间接统治的另类体制。

任何间接统治的体制都给统治者能从周边经济中榨取的资源数量设定了重大的限制。超过那个限制,阻止榨取、甚至支持普通百姓抵制国家要求,对中介者更有利。然而,在相同的环境下,统治者在破坏中介者的自治权力方面、在和被统治的人口中的大多数结盟方面发展出自己的利益。随着战争要求更多的资源,特别强调的是人力,随着被更大国家征服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统治者绕过、镇压或者指派旧的中介者,直接深入社区和家庭来攫取战争必要的资金。因此,国家常规军队、民族国家和直接统治相互促进。

在此之前,权力拥有者所享用的自治权的多少根据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它早期的征服和军事统治阶段之后,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建立起两种连续的统治形式,第二种甚至比第一种更为间接。进入17世纪,苏丹们从他们的诸侯国家中收取贡赋,但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他们土地的大部分分割成采邑(timars),即武士(只要他们继续为武装力量服务)所持有的奖赏。采邑主(奖赏持有者)从这块土地上获取自己的收入,为苏丹收税,经营市政管理,控制基督教奴隶,但是没有权力转让土地,或者将其传给孩子。然而16和17世纪的战争消灭了许多采邑主,为日益昂贵的战争收取越来越多税收的需求使得这种奖赏对武士吸引力较小。苏丹们逐渐转向税款包收入(tax farmer),他们利用杠杆作用把那些土地转为自己的财产。当此发生时,其他群体要求获得购买和拥有支付税收的土地的权利;私有土地替代了采邑。(Roider 1987:133—134)

因此土耳其人无意之间建立了间接统治的经典体制。由于它所交付

半独立的武士的权力,那一体制后来转向既反对国民又反对统治者。例如,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1791 年)的和平时期。

苏丹的禁卫军(janissaries)和不规则的军事单位(在塞尔维亚)发现自己失业了。因此他们转向掠夺平民百姓。这些军人团伙抢夺村庄及其土地,把夺到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财产。其他人则加入到反叛的阿万斯人(avans)或者说匪帮组织抢劫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和基督徒。(Jelavich and Jelavich 1977:27)

苏丹的禁卫军的自治和掠夺行为最终如此严重地阻碍了土耳其统治,以致在 1826 年苏丹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参与到君士坦丁堡的人群中去屠杀自己军团中的其他人。间接统治最大的风险就是中介者的掠夺,这种掠夺既激起了普通百姓对中介者的反抗,也激起了中介者的反抗,这些也激起整个地区对国家角色的顽强抵抗。

然而,在大多数时间里,地方统治者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进行统治,通过定期向土耳其国家缴纳贡赋来为地方百姓买得割据一隅。与此同时,当英国的中上阶层、贵族和僧侣在首都之外分担着市政管理的工作时,普鲁士的容克们同时是自己庞大财产的主人、法官、军事首领和皇家的发言人。在有利的环境下,中介者从而减轻了国家扩张对社会组织及其统治下人们的财富的影响。他们仲裁的性质在有当地贵族和由外来人统治的两类的地区有很大的区别。在贵族和农民有相同宗教、母语和传统的地方(如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存在着某种地方团结反对皇室要求的可能性。在贵族是外来人的地方(如在土耳其帝国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的欧洲部分),村长们或部落长者经常使地方百姓和国家当局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地区,帝国的崩溃使得农民、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直接和国家接触。(Berend and Ranki 1977:29—36)

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外来的,中介者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地区总是暴君。由于在土耳其境内奇夫特利克体制(chiftlik)替代了采邑,甚至向穆斯林法庭和官员上诉作为一种资源也消失了,而且失位的(absentee)地主比他们的武装前任更厉害地频繁地压迫农民。(Roider 1987:134)当此中心的权力下降——正如它通常在 19 世纪发生的那样——地主在地方事务中获得越来越大的控制权。在 19 世纪的波斯尼亚(Bosnia)和塞尔维

亚,穆斯林地主把他们的基督徒佃户变成了农奴。(Donia 1981:4—5)在那样的情况下,盗贼行为在巴尔干地区十分猖獗。由于受到中介者的剥削,和远方的国王或者其代理人结盟似乎就成了对迫在眉睫的压迫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因此村民们求助于皇家代理人,把他们控告地主的讼案带到皇家法庭,并且为对城市特权的缩减喝彩。从短期来看,他们的这些选择有时获利。但是从长期来看,中间屏障的破坏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国家下一轮战争产生的需求的需求的侵害。

国内征募的常规军队的增长强烈地刺激了直接统治。尽管在整个18世纪雇佣军队在某些军队中还一直存在,在强制已资本化地区的统治者在17世纪就已开始脱离大批地雇用雇佣军。雇佣军有严重的缺陷:薪水不足时就不可依赖,没有严密监督时就私藏战利品和抢劫,解散后会带来普遍的麻烦并引起大量的冲突。由17世纪的诸如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等统治者初创的在和平时期保持大量军队的努力,超出了大多数国家征收必需的财政收入的能力,特别是在面对来自地区掌权者的竞争时。这些情况鼓励统治者建立持久的国内军事管理机构,然后征募士兵、选派官员和深入到这些机构中去。这些措施绕过了中介者,走上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道路。

在国内招募大量的常规军队涉及很大的开支。解雇的雇佣军对任何国家很少有强行的要求,而来自国家军队的退伍军人对国家就会有很多强行要求,特别是当他们在为国家服役时期导致伤残时。伤亡战士的家属同样要求像在国家专营的烟草和火柴销售中的优惠之类的好处。军队在国内的驻防使得军官们和政府官员们参与到粮食供应、住房和公共秩序中去。最后,影响了军队效率的所有青年男子的健康和教育成了政府事务。因此军队的重新组织成了引起国家行为扩大到以前曾经是地方和私人领域的事物。

在统治者们更有意识地建设国家权力的努力中,他们在建立直接统治的过程中频繁地追求同化(homogenize)他们的人口。在统治者看来,一个语言上、宗教上和意识形态上同质的(homogeneous)人口造成了反对皇家要求的统一战线(common front)的风险。同化使得分而治之的政策代价更大。但是同质有许多可弥补的好处:在一个同质的人口中,普通百

姓更可能认同他们的统治者,交流可以更高效率进行,在一个局部行之有效的管理革新也可能在其他地方奏效。而且,感受到同源的人们更可能团结起来反抗外来威胁。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大国通过给予其他宗教的少数民族(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在皈依和迁出之间做出选择来达到不断地同化;例如,在 1492 年,在完全征服格拉纳达后不久,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给予西班牙犹太人的正是那种选择;葡萄牙在 1479 年也效仿那种做法。事实上,犹太人被从伊比利亚驱逐出境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犹太人贸易聚集区(diaspora),利用他们存在的联系建立起强有力的长距离的信用和交流体系,这种体系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几个世纪的不同时期,在珠宝、糖、香料和烟草方面建立起接近垄断的地位。(von Greyerz 1989)

新教改革给较小国家的统治者带来了定义他们国家和大帝国相比(vis-a-vis)的异同的极好的机会,更不用说选派为皇家目标服务的神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机会。瑞典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有着大量的公共管理放在路德教会的牧师手中。(今天的瑞典历史学家仍然从那些牧师们自从 17 世纪以来忠实地记载的,包括居民的教养和变化的信息的冗长的系列的教区登记簿中获益。)除了任何可能的对关于国家的合法性的信念的影响之外,和君主相联系的共同的神职人员和共同的信仰提供了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第四节 法国革命: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

在 18 世纪欧洲国家开始推动在地方和国家的忠诚之间做出选择。尽管启蒙“改革”常常有增强直接统治的效果,在此方向上最轰动的一步毫无疑问是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杰作。法国从 1789 年到 1815 年的活动以两种方式推进了整个欧洲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过渡:提供一个供其他国家模仿的中央政府的模式;在法国征服的任何地方推行那种模式的变种。即使许多时期在法国政府方面的革新来自为了对付起义和

腐败的威胁而做出的不顾一切的临时抉择,它们经历战争考验的形式超出了法国革命和帝国时期。

法国统治体制在革命岁月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1789年以前,法国国家像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地方层面上间接地统治,特别是依靠牧师和贵族来中间协调。从美国战争结束时起,政府筹集资金偿还战争债务的努力明确了一个反政府联盟,这联盟一开始包括国会和其他掌权者,但是随着政权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的加剧,它朝着一个更加流行的组成转化。(Comninel 1987, Doyle 1986, Egret 1962, Freche 1974, Stone 1981)在1788到1789年法国国家显著的弱点鼓励了任何有着反对国家、反对国家代理人或者它的同盟的受压抑的主张或者不平的集团申明它的主张和加入到要求改变的其他人中去。1789年春季和夏季的农村起义——大恐慌、抢夺粮食、抗税、袭击地主,等等——不成比例地发生在有着大城镇、商业化的农业和许多道路的地区。(Markoff 1985)它们的地理反映了一种复合的但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的解决方式。

与此同时,那些其社会生存主要直接依靠旧政体国家者——贵族、政府官员和高级牧师就是显而易见的例子——通常和国王结盟。(Dawson 1972:334—346)因此革命的形势开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集团都要求权力而且都得到了来自人口中的某些重要部分的支持。随着军人们纷纷背叛皇室和献身于大众事业的民兵的形成,反对派获得了自己的力量。密切联系的、常常是由资产阶级成员领导的大众集团开始获得对国家部分机构的控制。

律师、官员和其他在1789到1790年夺取了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迅速地替代了旧的中介者:地主、领主的官员、贪官污吏、神职人员,有时还有地方寡头。林·亨特(Lynn Hunt)断言,“不是一个农村的英国风格的绅士阶级在国家或者地区的层面上获得了政治优势,而是成千上万的城市从业者抓住机会发展政治生涯”。(Hunt 1984:155;也可参见Hunt 1978, Vovelle 1987)在地方层面,所谓的市政革命(Municipal Revolution)广泛地把权力转移到旧统治者的敌人手中;在民兵、俱乐部和革命委员会中建立起来并且和巴黎活动家联系的爱国联合阵线驱逐了旧的市政当局。甚至在旧的当权者设法从革命的早期动乱中幸存下来的地方,地

方和国家资本的关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例如,阿尔卑斯山脉的村庄“共和国”发现他们古代的自由——包括表面上自由同意税收——(当外来者把他们逼入新的管理机器时)崩溃了。(Rosenberg 1988:72—89)巴黎的革命者面临着没有中介者的管理问题;他们试着运用在 1789 年的运动中出现的委员会和民兵,但是发现难以从中央控制它们。大约与此同时,他们把法国地图重新绘制成了部门、区、州和公社相嵌的系统,另一方面,派出特使去推进革命组织,他们建立起直接统治。

考虑到城市、商人和资本的不平衡的空间分布,统一的地理栅格(grid)的强迫接受改变了城市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把微不足道的芒德(Mende)、尼奥尔(Niort)放到和强大的里昂、波尔多(Bordeaux)相同的管理水平上。(Lepetit 1988:200—237; Margadant 1988a, 1988b; Ozouf-Marignier 1986; Schulz 1982)结果,在地区资本方面的力量平衡点发生重大转移:在大的商业中心,那里的商人、律师和自由职业者已经成群结队,部门官员(无论如何他们常常来自相同的环境)别无选择,只有和当地人讨价还价。在国民议会从相对未商业化的农村地区开拓出分部的地方,革命的管理者威慑着新首都的其他居民,并且如果他们反抗的话可能真地威胁使用武力。但是在那些地区,他们缺乏帮助他们同事在其他地方做革命工作,并且反抗仍然人多势众的旧的中介者的资产阶级同盟军。

在大的商业中心,如马赛(Marseille)和里昂,政治形势则大不相同。大体上,联邦主义运动,随着他们的抗议雅各宾的中央集权制和要求地方自治,在那些商业地位大大超过其管理等级的城市中扎下根来。在对付这些另类的直接统治的障碍时,巴黎的革命者临时创造出三种并行的,有时是冲突的统治体制:委员会和民兵;按地理划分的选举出的官员和代表的等级;和四处活动的中央政府的使者。为了收集信息和获得支持,这三种体制都广泛地依赖现存的律师、自由职业人和商人等个人网络(personal networks)。

随着这种体制开始运作,革命领导人努力使他们的控制常规化,抑制当地热心者的独立行为,后者常常抵制这种努力。运用选举和镇压的两手,他们逐渐地挤走了委员会和民兵。战争动员给这种体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引起了新的抵制,增强了国家领导人采用严格的控制体制的动

机。在1792年开始,中央政府(直到那时,该政府还是继续采用和旧政权非常相似的形式)经历了自己的革命:人员大大地膨胀,一个真正等级制的官僚机构开始成型。在此过程中,革命者开始建立在大国中成型的直接统治的早期体制。

这种转移要求税收、司法、市政工程以及其他体制方面发生变化。考虑到维持治安。在巴黎地区以外,法国的旧政权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专门的警察;它派遣骑警队(Marechasse)来追踪逃税者、流浪者和其他的违反皇家意愿者,并且偶尔批准军队镇压叛乱的国民,或者就是依靠当地的和地区的当局来部署武装力量对付市民们。革命者改变了许多事物。对于普通老百姓,革命者从反应的(reactive)维持治安转向预防的(proactive)维持治安和信息收集:不是简单地等待到反叛或者集体犯法的出现,然后野蛮地但是有选择地报复,他们开始驻扎代理人,其工作就是预期和防止具有危险性的大众的集体行为。在革命的早期,随着委员会、国家卫队和革命的法庭接管了旧政权警察力量的日常活动,旧政权的警察通常被解散。但是有了姓名地址录,国家在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中集中了监督和拘捕。在1799年(VII/1799)南特的富歇(Fouche of Nantes)成了警察部长,此后经营了一个其权力扩大到全法国及其征服的领土的政府部门。到富歇时代,法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严格管辖的国家之一。

参加战争加速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化。几乎任何参战的国家都发现自己无法从其积累的储备和当前的财政收入中来为其努力付账。几乎所有的参战国家都广泛地借贷,筹集税收和从不情愿的对自己的资源有其他用途的市民手中夺取战争的手段——包括人力。革命前的法国切实地遵循着这些原则,直到积累的债务最终迫使求助于“国民大会”(the Estates General)。革命也没有否定这些规则:当法国在1792年对奥地利宣战时,国家对财政收入和人力的需求激发了像在旧政权(the Old Regime)时期爆发的一样猛烈的反抗。然而在镇压那次反抗中,革命者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法国把自己的新体制作为重建其他国家的模板。当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被打败后,其他国家也试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种直接统治体制的复制品。拿破仑政府巩固了这种体制并把它变成了可靠的统治工

具。这种体制在法国幸存于革命和帝国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在其他地方幸存下来;整个欧洲大量地朝着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其中至少有一点点代表被统治阶级)转移。

反抗和反革命行动直接来自新的国家赖以建立直接统治的过程。记住,革命者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多少变化。他们消除了以前领土上的权限,把许多旧的教区合并成更大的社区,废除贵族称号和封建权力,解散自治机构废其特权,建立起彻头彻尾的(top-to-bottom)管理和选举体制,通过那个体制征收扩大的、标准化的税收,没收迁出贵族和教会的财产,解散修道会(monastic orders),迫使僧侣们服从国家,强迫他们发誓维护新的国家教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征募青年人,终止贵族和牧师自动运用地方领导权。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1789 年和 1793 年之间。

后来的政权增加了更为短暂的变化,如革命的日历和对上帝的礼拜式,但是早期革命对国家的“检修”(overhaul)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并为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确立了范式。最大的逆转(reversals)涉及扼杀地方民兵和革命委员会,发还或者补偿没收的财产,以及拿破仑和天主教会的协定。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变化构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对一种由地方和地区显贵作为中介者的政府体制的显著的迅速的替代。而且,新的国家等级主要包括律师、医生、公证员、商人和其他资产阶级。

正如革命前的变化,这些根本变化侵害了许多现存的利益,为那些以前很少有机会得到国家认可的权力的人们——特别是村庄的和小镇的资产阶级带来了机会。结果,这些变化促进了抵抗和权力之争。阿图瓦省(Artois)巴德卡莱县(the department of Pas-de-Calais)经历了变迁的温和版本。(Jessenne 1987)在革命前,阿特西(Artesian)的贵族和传教士们拥有所有土地的一半多,而相比之下农民排第三。60%到 80%的农庄拥有土地不到 5 公顷(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大多数农庄经营者为其他人打短工),四分之一的户主为雇佣劳动者。在阿图瓦省税收、什一税、租金和领地应付款夺走相对低的 30%的来自租用土地的收入,伴随着革命夺取教会和贵族的财产,五分之一的农村土地有待出售。简而言之,到 1770 年农业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这样的地区,大的租赁人(fermiers)在地方政治中占优势,但是仅

仅在由贵族和教会地主设立的范围内。革命,通过扫除那些资助人的特权,威胁了租赁人的权力。然而,他们经受住了这种挑战,作为一个阶级,如果不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人群体的话:在早期革命斗争中许多政府官员失去了他们的职位,特别是当这一政治共同体已经和它的主人不一致时。而且对他们的替代不成比例地来自相同的舒服的租赁人阶级。在巴德卡莱,乔治·列菲伏尔(Georges Lefebvre)在邻近的北方发现的雇佣劳动者、小佃农和乡村豪强的斗争不太激烈,或者说不太有效。尽管较大的农场主,受到国家当局的怀疑,在恐怖时期(the Terror)失去了部分对公共职位的控制,并且在五人执政内阁时期(the Directory)再次失去,他们后来重新获得那些控制,在整个19世纪中期继续统治着他们的地盘。到那时,贵族和神职人员已经失去了许多控制地方当权者的能力,而制造商、商人和其他的资本家取而代之。对中介者的替代为在大农场主和资产阶级建立新的联盟开辟了道路。

在巴黎的引导下,在阿图瓦省向直接统治的过渡进行得相对平稳。在其他地方,激烈的斗争伴随着这种变化。克洛德·雅文克斯(Claude Javogues)的生涯[他是大革命在他的家乡卢瓦尔省(the Loire)的代理人]揭示了这种斗争以及激发这一斗争的政治过程。(Lucas 1973)雅文克斯原是一个大块头的激烈的酒量大的码头工人,他的直系亲属是在福雷(Forez)(里昂西面不远的地方)的律师、公证员和商人。这个家族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在1789年的蒙特布雷森(Montbrison)克洛德本人是一个30岁的出身名门的律师。1793年7月国民公会(The Convention)把这头狂怒的资产阶级公牛派遣到卢瓦尔省而且在1794年2月把他召回。在此6个月里,雅文克斯紧密地依靠他当时的亲戚关系,集中精力镇压大革命的敌人,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这样的理论(即牧师、贵族和富裕的地主是革命的敌人)而行动,忽视和弄糟了诸如组织食品供应等管理事务,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独裁和残忍的名声。

然而,雅文克斯和他的同事们事实上确实组织了地方生活。考察他在卢瓦尔省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了俱乐部、监督委员会、革命的武装力量、特使、法庭和代表团代表(representants en mission)。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无法相信的把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范围扩展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努

力。我们承认作为替代旧的中介者的力量的反对革命的敌人的普遍动员——真实的和假想的——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获得了对大恐怖的两个目的(消灭革命的反对者和铸造完成革命任务工具)之间的冲突的深刻认识。我们再次发现控制食品作为管理的挑战,作为政治主张的关键,作为普遍行动的动机的巨大的重要性。

和单一的民族欢迎等待已久的改革的到来旧的形象相反,大革命的地方史清楚地表明,法国的革命通过斗争和克服普遍的顽固的抵抗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大多数抵抗采取逃避、欺骗和破坏而不是直接反叛的形式。然而,在错误路线上深度发展的地方,抵抗加入到反革命中:形成替代革命确立的政权的有效的另类政权。反革命不是发生在每个人都反对革命的地方,而是发生在那些无法妥协的分歧分裂了明确的支持者和明确的反对者集团的地方。

法国的南部和西部,通过相似的过程,产生了支持反革命的最大的地区。(Lebrun and Dupuy 1987, Nicolas 1985, Lewis and Lucas 1983)大恐怖时期执行机构的地理分布提供了一幅反革命活动的合理的图画。有着 200 多个执行机构的省份包括:下卢瓦尔(Loire Inferieure)(3, 548),塞纳(Seine)(2, 639),曼恩·卢瓦尔(Main-et-Loire)(1, 886),罗纳(Rhone)(1, 880),旺代(Vendee)(1, 616),伊尔·维兰(Ille-et-Vilaine)(509),马延(Mayenne)(495),沃克吕兹(Vaucluse)(442),布歇斯迪罗讷(Bouches-du Rhone)(409),加来海峡(Pas-de-Calais)(392),瓦尔(Var)(309),吉隆德(Gironde)(299),和萨尔特(Sarthe)(225)。这些省份占了大恐惧时期所有执行机构的 89%。除了塞纳和加来海峡,它们都集中在南部、西南部、特别是西部。在南部和西南部,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罗旺斯(Provence)、加斯科涅(Gascony)和里昂内(Lyonnais)举行了反对革命的军事起义,这种起义的地理分布和对联邦制度的支持是紧密对应的。(Forrest 1975; Hood 1971, 1979, Lewis 1978; Lyons 1980; Scott 1973)联邦制运动始于 1793 年春季,当时雅各宾扩大对外战争——包括对西班牙宣战——激起了对税收和征募的抵制,这些接着引发了革命的监督和纪律的增强。自治运动在那些在旧政权下享有广泛自由的商业城市达到了顶峰,显著地是马赛、波尔多、里昂和冈(Caen)。在那些城市和

他们的周边地区,法国陷入了血腥的内战。

在西部,从1791年到1799年,游击队针对共和党的要塞和人员的袭击困扰着布列塔尼(Brittany)、曼恩(Maines)、诺曼底(Normandy),与此同时,始于1792年秋季,也同样间歇地持续到了1799年拿破仑平息这一地区的公开的武装叛乱也燎原于卢瓦尔南部的布列塔尼、安茹(Anjou)、普瓦土(Poitou)的部分地区。(Bois 1981, Le Goff and Sutherland 1984, Martin 1987)在1793年春季,当共和国对军队的需求加速了遍及大部分西部的武装抵抗时,西部的反革命达到了高潮。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对“爱国者”和“贵族”(人们对革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称呼)的大屠杀、对像翁热(Angers)的大城市的人侵和短暂的占领、蓝军(Blues)和白军(Whites)(人们对两派的武装分子的称呼)之间的激战。

西部的反革命直接来自革命官员要在那一地区建立某种直接统治的努力:这种统治实际上要消除贵族和牧师作为部分自治的中介者的地位,把国家对税收、人力和服从的要求深入到单独的社区、街道和家庭层面,给予那个地区资产阶级以前从未行使过的政治权力。在寻求把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并且驱逐这一统治的所有敌人的努力中,法国革命者开始了一个持续了二十五年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过程今天还未停止。

在这些方面,就其所有反革命暴行而言,西部符合法国一般的经验。在18世纪,在法国的每个地方,资产阶级——不是大企业主,在极大程度上,而是商人、律师、公证员和其他以对资本的拥有和操作为生的人——正在积蓄力量。在整个法国,1789年的动员把不均衡的资产阶级卷入到政治行动中。随着巴黎的革命者和他们在各省的同盟军替代了处于作为间接统治代理人的关键位置的贵族和牧师,现成的资产阶级网络成了在国家和遍布大陆的成千上万的社区之间的另外的联系。曾经一度,那些联系依赖于通过俱乐部、民兵和委员会的广泛的普遍的动员。然而,慢慢地,革命的领导者限制了甚至镇压了他们的好骚动的伙伴。经过试验、错误和斗争,统治的资产阶级设计出一个直接深入到地方社区,并且主要通过在其上级的监视和财政控制下服务的管理者的统治系统。

这一国家扩张的过程遭遇了三个大的障碍。首先,许多人在1789年

的危机中看到了促进自己利益和清算旧账的机会的展现。他们设法利用这个机会或者发现他们的希望被其他演员的竞争所阻断；这两类人都缺乏支持进一步革命变化的动机。第二，和大多数其他欧洲强权交战的巨大的努力，至少和旧政权的国王们的战争那样严重地，竭尽了国家的能力。第三，在某些地区新掌权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基础还是非常脆弱，难以支持革命的代理人到处进行的哄骗、限制、榨取和动员的工作；对税收、征募需求的抵制和对从道德上解释立法的服从广泛发生在法国，但是在预先存在的敌手安置了联系密切的反对革命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的地方，内战频繁地产生。在这些意义上，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革命转变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导致了一系列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最后，在法国之外，几乎在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征服的每一个地方，法国风格的管理等级制的强制推行，把这种实验进一步地推进，在半个欧洲建立起直接统治(确实，由总督和军事长官作为中介)。在动员反对法国的同时，许多德国的国家同样实行了广泛的中央集权化、民族化和渗透计划。(Walker 1971:185—216)如果拿破仑的军队最终失败，法国的傀儡国家最终倒台，这种管理的重新组织对像比利时和意大利这样的后来的国家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直接统治的时代开始了。

第五节 国家扩张、直接统治和民族主义

国家的非军事活动最大的扩张开始于 1850 年前后的军事专门化的时代。在那个延伸到最近的时期里，军事组织从在国家结构中占优势的、部分自治的部门转到了更加从属的地位，成了文官统治的政府所控制的几个不同部门中最大的一个(当然，这种从属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大，在荷兰比在西班牙大。)在前个世纪的军事力量的民族化已经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它们的国民百姓就筹集所征募的士兵、战争物质和税收讨价还价；诸如拿破仑战争中的庞大的国民军队导致了掠夺的国家对日常社会关系的前所未有的侵犯。

在建立直接统治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从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应的镇压转到了预防的镇压,特别是涉及国家精英之外的潜在的敌人时。直到18世纪,欧洲国家的代理人很少花时间来预期对国家的普遍的需求、反叛的运动、危险的集体行为,或者新的组织的发展;当他们有侦探时,那些侦探也是把注意力放在有钱人和有权人身上。当反叛或者“骚乱”发生时,统治者尽可能快地调来武装部队,以他们可能设想到的看得见的威胁的方式惩处。他们作出反应,而不是建立对潜在的颠覆破坏分子的持续的监控。随着直接统治的建立出现了监视和报告系统的创立,这些系统使得地方的和地区的管理者对预见和预防可能威胁国家权力或者其主要委托人的社会安全的运动负有责任。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区。(参见Thibon 1987)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在准备卷宗、监听哨、例行报告和对任何个人、组织或者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定期调查方面通力合作。长期的解除平民百姓的武装在对好战者和不满者的严格的牵制政策中达到了顶点。

欧洲国家开始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国家的领域扩展到远远超出了它的军事核心,其公民们开始对它提出范围非常广泛的保护、判决、生产和分配的要求。随着国家立法超出了自己的范围(远远不止批准征税),它们成了国家确实或者能够影响其利益的组织严密的所有集团要求的对象。直接统治和大规模的国家政治一起成长,并且有力地相互增强。

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在内部,国家着手推行国家语言、国家教育体制、国家军事服务以及许多其他事务。在外部,它们开始控制跨越国界的运动,运用关税和海关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把外国人看成需要限制权利和严密监视的与众不同的人。由于国家不仅投资于战争和公共服务而且也投资于经济基础,它们的经济变得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这就再次区分了它们居住在毗邻国家的经历。

在那个程度上,生活在国家内同质化了(homogenized),在国家之间

异质化了(heterogenized)。国家的象征确定了,国家的语言标准化了,国家的劳动市场组织起来了。战争本身成了一种同质化的经历,因为士兵和水手代表着整个国家,平民百姓经受了共同的丧失和责任。在其他后果中,在相同的国家内人口统计学的(demographic)特征开始相互类似,在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更大的差异。(Watkins 1989)

欧洲国家形成的后来阶段产生了我们将其都归结于“民族主义”这个标签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这个词指对那些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人口围绕着政治独立主张的动员;因此我们谈到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亚美尼亚人(Armenian)、威尔士人(Welsh)或者法裔加拿大人(French-Canadian)的民族主义。抱歉地,这个词也指对一个现存国家的人口围绕着伴随着那个国家的强烈的身份认定的动员;因此在 1982 年的马尔维纳斯或福克兰(Malvinas/Falklands)群岛战争中,我们谈到英国民族主义和阿根廷民族主义的冲突。无论在什么时间,也无无论在什么地方,当持某种宗教或者语言的统治者征服了另一宗教或者语言的民族时,在第一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贯穿了整个欧洲历史。在积极参与国家的国际战略的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前似乎很少,在此之后主要是出现在战争的狂热之中。人口的同质化和直接统治的实施都促进了这第二类的民族主义。

两种民族主义在 19 世纪都迅速地发展,其发展如此迅速以致也许最好发明一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在 1800 年以前的民族主义(equivalents)。随着主权分裂的地区,如德国和意大利,统一进入大的民族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版图具体分成 25 或者 30 个相互独立的领土,这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促进。大的征服运动非常典型地激发出两种民族主义,因为现存国家的公民看到他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而没有国家的但是团结一致的人们则看到了灭亡和新的自治的两种可能性。当拿破仑和法国人长驱直入欧洲时,在法国人这一方和在其国家受到法国威胁的另一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急剧地膨胀;然而,到拿破仑失败时,他的帝国政府已经在大部分欧洲为两种类型的新民族主义(确切地说,为俄罗斯人的、普鲁士人的、英国人的民族主义,但也为波兰人的、德国人的和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创造了基础。

在 20 世纪,这两种民族主义日益交织在一起,一种民族主义激发出

另一种——统治者要使其国民参与国家事业的企图导致未同化的少数民族方面的抵制,没有代表权的少数民族的政治自治的要求促进了那些从国家存在中获得最多利益的方面支持现存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非殖民化的政权开始把世界的所有其余部分分成有边界的、彼此承认的、相互独立的国家,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一个相对独特的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成功的主张通常会招致对至少一个其他民族建立国家的要求的拒绝;随着门关上了,更多的民族试图破门而出。与此同时,通过潜移默化的国际影响,现存国家的疆界变得较少因通过战争或者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而改变。越来越多的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能达到其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分裂现存的国家。近年来,像黎巴嫩(Lebanon)和苏联那样的复合国家已经尖锐地感觉到要求分裂的压力。在那种压力下,苏联解体了。

第六节 未意料的负担

因为战争手段的斗争产生了没有人曾经计划要创造、甚至特别期望的国家机构。因为没有任何统治者或者统治联盟有绝对的权力,也因为统治联盟之外的阶级对统治者用于战争的资源的重要份额总是掌握着日常的控制,没有国家能避免创造统治者宁愿避免的某些组织的负担。一个次要的平行的过程也会为国家产生未意料的负担:当统治者为了交战或者从国民百姓中榨取战争所需而创建组织——不仅仅是陆军、海军,还有税收机关、关税服务、财政部、地区政府,以及在平民百姓中推进他们工作的武装力量——他们发现组织本身发展出利益、权利、额外补贴、必需品和本身需要给予注意的要求。在谈到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时,汉斯·卢森堡(Hans Rosenberg)说道,

那个官僚机构学到了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并且发展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以自己的形象重塑政府系统。它抑制君主的独裁权威。它不再对王朝利益负责。它夺取了对中央政府和公共政策的控制。

(Rosenberg 1958: vii-viii)

以相似的方式,官僚机构在整个欧洲发展出它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基础。

对这种新的利益的回应带来了更多的组织产生:为退伍军人安置合适的职位,为政府官员确定尊贵的次序,训练学校,裁定官方特权的法庭和律师,为国家代理人服务的粮食、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提供者。16世纪以来,许多国家从事它们自己的对战争的进行或者财政收入的筹集至关重要的物质生产;曾经一度或者另一时间,许多国家为了某种目的或者其他目的制造武器、火药、盐、烟草产品和火柴。

一个再其次的过程同样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国家外的阶级发现他们可以把伴随着狭窄活动范围创办的公共机构转化成对真正引起他们兴趣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当这些问题并不大引起国家官员们的兴趣。为了建立完成他们自己任务所需的联盟,官员们接受了机构的扩大。原来是召集起来执行国王关于军队和税收的命令的法庭成了解决个人争端的工具,军队机构成了安置有权者无能的年幼儿子的方便的地方,登记办公室建立起来收取费用,因为文件的证明成了就遗产进行谈判的地方。

国家干预粮食供应的历史说明了这三类过程是如何为国家创造了未意料的负担的。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城市粮食供应一直不稳定,市政官员承担着监视市场、在短缺时期寻找额外的供应、并保证穷人能得到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的主要责任。例如,巴勒莫(Palermo)当局曾面临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当地的贵族鄙视大部分一直掌握在外国商人手里的商业。在17世纪大饥荒的威胁中:

为了把外来人从购买面包队伍中排除出去,巴勒莫的市民们不得不携带身份证。那些在巴勒莫有诉讼的人获得特别许可进入该城,但是只是在他们携带自己的粮食的条件下;其余的每个人都可能被城门前严格的岗哨拒绝入城。有时候甜饼制作完全被禁止,或者只有不新鲜的面包可以销售以减少消费。特殊警察被用来搜寻藏匿在农村的麦子贮存,而西班牙人很愿意做这个工作,因为西西里岛人有太多的朋友要照顾,有太多的敌人要报复。(Mack Smith 1968a:221)

尽管这些管理是运用在市民身上,它们给当局带来了沉重的执行负担。在市政官员没有完成他们职责的地方,他们就面临着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敌人和城市穷人联盟基础上的反叛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当人们最饥饿时,反叛并不发生,但是当人们看到官员们未能进行规定的控制、容忍牟取暴利、或者最糟糕地,批准把当地宝贵的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去时,反叛就必然发生。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许多城市采用了详细的规则,禁止在公共市场之外批发购买粮食,抑制囤积居奇,对和主食谷物现行价格极不协调的面包收取费用。建立了庞大军队、管理人员和大城市的国家从而增加了不能生产自己的粮食的人员数,并且增加了对通常地区市场之外的粮食需求。一国的地区的和国家的官员发现自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确保和管理粮食供应。

由于那些不欢迎国家干涉他们工作的地主,欧洲国家把它们控制集中在分配而不是生产上。国家,如普鲁士和俄罗斯,转让了巨大的权力给地主并增强了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以换取贵族提供军事和管理服务,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农业的特点,但仅仅是间接地。国家领导的教会土地的重新分配,正如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给了农业巨大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引起国家也那样去监督生产。直到20世纪,当某些社会主义政权接管了农业生产和大多数资本主义政权通过操纵信贷、价格和市场来干预生产时,国家才大力致力于那个粮食供应的目标。除了战时的定量配给和由财政或者政治计划推动的偶尔的禁止,国家也绕开消费。但是在分配领域,欧洲国家都发现自己在认真地对付粮食问题。

果断地遵循在欧洲不同地方的不同的时间表,从16世纪到19世纪发生了国际市场的相互依赖的扩张、大规模粮食批发商的兴起、依靠市场供应粮食的工薪阶层的增加。在这一点上,国家的管理者正在平衡农民、粮食商人、市政官员、自己的下属和城市穷人的需求——当国家伤害他们的特殊利益时,他们所有人都给国家带来麻烦。国家和国家官员发展出政治理论和实践,在其中侦察和拘捕罪犯起了重要作用。在19世纪前,正如我们所知的职业警察力量的迅速增长,警察这个词指的就是公共管理,特别是在地方层次上;粮食供应的管理是其单一的最大的成分。尼古

拉斯·德·拉·马赫(Nicolas de la Mare)的第一次发表在 1705 年的伟大论文,《论警察》(*Traite de la Police*)——就概括了宽泛的但是以粮食为中心的国家警察力量的概念。

确切地说,国家的粮食供应途径随着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特点不同而异。由于普鲁士建立了就其基础人口而言是非常之大的常规军队,它也创建了支持军队的仓库和供应系统,以及对粮食流入军队的集中省份的鼓励;那个体制,正如在普鲁士国家的几乎其他一切,依赖于地主的合作以及农民的服从。对粮食供应尽管有断断续续的国家立法,英国一般来说把对粮食供应的实际控制权放在地方官员手中,仅在粮食运入或者运出整个国家方面进行积极的干预。1846 年谷物法(*the Corn Laws*)的废除标志了国家限制粮食进口(当价格不太高时)的长久时期的结束,因此这个时期也是国家保护种植粮食的地主及其农民免受外来竞争的时期。在西班牙,政府供应陆地包围的马德里的努力冻结了通过大部分卡斯提尔的粮食供应,而且或许减缓了在整个伊比利亚人半岛上的大规模市场的发展。(Ringrose 1983)

增长的国家行为在国家专门管理粮食流通的政治机构规模方面引起了很大的扩张,即使是在国家政策公开宣布的目标是“解放”粮食贸易的时候。这个在 18 和 19 世纪日益被采纳的政策本质上包括强化大商人把粮食运输到它所能售得最高价格的地方的权利。最终在国家立法的敦促下,市政当局消除了旧的控制。从长远来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分配的改善足以减少城市、军队和穷苦百姓遭受突然粮食短缺的弱点。但是沿着这条道路,国家创造出专门用于粮食、监督和干预的人员来确保供应流通到那些其行为为国家所欣赏或者害怕的人们那里。间接地,军事力量的追求导致了对生存的干预。同样,为了获得人员、军服、武器、住所,尤其是钱来支持军队活动使得国家官员们建立起他们后来不得不监督和支持的管理机构。

欧洲统治者在 19 世纪和他们的国民转化成的市民(*subjects-become-citizens*)讨价还价中形成的群众代表的形式把国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活动舞台。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方案——选举、议会、广泛的就职机会、公民权利——成为现实。一旦公民对国家有由普选和议会立法机构支持

的可实施的要求,他们中更有组织的人们就会要求国家对就业、外贸、教育采取行动,最终会要求更多。国家通过原则上可接受的罢工和工会、通过监视它们两者、通过谈判或者强迫接受冲突的解决方案来干预劳资关系。基本上,工业化较晚的国家比那些领先的国家把更多的政府机构——银行、法庭和公共管理——投入到促进工业上。(Berend and Ranki 1982:59—72)

表 4.1 表明了国家支出的变化情况。在这些年里,挪威的国家人员也膨胀了:在 1875 年,中央政府雇用了大约 12 000 名公务员,大约占劳动大军的 2%;在 1920 年,54 000 (5%);在 1970 年,157 000 (10%: Flora 1983: I, 228;也可参见 Gran 1988b:185)。在挪威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司法、经济干预,特别是社会服务作为政治上的就国家对其依附者和公民的保护的讨价还价的结果都增长了。

表 4.1 国家支出在挪威 GDP 中的比例,1875—1975 年

年份	整个政府	军队	管理司法	经济环境	社会服务
1875	3.2	1.1	1.0	0.4	0.3
1900	5.7	1.6	1.2	1.0	1.2
1925	6.5	0.9	0.7	0.8	1.8
1950	16.8	3.3	1.4	3.9	7.4
1975	24.2	3.2	2.3	6.8	9.5

资料来源:Flora 1983: I, 418—419。

表 4.2 国家在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占 GDP 的比例,1900—1975 年

年份 ^a	奥地利	法国	英国	荷兰	丹麦	“德国”
1900			0.7		1.0	
1920	2.0	2.8	4.1	3.2	2.7	7.5
1940	2.3	5.1	5.3	4.4	4.8	11.1
1960	7.3	8.9	9.6	8.7	7.6	14.9
1975	10.8	9.2	15.0	17.2	24.6	20.8

a 数据是近似的。

资料来源:Flora 1983: I, 348—349。

社会服务的增长发生在整个欧洲。表 4.2 以奥地利、法国、英国、荷

兰和德国为例,只不过是因彼得·弗洛拉(Peter Flora)集中了许多有关它们的比较数据。转向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如苏联,在国民收入用于社会服务的比例上肯定发生更大的增长。每个地方,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干预健康、教育、家庭生活和财政。

正如表中数字的可利用性本身表明,所有这些干预产生了监视和报告,数量之多使得从大约 1870 年到 1914 年这一时期成了一个国家主持的有关罢工、就业、经济生产及许多其他方面的统计数据的黄金时代。从而国家管理人变得为国家经济和工人的境况负责,到了上个世纪无法想象的地步。如果说这些变化的范围和时间从抵制的俄罗斯到飞速的英国有很大的差异,几乎所有 19 世纪的国家都朝着这相同的总方向迈进。

第七节 军事化 = 平民化

我们所考察的国家转变的过程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政府的平民化。结果是惊人的因为武装力量的扩张推动着国家转变的过程。从图解的方式看,这种变化发生在现在已经熟悉的世袭制、经纪人制、民族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首先,是一个主要掌握权力者本身是活跃的军人,招募和指挥自己的陆军和海军的时期;然后是市政掌权者雇用的武装头领和雇佣军的全盛期;接着是伴随着常规军队的建立把军事机构并入国家;最后是转向大量招募、有组织的储备和基本上是从国家自己的公民中征募的收入高的志愿者军队,后者接着导致了退伍老兵的福利、立法上的照顾和在政治上代表可能的或者以前的士兵的主张。

我们从意大利的雇佣军的兴起中看到了从世袭制到经纪人时代的转变。从经纪人制向民族化的转变伴随着“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开始的,这种转变带来了大的武装头领如沃伦斯坦(Wallenstein)和蒂利*(就我所知,和我没关系)的顶峰和自取灭亡。这种转变的一个迹

* 和原著作者不是同一个人。——译者注

象出现在 1713 年到 1714 年把普鲁士的殖民地从它们曾经从中获得可观利润的服装业中排除出去。(Redlich 1965: II, 107) 法国 1793 年的普遍征兵以及此后的做法标志着从民族化到专门化的转移。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这种转移在 1850 年后变得很普遍。到这个过程结束时, 市政官僚机构和立法机构包括相对平等地分布在所有社会阶层的军事服务的军事的和法律的义务, 军人职业化的意识形态限制了将军们和舰队司令们涉足市民政治, 及直接军事统治的可能性或者说国家政变(coup d'etat)大大地减少。

1850 年后, 在专门化时代, 政府的平民化加快了。从绝对的条件看, 军事活动在开支和重要性上继续增长。但是三个趋势制约了它的相对重要性。首先, 受到市民经济的竞争需求的限制, 在和平时期军事人员作为总人口中的一部分保持稳定, 而其他政府方面就业继续膨胀。第二, 在非军事活动上的开支增长得甚至比军事开支还快。第三, 市民生产最终增长迅速足以超过军事扩张, 结果军事开支占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非军事活动及其开支吸引了政府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在我们前面已经考察过其社会开支的那些相同的国家里, 军事人员在 20—44 岁的男性人口中的比例上下波动。(参见表 4.3) 伴随着由于战争时期的阵亡和有关战争的动员产生的重大变化, 1970 年的西欧国家通常保持军队在 20—44 岁的男性人口中约占 5%。在 1984 年在军事服务方面总人口的比例变化如下(Sivard 1988: 43—44):

表 4.3 1850—1970 年^a 军事人员在 20—44 岁的男性人口中的比例

年份 ^a	奥地利	法国	英国	荷兰	丹麦	“德国”
1850	14.5	6.5	4.3	5.4	10.3	4.7
1875	8.4	7.4	4.5	6.4	6.4	5.9
1900	6.9	8.8	6.6	3.6	2.8	6.3
1925	2.5	6.7	4.3	1.2	2.3	1.0
1950	?	8.4	7.6	12.7	2.3	?
1970	4.2	5.8	4.2	5.3	5.3	4.5

a 这些国家的疆界和特性随着战争的运气有很大的差异。

资料来源: Flora 1983: I, 251—253。

低于 0.5%: 冰岛(0.0), 卢森堡(0.2), 马耳他(0.3), 瑞士(0.3); 0.5 到 0.9%: 丹麦(0.6), 联邦德国(0.8), 意大利(0.9), 荷兰(0.7), 挪威(0.9), 西班牙(0.9), 英国(0.6), 波兰(0.9), 罗马尼亚(0.8), 奥地利(0.7), 瑞典(0.8); 1.0 到 1.4%: 比利时(1.1), 法国(1.0), 葡萄牙(1.0), 捷克斯洛伐克(1.3), 民主德国(1.0), 匈牙利(1.0), 苏联(1.4), 阿尔巴尼亚(1.4), 芬兰(1.1), 南斯拉夫(1.0); 1.5% 或者更高: 希腊(2.0), 土耳其(1.6), 保加利亚(1.6)。

几个本质上非军事化的国家现在有低于它们人口的 0.5% 在服役, 几个军事化的国家超过了 1.4%, 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介于两者之间。所有这些比例——甚至半交战的希腊和土耳其——远低于瑞典在其顶峰时期到 1710 年投入其军事力量的其人口的 8%。而且, 由于它们很高比例的强壮人口已经就业, 少部分在农业, 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着(如果它们的经济没有大的转向的话)在战时所能动员的额外军队数量的严重限制。

与此同时, 非军事化的活动膨胀如此之快, 以致军事开支作为大多数国家预算中的部分份额下降了, 尽管那些预算有很大的扩大。以和前面一样的国家为例, 我们在表 4.4 中发现预算中用于军事开支的比例方面的下降趋势。在每一个国家, 长期的趋势指向用于军事活动的开支比例下降。

表 4.4 1850—1975 年军事开支占国家预算中的比例

年份 ^a	奥地利	法国	英国	荷兰	丹麦	“德国”
1850		27.4				
1875		23.2	37.8	34.0		
1900		37.7	74.2	26.4	28.9	22.9
1925	7.7	27.8	19.1	15.1	14.2	4.0
1950		20.7	24.0	18.3	15.6	13.5
1970	4.9	17.9	14.7	11.3	7.4	6.4

a 数据是非常的近似。

资料来源: Flora 1983: I, 355—449。

确实, 最终国民收入上升快于军事开支。在 1984 年, 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军事开支的比例以和服役人员的比例相似的模式变化。(Sivard

1988:43—44)低于2%:冰岛(0.0),卢森堡(0.8),罗马尼亚(1.4),奥地利(1.2),芬兰(1.5),爱尔兰(1.8),马耳他(0.9);从2%到3.9%:比利时(3.1),丹麦(2.4),联邦德国(3.3),意大利(2.7),荷兰(3.2),挪威(2.9),葡萄牙(3.5),西班牙(2.4),匈牙利(2.2),波兰(2.5),瑞典(3.1),瑞士(2.2),南斯拉夫(3.7);从4%到5.9%:法国(4.1),土耳其(4.5),英国(5.4),保加利亚(4.0),捷克斯洛伐克(4.0),民主德国(4.9),阿尔巴尼亚(4.4);6%或者更高:希腊(7.2),苏联(11.5)。

美国和苏联的疏远帮助创建了这种开支的分布。在1984年,美国花费了它自己巨大的GNP中的6.4%用于军事活动来匹配苏联从它弱得多的经济中挤出来的11.5%。然而,欧洲的总的趋势在朝下走:服兵役者占人口的比例更小了,国家预算中用于军事的份额也更小了,国民收入中用于士兵和武器的比例则更小了。这些变化来自,并且增强了,军事人员的组织的牵制。那么,在从世袭制时代到经纪人时代、从经纪人时代到民族化时代、再从民族化时代到专门化时代的每一步,出现了限制军事人员的自治权力的新的大的障碍。

对理想化结果的偏离证实了其逻辑。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利用殖民地的收入作为军事开支的主要部分、继续从西班牙贵族中招募军官和从最穷的阶级中招募步兵、并保持军官作为皇室在各省和殖民地的代表从而偏离了政府的平民化。(Ballbe 1983:25—36; Sales 1974,1986)所有这些因素最小化了和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权利和限制的国民百姓就交战资源的讨价还价的种类。西班牙和葡萄牙大概也发现自己陷入了“领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征服如此之多的独立领土,相对它们的榨取手段而言,以致管理的费用耗尽了从帝国的控制中所获得的好处。(Thompson and Zuk 1986)西班牙和葡萄牙因此在某些方面预示了许多当代的军人掌握政权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

在平民组织和军事组织的差异、军事的对平民的服从的背后,隐含着根本的地理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活动用于军事目的的空间分布和用于财政收入生产的空间分布有明显的不同。只要一个国家是通过在邻近领土的征服和贡赋运作,这差异就不一定太大;那么占领的士兵就能承担监视者、管理者和收税者的工作。然而,超过了这一点,四种利益则

分道扬镳:军事力量在它们可能的活动地方和它们主要的供应来源之间部署;擅长于以在空间的完整和人口分布保持一致之间达成妥协的模式来监督和控制平民百姓的国家官员的分布;把国家财政收入的收取活动划分到不同贸易、财富和收入的地理区域的工作;最后,根据参与协商的派别的空间结构分配来自就财政收入的讨价还价的国家活动。

显然,作为结果的国家活动的地理随着它和所有这四种力量的关系不同而变化;海军集中在沿着国家外围的深水位置,而邮局分布在和老百姓紧密接触的地方,中央管理机构则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军事部门越大,它转向国家自己领土之外的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不断增长来支持该部门的榨取和控制机构越广泛,它们地理上的差异就越大,理想中的军队在地理上离授予武装力量对平民百姓的实质的日常控制权的机构就越远。

地理的差异促进了用于每一活动的独立的组织的产生,包括把武装力量分成军队和警察部队。警察部队的部署达到接近平民百姓的分布,而军队的部署把军队和市民分开,把军队置于国际战略规定的地方。确实,法国的模式把地面武装力量分成三部分:士兵分成驻扎在为了管理和战术之便的地方的卫戍部队(garrisons);分散在通讯线上和国家领土内人烟稀少的地方的宪兵(gendarmes)(仍然在军队控制之下,在战争时期动员进入军队);驻扎在该国较大的聚集地的警察。因此士兵在边疆巡逻,保护国家权力所在地,干预海外事务,但是很少参与对犯罪控制或者国内冲突的控制。

除了高速公路,宪兵主要处理国家领土的私有财产占据其大部分空间的那些部分,因此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巡逻通讯线和对来自公民的要求做出响应。对比之下,城市警察巡回在以有着有价值的财产的公共空间为主的领土上;他们相对地把较多的精力用于出击去控制和逮捕罪犯而无需公民要求。最终,任何这类地理上的划分把军队和警察部队分离开来,使得警察依赖那些公民而生存,那些公民的当务之急包括财政的稳定、管理的效率、公共秩序及保持政治协商和(也许甚至而不是)军事的功效。这种复杂的逻辑严重地影响了欧洲国家的空间的区别。

肯定地说,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地理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那些管理

着国家市民那一半的人们很少有选择不和资本家建立工作关系,不去和人口的其余部分就产出资源用于日益扩大的国家活动范围进行谈判。随着他们追求财政收入和服从,官员们建立起变得和军队非常显著不同的组织,并且在很多场合变得逐渐地独立于军队。在欧洲总体上,这些过程并没有防止稳定增长的军费开支或者甚至破坏性更大的战争,但是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会使 990 年或者 1490 年的欧洲观察者大吃一惊的国内军事力量。

第五章

民族国家的谱系

第一节 中国和欧洲

G. 威廉·斯金纳(G. William Skinner)把中华帝国晚期的地图描述成两种中央-地方等级的交汇点。(Sinner 1977: 275—352; 也可参见 Wakeman 1985, Whitney 1970)第一种,从底层向上建立的,出现于交换;它重叠的单位由以规模日益增长的城镇为中心的越来越大的市场地区组成。第二种,主要由上而下实现的,来源于帝国的控制;它涉及的单位包括一个管理权限的等级。到县(hsien or county)这一层次,每个城市在商业等级和管理等级都有一定地位。在县级以下,甚至强有力的中国皇帝通过贵族们间接统治。在由上而下的体系中,我们发现了强制的空间逻辑(spatial logic)。在由下而上的体系中,可以看到资本的空间逻辑。我们已经看到两种类似的等级在欧洲国家和城市之间的不相等的遭遇中反复地起作用。

在中国某些地区,帝国的控制相对较弱而商业活动相对较强;在那里,城市通常在市场的次序中比在帝国次序中占据更高的等级。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帝国的外围,那些地区对中心来说在安全上比在财政收入上更有价值),帝国的控制给予一个城市的地位比商业活动给予它的地位

更高。斯金纳勾勒出一个城市在两种等级中相对地位的某些重要的相互关系；例如，派到在市场等级中占据相对较高地位的城市的帝国的管理者通过和商人和其他富裕的贵族交往而完成的工作比在较差地区的同事要多，而包括那些大的市场城市的地区所获财政支持高于其通向官僚生涯的帝国考试*考生的份额。许多其他结果则源于由上而下体系和由下而上体系的相互影响。

中国如何不同于欧洲？杰苏伊特·吉乌尔多·奥尔德尼(Jesuit Giuldo Aldeni)在1673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报道说，他的中国朋友常常问道：“如果有那么多的国王，你们怎么能避免战争？”据报道，他天真地或者不诚实地回答说，“欧洲的所有国王都通过婚姻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和睦相处。如果发生战争的话，教皇就会干涉；他派出公使警告交战方停止战斗。”(Bunger 1987:320)这只是发生在最终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拖入流血的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这差异是关键性的：尽管中国曾经一度生活在和欧洲的国际政治混乱时期非常相似的战国时代(an era of Warring States)，以及各种起义和来自边境的入侵循环地威胁着帝国的控制，但在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单独的中心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方，这一地区以欧洲标准来看是无法想象之大。帝国是中国长期的正常情形；当一个帝国衰落了，另一个帝国取而代之。而且，在18世纪，当时来自单独中心的直接统治开始在欧洲站稳脚跟，清帝国正在其整个领土上实施一种更加深远的直接统治；在1726年，清雍正皇帝在此方面走得如此之远，用自己政权中的官员替换了在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的首领。(Bai 1988:197)在欧洲，分裂成众多相互争夺的国家一直盛行于过去整个千年。

尽管俄国沙皇最终控制着大片亚洲，欧洲本身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帝国在顶峰时期的中国的规模。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地盘分崩离析之后，许多统治者曾企图在欧洲建立帝国或者把帝国扩展到欧洲。一连串的穆斯林帝国深入到西班牙和巴尔干半岛国家，但是到此为止。拜占庭帝国、保加利亚(Bulgarian)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有时横跨巴尔干半岛和中东，与此同时蒙古人和其他亚洲入侵者在俄罗斯留下了帝国传

* 科举。——译者注

统。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拼凑起一个有分裂倾向的帝国,诺曼第人曾经几次企图建立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在权利上)和哈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在事实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然而这些帝国的努力都远未能达到掌握整个欧洲大洲。在罗马之后,没有大片的欧洲地方感到了另一帝国在罗马规模(大大小于中国的)上的统治。

然而,欧洲以自己更为分段的方式经历了斯金纳在中国考察出的两种过程的相互影响:由下而上地建立起以贸易和制造业为基础的地区等级,由上而下地实施政治控制。欧洲的城市网络代表了资本的等级;它们包括深入到城镇和乡村的,由小商贩们(从词源上说,指那些肩挑商品的人们)、小贩们(从词源上说,指那些徒步运送商品的人们)和其他通过地方和地区贸易致力于资本积累的更大商人们建立的商业联系的较高层次。随着英国国王或者勃艮第公爵深入到农村征集税收和士兵,他发现了他们很少参与创建并且不能完全控制的成熟的商业联系。确实,欧洲的由下而上的等级比它的由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结构长期以来更加完善、更加密切、更加广泛。这就是许多在罗马之后的企图建立跨越整个欧洲大陆的帝国的努力都惨遭失败的主要原因。

R. 宾·翁(R. Bin Wong)的在欧洲和在中国的为了粮食的斗争的比较提出了在两个大陆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斯金纳式的类似。(Wong 1983; Wong and Perdue 1983)尽管在结构上有重大差异,在粮食市场的范围和政府对粮食供应控制的程度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的地方和时间里,当粮食短缺和价格过高时,这两个地区的人们似乎都特别喜欢用暴力夺取粮食。依赖当地市场供应粮食的穷苦人民,自行替代不能或者不再能够强制满足该地对在其周边贮存的、上市的和运输的粮食要求的政府当局。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中国经历了帝国控制的下降,因为市场自行保持甚至扩张,地方百姓阻止运输、威胁商人或者夺取贮存的粮食来实施他们要求供应的要求。

在 18 和 19 世纪的欧洲,对欧洲来说,出现了粮食市场的扩张,甚至比当地政府力量增长还快;其地方百姓夺取粮食来实行他们地方官员不再尊重的要求。(Bohstedt 1983, Charlesworth 1983, Tilly 1971)没有人描绘在欧洲的谷物抢夺的充分的主要的地理分布图来确定它们是否遵循

恰当的斯金纳的模式。然而,考虑到谷物抢夺围绕着大城市和港口的显著趋势,这种模式是非常似是而非的。中国的盗贼行为、起义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冲突也展示了至少和帝国和商业活动的共同分布保持大致一致显著的地区差异。从那个事实出发,我们也许能合理地在欧洲寻找相似的地理上的不平衡。流行的集体行为也许更好地展示了斯金纳的逻辑。

斯金纳描述的政治共变的模式也有欧洲的对应物:在商业稀少的地区的管理资本;在那些地区总督通过直接的军事控制拥有权力,但是只能为国王创造很少的财政收入,级别较低的皇家官员处在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和其谈判协商的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的包围之中。考虑一下国家的管理机构压倒了有利于大地主的商人的东普鲁士和相似的机构也融化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中的西普鲁士之间的对比。加布里埃尔·阿丹特(Gabriel Ardant)指出三十年前,财政体制和地区经济的“适合”决定了征收税收的努力的费用和效率。(Ardant 1965)在一个市场活动很少的地区,建立在估计价值基础上并且以现金征收的土地税,可能在收集上要花费大量费用、在人口中分布不均、丧失大量潜在财政收入并且激起广泛抵制。相反,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单调的人头税(flat head tax)以较高的代价比设计出来适合资本所在地和商业发展道路的可比税收产生更少的收入。

在另一方面(正如阿丹特没有观察到),伴随着高度的商业活动,商人们常常拥有大量的政治权力,从而处于防止建立会夺取他们财产、钳制他们交易的国家的地位。在欧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商业活动的范围极大地影响了用于建立国家力量的不同策略的适应能力。在伴随着波罗的海诸国的贸易增长而繁荣的格但斯克* 以外,波兰商人无法打破大地主的控制。[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地主的权力也钳制波兰当选的国王,从而使他成为一个对试图脱离条顿武士(Teutonic Knights)的更为贪婪的监护(tutelage)的普鲁士城市有吸引力的领主。]但是阿姆斯特丹、杜勃罗文克(Dubrovnik)、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在商业等级中的高端可以提出任何国家要在他们领土上运行的条件。因此斯金纳的中国模式也有助于理

* Gdansk, 旧称 Danzig, 但泽, 波兰港口城市。——译者注

解在欧洲的国家形成的地理。

事实上,前面几章已经展示了一种熟悉斯金纳模式的人很容易认出欧洲模式。这种模式有三种成分:

1. 一套社会关系以交换和资本积累为特色,在这种社会关系中集中产生了城市,不平等建立在剥削上;

2. 另一套社会关系以强制为特色,在这种社会关系中集中产生了国家,不平等建立在统治上;

3. 一整套由国家执行的活动,其中包括国家代理人从其他人那里获取资源。

由这两套社会关系决定的网络连接不平衡:在某些地方密集的强制集中汇合着同样密集的资本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密集的强制却伴随着稀少的资本,等等。因此,在不同地方执行的同样的国家活动产生不同的结果,有着不同的组织结果。这一点非常抽象地概括了本书至此为止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重新审视国家和城市

回忆一下国家是什么:在一片边界明确的领土上控制着主要的集中的强制手段,在某些方面享有凌驾于在同一领土上运行的其他一切组织的优先权的独特的组织。(那么,民族国家把所讨论的领土扩张到若干邻近地区,并且保持自己相对集权的有区别的自治的结构。)武装人员通过在某一领土内积累和集中强制手段,通过创立一个至少部分地不同于在该领土上管理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通过夺取、指定或者消灭在同一领土上的其他强制的集中,通过确定边界并通过在那些疆界内实施司法权而形成国家。他们通过延伸相同的过程到新的相邻的领土,通过伴随他们的进展精心筹划集权的、有区别的和自治的组织来建立起民族国家。

国家的形成和演化主要是作为努力征服和保持对该领土上的人们和财产的控制的结果而发生的。尽管国家的创建者在心中总是有征服和控制的模式,并且常常自我有意识地遵循这些模式,但是他们很少计划出那

些活动产生的国家的逐步建立的步骤。然而，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出由上而下的强制性控制的等级。

随着统治者形成和演化国家，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消耗大量的资源，特别是使他们自己陷入军事活动的资源：人员、武器、运输、粮食。那些资源在极大程度上已经深藏在其他的组织和社会关系中：家庭、领地、教会、村庄、封建帮会、邻里亲朋好友。统治者的问题是要从那些组织和社会关系中榨取必需的资源，而且保证某人在未来会再生产和交出相同的资源。两个因素塑造了国家获取资源的过程，并且深深地影响了由此过程导致的组织；资本由上而下的等级的特点，以及国家代理人企图从中榨取资源的地方在那个等级中的地位。

可能的国家创建者面临的的城市范围在欧洲是非常之大。借助于另一两维图表(图 5.1)，我们也许可以根据城市及其边远地区的活动表达出来的活动范围(从肤浅的联系到深刻的联系)来排列它们，也可以根据它们的市场地位(从纯地方的或者地区的市场到国际的贸易、加工和资本积累)来排列它们。因此在 13 世纪的佛罗伦萨，其商人们和食利者们对土地、生产和农民中的贸易行使着广泛的控制权，比热那亚更像大都市，是一个和自己的边远地区有着更弱联系的国际城市。15 世纪的马德里，非常靠近其本身和其卡斯提尔部分，看上去比里斯本更像一个地区市场，其统治延伸到葡萄牙的内部和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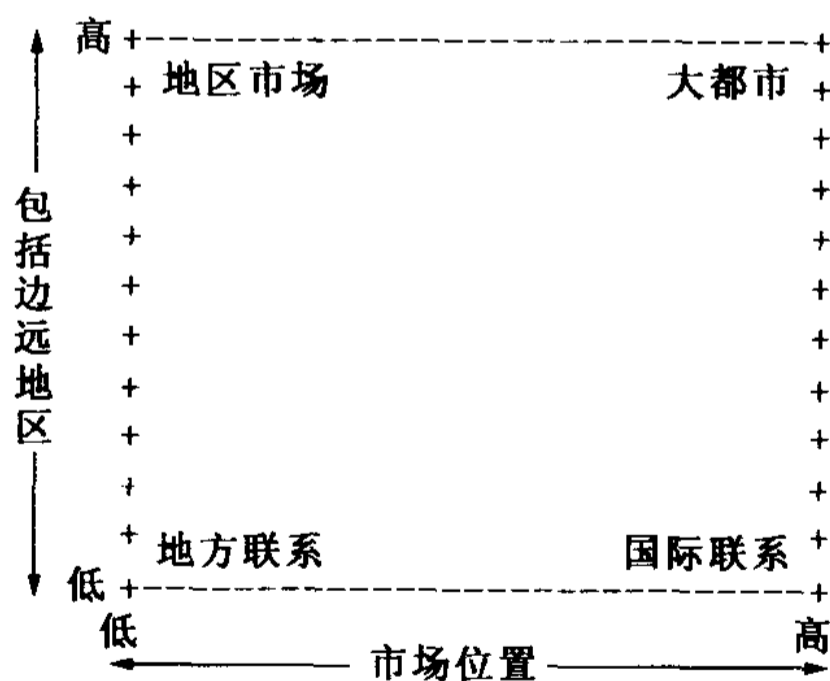


图 5.1 城市的类型

差异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不同类型国家的形成的前景。

一个城市的市场地位越高,任何建立集中力量的人就越可能必须和那个城市的资本家们谈判,或者甚至就是其中一员。一个城市 and 它边远地区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在任何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就越少可能出现一个作为该城市的平衡力或者敌人的单独的地主群体。在欧洲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一个统治着自己边远地区并占据国际市场地位的城市有很大的可能性构成它自己的自治的国家。无论是像米兰的城邦国家或者像威尼斯的城邦帝国。

在大约 1800 年以前欧洲流行的条件下,在城市增长扩大的地区,国际贸易非常频繁。有些城市在国际市场、资本积累和集聚中占据中心地位。在那些情况下,除了和当地资本家紧密合作,没有人创立了或者改变了一个国家。佛兰德斯、莱茵地区和波河山谷(the Po Valley)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一原则。在城市稀少的地方,条件不同;在那里,国际贸易在经济生活中起很小的作用,很少城市(如果有的话)在国际市场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资本既没有以很高的速度积累,也没有以很高的速度集聚。在这样的地区,国家常常在既没有当地资本家的合作,也没有当地资本家的有效反对下形成。在那里,强制在起支配作用。波兰和匈牙利就是突出的例子。在这两者之间,在一个地区存在至少一个大的资本积累中心或者地主占优势的中心使得通向国家的中间道路成为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资本的拥有者和强制的拥有者斗争着,但是最终讨价还价,暂时妥协。阿拉贡(Aragon)和英格兰(England)为此提供了恰当的例证。

这些差异在欧洲遵循着清晰的地理模式。尽管沿海地区有着更多的城市,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以外的港口通常有着较低的并且由地主控制的更大地区支持的浅海边远地区。广阔的城市地带大致上从西北的意大利半岛伸展到在分裂主权的地图上占绝大部分的英格兰南部,在国家形成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区;随着商业在大西洋海岸、北海(the North Sea)、波罗的海地区(the Baltic)获得重要性,这一地带起了某种“抽出器”作用,从地中海和许多东部地区到它所联结的地方抽出商品、资本和城市人口。大的、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主要在城市地带的边缘形成,在那里城市和它们的资本可以达到但不是无法抵抗的。再往外,国家占据了甚至更大的领土,但是直到很晚才对领土上的人们和活动实行短暂的控制。

这些对比的情况标志出了国家变化的不同道路。为了使讨论切实可行,让我们再次将此加以系统化(参见图 5.2),把许多道路简化到三条。这一图表说明当人们开始在欧洲的不同地方集聚强制时,集聚的资本的相对存在或者缺席预示了(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在国家结构上的不同的轨道;尽管欧洲的所有地区最终都汇聚到大的民族国家,国家实际上在很长时期里分歧很大;在几个世纪里,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资本化强制的国家在结构和行为上分离得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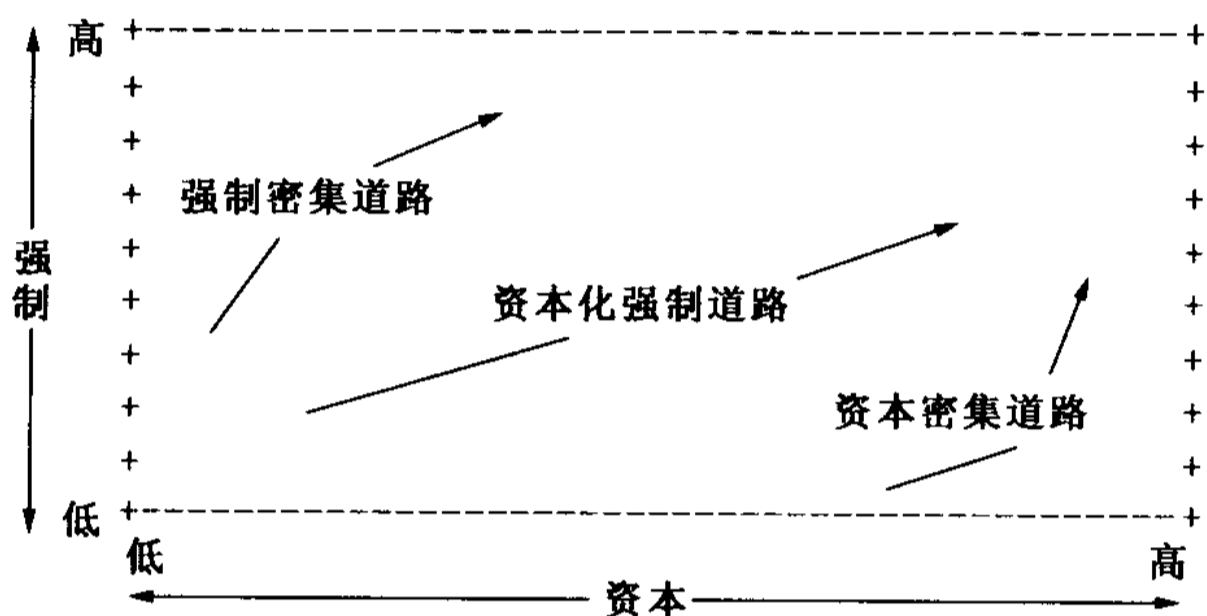


图 5.2 作为国家成长道路的决定因素的资本和强制的相对集聚

考虑到其所有的不成熟,这图表允许某些有用的差别。例如,在北欧(Nordic)国家内,我们会在图 5.3 描绘另类的道路。自然地,为了认真对待这一图解,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不同的时代,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都属于由他人统治的帝国和联盟,这些国家的疆界和在那些国家名下的从属关系由于征服和谈判变化很大,在 17 世纪中叶以前,丹麦有着在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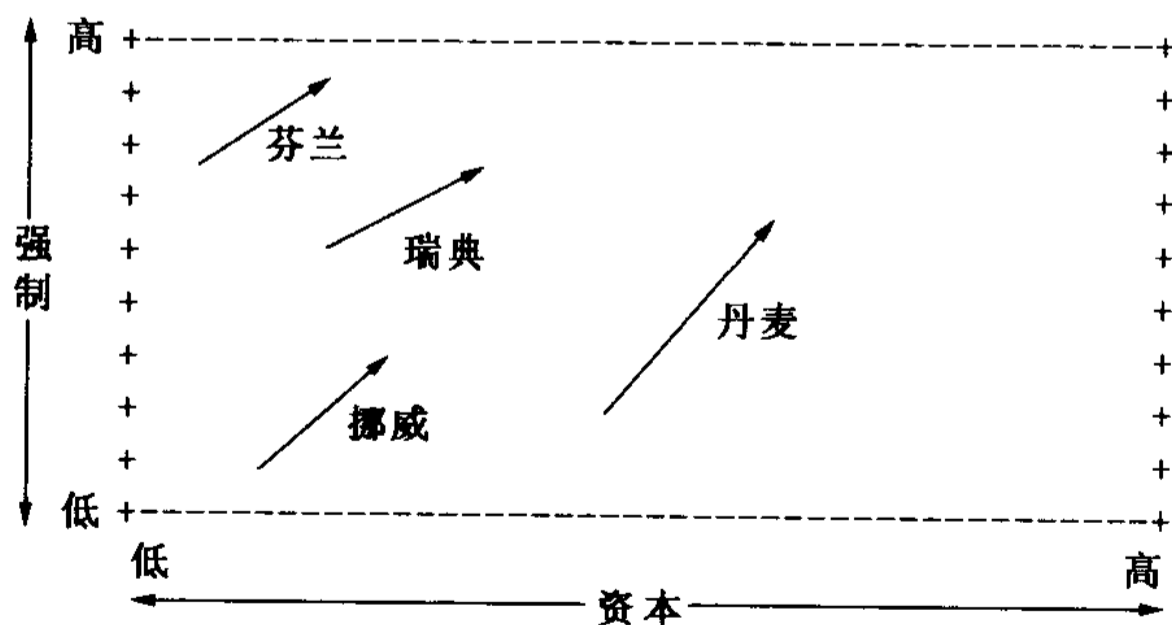


图 5.3 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形成道路

的地主贵族和地主国王之间的经典的联合,以及在 900 年后的整段时间里,芬兰仅仅享受了几十年的独立于邻国强权的存在。带着这些限定,这一图表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描绘丹麦是如何作为相对未商业化的征服力量开始这一千年,然后在西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贸易的条件下资本化,成为比其邻国繁荣得多的国家,而芬兰仍然是商业停滞不前的地方,由武力统治了更长的时间。

北欧国家创建了强制性国家形成的它们自己的变种。在 17 世纪以前,它们包括欧洲最极端的农村地区。许多城镇的出现是作为皇家权力的增强的前哨,而不是作为重大的商业中心。尽管有卑尔根(Bergen)、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其他商业中心作为贸易前哨的早期重要性,在 15 世纪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城市有多达 10 000 个居民的。(de vries 1884: 270)德国商人长期统治着斯堪的那维亚的贸易,到此程度,城市议会和城市地理等常常分裂成显著的德国部分和地方部分。

斯堪的那维亚的贸易成了汉萨的准垄断(near-monopoly)。汉萨城市坚决地排斥意大利银行家,并且拒绝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信用机构。相反他们依赖双边平衡的常常是以货代款类的(in kind)贸易。(Kindleberger 1984:44)只是伴随着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在 16 世纪期间的加速,资本和城市人口的大的集聚才开始出现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甚至在那时,接替了德国人的荷兰商人管理着大部分的贸易、资本和航运。然而这个地区的武士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留下他们的痕迹。

在 990 前后的几个世纪里,斯堪的那维亚人(Vikings)以及他们的表亲们征服了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方,并且常常建立起由武士-地主统治的国家。然而在他们的家乡,他们一般不能遵循相同的道路。那里森林和渔业的丰富、殖民地的稀少、边境的开阔和外来侵略的罕见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小农们(smallholders)的生存,并且限制了武士们成为大地主的能力。在寻求保证军事服役的同时,瑞典国王们做出了实际上造成大量小地主的默许。直到 17 世纪,他们通过相同的体制的变种征集了大部分军队:贵族(和后来的富裕农民)有资格通过为收入低下的皇家军队配备骑兵来获得免税,而平民们(commoners)分享着供养步兵并为他们及其家属提供土地的责任。除了驻扎在战争地区和边境省份的雇佣兵外,这种

安排也支持他们自己而无需皇家大量资金开支。

瑞典和丹麦保持着庞大的武装力量有几个世纪。在古斯达夫·瓦萨(Gustav Vasa)(1521—1560年)和他的后继者统治下,瑞典以使大部分经济服从国家的需求为代价建立起令人敬畏的军事力量。丹麦、瑞典和挪威的斯堪的那维亚联盟(1397—1523年)主要是作为维护皇权反对德国商人的商业优势和汉萨联盟(Hanseatic)的手段而形成的。在其他的步骤中,瓦萨赶走神职人员,创立了附属于国家的新教教会。和他的俄罗斯同时代人一样,古斯达夫·瓦萨也促进了这种观点“一切土地归皇室所有,那些非贵族享有对土地的暂时拥有,只有当他们完成了他们对政府的财政义务,才可能期望继续对土地的使用和占有”(Shennan 1974:63)。国家在主要是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中寻找资金来支付战争,激发了矿业和制造业的扩展、财政机构的苦心经营、巨大的国家债务的开始、对旧的代表议会的规避和神职人员(现在是新教和国家的教会)的日益增加的在为皇家保持记录方面的参与。(Lindegren 1985, Nilsson 1988)

较多商业的丹麦从皇家土地的收入中来支付其战争经费直到“三十年”战争。确实,直到1660年没有平民能够在丹麦拥有土地。瑞典和丹麦在17世纪40年代战争伴随着经济萧条,加速了丹麦贵族和当选国王之间的财政收入的争夺。在一次国家政变中,皇室建立起世袭的君主制并且极大地削减了贵族的权力。但是那也意味着削减了来自贵族的合作。结果丹麦做出了转向税收的决定性转移,包括有利可图的海湾通行费(the lucrative tolls of the Sound)。“尽管在1608年的67%的丹麦国家财政收入由来自皇家土地的收入组成,半个世纪后这种收入总量只有10%。”(Rystad 1983:15)确实,为了偿还战争导致的债务,这个君主国在1660年到1675年间卖掉了其大量的土地。(Ladewig Petersen 1983:47)因此,17世纪进行战争的费用在丹麦和瑞典两国产生了重大的政府变化。

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和丹麦一样)主要依赖雇佣兵,但是由于它在17世纪晚期对军队的要求上升,又转回到征募民族武装。查理十一世(Charles XI)(1672—1697年)通过夺取他的前任们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出售给富豪们的皇家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的大部分分配给那些为了谋取生存手段而服兵役的兼职的士兵们,来策划他自己的政变。到1708

年,瑞典和芬兰(那时是瑞典的一个省份)从整个大约 200 万人口当中组建了 11 万 1 千人的军队。(Roberts 1979:45)瑞典的君主经常缺少资金,但是能够通过出口铜和铁、通过在丰富的矿产基础上建立自己大型的军火生产业并且通过从它夺取的领土上榨取大量的回报来支付战争而不至于破产。只要战争在继续,这种贡赋体制很有效,但是和平和稳定统治一到来,这种体制就崩溃了。

随着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被刺(1718 年),瑞典放弃了它追求帝国权力的努力。然而,到此时,在人口很少的基础上创建庞大武装力量、相对没有货币化的经济、稀少的资产阶级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机构,在其中市民官僚和神职人员为皇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挪威(生活在丹麦的,然后是瑞典的统治下直到 1905 年)和芬兰(曾是瑞典的一个省份直到 1809 年,然后是俄罗斯的大公国直到 1917 年)经历了相似的演化,尽管它们有着非独立地位以及相对欧洲市场的更大的外围。丹麦,用交通产生的大量通行费(tolls)来控制海湾的交通,把比其邻国大得多的军事努力放在海军上,在和其南面的德国的贸易中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从而产生出较大的资产阶级和较小的国家机构。

尽管在 1750 年的财产合并(the consolidation of holdings)后瑞典的无地的劳动者在数量上大大地增多(Winberg 1978),他们从来没有落入大的土地所有者控制之下。相反,国家的官僚机构把它的监控直接延伸到农民和劳动者那里,后者保持着相当大的讨价还价权力;确实,在瑞典,农民通过独立于神职人员、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财产保持着自己的代表权。结果产生的国家围绕着强制而组织,给予资本很小的空间,但是缺乏其南面邻国的大的领主。

然后,和欧洲其他部分比较,北欧所有地区都集中在通向国家状态的强制密集道路上。在另一极上,商业城邦国家和意大利的城市帝国则遵循着显著不同的通向国家的道路,依赖资本的高度集中,但是在积聚强制方面比它们的北欧兄弟更少果断性和更多临时性。这就是要点:欧洲国家的变化轨道差异很大,产生了对比类型的国家。那些遵循资本密集道路的国家最终在欧洲成了占优势的,而其他国家会聚在他们的特色上。但是,在欧洲国家体制的后来合并前,许多其他类型的国家形成了并且运

行得非常有效。

让我来回顾一下关键点。在欧洲不同地方的统治者们相互作用并且共同参与国际战争,他们进行着相似的活动:他们寻求创立和利用交战能力为自己谋求优势。但是每个统治者是在他自己领土上流行的强制和资本的结合所设立的高度不同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另类的结合意味着不同的阶级配置,不同的潜在的同盟和敌人,不同的国家活动的组织残余,不同的对国家活动的抵制形式,不同的榨取资源的策略,从而不同水平的资源榨取的效率。因为每一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组织残余和社会关系,一个国家遵循的道路在时间上到某一点上限制了超过那一点能为统治者所用的策略。由于那个理由,甚至在时间的不同点上在强制和资本上占据一模一样的位置的国家表现得有点不同。然而,这巨大的差异分开了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国家形成的资本-强制轨道。

第三节 强制的轨道

以通向高度强制的道路为例。在现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贸易路线稀少,资本缺乏。在 990 年,主要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是基辅(Kiev),它起了联结拜占庭和印度、中国以及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大的商业地带的—一个北方分支的作用;基辅也处于联结波罗的海地区和拜占庭的较次要的南北贸易路线上。历史记载在 988 年,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君主(Prince Vladimir)通过接受洗礼加入到基督教的分会来加强和拜占庭的联系。转向南方去攻城掠地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后代——基辅的君主们对其他的俄罗斯城邦国家和地区性大公国行使着微弱的主权。在地方层面,大量的土地仍然处于农民公社(peasant communes)的控制之下;正如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地主能够从农民那里以应付款、罚款、使用费和到他们土地上打短工的形式强制得到收益,但是他们很难对家庭和公社自己的土地的管理加以干涉。人口的稀少使得耕作者相对地容易从压迫的主人那里逃走,到其他地主的土地上寻求庇护。大地主们也遭受来自西伯利亚

大草原(steppe)的游民的不断的袭击和征服。然而,在很大规模上,相对自治的武装地主统治着这片领土的大部分。

在西面,在 990 年,一个波兰人的国家通过征服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正在壮大起来。它也在向东扩张;在 1069 年它的大公驱使他的军队直达基辅,把他的一个亲属扶上了俄罗斯王位。在西北,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国家定期地试图把它们边界推进到俄罗斯和波兰主张的领土内。好战的保加利亚人的国家则在俄罗斯的西南耀武扬威。在此同一地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后者是新加冕的)也同样规划出它们自己的控制区域。围绕着欧洲西部边缘——特别在英伦三岛(the British Isles)、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频繁的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和中东的武装侵略者通常夺取土地并创立起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不管人口多么稀少,他们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相反,几乎所有欧洲东部的三分之一,正在形成收取贡赋的国家,它们对大片领土声称拥有优先权但是如果管理的话,也只能松散地管理它们。

在东部,游牧的征服者同时威胁着任何大的国家的霸权,在他们能够掠夺的继续存在的农业国家保持着很强的投入。当他们的数量很大并且力量太强,不再能寄生在现存国家时,其中的某些就逐渐定居下来,形成自己的掠夺性国家。在所有这些方式中,它们塑造了在 500 年后的一千年来国家形成的东欧模式。一个接一个地,它们呼啸着走出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Magyars)、佩切涅格人(Petchenegs)、蒙古人、土耳其人以及许多较小的民族。

来自东南的侵略一直持续到一千年之后,在 13 世纪 30 年代,当蒙古人洗劫了基辅并在其领地内建立霸权时达到其顶峰。在那个时刻,蒙古人正处于走向统治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从俄罗斯到中国的道路上。确切地说,在其大多数领地内。这种“统治”只不过包括要求正式投降、榨取贡赋、赶走权力的竞争对手和对合作不够的臣民们进行偶尔的军事袭击。然而在两个世纪里,俄罗斯君主们向金帐汗国(the Golden Horde)缴纳贡赋和表达敬意。金帐汗国将其首都定在伏尔加河下游。确实,金帐汗国的可汗们常常迫使统治俄罗斯的君主们的儿子们居住于蒙古的首都,从而为其父亲的表现起人质作用。(Dewey 1988:254)

从15世纪开始来自东南方的袭击的频度和强度似乎下降了,因为中央蒙古帝国崩溃了,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武装骑兵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沿着他们南部侧面的易受攻击的、富裕得多的国家。当鞑靼人(Tatars)在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时,他们无意识地标志着对俄罗斯的大入侵的结束。在17世纪,准噶尔蒙古人实际上在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中和俄罗斯人合作。非常可能在欧亚大草原的破坏性的疾病(特别是瘟疫)和欧洲开辟出提供替代古老的从中国、印度到欧洲的商旅之路的可行的航线的结合,减少了来自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对俄罗斯的国家创建者的威胁。(McNeill 1976:195-6)

到1400年,欧洲从维斯瓦河[(Vistula)波兰中部]到乌拉尔河(Urals)正在并入大的国家,包括立陶宛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共和国,和金帐汗国的领域。在西北方,条顿武士的普鲁士和一个暂时包括瑞典和挪威的丹麦统治着波罗的海地区。在16世纪的上半叶,辽阔的立陶宛和莫斯科的大公国分割了这个在穆斯林王国地带之上的从东部沿着黑海北海岸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希腊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或岛屿)(the Adriatic)的区域。(在1569年,立陶宛和波兰团结在一起,在其西方,在俄罗斯和欧洲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如果说是管理稀疏的——国家。)16世纪从英国和荷兰到阿尔罕格尔(Archangel)的北极航线的建立加强了欧洲和日益壮大的俄罗斯国家。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年)和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的征服把俄罗斯的边界决定性地推到了黑海和临时性地推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卡累利亚(Karelia)。这两位统治者都加强了俄罗斯对西欧的文化和政治的参与。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给欧洲人留下了俄罗斯(在有点像它现在的疆界内),和普鲁士、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帝国。土耳其国家,本身就是来自东方征服的产物,覆盖着巴尔干半岛,向西延伸和亚得里亚海沿岸交界的奥地利的领土的狭窄长条接壤。在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欧洲的整个东部边疆并入到声称控制着大片土地的国家中去。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把它们定位从东南转向了西北。和13世纪和14世纪的收取贡赋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对它们的边界行使着重大的控制和对国内的人口行使着强大的权力。

几个世纪以来波兰一直是证明该规律的例外,在这个国家中名义的统治者从不能统治大地主,很少能使他们参与到持续的协调的军事努力中来。在 18 世纪 60 年代,当波兰国家仍然占领着比法国的国土还要大的领土时,国家的军队只征召到 16 000 人,而波兰的贵族有大约 30 000 人在服役。这发生在每次当毗邻的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用 20 万到 50 万人的军队准备行动的时候。(Ratajczyk 1987:167)由于大量军队的形成,未能赶上你的强大邻国,或者未能和其中的至少一个结盟,就招致征服。在 18 世纪末期,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吞并了波兰的相邻部分,最终一点也没剩下。

在 19 世纪波兰再次成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牺牲品,但是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边界保持相对稳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解决把一系列的小共和国,加上大的波兰放到了新形成的苏联的西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把那些共和国的一部分带回到苏联的国家领土内,并把其余部分纳入苏联的轨道。从而讨论“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就是追溯着在霸权和领土之间的巨大的系列的变化。

在 20 世纪前,在上述领土上没有大的城市集聚,甚至在这片领土上也少有国家深入到欧洲大陆的贸易密集区。确实,在 1300 年后,随着旧的从中国到巴尔干地区商业带的收缩(以及它从而向北扩张到波罗的海地区),随着掠夺的蒙古人封锁通向地中海和黑海的通道,一度繁荣的包括基辅、斯摩棱斯克(Smolensk)、莫斯科的城市网络逐渐稀疏。16 世纪贸易的复兴增加了城镇,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像欧洲的西部和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密集的东西。俄罗斯国家在资本短缺的环境内形成。

那环境也是富于强制的。在 990 年后的五个世纪里,在欧洲的那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国家通过征服运行,依靠贡赋生存,并且主要通过那些有着自己权力基础的地区权贵进行统治(这词夸大了)。在蒙古人的霸权下,北方大体上独立的君主们把他们的主权分配给那些把对在其权限内的农民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融合在一起的地主们。在 16 世纪,随着蒙古国家的崩溃,俄罗斯人对南方和东方的征服带来了一种奖励武士土地和劳力、农民的强迫劳动、迁移权的限制和提高战争税收的制度;俄罗斯的农奴制的持久的显著特点开始出现。

直到那个时期,俄罗斯的皇帝们正在努力用不足的兵力统治辽阔的领土。他们通过拥有巨大的权力和保持着对皇家要求的制约能力的教会和贵族非常间接地进行统治。俄罗斯的沙皇伊万三世(Muscovite tsars Ivan III)(the Great, 1462—1505年)和伊万四世(Ivan IV)(the Terrible, 1533—1584年)通过削弱独立地主的权力开始建立起更为直接的统治;在那里他们通过他们的主要军官享受的帝国土地的赠与建立起附属于君王的军队和机构。

伊万[大帝]及其后继者,杰罗姆·布卢姆(Jerome Blum)报道说,下定决心要建立他们所需要武装力量来征服他们的同胞君王,来镇压他们自己的世袭贵族的寡头政治的野心,来避开外来侵略,来扩大他们的疆土。他们需要一支尽可能地依赖他们因而他们自己也可以依靠其忠诚的军队。但是他们缺乏资金来收买人员和所需的效忠。所以他们决定使用土地。(Blum 1964:170—171)

那就是精粹的强制密集策略。由于大多数需要的土地属于武装的、半独立的地主,沙皇的重组加速了和贵族的血腥的战争。沙皇赢了。在此过程中,享受帝国优惠的地主们获得了超过他们的反叛的邻居的信号的优势:他们能够指望政府的武装力量来安定他们土地上的否则就会无法无天的农民。因此在一个缺少资本的地区进行战争和创立国家的逻辑使得统治者用剥夺来的土地收买官员们。最终俄罗斯的统治者建立起只有国家的仆人才能拥有土地的原则;尽管例外和违规比比皆是,这个原则为官位的增加和为官员们和地主在剥削农民中进行合作提供了动机。

在西北,把小的地产放到追逐利润的官员手里增加了对农民的压力。伴随着在南方和东方的新的领土的开拓,这种压力引起了原来的定居农业地区的人口减少,这只是增加了通过地方习俗和皇家法令来安定农民的动机;所谓的1649年的集会法案(Assembly Code)通过立法确定了发展了两百年的农奴制度。此外,在16和17世纪奴隶劳动者,特别是在新的定居地区,继续在扩大。在18世纪中,为了从奴隶以及农奴中榨取收入,沙皇实际上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法律的区别。在一次失败的对个体农民课税的努力之后,彼得大帝使得地主们为灵魂税负责,这一行为加强了君主和地主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不要说地主用来对付他们不幸的农奴的

国家支持的权力。在 1700 年彼得诏令所有释放的奴隶或者农奴必须立即登记军事服务,如果被(某一主人)拒绝服务就要自缚到另一主人处。彼得同样培养了地位明显的贵族,完全通过为沙皇服务的等级来确定级别。在某种在西欧无法想象的程度上,俄罗斯获得了由国家确定的、支持的和统治的社会等级。

从上到下,社会关系的出现的结构决定于强制。由于俄罗斯国家开始认真地和其高度武装的西方邻居进行战争,从未商业化的经济中榨取必要的财政收入的努力增长了国家的结构。与此同时,对位于俄国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土地的征服扩大了军事机构,输出了农奴制和土地所有的俄罗斯模式,并且把帝国的官僚机构发展到它的充分的、笨重的形式。彼得大帝开始了消灭分裂主义,使帝国的所有部分——和它们的财政收入——服从俄国的规定和中央政府的伟大努力:

伴随着彼得的清除乌克兰的(Ukrainian)分裂主义的运动,是一个从哥萨克将军的职权榨取最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了对贸易路线的规定、国家垄断、对外国商品的关税和进出口税……彼得也开始大量地招募哥萨克人,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帝国的公共事务——建造运河、要塞,特别是彼得喜爱的工程——新的首都圣彼得堡。(Kohut 1988:71;也可参见 Raeff 1983)

凯瑟琳大帝通过直接废除半自治的哥萨克将军的职权完成了对乌克兰的兼并。然后这相同的机构发展到帝国的所有地方。改变了欧洲大部分的国家结构的拿破仑法国战争的挑战,加强的俄罗斯国家,扩大了它的预算、税收和人员队伍,扩充了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把它固定在深度强制的国家的位上。

以广泛相似的方式,俄国人的、波兰人的、匈牙利人的、塞尔维亚人和勃兰登堡人的国家是在交战的君王和武装的地主之间的坚固的联盟、政府转让较大的权力给贵族、对农民的共同剥削和对商业资本的有限范围基础上形成的。缺乏资本的征服力量的领导者不断地给他们的追随者以战利品和土地,没想到会面临着约束他们从而造成的大的武士-地主们的问题。蒙古人显然例外,因为他们很少定居下来管理自己的土地,而是常常继续依靠通过长期的毁灭性的侵略的威胁榨取来的贡赋生存。

尽管君主和贵族的相对分量(从而战争创造出持久国家结构的程度)因国家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所有这些国家在极大地信赖残忍的强制方面和它们的欧洲邻国形成鲜明对比。在16世纪,当大量的东欧谷物流向西方,当时的控制机构允许大地主直接从其运输中获利;他们利用国家权力来制约商人和强制农业生产者,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农奴制。在那种权力平衡中,甚至广泛的商业化也没有建立起城市、独立的资产阶级或者更加像那些处于城市地区的欧洲国家的东西。

西西里的经验奇怪地和东欧强权的对应。西西里几个世纪以来对所有地中海人来说是一个粮仓,丰富的粮食之源。然而它的阿拉伯的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强加给这个岛屿一个和军事上活跃的地主的联盟的体制,给城市和资本家留下很少空间。1208年开始掌权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使城市附属于他光荣的国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nis Mack Smith)报道说:

弗雷德里克对城镇的征服,有助于保证没有任何商人阶级或者市政官员足够独立和强有力来抗衡拥有土地的贵族;而这种缺乏对贵族的挑战将是西西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衰退的根本的因素。一旦强大的政府垮了,是贵族而不是地方城市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因此是外部的城镇——比萨、热那亚、威尼斯、阿玛菲(Amalfi)、卢卡(Lucca)——统治了西西里的商业。(Mack Smith 1968a:56)

那种外部对商业的控制继续了六个世纪,结果农业丰富的西西里仍旧缺乏资本并且屈从于强制控制。

我们开始看到在国家形成的强制丰富的道路中的一种既一致又有差异的模式。所有欧洲的高度强制的地区是从两个条件的某种结合开始的:(1)驱逐收取贡赋的强权的努力;(2)城市和集聚的资本很少。驱逐收取贡赋者在北欧国家相对不太重要。城市和资本的程度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比在东欧和北欧大。但是这种结合在每个地方都鼓励一种征服的策略,在此征服中领土上的地主既联盟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在自己领土上又相互争权夺利,伴随着大地主把对土地和劳力的控制转让给其同伙来交换军事援助。总之,那种策略给自治的资产阶级没有留下太大空间,从而影响了国家之外的资本的积累和集中。

在此差异开始出现。在某些地区(波兰和匈牙利是明显的例子)武士贵族保持着很大的权力,包括设立和废黜国王的能力。在其他地区(瑞典和俄罗斯是恰当的案例)单一的强权通过建立起给予贵族和神职人员相对于较为普通的大众更大的特权,但让他们为国家服务的国家机构设法建立起优先权。依然在其他地区(我想起了西西里和卡斯提尔)一个依靠从遥远的地产得来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贵族阶层(其较富裕较强大的成员居住在首都)和深入到各省并且依靠牧师和地方贵族的帮助实现皇家意愿的国家官员并存。然后,大的分界把第一个变量和其他两个分开——划分出在其中竞争的武装地主长期占上风的国家和在其中它们之一早就建立起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霸权的国家。在所有地区,国家成长起来,渴望资本,用国家保证的特权来交换国家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强制来确保服从皇家的要求。

第四节 资本主义的轨道

和佛兰德斯或者意大利北部的国家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考虑一下亚得里亚海的上半部分,从拉文纳(Ravenna)到的里雅斯特(Trieste)海岸线的弧线。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在经济上和在政治上统治着这一地区。但是在南面,竞争的强权争夺着对海岸地区的控制。例如,曾经是罗马人和哥特人(Goth)的居住地的拉文纳,作为共和国经历了这一千年,只是在14和15世纪处在威尼斯人的控制之下,从那之后直到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一直属于教皇的领地。在西面,众多城邦国家的地区屈服于威尼斯的14世纪的征服,通过伦巴第(Lombardy)给予威尼斯人的城邦帝国一个共同的前线——伦巴第开始是一个独立国家,后来先后为西班牙、奥地利和统一的意大利的领地。在北面,神圣罗马帝国和它的后继国家总是显得庞大,有时占有这海岸。在东面,帝国接着帝国风涌而起,直逼亚得里亚海沿岸。在990年,拜占庭帝国对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威尼斯地区实行了名义上的控制,与此同时基于中欧的边界模糊的“罗

马”帝国对意大利的邻近地方声称有主权。

为了简化复杂的叙述,让我们集中到威尼斯,并且简单地注意一下这个城市 and 所有那些竞争的强权们相互作用。我们将寻找:在资本的大的日益增长的集中和强制的弱小的分裂的集中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对任何企图建立自治的强制的权力的深刻影响;狡猾的、高效的、掠夺的、以保护为导向的航海国家的出现;那个国家最终被较大的陆上强权包围;简而言之,资本密集国家的精华。

伦巴第对意大利的入侵(568年)把船夫和盐工们的散居改造成为和大陆意大利有着紧密联系的一系列的难民定居点。当伦巴第人以及其后的富兰克人(Franks)霸占了大部分附近的领土时,威尼斯仍然是拜占庭帝国的名义上的一部分。直到990年,随着拜占庭帝国达到其顶峰时,威尼斯主要起了由拜占庭体系内的商人分发到意大利北部的货物的中转站作用。这个城市把自己的商人派到巴维亚(Pavia)和其他岛屿的市场,用来自东方的盐、鱼和贵重货物交换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然而,随着他们转向海边,威尼斯商人把奴隶和木材加入到他们的货物中。他们也把这个城市的商业的和政治的影响带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许多地方。

在那个时代的地中海,造船和航海的限制意味着船只紧靠着海岸,沿着由风、洋流和海滩决定的相对少的几条航线,常常加入对淡水和其他供应的需要,一旦他们遇上海盗要艰难地逃避他们,而且当他们远距离航行时只运得起昂贵的货物。(Pryor 1988)对远离其本土的许多港口没有广泛的特权,就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强大的海上强权。控制着许多港口的国家从其中获得了三重的回报:接近长距离的贸易航线、在那些港口的贸易、使用那些港口作为海盗掠夺其他强权商业的基地。曾经一度,威尼斯满足这些条件并且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海上强权。它为基督教国家从穆斯林的控制下夺取重要的海上航线贡献非凡,这开始于10世纪,一直没有衰退,直到14世纪土耳其人接近。只是在15和16世纪的土耳其强权的兼并才危及西方对地中海航线的控制。(Pryor 1988:172—178)

在11世纪,威尼斯的船队开始把它的贸易输入到地中海并同时击退对亚得里亚海(Adriatic)控制权的竞争对手——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匈牙利人、撒拉逊人(Saracens)、诺曼人(Normans)。在990年威尼

斯的军队吞并了达尔马提亚,但是在大约 1100 年又把它输给了扩张的匈牙利人的国家;此后五个世纪匈牙利人控制着达尔马提亚的商业活动,但是作为在东面的领土上的国家的扩张与收缩的一个函数,他们在政治控制方面时强时弱。由于在与其敌人的战争中和拜占庭皇帝通力协作,他们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额外的贸易特权,包括他们自己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总部(1802 年)。像在斯堪的那维亚和德国北部的汉斯(Hanse)商人一样,威尼斯商人逐渐掌管了大部分的拜占庭的远距离商业。在 12 世纪,他们把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地中海,有利地把贸易、海盗行为、征服和参与十字军东侵混合在一起。由于十字军东侵本身就结合着贸易、海盗行为和征服,那些活动相互补充。到 1102 年,威尼斯在西顿(Sidon)有自己的商业总部;到 1123 年它又在泰尔(Tyre)建立了一个基地。

在 1203 年和 1204 年,当一个狡猾的总督把十字军引向了君士坦丁堡,给了拜占庭帝国致命的打击时,威尼斯在它的结合策略上收到了回报。在君士坦丁堡抢夺来的圣马可(San Marco)的青铜马作为那次精心杰作的纪念碑仍然巍然耸立。威尼斯结果控制了过去帝国的大部分(合法地,八分之三)。这个城市然后把在希腊岛内的封地授给其大家族,只要他们保持贸易路线开放。

在所有的征服中,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占最大的优势。这个城市的名门望族是商人和银行家,这个城市的管理委员会代表着名门望族,总督来自那个相同的贵族等级,这个城市的武装力量招自自己的人口,而且它的军事的和外交的政策促进了商业垄断、对其商人的保护和整个威尼斯的贸易渠道的建立,而不是在领土上的帝国的建立。一旦威尼斯当局巩固了他们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就变得不愿意容忍海盗行为和许可海盗船,因为这两者都会威胁他们对和平的工商业的投资。

这个城市的海上统治进一步开拓了在安全运输货物和人员方面获利的新的机遇。威尼斯的运输业主通过运输十字军士兵,和然后把朝圣者运到圣地(the Holy Land)发了大财。在 1203 年把十字军士兵运输到君士坦丁堡的运输费用,“达到英国国王的年收入的大约两倍”。(Scammell 1981:108)而且,尽管有为十字军士兵和朝圣者的所有那些服务,威尼斯

的统治者并不在乎和基督教徒(christendom)的敌人打交道。例如,在的黎波里(Tripoli)(1289年)和阿克里(Acre)(1291年)落入土耳其帝国的土耳其人之手之后,威尼斯立即和土耳其帝国商讨了保持他们旧的贸易权利的条约。

在亚得里亚海区域,如果没有领土上强国的帮助,竞争的城市就不能坚持反对威尼斯。例如,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拉古萨同样是享有某种程度独立的贸易城市,但是没有外界的帮助它们也不能制约威尼斯。威尼斯在1203年征服了的里雅斯特,并且使该港口处于不舒服的奴役状态达一个多世纪。在的里雅斯特的1368年的不成功的反叛中,威尼斯的敌人、垂涎于的里雅斯特的开放的奥地利的利奥波德(Leopold)公爵派出了一支救援部队。在1382年,的里雅斯特成功地使自己处于利奥波德的霸权下。的里雅斯特从此留在奥地利(确实,一直是奥地利的主要港口)直到20世纪。

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Ragusa/Dubrovnik)遵循着大致相似的战略。拉古萨生活在名义上威尼斯的霸权下直到1358年,但是在此之前通过培养和邻近的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王国友好关系来保持相对独立,在它们的贸易当中,其商人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4世纪50年代,扩张的匈牙利把威尼斯从达尔马提亚赶走,给予拉古萨在其帝国周边几乎独立的地位。在15世纪60年代,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土耳其人夺取了巴尔干地区,拉古萨的商人贵族们设法和新的穆斯林统治者达成了相似的安排。由于它的连续的保护者使它避免了来自意大利的征服以及它的商业地位保证了它在斯拉夫(Slavic)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大的自治,拉古萨运行得像一个本质上独立的城邦国家直到1808年拿破仑的入侵。

尽管其供给线受到威尼斯统治的意大利城市和威尼斯对其实施直接控制的达尔马提亚的城市阻止威尼斯霸权的不断的努力,威尼斯最直接地和相同的远洋航海的城邦国家热那亚争夺海上霸权。在13世纪后期,热那亚以和威尼斯渗透到东地中海和黑海相同的方式,通过西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Gibraltar),沿着大西洋海岸扩张;但是热那亚以比威尼斯西扩更为有效率地东扩;这两个强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它们海域交汇的地方。热那亚在13世纪后期对黑海的控制阻止了威尼斯对可获利的和通

过蒙古占领的地盘从特立勃森(Trebizond)到中国的贸易的接近。然而,一旦威尼斯的力量在基奥贾(Chioggia)的潟湖封锁了和捕获了热那亚的船队(1380年),威尼斯在东方就保持领先。

在千年之后,随着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域和东地中海的贸易中的地盘的增长得更大,该城的人口迅速增长成为欧洲最大人口之一:1200年的80 000人或者更多,1300年的120 000人左右。尽管黑死病[由从喀发(Caffa)回来的热那亚的船队传入意大利]在1347年、1348年和1349年毁灭了该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居民的数量从此以后膨胀到大约120 000人,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从13世纪以来,制造业和商业代替航海业成了该城市主要的活动。但是威尼斯在海上贸易方面仍然是一个关键的联系,在海上政治方面仍然是一个强国。例如,它的帝国延伸到塞浦路斯直到1573年,延伸到克利特岛(Crete)直到1669年。这个城市的武装力量进行战争来保持和商业机会的接近,进行战争来甩开像热那亚那样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它的统治者获得了这样的名声,那就是他们有能力以对该城市的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来说相对低的代价进行节俭的和成功的海战。

威尼斯贸易的特性加速了一个格外反应快的和掠夺的国家的建立。不像荷兰人,他们从运输大量的产品,如谷物、食盐和酒类中获得财富,威尼斯人集中在高价的奢侈品上:香料、丝绸、奴隶。此外,他们常常运输大量的金块。因此效率、垄断和来自掠夺者的军事保护对他们的成功变得非常重要。“尽管其他的帝国强权可能把大量的精力和资源用于保护某个具体的垄断,”斯卡梅尔(G. V. Scammell)说道,“但是除了威尼斯,没有其他国家将垄断的运行和保护有效地变成了它们存在的整个目的,国家为垄断的运作提供船只,整个海军和帝国为垄断保驾护航”。(Scammell 1981:116)这样的国家尽可能少地打仗,但是一打仗就非常残忍。

总督们特别地对战争负有责任。早期的总督们都是拜占庭帝国的仆人。随着威尼斯建立起它对帝国的独立,总督们逐渐表现得像是当选的但从此以后至高无上的君王,表现得和社会没有任何形式的磋商,而且从自己的王室内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伴随着990年后城市的增长,威尼斯逐渐转向了正式的寡头政治。大家族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会员大

会选举总督。他必须向在理论上代表着由所有潟湖定居点形成的社区的委员会咨询,而在实际上为中心定居点的大家族说话。情况常常如此,当自称的君主面对着利益明确不同的群体而且没有其支持他就不能统治时,一个正式的委员会就开始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的委员会变得越来越专门;在1297年,委员身份本质上变成了世袭的。在1300和1310年,委员会击退了流行的对把非贵族排除在它考虑之外的反叛。从这时开始,寡头政治的成员们为了在城市内的卓越地位而努力,但是从未放弃对城市命运的集体控制。

确实,不是单一的管理委员会,连续的权力斗争产生了一个变动的委员会等级,从总督自己的顾问到所有居民的会员大会,现在后者演变成批准他们上级的决定。另一方面,威尼斯没有隐匿官僚机构;当选的委员会和官员们的家臣们做了大量的政府工作。到1200年,总督成了寡头政治的执行官而不是由普遍赞成挑选出来的独断独行者。结果,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支配着威尼斯国家国内和国外的政策。

如果商业利益引导威尼斯,国家依次规范其公民的商业活动。

出差到累范特*,威尼斯人,丹尼尔·韦利(Daniel Waley)这样说道:可能走进一艘由国家选定的船长指挥的国家建造的大船,在国家组织的护航范围内,当大船到达亚历山德里亚或者阿克里,他也许会接到命令去和其他威尼斯人一起参与国家组织的联合的棉花或胡椒的购买。后一体制的优势就是如果威尼斯人不相互竞争的话,价格可以保持较低。这种为较远的航海护航的体制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到13世纪这种常规做法可以安排一年两次对到东地中海的大船的护航,到14世纪初已经有了一年一度的航行到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到北部非洲(“Barbary”北非伊斯兰教地区)和艾格莫尔特(Aigues-Mortes)[法国普罗旺斯地区,接近罗讷河(Rhone)的出海口]。兵工厂即国家造船厂可追溯到13世纪早期,那里所用的材料

* 地中海东部地区。——译者注

** 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译者注

通常由威尼斯共和国直接购买。(Waley 1969:96)

国家,即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非常认真负责。然而威尼斯国家并不庞大。其财政体制使其成为精简的政府。例如,在 1184 年,威尼斯建立起对来自基奥贾(Chioggia)潟湖的盐的生产和销售的垄断;尽管这一垄断促进了小规模走私和假冒,它也产生了可观的收入而无需大量的人力。从 13 世纪开始,这个区域建立起固定债务。蒙特韦奇奥(The Monte Vecchio)债券以及继承它的其他蒙蒂(Monti)债券(有价证券代表固定债务)成了在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受欢迎的投资。该城市借债来支持战争,然后依靠进口税和货物税来偿还债务。大的宗教慈善协会、同业公会(the Scuole Grandi)借了大量的钱给国家。(Pullan 1971:138)由于国家可以从自己的商人处借钱并且对广泛的商业化的经济的流通征税,它很少创立新的用于财政目的的组织。

威尼斯在 14 世纪更深地陷入了陆地战争,并且建立起相应的国家机构。由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国家开始扩张它们的领土,它们威胁到威尼斯在大陆上工业供应的来源,也威胁到威尼斯商人利用横跨阿尔卑斯山脉的至关重要的贸易路线的通道。威尼斯人开始了两个致命的游戏:对大陆的征服和转向与其他意大利北部强权结盟。到此世纪末,当横跨阿尔卑斯山脉的强权开始严重地侵入意大利北部时,威尼斯正在组织反对法国的联盟,和诸如卡斯提尔国王、德国皇帝联合。一群长期的大使被分派到欧洲主要的宫廷。土耳其人在东地中海周围的推进,甚至推进到意大利,同时把这城市拖进了日益增多的海上战争。

扩大的战争规模在该城市用于战争的组织方面引起了变化。威尼斯第一次把战争委托给外来者——雇佣军,它大量地雇用雇佣兵。政府通过派出贵族专员(proveditori)来平衡雇佣军的影响。贵族专员对供应、报酬以及有时对军事策略本身有着广泛的权力。(Hale 1979)不久以后,该城市求助于在其附属领地和威尼斯本地的招募,那里的工匠和鞋匠同业公会会收到为战船提供桨手的名额。在 15 世纪,威尼斯开始强迫罪犯和俘虏来充实战船人手;在此过程中,战船从需要三个熟练的划手每人执桨坐在每一座位的三层桨座的战船,演化为每个座位一个大桨的战船,在此座位上甚至不熟练的、不情愿的甚至上了镣铐的犯人也能派上用场。

从此运用所有自愿力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战争的扩大和不再使用市民战士给该城市带来了新的财政负担。到14世纪末期,威尼斯已经征收强迫借款、收入税和直接的财产税来支付其战争导致的债务。然而,这些额外的努力并没有建立起庞大的或者永久性的官僚机构;在高度商业化的经济中,选举出来的官员和少量职业的秘书和干事群体管理着该城市的账目,无需大量的人员。国家把许多责任分给市民,就像它们要求同业公会自己筹集部分战争舰队的经费一样。(Pullan 1971:147—156; Lane 1973b:163) 财政的债务也没有压垮该城市的财政机构。在17世纪初,当其他欧洲国家在痛苦地积累起战争债务时,威尼斯实际上成功地临时清偿了它的整个长期债务。(Lane 1973a:326)

早在1600年前,该城市商业权力的顶峰就已过去。从15世纪开始,一连串的变化把威尼斯降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二流演员:土耳其把威尼斯从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港口排挤出来,威尼斯的领土几乎被哈勃斯堡、波本(Bourbon)和土耳其人的帝国包围,威尼斯利用木材途径的减少,以及由此导致的造船业的衰退,它控制达尔马提亚能力的减弱,还有大西洋海上强权如荷兰和英国的在地中海的竞争及附带的海盗活动。通过绕道航行非洲和渗透到印度洋的贸易路线,葡萄牙商人打破了威尼斯人对香料贸易的钳制。在16世纪末,葡萄牙船队运输了欧洲人从远东贸易来的所有香料和药材的四分之一到一半。(Steensgard 1981:131) 然而,葡萄牙人的优势没有持续很久;在一个世纪内,组织效率高的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Dutch and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ies)就已经取代了其伊比利亚对手。

庞大的武装的帆船进入地中海地区粉碎了威尼斯大船的长期的霸权。此后,威尼斯仍然保持繁忙和独立,越来越多地从事制造业和它的大陆领土的管理,但是不再是地中海的领导力量。甚至在曾经是该城市的私家湖泊的亚得里亚海域内,16世纪的威尼斯船队已不能控制竞争的拉古萨商人或者阻止海盗的掠夺。在18世纪,威尼斯人已放弃从他们的海湾排除外国战船的努力。到那时,不仅仅拉古萨而且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安科纳(Ancona)都在拼命地竞争亚得里亚海的贸易。

威尼斯满足于军事和外交中立的总的策略,重要的商业小环境

(niche),日益增加的对作为经济基地的内陆领土依赖,以及由旧的寡头政治统治的共和国的公共生活。“处于政治独立和商业成功的艰难抉择之间,”阿尔伯诺·特南蒂(Albero Tenenti)这样总结 17 世纪,“在其关于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中,威尼斯自豪的决心仍然在其所有错误的低劣的行为中闪闪发光。不是选择一种没有风险没有历史的生活,像其邻居拉古萨一样,这个古老的城邦国家拒绝向任何强权的优势让步,不管它是土耳其人的或者罗马教皇的,西班牙人的或者哈勃斯堡的”。(Tenenti 1967: XVII—XVIII)

然而,这一选择最终失败了:1797 年,拿破仑的人侵终结了这种 18 世纪的满足。威尼斯及其内陆领地先是成了奥地利的,后来是拿破仑的意大利王国的,然后又是奥地利的领土。1848 年,一群由丹尼尔·马宁(Daniele Manin)领导的起义者曾短暂地掌权,但是奥地利很快就使那些革命的国民就范。最后,在 1866 年,普鲁士打败了奥地利,解放了威尼斯,使其加入了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

威尼斯遵循着独特的历史轨道。然而该城市的历史和热那亚、拉古萨、米兰、佛罗伦萨甚至荷兰、卡塔卢尼亚(Catalonia)或者汉斯有某些共同之处。毕竟在 14 世纪,巴塞罗那派出商人往来于地中海,统治了底比斯(Thebes)、雅典(Athens)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荷兰共和国(贸易中心的一个频繁吵闹的联盟)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是欧洲强国之一。城邦国家、城邦帝国和城市联盟作为商业和政治强权都维持了几个世纪,它们高度重视商业目的,创造了没有大的官僚机构的有效率的国家体制,发明了相对充足的偿付战争和其他国家开支的方法,而且在它们的国家组织中建立起代表它们商业寡头政治的制度。

资本密集型国家的形成在三个根本方面不同于强制密集的以及资本化强化的演化道路。(1)商业寡头政治的影响促进了围绕着商业的保护和扩张——在欧洲经验中特别是为海上贸易而组织的国家的发展;(2)资本家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而创立的制度实际上有时成了国家管理的工具;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共和国达到了市政和民族政府的显著的融合;(3)资本和资本家的可用性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借贷、征税和购买,可以有效率地进行战争而无需创建庞大的持久的国家管理机构。直到国内征募

的陆军和海军从事的战争的纯粹规模压倒了它们的高效但是紧凑的军事力量,资本密集的国家在好战的世界中兴旺发达。在梅迪奇(Medici)之后不久,在罗马教皇的军队的帮助下,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回去统治他的故乡佛罗伦萨,他写道:

如果某人想在一个有许多绅士的国家建立一个共和国,除非他把所有绅士都消灭掉他才会成功;不管谁渴望在自由和平等盛行的地方建立一个王国或者公国,他同样会失败,除非他从全面的平等中除去许多最大胆的最雄心勃勃的精神,并且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通过给予绅士城堡、财产以及金钱和臣民,用改造后的精神来塑造绅士;因此在这些条件下,他才能够保持他的权力,通过他的支持他们才能够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而其他入也许会被迫服从迄今只有武力才能使他们服从的那个束缚[Discourses, I, 55;我是从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处得到该适当的参考的]。

尤其重要的是,绅士们——也就是说,贵族地主们——支撑着强制密集的国家,而资本家——也就是说商人、银行家和制造商们——支配着资本密集的国家。它们经历中的差异取决于它们在什么时候形成,它们企图控制多大的领土,农业和制造业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了它们经济基础上的重要部分,以及它们“特产”什么样的商品。

这些因素依次取决于在每个国家内核心城市的地理的和地理政治的位置。大片农业边远地区的存在,当它出现时,促进了更大领土的国家的形成。主要起着长途贸易的市场作用的港口城市更频繁地在较小国土上创造出城邦国家或者城邦帝国。毗邻大的帝国和民族国家有利于吸纳进那些国家或者进入相同的控制领土的斗争。然而这些差异运行于由资本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存在所设立的界限内。

第五节 资本化强制的轨道

显然,并非所有亚得里亚海上半部分地区都同样能很好地说明在国

家形成中的资本主义道路。奥地利最终成功地夺取了包括的里雅斯特的这个海岸的大部分,并且将其从属于在其他地方有很大的强制利益的国家。拜占庭、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土耳其帝国都和威尼斯争夺对达尔马提亚的控制权,而且土耳其人赢了——至少有几个世纪。然而,亚得里亚海上半部分地区的历史和欧洲俄罗斯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亚得里亚海地区,大量的资本加速了武装力量,特别是海上力量的建立,但是也为资本家抵制可能使他们利益服从王朝利益的大的国家的创建提供了动机和手段。在俄罗斯,集中资本的稀少(特别是在 14 世纪和亚洲、拜占庭帝国的贸易联系缩减之后)和武土地主的存在预先决定了形成的所有国家趋向强制手段。在那里大的问题是到底巨头们继续在他们众多的手中掌握分裂的主权,还是由单一的统治者设法建立高于所有其他人的坚实的优先权。一旦俄罗斯国家选择了武装力量的集中创建,它的努力就导致了一个庞大的国家产生,在这样的国家里,地主在自己的领地里保持着很大的自主权,但是面对沙皇就失去了自主权。

农民(在 18 世纪前在欧洲的几乎每个地方的人口的大多数)的命运在强制密集地区和资本密集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强制密集的国家形成的大多数地区,统治者和拥有广泛的军事的和民间的权力的大地主紧密协作创造出国家。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就是这个过程的例子,在西西里和卡斯提尔也有某些类似。在这样的国家里,16 世纪的贸易扩张鼓励并促使地主(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把农民(从其身上他们以前收取了充足的租金)变成农奴;最常见地,他们需要来自从法律规定其所属的小块农田谋取生存手段的耕种家庭在地主的领地上极低报酬的劳动服务。在地主从未获得东欧地主那样的经济、政治权力的其他强制密集地区(特别是在斯堪的那维亚),16 世纪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在神职人员和其他的官僚的帮助下建立了对农民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了谋生的农民的长期生存。

在资本密集地区,如荷兰和瑞士的某些地方,农民经历了分化。在有城市市场和生机勃勃的资本家的地方,农业很早商业化并且和农村的工业结合在一起。结果少数农民依靠经济作物和其邻居的劳动而致富。大多数成了贫穷的工资劳动者,当需求上升时许多这样的工资劳动者在国

内制造业和摊贩业翻了一倍。伴随着无处不在的商人,少数人和多数人创造了有助于充足的税收,能够轻松地供应城市,处于作为地区的贸易中心的城市控制之下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资本密集地区和强制密集地区的国家形成的这些不同轨道的原因和结果。

在资本的和强制的两极之间有着资本化强制的道路,这可在强制聚集和资本聚集在更大的相等的程度上发生、并且两者有更紧密联系的地方找到例证。不列颠群岛——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说明了这种道路。它们也表明在强制-资本图表中的经验的定位在多大程度依赖于我们加在经验上的时间的和地理的限制。从990年的丹麦来看,不列颠群岛就像在一个以斯堪的那维亚为中心的庞大帝国内的一个征服的和贡赋的周边地区。从那个时间以后时期的爱尔兰来看,在不列颠群岛的国家形成有着比从英格兰的东南部来看的更多的强制色彩。从1500到1700年代的苏格兰来看,国家形成就像三个有着不同经济基础的非常独立的国家——英国、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竞争和相互作用。那么,要清楚,我们正在考察990年后的一千年内的整个地区。在这整个千年里,主要的戏剧就是开始由征服形成但不久就由大港口和商业化的经济所平衡的英国国家的扩张。

在990年,爱尔兰陷入了众多的凯尔特人的(Celtic)王国和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沿海统治的斗争之中。尽管众多的北欧征服者瓜分了北海的岛屿,内陆苏格兰和威尔士在武士国王的统治下或多或少是统一的。一个名叫克努特(Canute)的丹麦人正在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手中夺取联系很弱的英格兰,后者已经向丹麦人付了十年的贡赋。不仅是交纳贡赋,而且遭受持续不断地掠夺。在其997年的条目中,罗德编年史(the Laud Chronicle)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年,[丹麦的]主人绕过德文郡(Devonshire)进入塞文(the Severn)河口,并且在威尔士(Wales)的康沃尔(Cornwall)和德文郡进行了掠夺,然后在沃切特(Watchet)登陆;他们杀人放火造成严重破坏,然后往回绕过兰兹角*到南边,进入特马尔(Tamar)的河口,再

* Land's End,英国的天涯海角。——译者注

溯流而上直到他们来到利德福德(Lydford)。在那儿,他们放火焚烧和杀死遇到的所有东西,他们烧毁了在达维斯托克(Tavistock)的奥德沃尔(Ordwul)修道院教堂,把数不清的抢夺来的物品装上船。(Garmonsway 1953:131)

正当其他的斯堪的那维亚人航海到冰岛(Iceland)、格陵兰岛(Greenland)和美洲时,克努特和他的袭击者暂时地把英格兰变成了延伸到丹麦和挪威的收取贡赋的帝国。新的领地非常有价值:在那时,都柏林(Dublin)有大约 4 000 居民,约克(York)有 10 000 居民,诺威治(Norwich)有 4 000 居民,伦敦有 25 000 居民,远大于任何斯堪的那维亚城镇。约克是联系斯堪的那维亚的重要环节,伦敦则是联系世界其他地方的纽带。虽然不是和城市网络精确地十字交叉,这些岛屿和大陆欧洲的城市联系密切。

仅仅 60 年之后,诺曼人[定居在高卢(Gaul)的早期斯堪的那维亚武士的后代]组织了对不列颠又一次侵略。他们对英格兰的征服遵循着把封地内的土地分配给成为皇家地区代理人的(和潜在的对手)士兵的典型模式。这减缓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入侵,并且开始了英格兰的统治者在不列颠内外扩张其领地的过程。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诺曼-英国和苏格兰的军队实际上在不列颠岛屿消除了丹麦人和挪威人的领土控制权。由于联盟和继承的运动增加了“英国人”在后来成为法国的地方的占有,英格兰的统治者开始和他们的诺曼堂兄弟交战。在 12 世纪,他们也试图把他们的统治延伸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1152 年借助和阿吉丹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的婚姻,亨利二世(Henry II)牢牢地掌握了对英格兰、诺曼底、缅因(Maine)、布列塔尼(Brittany)、安约(Anjou)、阿吉丹(Aquitaine)和威尔士大部分的统治,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把这种统治扩大到英格兰和部分爱尔兰。在他管理帝国时,他建立起相对有效的皇家司法组织。然而从 1173 年起,他的儿子开始和许多贵族联盟,有时甚至和皇后联盟来争夺他的权力。

在交战和干预王朝敌手的过程中,英国国王所赖以进行战争的贵族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对抗国王以及其他的人,从君主处要求特许的让步——最引人注目地是在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里。1215 年的大宪章要求国王停止榨取作为进行战争资金的封建义务,当贵族们不打仗时

停止租请雇佣军,只有在大的参议会、巨头们的代表同意下才能征收大的税收。这参议会开始运用持久的权力,特别是它在对新的征税的赞成中的地位有所增强。后来的国王们反复地批准这个宪章。然而英国君主创建武装力量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产生了持久的中央机构:皇家国库、法庭和领地。

例如,爱德华一世(Edwar I)(1272—1307年)把义务的骑士身份扩大到所有拥有价值一年二十磅的土地的人,要求所有的骑士为皇家民兵服务,建立支付步兵的税收,对羊毛和皮革征收早期常规关税应付款,组建一支永久性的中央人员队伍来接管某些以前由贵族们和国王的个人随从们从事的活动,规范那些给他钱财的贵族们、郡县骑士们、有选举权的市民们和神职人员们的独立集会。[在1294年,为了准备在法国的另一场战役,爱德华竟对羊毛征收6倍的出口税并且要求神职人员用一半的收入纳税。(Miller 1975:11-12)]在14世纪中央国家机构的创建还在继续:不仅仅皇家朝廷把他们的权限延伸到整个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而且治安法官们作为朝廷委任的代理人开始掌握地方权力。

中心倒不是一直稳定。毕竟,爱德华二世(Edwar II)死了,被杀害于监狱(1327年),爱德华三世(Edwar III)实际上毫无权力地寿终正寝(1377年),废黜的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死于监狱——也许也是被谋杀的(1400年)。兰开斯特(Lancaster)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了王权打了30年的内战(玫瑰战争,1455—1485年);战争最后以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被亨利·都铎(Henry Tudor)的军队杀死而告终,亨利·都铎因此成了亨利七世(Henry VII)。争夺王权和皇家继承权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个世纪,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使奥兰治王朝(the House of Orange)得以建立。

与此同时,英国的国王们不断地试图掠夺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和法国的领土。爱德华一世(Edwar I)迫使威尔士就范以及使爱尔兰和苏格兰在名义上服从英国王朝。威尔士人只是进行了又一次较大的起义,欧文·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的起义(1400—1409年)。然而,爱尔兰人和苏格兰都顽强地抵抗英国的统治,并且经常获得高兴看到其英国对手被不列颠群岛内的军事活动而分心的法国国王的支持。在抵抗的过

程中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和英国议会有些相似的议会。两者都经历了血腥的内部争夺皇家继承权以及国王和贵族之间相对权力的斗争。当爱尔兰还是一个桀骜的殖民地时,英格兰成了一个有着自己权利的独立的欧洲强权。直到 17 世纪爱尔兰和苏格兰才屈服于相对稳定的英国控制。

英国国王长期的最终失败了的保持其法国财产的努力使得这个国家从 1337 年到 1453 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交战状态。那个努力[后来称为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的财政需求加强了议会的地位,并且规范了其两个议院的划分。在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后,反对苏格兰和法国(有时是两国一起)的战争把议会卷入了皇家资金的筹集,并且建立了其赞成征税的权利。

下议院,后来被称为国会下院,集中了区和县的代表,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是商人,另一方面是地主。商人和地主之间的一种长期的(如果说是不稳定的)联盟始于 13 世纪,当时英国的羊毛开始供应大陆的纺织加工业,并且成为在英国的纺纱业和织布业的基础。英国开始了缓慢但是决定性的从出口羊毛到制造和出口毛纺织品转移。从那时开始,英国商人定居在佛兰德(Flander),并且开始扩散到欧洲其他地方。在 15 世纪,英国人同样证明了自己是海上强人;例如大约在 1412 年东海岸的水手重新打开了大陆和冰岛的贸易。(Scammell 1981:460)1496 年的一个商业条约("The Intercursus Magnus")确立了英格兰为在佛兰德的国际贸易中的公认的伙伴。尽管在后一个 50 年内外国商人和船队统治了英格兰的贸易,到 1600 年,英国人在全世界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竞争。

在此相同的时期,英国的航海家,如和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他自己碰巧是一个威尼斯人)一起航海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人开始参与荷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世界遥远地方的探险,以及参与为全世界范围的贸易帝国奠定基础的活动。到 1577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正在环球旅行。皇室参与这些冒险是因为它们可能增加政府收入或军事力量。(Andrews 1984; 14—15)英国的地主,在法律支持的围圈旷野和共同土地的帮助下,大量地参与羊毛和粮食的买卖;众议院逐渐地成了商人和经济作物土地主人间的紧密联盟的代表,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商业力量加速了国家权力的增长;它使得亨利七

世(Henry VII, 1484—1509年)和后来的都铎王朝(the Tudors)能够阻止英格兰人、挑战法国人、扩大国家的交战力量、扩展税收并且削弱大地主的私人武装。

亨利七世的脱离罗马、抢夺教会的收入、征用修道院(1534—1539年)提高了皇家的收入,使合作的神职人员和皇家利益联系在一起。都铎王朝的扩张也激起了地区的不断反叛,包括优雅的朝圣者(Pilgrimage of Grace)(1536年)。然而,都铎王朝最终遏制了大贵族,以及他们的私人军队和对自治权力的主张。(Stone 1965:199—270)这个国家的几乎不停息的商业化、无产阶级化和经济扩张为国家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且国家对关税和国内税收的依赖使得从这个基础榨取资源更为有效率——但是只是在富豪、皇家和议会能够争吵出一个合作协议时。

在16世纪,苏格兰和法国更加接近了。当年轻的苏格兰人的玛利亚女皇(Mary Queen of Scots)也成为法国女皇时(1559年),这两个王国接近合并。但是这之后的新教徒的反叛制约了玛利亚在苏格兰的权力,她曾在激起另一次起义而且逃到英格兰被伊丽莎白(Elizabeth)保护拘留之前在那里不稳定地统治了6年;她在1586年被斩首事件结束了法兰西苏格兰和天主教的英格兰女皇的威胁。然而在伊丽莎白去世时,玛利亚的儿子詹姆斯(James)(自从1567年后他曾经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作为詹姆斯一世继承了英国王位。和法国的联系几乎烟消云散。

在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和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族(Stuarts)的统治下,英国为了筹集皇家财政收入以应付大陆战争的内部斗争、国王们希望不要议会来进行统治(而且,特别是收税)的努力,以及最终一场内战导致了詹姆斯一世走向断头台。作为时代的一个特征,在1627年查尔斯把最后一块皇家土地让渡给伦敦市,为此他获得了取消过去债务以及进一步的贷款;从此他的信誉扫地,而且他对贷款和税收的要求只是加剧了和议会、金融家们的冲突。到1640年他开始夺取为了安全保存而留在伦敦塔内的金银,并且开始和为了获得海关税收保证的贷款而抵押那些金银的金匠、商人讨价还价。(Kindleberger 1984:51)查尔斯组建和控制军队来镇压爱尔兰境内的反叛和苏格兰境内的抵抗的努力使他筋疲力尽。在英联邦和保护国时代(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1649—1660

年),军队的不同部分和议会的不同部分在试图使爱尔兰和苏格兰回到国家控制并且和西班牙、荷兰进行战争的同时,也统治了这个国家。由军队激起的议会对查理二世的邀请导致的回归时代(The Restoration)巩固了不列颠国家内的议会的权力,特别是当它涉及财政收入和财政开支时。当英国继续在海上和荷兰进行战争时,皇家事务和大陆战争的紧密的相互依赖继续伴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回归。1688 年的革命带来了联盟的戏剧性的反转;它把荷兰新教徒奥林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他的妻子、约克公爵的女儿玛利亚送上了王位宝座,而法国的路易十六(Louis XIV)却支持流亡的斯图亚特王族。此时不列颠回复到其历史上的和法国为敌,并且在此过程借鉴了荷兰的制度。这个国家在 1694 年建立了英国银行作为支持始于 1688 年的和法国的战争的工具。(Kindleberger 1984:52—53)伴随着革命的结束和英国在大陆的军事参与的恢复,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不列颠开始形成实质性的常规军队,有效率的中央官僚机构开始成形,批准税收的国会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获得了相对于国王和他的部长们的权力。(Brewer 1989)

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不断发生的起义再次——常常涉及对英国王位的竞争主张者,更不用说法国的微妙之手——消耗了国家的参战力量。战争和王朝斗争结合在一起使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稳定的联盟(1707 年)、德国的汉诺威家族(house of Hanover)[后来重新命名为温莎公爵(Windsor)]最终登上国王宝座,以及在君主和强有力的代表这个国家的拥有土地者的和商业的利益的议会之间的暂时妥协(modus vivendi)的达成。一次代表斯图亚特王族王位争夺者的反叛(1715 年)彻底地失败了,同样标示着对在大不列颠的皇位继承最后的大大的威胁的 1745 年的第二次反叛也失败了。英国的军事力量继续增长:“到 1714 年,英国的海军是欧洲最强大的,它雇佣了比在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行业都要多的工人”。(Plumb 1967:119)和它的大陆邻国相比,由相对小的中央机构管理、由广泛的受保护者和地方权力拥有者系统补充的英国国家,在这个系统中郡治安长官、州长、市长、警察和治安法官做着皇家的的工作却不必成为它的全日制的雇员;在拿破仑战争之前,只有关税和国内税收支持着若干常规任命的官员。到那时为止,英国没有维持一支

常规的军队,特别是依赖于战时海军力量的动员来充实其武装力量。除了在爱尔兰,在控制英国国内百姓方面,这军队起着相对较小的作用,而民兵起着相对较大的作用。在它整个霸权时代,英国政府继续在爱尔兰部署武装力量并且继续试验新的维持治安的方法;确实,英国通常把爱尔兰作为这个国家后来引进到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维持治安技术的试验场。(Palmer 1988)

大不列颠继续在欧洲进行战争并努力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建立帝国;反对法国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1763年)的结果是英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美洲殖民地的丧失(1776—1783年)并没有像以前的失败那样威胁国家权力。为了和法国战争的不断动员,特别是在1793年到1815年,极大地扩大了征税、国债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同时引起了从国王及其大臣的影响到议会的影响微妙的但是确定的转移。在那些战争中(1801年),大不列颠把爱尔兰(不是明确地,但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合并进了联合王国。到19世纪初,(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已经成为由地主、金融家和商人统治的议会君主制的真正的典范。

帝国的扩张通过19世纪的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进行。在英国,国家朝着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方向做出了决定性的转变:在前几个世纪国王和议会常常颁布立法来管理食物销售、集体行为的控制、穷人的待遇和工人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几乎总是依靠地方权力来推动和执行。在英国比其许多大陆邻国在更大程度上保持着地方权力的同时,在19世纪国家官员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维持治安、教育、工厂监察、工业冲突、住房、公共健康和大量的其他事务中。日益增长地但是决定性地,英国国家转向了直接统治。

尽管民族情绪的偶尔动员,威尔士和苏格兰此后很久不再威胁分裂英国国家。但是英国从未成功地融合,或者说驯服大部分爱尔兰。爱尔兰的抵抗和反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达到了顶峰;通过几个步骤,几乎新教和英国化比较严重的东北角阿尔斯特*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

* Ulster,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译者注

在英国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内,然后终于在其之外。在阿尔斯特内部和为了阿尔斯特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尽管在回顾中,大不列颠常常作为一个政治稳定的典范,对不列颠群岛的国家形成的仔细考察表明强大的党派为控制国家而战是如何地持续不断,发生在暴力中从一个政权到另一个政权的变迁又是多么地频繁。爱尔兰的经验展示了该地区沿着强制密集的道路创造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的能力。然而英国国家在 18 和 19 世纪统治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而且今天还是一个世界强国。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或者甚至是个综合)。

英国的,然后是大不列颠的国家建立在资本和强制的联合之上,这种联合从很早就一直给予每个君主利用巨大的战争资源的途径,但是仅仅以对这国家的商人和银行家大的让步为代价。在地主和商人之间的不稳定的联盟限制了皇家的自治,但是加强了国家的权力。商业化的农业、广泛的贸易、帝国的征服以及反对欧洲竞争强国的战争相互补充,促进了对海军力量的投资以及动员陆地力量用于海外军事行动的准备。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商业化意味着用于战争的税收和贷款进行得更加容易,而且比在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涉及更少的国家机构。亚当·斯密(Adam Smith)根据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简单比较表达了这种意思。他写道:“在英国,由于政府处于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商人通常就是那些给政府提供资金的人们……在法国,由于政府不是处于大的商业城市,商人在给政府提供资金的人口中没有构成那么大的比例。”[Smith 1910(1778): II, 401]在这一点上,英国比法国更接近国家形成的资本密集道路。英国形成了易于利用资本和高度地依靠地主对王国进行日常管理之间的显著的结合。尽管革命前的法国同样依靠贵族和牧师来进行大量的地方管理,从较少资本化和商业化的经济中榨取战争资源的努力建立起一个比在英国要庞大得多的中央国家机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威尼斯或者俄罗斯,我们立即就能看出在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强制关系的巨大相似之处。我们习惯于对比英国、法国、普鲁士和西班牙的轨道,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的选择性类型。然

而,在整个欧洲范围,这四个国家有着明显不同于资本密集和强制密集道路的共同特性。在这所有四个案例中,雄心勃勃的君主(成功程度不同地)试图建立军事力量来镇压或者阻挠代表集会如16和17世纪的地方议会(provincial Estates);在法国和普鲁士,议会屈服了,在西班牙议会摇摇欲坠,在英国,国会却作为统治阶级的壁垒幸存下来了。在这所有四个案例中,强制中心和资本中心的耦合,在当庞大的耗资巨大的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给那些有能力创造它们的民族国家在寻求霸权和帝国之中以压倒优势的时代,加速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创建。

为什么威尼斯或者俄罗斯没成为英格兰?这个问题并不荒谬;它是根据这种认识:欧洲国家总体上走向资本和强制的更大的集中,会聚于民族国家。部分的答案是:它们成了。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罗斯的国家意大利的国家比它们两个世纪前的一个世纪的先辈有着多得多的民族国家的显著特点。但是更为深刻的回答是它们以前的历史笼罩着它们。威尼斯创立了一个屈从于商业贵族阶级利益的国家,那个贵族阶级在寻求欧洲商业体系的空隙中,而不是通过在建立庞大的持久的军事力量的任何努力中进行合作,找到了它的优势所在。俄罗斯创立了一个由假定的贵族领导,但是整个地依靠地主们(他们自己的利益决定了拒绝把农民的劳动和产品用于国家的目的)的合作、依靠能够轻松地消耗国家所产生的任何过剩的官僚机构的国家。不同类型的革命——复兴运动*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夺取政权——把威尼斯人和莫斯科人带进了变得越来越像西欧大的民族国家的全新国家。但是即使后来的国家也带有其以前身份的标志。

G.威廉·斯金纳的关于中国的示意图,动态地看,为欧洲经验提供了敏锐的洞察。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武装力量的建立及其组织的结果,作为资本和强制、剥削和统治的“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体制的、城市和国家的相对权重的一个函数,从欧洲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是如何地不同。尽管所有国家把主要精力用于战争和战争准备,超出那个共同

* Risorgimento, 19世纪为解放和统一意大利的运动。——译者注

之处,它们的主要活动根据它们在资本和强制的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以前的历史而有所不同。而且即使相同的活动也根据它们发生的地方和时间不同而留下了不同的组织残余。然而,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日益决定每个具体国家的结构和活动。由于它们在把国内资源转化为国际战争中的成功的优势,大的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欧洲政治实体,以及作为国家形成的典范取代了收取贡赋的帝国、联邦、城邦国家和所有其他竞争者。那些国家最终规定了欧洲国家体系的特点,成了这一体系向全世界扩张的先锋。

第六章

欧洲国家体系

第一节 欧洲国家的联系

土耳其海军力量把威尼斯从东地中海赶走,并且加速了这个城邦帝国作为主要的军事强国的下降。当好战的土耳其人开始从亚洲的大草原涌入欧洲时,他们就像许多他们的好战的邻居一样是限制在陆地的游牧民族。但是一旦他们达到了黑海和地中海,他们迅速地学会了造船和航海。而且,在15世纪他们开始在欧洲人前所未见的规模上使用火药。他们把恐惧扎进欧洲人心里因为他们既赢得了殊死战斗的海上胜利,也赢得了陆地上的野蛮的征服。似乎没有人能避开那些凶猛的掠夺者。到15世纪,他们挺进到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也威胁了意大利和奥地利。

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夺取(1453年)清楚地威胁了威尼斯的利益,但是威尼斯通过和土耳其人签订商业条约争取到了时间。争取到的时间是短暂的:土耳其和威尼斯很快就开始交战,给威尼斯带来了可怕的结果。威尼斯在爱琴海的北部的的主要基地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的丧失开始了该城市脱离土耳其地区的进程。从那时开始,在土耳其人对意大利内陆不断侵袭的同时,威尼斯进行了五十年断断续续的反抗土耳其帝国的自卫战争。

1499—1503 年威尼斯和土耳其的战争迫使威尼斯在国际的阶梯上又下降了一步。尽管在 1500 年有时敌国匈牙利会和威尼斯一起反抗土耳其帝国,这个城市的水兵未能打败土耳其人。相反,在悲惨的宗基诺战役(deplorable battle of Zonchio)中,由克马尔·瑞厄茨(Kemal Re'is)领导的土耳其海军给威尼斯曾经聚集的最大的舰队以痛击。(Lane 1973a: 242)在战役中威尼斯失去了重要的地中海前哨模登(Modon)、柯伦(Koron)和列潘多(Lepanto),在和平时期,威尼斯人放弃了他们对许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城市的主权要求。

其他欧洲强权把那场战争的解决视为危急事件,并参与条约的草拟。在威尼斯失去东地中海的前哨的同时,该共和国在西班牙和法国在 15 世纪 90 年代干预的地方——意大利北部征服了重要的领土。欧洲南部的政治疆界正以一种例外的速度改变。“布达(Buda)的和平(1503 年 8 月)包括土耳其、摩尔达维亚(Moldavia)、拉古萨、威尼斯、罗马教皇(the Papacy)、波希米亚-匈牙利(Bohemia-Hungary)、波兰-立陶宛、罗德斯、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并且被列为最早的现代的大的国际争端的解决。”(Pitcher 1972:98—99)那个大的和平会议的举行有着额外的意义:面对土耳其的扩张,以及在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交战结果中,欧洲人正在开始形成有特色的联系的国家体系。

众多国家在这样的范围和程度上形成一个体系,它们经常相互作用而且它们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每一国家的行为。在 990 年,没有像欧洲体系的东西存在。到 1990 年,曾经一度主要是欧洲的体系扩大到几乎包括整个地球。在这一千年间,欧洲经历了这样几个世纪,在那些世纪里大多数欧洲国家和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保持着非常强的联系——敌视、友好、中立,或者更可能地是混合的和不定的一——但是很少和欧洲大陆之外的其他国家保持强的联系。在它们的集体权力和联系中,那些国家显然不同于其余国家。过去一千年的主要政治事实就是主要由民族国家而不是帝国、城邦国家或者其他强制权力的变种组成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扩张。

世界从一组非常不同的境况向着它现在的特殊条件迈进。一千年前,全世界的人们不是生活在联系松散的帝国内,就是生活在主权分裂的

情形中。尽管像玛雅的(Mayan)和中国的帝国已经达到了很高程度的中央集权化,它们甚至非常不直接地统治了其核心之外的地区,征收赋税、把政府委托给享有很大自治权的地方掌权者。征服运动、在国家领土边缘的战争和为了贡赋、战利品和俘虏的袭击常常发生,但是对正式的盟国宣战以及集中的军队无论在何处确是少有的事件。

在 990 年,欧洲自己的空间分裂成 4 到 5 个相对独特的国家群。征服东欧的国家持续地侵袭彼此的控制区,与此同时在北面和斯堪的那维亚人、在南面和拜占庭人、在东面和大草原的武装民族保持着联系。更为确定的联系更加紧密的国家群,主要是穆斯林,围绕着地中海并且覆盖着大部分的伊比利亚。在从意大利中部到佛兰德斯的相对城市化的地带,许许多多的半自治权力和罗马教皇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权限交迭在一起。一个撒克逊人的地区接触到那个地带的东北边缘,一个丹麦帝国升展到不列颠群岛。

这些部分分离的国家群很快获得了较强的相互联系,也获得了不同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更明显的区别。它们开始通过从地中海向北的贸易扩张、来自大草原游牧部队的持续运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为了土地的斗争,和来自北方的海上勇士的广泛的袭击而发生联系。例如,曾经掠夺北欧和东欧几个世纪的北欧海盗(Vikings)的诺曼后裔不仅仅在我们现在称为法国的地方的中部巩固了他们自己的王国,也征服了英格兰和西西里。

西西里的历史说明了强大的征服把欧洲结合在一起。从罗马帝国垮台以来,这个岛屿就处在一个接一个的非意大利人的强权统治之下:开始是拜占庭,然后(从 827 年开始)是一系列穆斯林国家。在两个世纪的穆斯林统治之后,在 11 世纪晚期,诺曼冒险家们夺取了这个岛屿。他们的后继者成了西西里的国王并且和阿尔卑斯山北的皇家通婚。在 1194 年的圣诞节,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Henry VI)(在继承的和征服的权力的结合中变得强大)给自己戴上了皇冠。此后,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皇室成员统治了西西里直到拿破仑到来。一千年来,西西里对到达地中海的征服运动起了十字路口的作用。

国际的联系也抄近路通过北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而且,它们常常

和国内政治相联系。例如,13 世纪的佛罗伦萨在效忠教皇还是皇帝上痛苦地分裂。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获胜的(反对帝国的)黑党(Black party)成功地流放了对手白党(Whites),包括但丁。在 1311 年,黑党清除了佛罗伦萨街头的许多帝国之鹰的标志。(Schevill 1963:187)然而,那并没有终止佛罗伦萨的国际参与。在 13 和 14 世纪,佛罗伦萨把它大部分的公共生活用于接待全欧洲的君主和使臣。(Trexler 1980:279—330)与此同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征服了地中海的上上下下。简而言之,早在 1500 年前,意大利国家积极地参与欧洲的政治。特别是在意大利,我们能够看到在 13 和 14 世纪形成的,或多或少有意地区别于南部的和东部的穆斯林国家的欧洲国家体系的成分。

推进到 1490 年,500 年前,欧洲人正忙于创造在那时是独特的两个安排:第一,由条约、使馆、婚姻和广泛的交流而相互联系的国家体系;第二,宣告由大量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参战并且以正式的和平解决结束的战争。他们正进入一个时期,在这个时间每当战争结束,整个欧洲大陆的边界和主权就根据众多国家参与的条约的条款重新排定。更古老的作战方式留存于海盗行为和盗贼行为、蒙古干涉的最后阶段、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在巴尔干地区的无规律的战争,以及欧洲人在非洲、亚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探险之旅。但是在欧洲某种像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家体系的东西正在形成。而且参与者逐渐地不仅是城邦国家、联盟和帝国,而且有民族国家:对几个边界明确的相邻地区内的人口实行严密控制的相对自治的、中央集权的、彼此区别的组织。

历史的起点总是不牢靠的,因为在邻近的历史过程中某些较早的因素总是和假定的起点相联系。然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在欧洲的有规律的外交使团的建立追溯到 15 世纪的意大利国家的惯例。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对意大利的入侵推广了这种惯例:

到 15 世纪 90 年代早期,米兰在西班牙、法国以及在帝国宫廷都有常驻代表。到 15 世纪 80 年代阿拉贡的斐迪南(Ferdinand)首开先例派一常驻代表到罗马,后来又派一人到威尼斯,1495 年又派人到英格兰。他在哈勃斯堡王朝的代表也出现在 1495 年,有两位,一位是在帝国宫廷的大使,另一位在荷兰。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皇帝在 1496 年底前建立的网络,由于缺乏资金而崩溃了,正如它在 1504 年再次崩溃那样。罗马教皇最终也屈服于这种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是税收官的直接后代的常驻的罗马教廷大使,到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教皇结束时(1503 年),已被派到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威尼斯和皇帝处。(Russell 1986:68)

伴随着使馆的制度,出现了延伸的信息收集、更广泛的联盟、皇室婚姻的多边谈判、在承认其他国家的条件下的对每个单独国家的更大的投资,以及战争的普遍化。

我们可以合理地把广泛的欧洲国家体系追溯到法国和西班牙对意大利的入侵,这次入侵大大地扩大了欧洲战争进行的规模,并且开始了大量使用雇佣兵的时代。卡托-康布雷齐和约(The Peace of Cateau-Cambresis)(1559 年)结束了哈勃斯堡皇室和瓦卢瓦王朝(Habsburg-Valois)的战争。它确认了把法国实际上排除在意大利之外、西班牙在那里的首位和把英国排除在加来(Calais)之外。在终止敌意之外,与会的大使们就广泛范围的欧洲事务进行了磋商,包括像萨沃伊(Savoy)和苏格兰国家的命运、西班牙的费利浦国王(King Philip)和法国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sabeth)的婚姻。管理国家的本领在战争的支持下正在成熟。

不仅所有欧洲国家都巧妙地纳入了正在显现的体系。在 16 世纪,虽然在低地国家和波罗的海诸国间的日益增多的贸易开始把丹麦和瑞典密切地纳入了西欧国家的联系中,北欧的国家仍然形成了分离的地区。波兰到立陶宛距离遥远,而且俄罗斯,从西欧的视角看,是半神话的:塞巴斯蒂安·明斯特 1550 年的《宇宙学》(Sebastian Munster's *Kosmographie*)把“俄罗斯人”定位在波罗的海地区。(Platzhoff 1928:30—31)然而在 15 世纪哈勃斯堡皇室(the Habsburgs)和莫斯科大公(the grand duke of Moscow)建立了外交关系,通过对更加西方的强权的影响,俄罗斯的扩张把俄罗斯人和欧洲联系在一起。

在约翰三世(Johan III)(1568—1592 年)统治下的瑞典的外交和王朝的联系证明,即使是外围国家也深深地影响这个体系。随着条顿武士的利沃尼亚帝国(the Livonian empire)的解体,瑞典、波兰、丹麦和俄罗斯都纷纷抢夺其地盘。在抢夺中,约翰夺取了拉威尔(Reval)、爱沙尼亚

和沿着后来成为漫长的瑞典和俄罗斯边境的其他的土地；尽管在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竞争，在阻止俄罗斯方面他们也成功地联合了波兰和丹麦。约翰在交战的同时，也取得了外交的成功。约翰的妻子卡塔琳娜·贾基罗尼卡(Katarina Jagellonica)是一位波兰公主，是来自米兰的斯福扎(Sforza)的女儿。波兰的联系使得选举他们的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担任波兰国王成为可能。约翰死时，西吉斯蒙德也成了瑞典国王——至少直到他的叔叔卡尔(Karl)废黜他。约翰的另一个儿子，古斯塔夫·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后来把外围的瑞典建成了欧洲强权之一。到 17 世纪早期欧洲国家体系从瑞典扩展到土耳其帝国，从葡萄牙扩展到俄罗斯。

第二节 战争的目标

联系日益紧密的欧洲国家体系随着大的战争的节奏发生变化。杰克·利维(Jack Levy)已经准备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自从 15 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强权及其战争的目录。让我们随意的以利维列举的所有在其中大国遭受了至少 10 万战争死亡人数的战争为例。它们包括：

战 争	大国战争死亡人数	主要解决方案
30 年战争(1618—1648 年)	2 071 000	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
法国西班牙战争(1648—1659 年)	108 000	比利牛斯(Pyrenees)条约
土耳其战争(1657—1664 年)	109 000	沃斯沃尔(Vasvar)条约
法国荷兰战争(1672—1678 年)	342 000	尼姆威根(Nimwegen)条约
土耳其战争(1682—1699 年)	384 000	卡尔洛维茨(Karlowitz)条约
奥格斯堡联盟战争 (1688—1697 年)	680 000	里斯维克(Ryswick)和约
西班牙继承(Succession)战争 (1701—1713 年)	1 251 000	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
奥地利继承(Succession)战争 (1739—1748 年)	359 000	亚琛(Aix-la-Chapelle)和约

7 年战争(1755—1763 年)	992 000	巴黎、胡贝尔茨堡条约(Treaties of Paris, Hubertusburg)
土耳其战争(1787—1792 年)	192 000	贾赛(Jassy)条约
法国革命(1792—1802 年)	663 000	亚眠(Amiens)条约
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年)	1 869 000	维也纳和会(Congress)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	217 000	巴黎和会
普法战争(1870—1871 年)	180 000	法兰克福条约
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77—1878 年)	120 000	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条约,柏林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	7 734 300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 Versailles, St Germain, Neuilly, Trianon)和约
中日战争(1937—1941 年)	250 000	无,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1945 年)	12 948 300	没有总的解决方案
朝鲜战争(1950—1953 年)	954 960	停战:没有解决方案

当然,大国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只是易误解的:考虑到欧洲人口的大量下降,其中只有部分是由向外迁移造成的,直接由于三十年战争的总死亡数,包括所有国家的平民和军队,可能大大超过 500 万,而不是由大国维持的 200 万。

中国在 1937 到 1941 年抗击日本的大约 75 万死亡人数没有计入,因为当时中国还不能称为大国。越南战争也未纳入清单(cutoff)[指我的,我仓促加上的,不是列维(Levy)的]因为和所估计的越南部队中的 65 万战斗伤亡数相比,美国“只”损失了 5 万 6 千。然而,该清单给出了一个规模扩大的战争概念,以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益增加的和平解决的普遍性。它也意味着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冲突的国际化破坏了有四百年历史的通过常规的和会(general congresses)和平解决的体制。自从那个时间以来,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使得任何常规的和平解决变得非常复杂。

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把欧洲国家体系固定在某种位置上。实际上,一张复杂的战争之网,开始作为神圣罗马皇帝镇压波希米亚的新教徒的努力的斗争最终卷入了大多数的欧洲强国。土耳其帝国、意大利国家、英国和东欧国家是主要的缺席者。土耳其人全神贯注于其波斯纷争,英国也

有自己的大的分裂要对付。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间的主要结盟使得它们能与法国和瑞典抗衡。换句话说,是哈勃斯堡和欧洲其他地方抗衡。

开成一次和会——或者说是两次,一次在明斯特(Munster)(主要是为新教强权),另一次在奥斯纳布鲁克(Osnabruck)(为天主教徒)——就花了七年谈判时间(始于 1641 年)。在这七年间,战争一直在持续。担心下面的个别国家独自媾和,费迪南皇帝授予它们参加和会的权力,并把和会当成帝国的国会。最终在 1648 年 1 月迫使西班牙承认其独立的荷兰共和国也参加了和会。威尼斯和教皇尽管不是交战国,起了主席和调停者的作用。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1648 年)从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大部分国家中召集了 145 位代表。他们不仅协商出结束战争的条款,也解决了许多突出的外交问题,例如是否承认瑞士联盟(Swiss Confederation)和荷兰共和国为主权国家。通过把斯凯尔特河的出海口(the mouth of Scheldt)归入荷兰领土,他们确认了对到安特卫普的海外交通的封锁,从而确定了荷兰共和国对西班牙属荷兰地区的商业优势。该条约通过威胁要废除任何改变宗教的君主,冻结了现存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分裂。在此过程中,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Alsace)及其他领土,瑞典(在其他土地中)获得了西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而且重大的重新结盟出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

在帝国内,一个国家至少对另一个不同的国家行使主权。(Doyle 1986:30)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前的一个世纪,形形色色的帝国统治着欧洲。然而,三十年战争的解决方案决定性地阻碍了哈勃斯堡帝国的兼并,敲响了哈勃斯堡皇室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使得任何其他帝国——也许除了俄国人和土耳其人——不再可能在欧洲大陆上扩张。按照和平解决的先例,个别德国国家进行了自己的外交,而不是接受皇家作为它们的代言人。因此,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加强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

肯定地说,在帝国正在欧洲之内失败的同时,欧洲的主要国家正在欧洲之外创建帝国,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外部帝国的创建为欧洲大陆内的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和均质化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某些手段和某些动力。欧洲强权在那些帝国地区相互对抗。在荷兰起义之

后的长期战争中,荷兰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以及欧洲和西班牙人作战;荷兰水手实际上从亚洲和非洲驱逐了葡萄牙(直到1640年还服从于西班牙君主国)。(Parker 1975:57—58)但是在1648年那些外部的帝国还未适应谈判协商。

后来的和平解决遵循着1648年的模式,带着关键性的差异:非欧洲的帝国进入了画面。尽管终结的战争中的胜败在谈判刚开始时持续决定着国家谈判的地位,疆界和统治者最决定性的变化是在解决的时刻。事实上国家常常放弃它们所征服的领土来换取他们发现更加值得要的东西。在结束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的英国人和荷兰人战争之一的布列达条约(the Treaty of Breda)(1667年)中,所有重大的领土转让都发生在美洲。荷兰人,在其他东西中,还为了苏里南(Suriname)放弃了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现在的纽约),这一交换(至少在回顾中)标志着英国那时战胜荷兰的优势。

奥格斯堡联盟(the League of Augsburg)的战争(1688—1697年)使得路易十六(Louis XIV)反对那个联盟,联盟中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瑞典、西班牙、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Saxony)、巴列丁奈特(the Palatinate)以及,后来的萨沃依(Savoy);荷兰和英国自己和这联盟结盟而不是加入联盟。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通过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结束了那场战争。除了领土的调整、承认和安全保证外,这次解决方案包括另一个英国人和荷兰人间的殖民地的协议,以及法国的得分:荷兰把蓬迪遮里(Pondicherry)(印度)归还给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以换取贸易权。从那时起,非欧洲的领土在欧洲的和平解决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到18世纪早期,欧洲强权中的战争通常包括海外战斗,而且那些战争的解决经常包括海外帝国的重新结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The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始于1701年,当时路易14世(Louis XIV)企图把由他的孙子安茹公爵(the duke of Anjou)继位给他带来的优势用到西班牙王室;在其他行动中,老谋深算的路易国王立即派遣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在佛兰德斯拥有的要塞。战争期间,法国和英国在美洲、印度以及公海上交战。战争以《乌得勒支和约》(the Treaty of Utrecht)(1713年)告终。该和约确立了英国作为最主要的殖民强国的地位,也确定了西班牙在欧

洲相对下降的地位。在那个和约中,英国获得了纽芬兰(Newfoundland)、新斯科舍(Nova Scotia)、哈德逊海湾领土条约(the Hudson's Bay Territory)、直布罗陀(Gibraltar)、梅诺卡岛(Minorca)、西班牙殖民地港口的使用、为西班牙殖民地供应奴隶的权利,以及对它的新教的王位继承权的承认。萨沃依在损害西班牙利益的情况下吞并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其他领土;普鲁士获得了对其王国地位的承认;在许多方面是输者的法国不仅重新获得了里尔,而且还得到了一波旁皇族(Bourbon)成员被承认为西班牙国王;在密切相关的《拉什塔特和约》和《巴登和约》(treaties of Rastatt and Baden)(1714 年)中,奥地利哈勃斯堡王室(the Austrian Habsburgs)获得了对曾经是西班牙的荷兰的控制。

7 年战争(1756—1763 年)和美国革命战争(1778—1784 年)再次使得法国在美洲和英国竞争。作为第一场战争的结果,法国割让了大陆加拿大,而在第二场战争中,英国失去了 13 个繁荣的北美殖民地。随着美国的独立,欧洲政治溢出,欧洲进而为这种国家体系创造新的成员——完全外在于欧洲的成员。

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1815 年),把所有欧洲强权的代表召集在一起,更不用说许多想要成为强权的国家的代表。该次会议重新制定了欧洲版图,仅恢复了少数战前的边界,并且创造了像尼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Netherlands)、德意志联邦(the Germanic Confederation)和伦巴第-威尼斯王国(the Lombardo-Venetian kingdom)等全新的实体。但是,它也把锡兰*、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多巴哥(Tobago)、圣卢西亚(St Lucia)、毛里求斯(Mauritius)、马耳他(Malta)纳入了英帝国。在那次解决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谈判中,大国们最接近有意识地集体规划整个国家体系,直到个别国家的边界、统治者及其国体。

在整个 19 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解决继续有这个国家体系的许多成员参加,并且标志着其成员的大的重新结盟。也许可以把这

* Ceylon,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 Srilanka,首都为科伦坡 Colombo。——译者注

一点引申到包括作为拿破仑战争的解决的延时部分,独立的比利时的建立(其脱离尼德兰事件发生在紧接 1830 年的法国革命之后,并且由于法国人的直接武装干涉而幸存)。但是法国吞并萨沃依和尼斯(Nice)以及创立一个意大利王国起源于 1859 年法国和皮德蒙特(Piedmont)反对奥地利的战争。而且双重的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和北部德意志联邦(帝国的直接先驱,其本身就是法国-普鲁士战争的非常直接的结果)的形成来自 1866 年的奥地利-普鲁士战争。在欧洲的东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Crimean)、奥地利-德国的(Austro-German)和众多的俄国-土耳其(Russo-Turkish)战争都加速了土耳其控制的进一步解体和强烈的国际影响下的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地纳哥(Montenegro)。而且,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的解决(1856 年)把土耳其帝国重新铸造成土耳其,一个新的有点像欧洲版式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决带来了最后一次欧洲版图的或多或少总的、同时的和一致的重新划定。新的或者更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匈牙利(Hungary)、波兰(Poland)和南斯拉夫(Yugoslavia)获得了独立。德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给法国、波兰和其他邻近的强国。罗马尼亚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作为后来转向同盟国方面的结果。土耳其帝国的残余断裂成了碎片,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则主张自己是国家体系中成员身份和行为的仲裁者。1919 年和 1920 年的众多的条约包括许多诸如萨尔河(the Saar)的法国控制、没有主权之类的妥协,也遭受了美国对该联盟的拒绝。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中的裂痕预告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展现的鸿沟。到那时以前的欧洲国家的全世界的影响以及诸如日本和美国等地理上和政治上怪异的强权的出现,给较好运行了四个世纪的一系列关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第三节 该体系的成员

谁是强权国家? 我们也许可以比较两个最近的成就来确认它们。乔

治·莫托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曾经用海军力量来编辑从 1494 年到现在的“全球强国”的名册。根据他们的定义,“全球强国”在所有全球强国的总的海军开支中至少占 5%或者在总的战舰中占 10%,并且在其自己地区之外的海洋开展其海军活动。同样,杰克·利维编辑了一本世界强国以及包括从 1495 年到 1975 年的大的战争的小册子。至于强国,他在全球挑选出那些(在他的估计中)拥有相对其他国家的很强的军事能力,追求大陆的或者全球的利益,运用广泛的手段(包括武力和武力威胁)保护那些利益,被最强大国家承认为主角,并且在国际关系中行使着异常的正式权力的国家。(Levy 1983; 16—18)在可能的欧洲候选国中,利维用他的标准在从 1495 年到 1975 年整个时期中排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威尼斯、瑞士联邦、葡萄牙、波兰、丹麦。

这两个名册包括:

国 家	利 维	莫托斯基-汤普森
葡萄牙	—	1494—1580 年
法国	1495 年—	1494—1945 年
英国/大不列颠	1495 年—	1495—1945 年
“奥地利” ^a	1495—1519 年、1556—1918 年	—
西班牙	1495—1519 年	1494—1808 年
土耳其帝国	1495—1699 年	—
联合哈勃斯堡	1519—1556 年	—
荷兰	1609—1713 年	1579—1810 年
瑞典	1617—1721 年	—
俄国/苏联	1721 年—	1714 年—
普鲁士/德国/联邦德国	1740 年—	1871—1945 年
意大利	1861—1943 年	—
美国	1898 年—	1816 年—
日本	1905—1945 年	1875—1945 年
中国	1949 年—	—

a 包括奥地利哈勃斯堡、奥地利和奥地利-匈牙利。

要求过分的莫托斯基-汤普森标准排除了许多主要依赖陆军而不是海军的大国。而且某些指定也是有争议的。毫无疑问一个称为法国的民族国家自从 1495 年就或多或少一直存在。而且在称为英国、大不列颠和

联合王国的持续变化的实体中看到某些连续性也不是荒谬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把普鲁士、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以及联邦德国看着一个称为德国的单一实体是有疑问的。

而且,哈勃斯堡土地的不同的划分在该小册子中出现了四处:作为奥地利哈勃斯堡、西班牙、联合哈勃斯堡和荷兰。而且西班牙和哈勃斯堡并没有像利维的年表所表明的那样,伴随着查理五世(Charles V)在1556年的退位而从欧洲场景中消失;在1588年西班牙的舰队依然是令人畏惧的力量。然而,考虑到在17世纪30年代的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名义上的所有伊比利亚王国的首领菲利普四世(Philip IV)不能够说服卡塔卢尼亚(Catalonia)、巴伦西亚(Valencia)以及他的其他几个地区来参与当时由卡斯提尔领导的战争的努力,“西班牙”这个实体也是有疑问的。那么葡萄牙又如何?利维没有提到葡萄牙。莫托斯基和汤普森把葡萄牙确认为1494年到1580年的全球强国(大国的称号),当时葡萄牙独立于西班牙皇室。甚至在随后的西班牙霸权的六十年里,葡萄牙也是作为独特的国家运行的。简而言之,就国际关系而言,在18世纪前很难以单数形式谈论西班牙。因此,这些列表大大地简化了。然而,它们提供了在欧洲强国中的优先方面的可靠的最初的近似。

这两个列表对欧洲展现了非常强烈的偏见。直到美国的到来(对莫托斯基-汤普森是1816年,对利维是1898年),这个系列只包括其主要基地在欧洲的国家。例如,读者将从这个信息中发现,很难想象在1495年中国有大约100万人在从军,也难以想象在欧洲之外的马里人(Mali)、桑海人(Songhai)、波斯人(Persian)、莫卧儿人(Mughal)、阿芝台克人(Aztec)、印加帝国(Inca empires)会繁荣。我们也不能假定欧洲体系无比地富裕,因而比其他国家更值得关注。在17世纪几乎有一半的银子是在美洲开采,最终到达中国,以交换丝绸、瓷器和其他珍贵的货物。(Wakeman 1985:2—3)在这一点上,在欧洲的人均收入显然不比在中国的人优越。简而言之,在18世纪晚期,不能肯定欧洲强国在经济上领导着世界。

然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列表有其军事的理由;1495年后不久,欧洲人

(包括现在的半欧洲的土耳其人)把他们的军事控制延伸到如此之远,以致他们的体系成为整个世界的强国体系。例如,到 16 世纪 40 年代,土耳其帝国正在有规律地进入和像法国一样的欧洲国家结盟。由于它对意大利和哈勃斯堡国土的威胁,它对其他主要选手的结盟和策略施加了很大的杠杆作用。

那么到 15 世纪末,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清楚的结构和成员。此外,它正在走向统治世界的路上。利维和莫托斯基-汤普森的编纂确定了大国,但是没有确定该体系的较小的成员。作为整个体系在 1500 年的局限的最初近似,我们也许可以采取爱德华·富特(Eduard Fueter)在(the von Below and Meinicke)的第一卷《政治历史》(*Politische Geschichte*)中的细目分类。(Futter 1919)可以理解地,富特把他的国家的分类建立在对由法国和西班牙侵略意大利引起的战争的参与之上:

直接参与意大利纷争的大的国家

法国

西班牙

哈勃斯堡政权

勃艮第

奥地利

德国

威尼斯

直接参加的小国

米兰

佛罗伦萨

罗马教皇的国家

那不勒斯和西西里

热那亚

萨沃依

其他小的意大利国家:安科纳(Ancona)、费拉拉(Ferrara)、
乌比诺(Urbino)、曼图亚(Mantua)、摩纳哥(Monaco)等。

没有直接参加的大的国家

土耳其帝国

英国

没有直接参加的小的国家

匈牙利

北非海盗国家

波兰

苏格兰

丹麦,然后是丹麦和瑞典

葡萄牙

波斯

纳瓦赫(Navarre)

在把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成员[巴登(Baden),勃兰登堡(Brandenburg),科隆(Cologne),汉诺威(Hanover),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美因兹(Mainz)以及其他十几个成员]并入一个单一国家方面,在把辽阔的哈勃斯堡领地堆积到一起方面,在忽视土耳其帝国的欧洲附庸国[例如,波斯尼亚(Bosnia),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方面,在轻视东欧的半独立国家(例如,立陶宛)方面,以及在把波斯(Persia)列入参与者名单方面,富特的国家体系的详细目录不同于它的主要替代——斯普勒(Spuler)编撰的关于国家和统治者的小册子。(Spuler 1977, vol. 2)富特在帝国的成员只能通过它们选出的皇帝来和外部国家开展外交关系的基础上为把神圣罗马帝国的众多国家说成单一的“德国”辩护。但是他承认宗教改革[在其中许多德国领土上的地主发现新教(Protestantism)是对皇帝的天主教的有吸引力的替代]强调了帝国的划分(fractionation)。(Fueter 1919:123—136)同样,他把卡斯提尔、阿拉贡以及它们所控制的领土(在其共同的君主代表他们所有人说话的基础上)相提并论。(Fueter 1919:79—103)他把波斯纳入该体系,因为欧洲国家有时和波斯结盟来反对土耳其人和北非海盗(因为他们坚持和地中海的船员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把富特对从 1492 年到 1559 年欧洲国家体系的列举,和后来的由沃尔特(Walter Platzhoff)(1559—1660 年)和马克斯(Max Immich)(1660—1789 年)作的在相同系列里的两个小册子相比较,该体系的成员显示了如下的变化(Platzhoff 1928, Immich 1905):

国 家	1492—1559 年	1559—1660 年	1660—1789 年
奥地利	+	+	+
勃兰登堡-普鲁士	-	?	+
勃艮第	+	-	-
丹麦	+	+	+
英国	+	+	+
佛罗伦萨	+	?	-
法国	+	+	+
热那亚	+	+	?
德国/匈牙利帝国	+	+	+
匈牙利	+	?	?
里凡尼亚(Livonia)	-	+	-
米兰	+	-	-
那不勒斯-西西里	+	-	-
纳瓦赫(Navarre)	+	-	-
荷兰	-	+	+
北非海盗	+	-	-
土耳其帝国	+	+	+
罗马教皇	+	+	+
波斯	+	-	-
波兰	+	+	+
葡萄牙	+	+	+
俄罗斯	-	+	+
萨沃依	+	+	+
苏格兰	+	+	-
意大利小国	+	+	+
西班牙	+	+	+
瑞典	+	+	+
瑞士联邦	+	+	+
威尼斯	+	+	+

? = 没有列举,但是在文中作为独立国家提到过。

因为在 1500 年俄罗斯和里凡尼亚,尽管和欧洲其余部分联系微弱,

实际上存在,唯一真正的新到者是形成于反叛哈勃斯堡的荷兰和锻造于几个世纪战争的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些德国作家对将“德国”视为一体的坚持(甚至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隐藏着诸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之类国家的独立的重要性。尽管富特的分开的列举,在1477年勃艮第公国沦陷于法国,荷兰的勃艮第王朝在1482年让位于哈勃斯堡。伴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勃斯堡帝国崩溃以及一个独立的荷兰成了主要的强国的资格,然后,1495年到1789年的主要的运动转向合并:正如米兰、那不勒斯、纳瓦赫、西西里并入了法国和西班牙,匈牙利融入了土耳其帝国,苏格兰并入了大不列颠,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的合并正在进行。

这些国家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常常把欧洲国家体系看成有着一个霸权国家或者两个霸权国家在最高阶层争夺权力的简单的等级。(Gilpin 1988, Modelski and Thompon 1988, Levy 1988, Thompson 1988)整个霸权战争的理论是建立在国家争夺最高地位的假定上。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以这种模式所要求的方式支配着这个体系;在法国权力巅峰时期到1812年,英国和俄国绝不是保持从属地位。由于英国在19世纪处于鼎盛时期,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常常抗拒英国的权力。

简单的等级模式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和关键性的:权力的运用总是依赖于地点;在紧邻地区部署巨大兵力的人总发现当他离开他的基地时他的权力就缩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曾经一度在亚得里亚海地区施加了巨大影响的威尼斯,确实代表了欧洲最大的单一强国的时代——然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就根本没有影响。一个好得多的欧洲国家体系的概念将它看成在地理上分散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加中心更有影响,但是等级不同于在体系中的一个地点相对于另一地点。

杰克·利维的编撰又一次帮助了我们。利维把大的战争定义为每年涉及平均1000人或以上的战场死亡的战争。他排除了内战、殖民战争和帝国战争。根据他的标准,这个世界在1459年和1975年之间经历了119场涉及至少一个大国的大的战争。那些战争的参与国(包括那些没有资格算做大国的国家)为上五百年里这国家体系中的成员设立了一个大致的界限。那么谁是成员呢?利维没有说,但是看一看在他的详细目

录(1495—1514 年)的前面 20 年里的整个参战国系列就会得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利维没有列举所有的好战者,但是标准的历史很容易说出它们的身份):

威尼斯联盟战争(1495—1497 年):法国、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政权、米兰、西班牙和那不勒斯。

波兰-土耳其战争(1497—1498 年):土耳其帝国、波兰、克里米亚鞑靼(Krim Tatars)、俄国、摩尔达维亚(Moldavia)。

威尼斯-土耳其战争(1499—1503 年):土耳其帝国、威尼斯、匈牙利。

第一次米兰战争(1499—1500 年):法国、米兰。

那不勒斯战争(1501—1501 年):法国、西班牙、罗马教皇、那不勒斯。

坎布雷(Cambrai)联盟战争(1508—1509 年):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勃斯堡、罗马教皇、米兰、威尼斯。

神圣联盟战争(1511—1514 年):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勃斯堡、罗马教皇、威尼斯、米兰、瑞士各州。

奥地利-土耳其战争(1512—1519 年):奥地利哈勃斯堡、匈牙利、土耳其帝国。

苏格兰战争(1513—1515 年):英国、苏格兰。

这隐含的成员名单很像富特列举的 1492 年到 1559 年的,但是更窄一些。从富特的国家体系的参与者中,利维的战争详细目录省略了丹麦、佛罗伦萨、热那亚、萨沃依、北非海盗、波斯和较小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因为在那二十年里它们只是作为边缘者参与了大国的战争。例如,佛罗伦萨在神圣同盟战争中实际上宣布站在法国一边——在和平解决时却为它付出了代价;但是在 1495 和 1514 年间,佛罗伦萨人是如此地关心其内部的分裂以及像比萨的附属国的起义,它们置身于周围发生的大规模战斗之外。另一方面,远在东方,战争[通过俄国、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鞑靼和土耳其人的战争]确立了它们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一部分的地位。

图 6.1 是不同的国家共同参与这些战争的情况。它通过忽略谁和谁交战,通过把奥地利哈勃斯堡及其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混在一起,通过仅仅区别(1)没有共同参与;(2)共同参与单个战争和(3)共同参与两个或者以上的战争,简化了复杂的重重关系。由于至少一个大国的参与使得一

场战争有资格进入利维的清单,该插图必要地夸大了那些国家在 1459 年到 1515 年间战争中的中心作用。然而一个似是而非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图景显现了:俄国、波兰、克里米亚鞑靼、摩尔达维亚和土耳其帝国形成了显著的一批国家(该目录对涉及大国的战争的限制排除了在这二十年里波兰和俄国、波兰和里凡尼亚之间的反复的战争,但是它们的归入只不过强调了东南地区的东部国家的不同)。土耳其和最近的欧洲国家的战争、匈牙利徘徊于威尼斯和土耳其帝国之间,英国和(特别是)苏格兰处于国际关系的外围,而阿拉贡、法国、奥地利哈勃斯堡、威尼斯、罗马教皇政权、米兰和那不勒斯经常相互影响。注意米兰、威尼斯和罗马教皇政权(根据利维的标准不是大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中心作用、威尼斯[按照威廉·麦克纳尔(William McNeill)的说法]作为“欧洲的铰链”的地位、土耳其帝国的隐隐约约的存在以及北部欧洲总体上微弱的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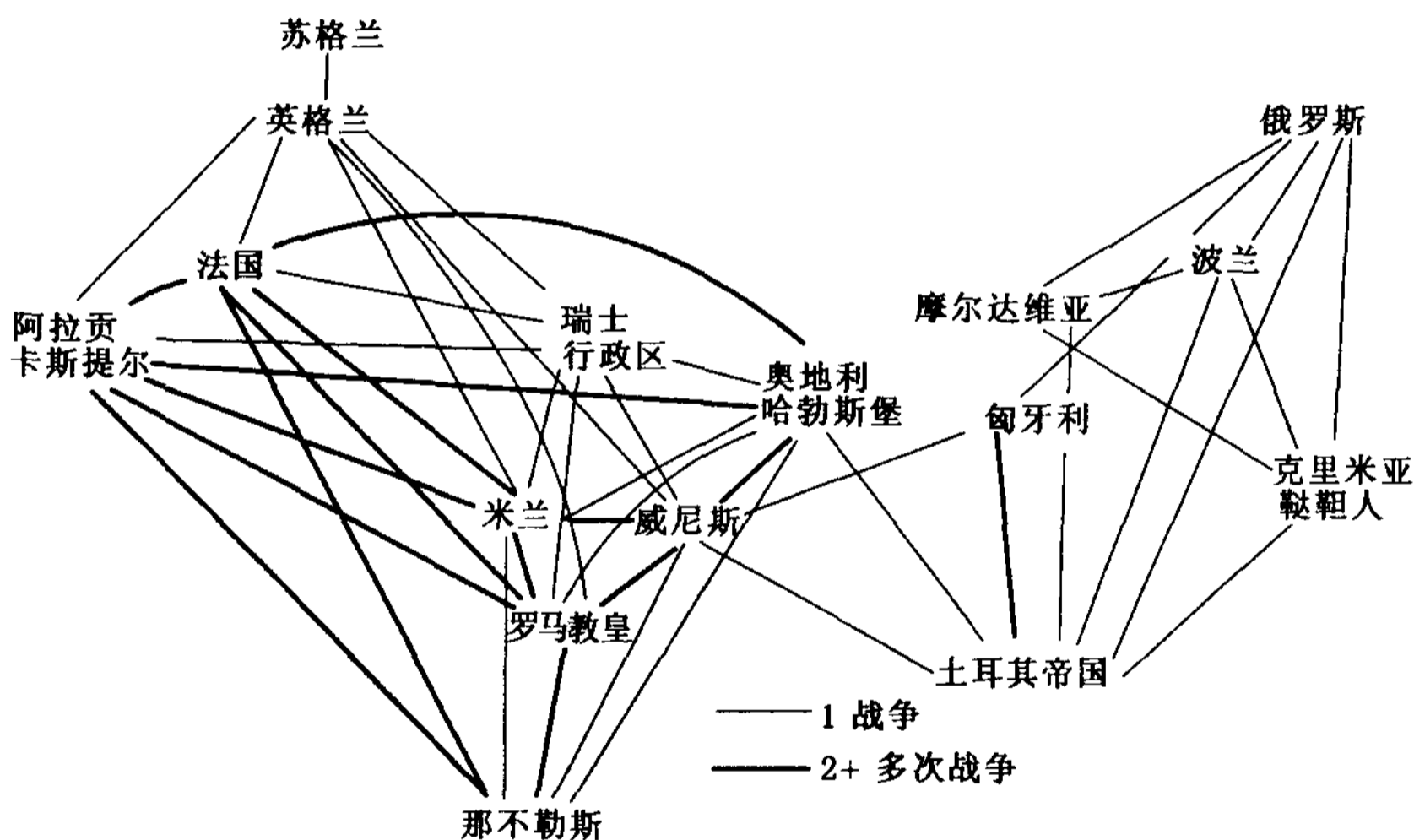


图 6.1 1496—1514 年权力之争中陷入的欧洲国家

如果我们向前跨越一个半世纪,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体系。利维的范围从 1655 年到 1674 年中每一年的涉及大国的战争目录包括这些战争: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战争(1642—1668 年):西班牙,葡萄牙。

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的战争(1645—1669 年):土耳其帝国、威尼斯、

法国。

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1648—1659 年):法国、西班牙、英国。

苏格兰人的战争(1650—1651 年):苏格兰、英国。

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战争(1652—1655 年):英国、荷兰。

北方战争(1654—1660 年):奥地利哈勃斯堡、荷兰、瑞典、波兰、勃兰登堡、俄罗斯、丹麦。

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战争(1656—1659 年):英国、西班牙。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战争(1657—1661 年):荷兰、葡萄牙。

土耳其战争(1657—1664 年):土耳其、法国、奥地利哈勃斯堡。

瑞典人和不来梅人(Bremen)的战争(1665—1666 年):瑞典、不来梅。

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战争(1665—1667 年):英国、荷兰、法国、丹麦。

进化战争(Devolutionary)(1667—1668 年):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勃斯堡。

荷兰人的战争(1672—1678 年):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奥地利哈勃斯堡、瑞典、勃兰登堡。

土耳其人和波兰人的战争(1672—1676 年):土耳其帝国、波兰。

图 6.2 概括了共同的参与。和较早的图表相比,它揭示了一个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确定地向北移动、因此失去其意大利中心的欧洲国家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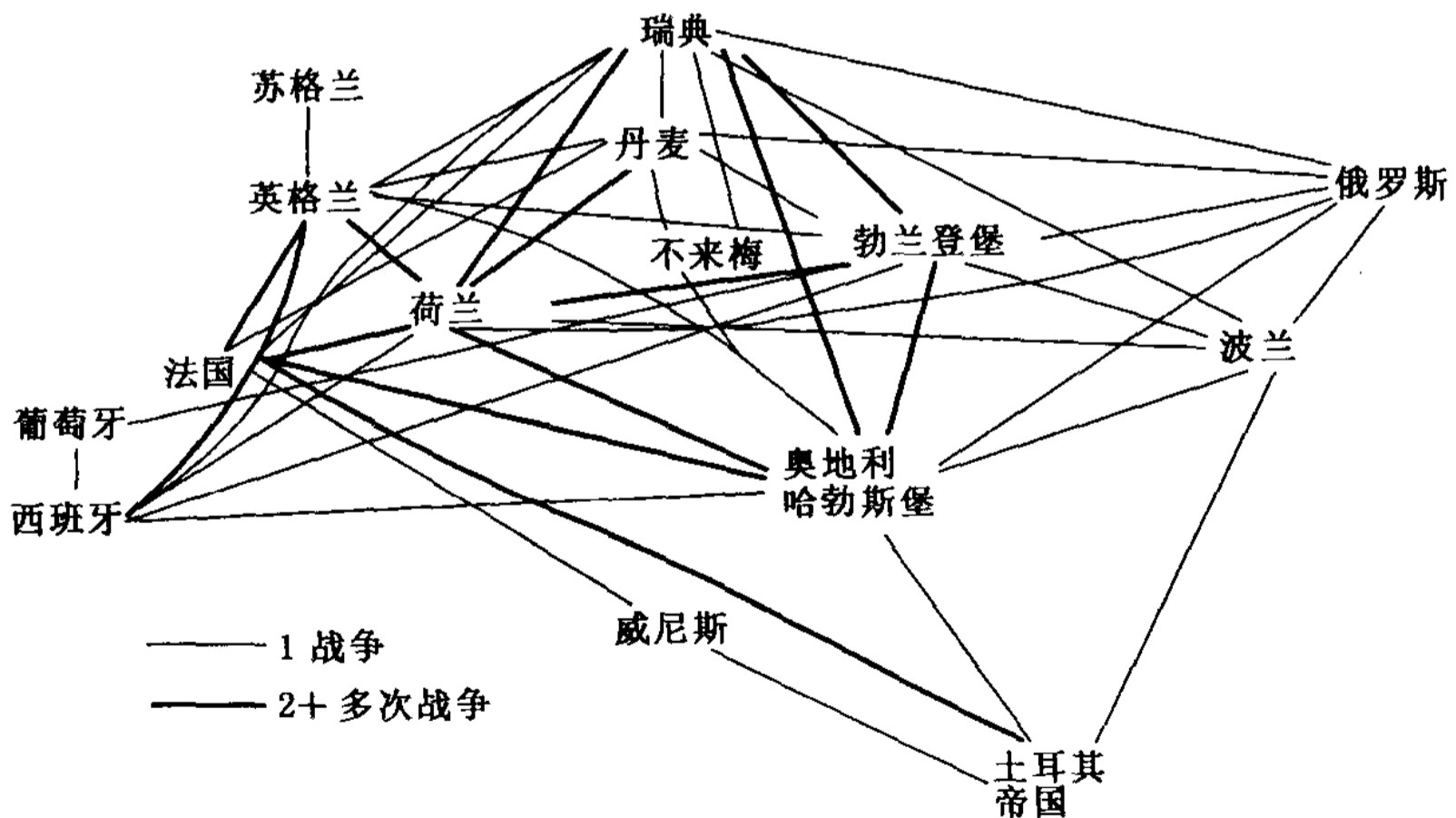


图 6.2 1656—1674 年权力之争中陷入的欧洲国家

系。至于 1655 年到 1675 年,法国和西班牙保持着它们的重要性,英国和奥地利哈勃斯堡变得更加中心,而瑞典、荷兰和勃兰登堡显得是重要的演员。尽管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和中心地位变化很大,17 世纪后期的地图向我们展示了某些类似这个流行到我们自己时代的结构的东西。它没有展示的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的日益扩大的对欧洲之外的世界的参与。

后来时期的图表变得无法阅读;首先它们把每一欧洲国家与几乎每一个其他欧洲国家联系在一起,然后它们一个结点一个结点地延伸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关于从 1790 年到 1809 年的二十年,利维的大国战争包括俄罗斯人和瑞典人的战争(1788—1790 年):俄国、瑞典、丹麦;法国革命(1792—1802 年):法国、大不列颠、西班牙、奥地利、荷兰、俄国、普鲁士、撒丁岛(Sardinia)、萨克森、汉诺威(Hanover)、欧尔登堡(Oldenbourg)、海塞-卡塞尔(Hesse-Cassel)、巴登、瓦腾堡(Wurttemberg)、巴伐利亚、皮德明特(Piedmont)、帕尔马(Parma)、莫德那(Modena)、曼图亚(mantua)、教皇政权、马耳他、威尼斯、热那亚、瑞士、埃及、土耳其帝国、葡萄牙、那不勒斯、托斯卡纳(Tuscany);拿破仑战争(1803—1815 年):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瑞典、巴伐利亚、瓦腾堡、海塞(Hesse)、拿骚(Nassau)、巴登、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伯格(Berg)、布兰斯威克(Brunswick)、兰伯格(Nurnberg)、土耳其帝国、摩尔达维亚(Moldavia)、瓦拉几亚(Wallachia);俄国人土耳其人战争(1806—1812 年):英国、俄国、土耳其帝国;俄国人瑞典人战争(1808—1809 年):俄国、瑞典、丹麦。

除了有点独立的联接俄国、瑞典和丹麦的三角之外,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时期看成一个持续地吸引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战争;相应的网络表明包括土耳其帝国在内的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和其他每个国家相互纠缠在一起,而且由于拿破仑的入侵,埃及被吸引进该体系。如果我们把这个时期延长到 1812 年,我们将会发现最近形成的美国也在进入该体系。尽管这些局外人,尽管这些战争在许多殖民地领土上进行,这个时期的战争本质上是欧洲的。

大国战争局限于欧洲国家的现象很快就结束了。该体系自 1815 年以来的变化是清晰的和巨大的。在俄国和普鲁士的 1870 年到 1871 年的

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三个关键的改变出现在欧洲国家体系中:德国分裂的国家和意大利统一成实质性的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帝国和哈勃斯堡帝国分裂成有限几个独特的民族国家,而且众多的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并且为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帝国和土著民族斗争。在这个时期欧洲国家间的条约——例如,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典型地包括有关保护海外利益、防止其他欧洲国家的条件。那些冲突的利益常常导致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战争。

在从 1880 年到 1899 年的二十年里,大的战争(那些导致至少每年 1 000 人的战场死亡的)包括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 年:英国和阿富汗)、太平洋战争(1879—1883 年: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法国印度支那战争(1824—1884 年:法国和印度支那)、救世(Mahdist)战争(1882—1885 年:英国、埃及和苏丹)、中法战争(1884—1885 年:法国和中国)、中美洲战争(1885 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1885 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法国马达加斯加战争(1894—1895 年:法国和马达加斯加)、古巴战争(1894—1898 年:西班牙和古巴)、中日战争(1894—1895 年:中国和日本)、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895—1896 年: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第一次菲律宾战争(1896—1898 年:西班牙和菲律宾)、希腊土耳其战争(1897 年:土耳其帝国、希腊)、西班牙美国战争(1898 年:西班牙和美国)、第二次菲律宾战争(1899—1902 年:美国和菲律宾)、布尔战争。(1899—1902 年:英国和布尔;Small and Singer 1982:85—99)利维没有把上述战争归类为大国战争,只有中法战争是涉及大国体系的战争。所有其他的战争都是使小的国家或者大的国家和殖民地人民相互反对。除两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和希腊土耳其战争,它们都发生在正在解体的土耳其帝国的边缘)之外的所有战争都是始于远离欧洲战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决(或多或少是决定性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决(尚未解决)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中带来了进一步的关键性的变化,包括自 1945 年来的非殖民地化的浪潮。确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要把欧洲国家体系和迅速形成的世界国家体系区分开来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不仅几乎包括所有的欧洲国家,也包括土耳其、日本、巴拿马(Panama)、古巴、玻利维亚、暹罗(Siam)、利比里亚(Liberi-

a)、中国、秘鲁(Peru)、乌拉圭(Uruguay)、巴西(Brazil)、厄瓜多尔(Ecuador)、危地马拉(Guatemala)、尼加拉瓜(Nicaragua)、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海地(Haiti)、洪都拉斯(Honduras)。欧洲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也促进了军队增长。

在最近几十年里,战争变得甚至更加国际化。在利维编辑的二十年里(1956—1975年),斯莫和辛格(Small and Singer)列举了12场导致每年至少1000人战场死亡的国家之间的战争:

苏联匈牙利战争(1956年):苏联、匈牙利。

西奈(Sinai)战争(1956年):法国、英国、以色列、埃及。

中印战争(1962年):中国、印度。

越南战争(1965—1975年):北越(North Vietnam)、南越(South Vietnam)、泰国(Thailand)、美国、柬埔寨(Kampuchea)、韩国(Korea)、澳大利亚(Australia)、菲律宾(Philippines)。

第二次克什米尔(Kashmir)战争(1965年):巴基斯坦(Pakistan)、印度(India)。

六日战争(1967年):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约旦(Jordan)、叙利亚(Syria)。

以色列埃及战争(1969—1970年):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

足球战争(1969年):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孟加拉(Bangladesh)战争(1971年):印度、巴基斯坦。

赎罪日(Yom Kippur)战争(1973年):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伊拉克(Iraq)、叙利亚、约旦、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

土耳其塞浦路斯战争(1974年):土耳其、塞浦路斯(Cyprus)。

越南柬埔寨战争(1974年):越南、柬埔寨。

在此系列中,仅仅直接涉及大国的战争,根据利维的标准,是苏联人对匈牙利的入侵(1956年)、西奈战争(1956年)、中印战争(1962年)和在越南的战争(1965—1973年)。这四场战争中只有一场发生在欧洲。在匈牙利,世界上优势大国之一镇压了在其卫星国的反叛。在西奈,法国和英国在以色列入侵埃及领土后迅速地干预,而埃及,作为报复,进入了苏伊

士运河地区并且炸沉船只以封锁该运河。一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稳定了该地区,两个月后以色列从除了加沙地带(Gaza Strip)和沙姆沙伊赫(Sharmel sheikh)之外的西奈半岛撤军。在中印边界,在印度试图在争议地区占领一座高山后,中国部队进入了高地区域。中国人在其进程中停了下来,其后开始撤军。

越南的冲突在持续性和伤亡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战争;在其残酷的十年里,它造成了 120 万人战场死亡,加上数不清的平民伤亡。(Small and Singer 1982:93)昔日的殖民地霸主法国从此撤离,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的两半之间留下了一场战争。

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在两年的暗中参与之后,接着公开地以摧枯拉朽的但是最后是不成功的力量进行干预。美国军队后来入侵了周边国家柬埔寨,并且轰炸了它的城市。正当苏联为越南北方送去了给养,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在南方支持美国的努力,当整个冲突演化成了老挝人的内战,处于上升的大国中国,在边界的另一边密切地注视着。柬埔寨和越南的战争同样是由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时间内开始的斗争发展而来。

越南战争使国家体系发生的变化更加戏剧化。大国之间的战争或者由大国引起的战争变得相对很少发生,但是非常具有破坏性。

随着一个或者更多的大国代表着地方政党直接或者间接地干预内战,对所有大的战争的日益增加的参与发生在宪政国家。伴随着分裂主义要求的重要的例外,这种竞争很少关心领土将被某个国家占领;相反,参战者为了什么集团将会在其所建立的边界内控制现存的国家而战。国家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清洗或者排斥开始以世界历史中史无前例的规模产生难民。由于苏联和美国两极的霸权造成的欧洲一致的转移消灭了总的和平解决的习惯。

这一系列的变化,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构成了显著的和过去的断裂。它改变了战争的目标: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再希望通过交战获得(或者担心失去)大量的领土。以色列和其邻国的领土战争不会令 18 世纪的欧洲人感到惊讶,但是在 1945 年以来的时期它们变成了异常的事情。战争日渐关心的是在每个国家谁将统治,哪个国家将控制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

在国家之间什么样的资源、人力和产品转移将会发生。

第四节 国家联成的世界的形成

然而,在上个五百年里,三件显著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形成了边界和相互关系都明确的民族国家。第二,欧洲体系实际上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第三,其他国家,行动一致地,对新的国家的组织和领土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影响。自从欧洲的最主要的国家通过对非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化、征服和渗透积极地推广这个体系,这三个变化紧密联系。首先是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创立,然后是联合国的创立,只不过批准了把地球上的所有人口组织进了一个单一的国家体系并使其合理化。

注意这些变化的意义。平均来说,国家的形成是从相对“内部的”走向强烈的“外部”过程。战争在我们已经考察的整个历史中在国家的形成上有着非常大的分量;在那个程度上说,这个过程总是外部的。然而,我们越往回追溯,就会越多地看到统治者和可能的统治者努力去驯服他们名义上控制的领土上的百姓,击退在那些领土内的武装的对手,征服邻近的土地和民族,建立起他们自己对武力的垄断。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无意之中建立起国家,这些国家的结构带着促使其产生的斗争和讨价还价的痕迹。相反地,当我们往前考察,我们看到对某一具体国家的命运的国家之间的日益突出的一致——至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见 Chapman 1988, Cronin 1988, Cumings 1988, Dower 1988, Eden 1988, Geyer 1988, Gran 1988a, Levine 1988, Rice 1988, Stein 1988)

比利时作为单独的国家出现就说明了在欧洲外部影响的重要性。(Clark 1984, Zolberg 1978)在 1831 年前的比利时从来不是一个明显的和统一的国家,它形成于大约在荷兰人反叛之后由西班牙,然后是奥地利哈勃斯堡维持的低地国家的区域。法国在 1795 年征服和吞并了那些领土,并一直控制着它们直到 1815 年的战争解决;法国二十年的管理改变

了该地区的经济,并使其成为欧洲主要的工业中心之一。拿破仑战争后的解决方案将该地区划归新形成的坐落于海牙的荷兰王国。不久实业家、自由主义者、讲法语的当地人和天主教徒(这些范畴相互重叠,但决不是相同的)的联合迫切要求地方权利。

1830年10月,该联合的活跃分子,在邻近的法国的7月革命的鼓舞下,形成了一个革命的临时政府,而且法国报复的威胁使得荷兰政府不敢动用武力做出反应。在11月,英国召集了一次欧洲强国会议,该次会议宣布了荷兰王国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在法国和英国的密切监督下,刚刚受过洗礼的比利时人于是着手招募国王并起草自由宪章。当伦敦会议提出一个令荷兰相对不快的长期的解决方案时,荷兰的威廉国王派来了军队,打败了临时召集的比利时军队,并且激起了法国人的入侵;后来英国也加入到把荷兰军队从现在的比利时领土驱逐出去的努力。在1839年,威廉国王最终接受了不仅承认比利时而且提出了一个使其作为独特国家的独立的(如果说领土上减少了的)卢森堡公国解决方案。自始至终,比利时是通过由其强大的邻国挖掘出的渠道进入欧洲国家体系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国的契约逐渐地缩小了国家间争夺权力的发生范围。它们通过强加国际战争解决方案、殖民地组织,推广军队、官僚机构以及其他国家机构的成分的标准模式,创建负责照管国家体系的国际组织,集体保证国家边界和为了维持国内秩序进行干预等方式达到这一点。这种范围的缩小限制了国家形成的其他道路。在全世界,国家的形成集中在根据由大国提供的、资助的和推行的模式的民族国家(不是帝国,不是城邦国家,不是联邦,而是民族国家)的或多或少深思熟虑的构建。

不仅是可能的统治者或者他们的资助人像预制房屋那样号令整个国家。当一个欧洲国家在其殖民地之一建立起法庭、财政系统、警察、军队或者学校,它通常都遵循着欧洲的规则。当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组织市场、制造、或者军事力量方面转向大国求助时,大国一般会劝说它们按照欧洲的方式来组织。当诸如世界银行的国际机构贷款给斗争中的非欧洲国家,它们常常规定那些国家要进行把它们纳入欧洲的和美国的惯例的“改革”。最后,当贫穷的国家四处寻找地方来教育它们的官僚、技术人

员和军官,它们常常把他们派到欧洲或者它的一个分支地方去培训。一旦民族国家在欧洲和主要由欧洲人定居的世界上的部分地方占了优势,它就会为每个地方的国家形成起模板作用。

为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整个世界胜出是因为它们首先在欧洲胜出,然后欧洲的国家产生了复制自己的效果。它们在欧洲胜出是因为它们在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位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法国和西班牙——采取了暂时压倒其邻国的战争形式,而且它们的支持产生了作为副产品的国家机构的中央集权、区别和自治。那些国家在15世纪晚期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它们最近完成了把竞争国家从它们的领土上排除出去,因为它们有途径接触那些能够帮助它们在财政上支持用昂贵的防御工事、大炮以及最重要地是雇佣兵等手段来进行的战争的资本家。

我毫不夸张地说:诸如荷兰共和国和威尼斯等海上国家有效地和陆地大国竞争了又一个世纪;海岸的控制在为内部提供给养仍然是关键的,它们的舰队有助于保护其免受侵略以及海外帝国在重要性上与日俱增。某些相对没有商业化的国家,如瑞典和勃兰登堡,通过一次在其领土上的巨大的强制的渗透而成功地建立起有竞争力的军事力量。但是最后只有那些把重大的资本资源和产生巨大国内军事力量的大量的人口结合的国家在新的欧洲战争风格中略胜一筹。那些国家就是,或者成了民族国家。

即使法国和西班牙在15世纪末不那么具有侵略性,民族国家毫无疑问也会在欧洲盛行。在16和17世纪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曾经一度企图在欧洲内部征服他国:瑞典、勃兰登堡和俄国立即泛上心头。此外,荷兰共和国、葡萄牙和大不列颠开始争夺海外帝国,给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带来了许多相同的效果。欧洲国家在1500年对地球上的7%的陆地保持着政治控制,在1800年是35%,在1914年是84%。(Headrick 1981:3)这一扩张本身加速了民族国家在全世界的增加。如果国家的其他结合在斗争中占优势,其特点就会大大地影响欧洲国家形成的道路和结果。而且,在16世纪的资本的扩张和战争的重新组织共同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日益上升的优势。

第五节 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一个由战争造成的体系决定了该体系成员交战的条件。国家交战的条件在我们考察的漫长时期(不止一次地)变化很大。伴随着一个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作用、它的统治阶级的特点以及代表其统治阶级从事的保护活动的类型的重大调整,作为现在常见的在变化的环境下继续起作用的不变的逻辑的作用的条件变化了:统治者通常企图建立他们能够享受来自强制的回报的安全区域和加强了缓冲区域来保护安全区域。当这种努力很成功时,缓冲区域就变成了安全区域,这促使强制的运用者在旧的缓冲区域周围获取新的缓冲区域。只要邻近的国家也遵循相同的逻辑,战争就会接踵而来。在欧洲一旦罗马帝国崩溃了,成千上万的军阀从事这相同的练习。因此产生了永不停息的广泛的(如果说主要是区域性)战争。国家领土后来的扩大、紧凑的民族国家取代若干块领土以及通过国际协议的边界保护极大地减少了易受攻击的边界的长度,但是没有消除促进战争的逻辑。

然而,其他的条件彻底地改变了。在世袭制时代(在欧洲大部直到1400年),控制大量强制手段的集团典型地是家族集团、相邻群体、武士的誓盟群体的三者之一或者三者合一。公爵领地的世系就是第一类的例子,圣堂武士(crusading orders)是第二类的例子,而封建贵族则是它们的结合。控制大量强制手段的集团一般(必要时使用武力)寻求使他们能够从周边人口榨取的贡赋最大化,并且确保未来他们的子孙后代的贡赋的可使用性。通过通婚,创造出一个贵族等级,并且(在从土地和税收的捐赠中获益的天主教会的鼓励下)建立起普遍认同的继承规则,统治阶级为王朝政治(在其中婚姻巩固了国家间的联盟,继位成了国际关注的对象)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农民群体、城市民兵、强盗集团以及其他对国家权力并无要求的集团常常进行他们自己的战争。结果,当一个权力拥有者同其邻居相比显示了虚弱的迹象,当一场有争议的继位发生以及当一

个新的征服者掺和进来时,战争往往会发生。

当然,在我们的一千年的前半时间里,要问国家什么时间在打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时间在打仗。确实,大量的军队主要来自民兵和领地内的征集,这意味着战役平常只在每年的几个月里进行。然而,当一场国际战争开始时,它通常有进行许多战役。从大概 1150 年到 1300 年的几十年打断了在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几乎每年有的节奏,但是即使在那时,斯堪的那维亚、俄国、意大利、地中海和伊比利亚都有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且,在主权剧烈分裂时期,士兵、匪帮、海盗、起义者以及各行其是的封建领主之间的差别模糊成了强制行为的连续体。在大的战役之间,地方战斗迅速增加。在 1500 年以前,更为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国家在打仗,而是谁和谁打,频繁程度如何,激烈程度如何。

从 16 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国家体系的巩固、军事活动同市民生活的分离、市民武装的解除加深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战争,一旦开始就变得更加激烈、更具破坏性、更加持久,但是也成了更加稀少的事件。在这一方面,20 世纪只是超过了长期的趋势。

在经纪人时期(大约是在 1400 年到 1700 年的该大陆的重要部分),王朝的野心仍然决定着国家的策略,但是国家机构的庞大和战争努力的规模意味着支持国家的主要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限制着战争的可能性;只有在他们的同意和合作下,君主们才能集合参战的手段。在强制密集的国家,地主的利益举足轻重,而在资本密集的国家,则是资本家的利益起决定作用。

在分裂时期的政权统治下,战争依然跟随着王朝的机遇、邻国的虚弱以及诸如鞑靼人、土耳其人的征服者的到来,但是几件事情改变了。统治阶级的商业机遇和威胁成了更加频繁的交战时机,经济基础正在扩张的国家变得更有能力抓住机遇,消除威胁,国家间的联盟进入了那些机遇和威胁的定义,此类联盟常常形成以制约当前最强大的国家的扩张,扩张的国家更加经常地打仗来扩大它们的邻近的领土而不是附加新的缴纳税赋单位而不管它们的地点,而且由统治者企图榨取战争手段或者推行国家宗教激起的大规模的反叛,为邻近国家的干预提供了更频繁的机会。与此同时,市民人口的逐步解除武装减少了非政府集团作为战斗者——但

是,唉,却作为牺牲品——的战争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对同一教派的人的保护替代了王朝的继承作为一个国家干预别国事务的基础。

随着欧洲国家进入民族化阶段(特别是在 1700 年到 1850 年间,一类国家和另一类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王朝丧失了其大部分代表自己开战的能力,而且某些我们模糊地称之为“国家利益”的东西变得支配着国家参战或者不参战。国家的利益综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也混合了在欧洲内部控制邻近领土和人口,以及更激烈地竞争欧洲之外土地的更加强烈的动力。

在民族化下,三个关键的变化影响了战争的条件;整个国家体系的现状——显然是当前达到的力量的平衡程度——开始在战争的可能性及地点造成很大的区别(Levy 1988);逐渐增加地,正在达到力量平衡的几对国家相互开战,特别是当它们占领了邻近的领土时;(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Moul 1988, Houweling and Siccama 1988)整个(而不是人均的)国家的收入开始前所未有地限制国家的军事能力,结果是大的商业和工业国家开始在国家体系中称雄。在对收获的合理期望和损失的合理的最小化的基础上的战争时代降临到了欧洲及其扩张范围。与此同时,三方更加频繁地干预民族对混合的君主的反抗,如法国、英国和俄国参与到希腊人的 1827 年对土耳其帝国的反抗中时那样。至于干预的基础,共同的民族性取代了王朝的继承和共同的宗教。

在随后的专门化时期,开战的条件相对变化很小,除了对帝国的竞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而不是国家领土起了比以前更大的作用。在 1945 年后,苏联和美国间的疏远几乎消除了欧洲国家间的在欧洲的战争,但是使得在欧洲之外的苏联的、美国的和中国的权力之间的接触点成了追求国家利益的关键地方。

随着军事力量的民族化和专门化,国际战争发展出了和革命、起义和内战的相应的关系。在那些王朝通常控制着国家的世纪里,统治的宗族集团的削弱,例如,国王去世留下一个婴儿继承人或者根本没有继承人——给了国家外的竞争对手进攻的机会。当起义先发生时,它招来了外部力量代表挑战者进行干预。由于宗教的区分成了国家的根本事务(这特别是在 1520 年到 1650 年间),干预的动机变得更加急迫。统治阶

级从不情愿的人口中榨取日益增多的战争手段的努力和国家因战争中的损失造成的削弱有时激起起义和内战。如果反叛联盟赢得反抗统治者的战争,取代他们,并且从事社会改革,全面的革命就随之而来了。

欧洲所有大的革命,以及其许多较少的革命,都始于由战争导致的紧张。英国革命始于查理一世(Charles I)在欧洲大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绕过国会获取用于战争的财政收入的努力。法国君主在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促进了法国革命的斗争。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俄国帝制的统治失去了信任,促使了军人倒戈,使国家的弱点暴露无遗;1917年的革命接踵而来。

国家的形成也影响了没有达到革命的民众的集体行为的节奏和特点。在经纪人时期和民族化时期,对金钱和人员的临时的但是大量的需求反复地激起在乡村或者地区层面的反抗。地方百姓赶走了收税者,袭击了税款包收人的住房,把年轻人藏匿起来抵制征兵,请求国王免除债务,要求支持者为他们调解,抵制将他们财产登记造册的努力。他们特别瞄准那些和国家有着联系的当地人,无论国家官员还是作为间接统治的代理人。伴随着后来的民族化和转向专门化的阶段,民众的集体行为本身民族化了,并且变得更加自治;由于民族国家的政策和需要变得越来越直接地涉及他们的命运,工人、农民以及其他普通百姓联合起来对国家提出要求——要求赔偿,当然,也要求他们以前在国家层面从未享有的权利。(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Tilly 1986)政党、特殊利益联盟、民族的社会运动以及所有其他民众的政治开始形成。因此国家不仅推动了国家体系和具体国家的形成,也推动了对国家的权力的分配。即使伴随着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政府的平民化,战争仍然是民族国家的规定性活动。

第六节 六个突出的问题

作为一种测量我们走得多远的方式,让我们回到引起这次探求的问题。这一次,让我们颠倒一下顺序,先看更为细节的问题,作为普遍问题

的先导。

怎么解释欧洲的国家形成的总体上大致同心圆的模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问题在某些方面表述错了初始情形。在 990 年，几乎所有的欧洲人生活在分裂的主权下。然而分裂的特点和程度不同。在外圈的不同部分，大地主和游牧袭击者以相对自治的方式部署强制，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当中的某人拥有诸如公爵、可汗或者国王的称号，从他人处得到尊敬和贡赋，并且对其他地方的断断续续的军事服务拥有权利。

欧洲在国家形成道路上的总的地理上的差异反映了强制和资本的差别分布。在外圈层，典型的有俄国和匈牙利，集中资本的稀少，随之而来的城市和资本家的弱小，武装地主的力量，以及和像蒙古人那样强大的侵略者的斗争，给予了那些能够从地主和农民榨取军事力量而无需筹集大量现金的统治者以一定的优势。遵循着强制密集道路的国家挑选地主和神职人员，驯服农民，建立广泛的官僚机构，抑制它们的资产阶级。

在内部地带，典型的有威尼斯和荷兰，资本的集中和资本家的优势同时加速了军事力量的创建并且禁止了擅长于强制者对国家的篡夺。几个世纪这个地区的海上国家享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然而，它们最终发现自己被基于陆地的能从其自己的人口招募大量军队的国家所包围或者说征服。

在其之间有那些把大量国内资本来源和促进大量军事力量的创建的地主-耕种者关系相结合的国家——突出地有法国、英国和后来的普鲁士。它们能用自己的资源支持军队的优越的能力最终使得它们优越于其他类型的国家。而且，建立军队的活动使它们很早就成了民族国家。

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所有三种经历的有趣的复合：只要地中海贸易繁荣就表现得很像城邦国家的由巴塞罗那统治的加泰罗尼亚；把军事力量建立在武士贵族和屈服的农民的基础上但是利用外国财富租借雇佣兵的卡斯提尔；显著地分为里斯本和有着悠久农业的内地等两部分的葡萄牙，在瓦伦西亚(Valencia)、安大路西亚(Andalusia)、纳瓦拉和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组合。但是那时所有国家都是比我简单的类型学的需求要复杂得多的复合物：英国有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海外领土；普鲁士有从农村的波美拉尼亚到城市化的莱茵河的最终的延伸，土耳其帝

国有其有时通过贸易的地中海岛屿从波斯延伸到匈牙利的跨越,形形色色的哈普斯堡帝国及其后继者,分散在大部分欧洲的气候和经济中。国家形成的强制密集道路、资本密集道路和资本化强制的道路间的区别占了地理上的差异和当时的差异的重大部分,但是并非所有差异。

尽管明显的利益相反,为什么统治者频繁地接受代表屈从于那个国家权限的人口中主要阶级的机构的建立?君主们正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玩着同样的游戏——战争和争夺领土游戏。战争变得越昂贵、要求越高,他们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为了必要的资金而讨价还价。这讨价还价产生了或者加强了议会和国会、最终是国家立法机构形式的代表机构。讨价还价的范围从选举的特权到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但是它在君主和国民之间留下了契约。尽管诸如法国和普鲁士的统治者几个世纪来设法抑制大多数旧的代表机构,当经常的税收、信贷和国家债务的偿还对武装力量的不断产生来说变得必不可少时,那些代表机构或者它们的后继者最终获得了相对朝廷更多的权力。

为什么欧洲国家在关于把城市寡头和机构并入民族国家结构方面差异如此之大?总体上说,城市机构在集中资本盛行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民族国家机构中持久的因素。这种现象产生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强大的资本家群体长期具有阻止非资本主义的地主在他们附近积累强制力量的企图的动机和手段;第二,因为随着战争的规模和开支扩大,有着信贷和商业化的容易收税的经济的统治者在战争行为中获得了很大的优势,这一事实给予大的贸易城市以及它们的商业巨头很大的讨价还价的权力。

一个极端是,波兰的资本的弱小加速了地主对国家的掌握,这种掌握到了这种程度,国王从未获得超过其名义上的国民的有效的优先权。除了格但斯克*部分例外,波兰贵族把他们的城市挤榨干了。另一个极端是,在荷兰共和国的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把国家政府降低成城邦国家的联盟。然而,那些联盟的城邦国家的巨大的商业力量给了它们迅速地形成海军和雇佣军队的手段。在国家-资本地区,统治者使城市附属于国家并

* Gdansk, 旧称 Danzig 但泽, 波兰港市。——译者注

且把城市当作统治的工具来使用,但是也在武装力量的生产方面运用它们的资本和资本家;国家并非总是把城市机构和城市巨头合并到国家结构中,但是通过讲价卖掉代表形式,这给予它们很大的权力。

为什么政治的和商业的权力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和城邦帝国落入了大西洋的实质的国家和相对从属的城市?我们对从 990 年到 1990 年的一千年的考察把这个重要的转变纳入了视野,并且对单一霸权的纯粹的更替(例如,从威尼斯到葡萄牙,再到英国)提出了质疑。也许为 19 世纪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棕榈叶授予大不列颠(并且从而有助于解释在 1815 年到 1914 年间大的欧洲战争的相对稀少)。但是在此之前至少两个强国总是争夺在欧洲的优势;其中没有一个达到了这一点。在商业方面,在 15 世纪晚期变得明显的扩张冲击了大范围的欧洲城市地区;它支持了其中心依然处于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国家,但是其分支达到了德国、佛兰德斯和法国的文艺复兴,也支持了其开始焦点处于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城市的宗教改革。此外,威尼斯、热那亚、拉古萨以及其他地中海的城邦国家继续繁荣(如果说不是优胜)到 18 世纪。

然而商业和政治的重心在 15 世纪的确向西北移动。首先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疾病和最终欧洲绕过非洲到达亚洲的公海航线的建立,欧洲的陆地、沿海和东方的城市的商业交易萎缩了。然后相互加强的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贸易使得卡斯提尔、葡萄牙、法国、英国和荷兰比欧洲其他地方富饶。所有那些国家利用他们新的财富建立军事力量,并且运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来寻求新的财富。组建庞大军队、大的舰船、远程航海以及海外征服的能力给了他们超过其水路被穆斯林国家限制的地中海的城邦国家的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和宗教组织失去了它们作为欧洲国家流行的类型的重要性?在整个欧洲国家历史中,交战和保护导致了榨取活动,这包括和那些拥有战争和保护手段的人讨价还价。那种讨价还价有时进一步导致国家参与生产、分配和仲裁。它总是创造出根据它发生时所处的经济和阶级结构而不同的某种形式的国家结构。

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以及宗教组织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地方在欧洲繁荣到了 16 世纪;确实,这种或者那种帝国在 1557 年查理五

世(Charles V)退位时在欧洲仍然占优势。然后民族国家开始获得优先权。它们如此是由于两个相关理由:第一,在像英国和法国等较大国家的商业化和资本积累减少了小的商业国家交战的优势;第二,部分地作为较大的国家挤榨其经济或者殖民地来支撑武装力量的能力增长的函数的战争在规模上和费用上扩大了。它们在战争中获胜。较小国家保护自己的努力要不转变为、吸收到或者结合到民族国家中去。

为什么战争从为了贡赋的征服和武装的贡赋收集者间的斗争转化为持续不变的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战斗?记住从世袭制到经纪人时代,到民族化再到专门化的转化。是什么驱动着那些转化?成功的贡赋收集者发现自己处于对广泛的土地和人口不直接的控制中,这些土地和人口的管理和利用——特别是在和其他大国的交战时期——创造了持久的国家结构。那些努力把大量的资本和资本家纳入其战争准备中去的人口众多的国家首先通过经纪人业务创建了陆军和海军,然后通过民族化,接着通过专门化把武装力量纳入国家结构。在每一阶段,它们都有在比其邻国大得多的规模上获得和部署最有效的军事技术的手段。由于战争酬报的是效力而不是效率,它们给予较小的邻国艰难的选择:以很大的代价来做出相同类型的军事努力、接受征服或者找到安全的屈从的契机。民族国家排除了其他形式的战争。

总而言之:怎么解释在自从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到民族国家的不同的变种上?为什么变化的方向如此相似,但变化的道路却如此不同?欧洲国家起始于作为集中的资本和强制的一个分布函数的非常不同的位置。它们随着资本和强制的交叉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军事竞争驱使它们所有国家走向总的相同的方向。它支撑起民族国家的创建和最终优势。在此过程中,欧洲人创立了在整个世界占优势的国家体系。我们今天就生活在那个国家体系内。然而欧洲之外的世界只是表面地像欧洲。在欧洲的国家体系延伸到地球的其他地方时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包括军事活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有关欧洲经验的知识有助于识别当代世界的某些令人不安的特殊性。下一章(即最后一章)着重探讨这些特殊性。

第七章

1992 年的军人与国家

第一节 政治的歧途

就在二十年前,许多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大致重复西方国家形成的经验。这种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的“政治发展”的观念,概括了标准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国家能够转向充分参与和效力的终点)的概念——参与和效力的模式当然是这种或者那种现存的西方国家。伴随诸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古巴的明确的可选择的模式的出现、预期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经历的现存的发展方案令人难堪的失败、第三世界领导和学者对西方学术建议的适当的抵制而粉碎的政治发展主义者们(developmentalists)的信心,在大国对待第三世界中转向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西方学者本身关于如何恰当解读过去经验的争论。(参见 Evans and Stephens, 1989)伴随着“现代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其他善意的但是令人困惑的口号,政治发展很快从分析的词典中消失。

正如现在看来旧的分析是误解那样,假定非西方国家将会经历某些和它们的西方兄弟相同的经历并且最终看来和它们非常相似并非完全愚蠢。正如许多西方国家的最新的殖民地,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是从可追溯到西方路线的形式的组织以及合并殖民地的重要部分开始它们的事业

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国家领导人自觉地寻求建立具有西方理念的政府、议会、政党、军队和公共服务机构。

而且,他们这样说:第三世界领导宣称他们将从政治上发展他们的国家,使其现代化。主要的西方国家积极地支持他们,借出专家、模式、培训计划和资金。只要日本还在从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蹒跚走出,只要中国还在被其内部斗争所消耗,显然就没有其他模式可以利用。选择似乎只是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在每一极之外没有可行的国家形成道路。这整个范围简述了欧美经验的这个或者那个版本。谈到1960年的东南亚,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断言:

东南亚占优势的主题是这些新的国家的领导人从他们的过渡社会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这些领导人使他们的人民投入了建立政府的代表机构和发展经济生活的更高效率的生产模式的任务。尽管为了这些目标的狂热并不缺乏,但很难估计它们被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还很难辨别正在东南亚演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失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领导人和市民也许会遇上自我怀疑的麻烦。朝向更加独裁的做法的趋势已经广为流传:例如,军队正逐渐扮演原来留给民主政治家们扮演的角色。(Pye 1960:65—66)

注意这里的语言:它谈到了在一个不甚了解的并且危及这个事业的形势中建立其特点已经众所周知的某种东西。这个要建立的“某种东西”就是按西方构思的有效的民族国家。自然,派伊看到了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会出现在东南亚的可能性,甚至东南亚的领导人也许迫切要求某种不同的东西。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都宣称他们寻求第三条道路,至少是模糊的社会主义的,处于美国的岩礁妖魔(Scylla)和俄罗斯的大漩涡(Charybdis)之间。但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决定了选择范围。带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和敏锐,政治发展主义者正确无误地说到了这一点。

甚至像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等对历史很熟悉的分析家也散布了具有政治发展连续阶段特征的模式。布莱克区分了不少于七种的不同具体的现代化道路,那些道路由英国、美国、比利时、乌拉圭、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里亚(按此顺序)所说明。(Black 1966:90—94)但是他

主张他的所有不同的例子经历了四个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的领导的增强,经济的和社会的转变,然后是社会的融合。在他的分析中,以前的历史精确地影响某个具体社会如何面对这些挑战。但是最终他所考察的所有的欧洲案例在按照相同的顺序跨越三个前面的门槛之后达到了某种像社会融合的东西。

这似是而非的集合的推理有很大的缺陷。它假设了一个单一标准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存在,每个国家或多或少独自地经历了相同的内部过程,西方经验就是这个过程的例证,当代西方国家已经总体上达到了这个过程的终点,以及问题只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之一。把这些假设放到建设“现代”非洲的、亚洲的、拉丁美洲的,或者中东的国家中加以检验的努力立即引起了怀疑。主要的掌权者抵制或者歪曲现存政府组织的转变,官员们把国家权力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政党成了种族集团或者老板-客户联系的工具,国营企业倒闭了,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镇压了西方风格的选举政治,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更多的特点挑战着西方模式。

西方模式?事实上,“政治发展”的标准解释也误解了它们表面上利用的西方经验。在总体上,它们将其表述为有意识的解难题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一系列标准的内部产生的过程并且最终产生了成熟的稳定的国家。对奥肯斯基(A. F. K. Organski)来说(1965:7),那些阶段是:(1)原始统一的政治;(2)工业化的政治;(3)国家福利的政治;(4)富裕的政治。

奥肯斯基的有特色的方案把大量的第三世界的经验压缩进了它的第一阶段,但是描绘了一条清楚地走向现在的欧洲世界及其分支的道路。

同样地,大量的政治分析家以为向现代的转变经历了从一个平衡条件——传统社会,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到另一个更高的现代的平衡条件的转移。在此之间,根据这一主张的思路,有着迅速的社会变化的动荡。因为社会变化在 20 世纪发生得比以前更加迅速得多,新的国家比其欧洲前辈经受着更大的压力。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冒着同时发生国外和国内冲突的风险,两者相互刺激。(参见 Wilkenfeld 1973)然而,最终他们将学会控制冲突并达到现代类型的稳定的政府。至少,关于政治发展的许多文本是如此教授的。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西方经验的更为清晰的解读使得那些假设的不足变得明显。本书从后来的知识宝库中借鉴了许多,并重新将其投资到西方国家历史的重新解释的积累中去。在前面的几章里,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强制和资本的地理学、主要掌权者的组织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的函数的欧洲国家形成的轨道的差异是如何之大。我们已经考察了在统治者、其他掌权者和普通百姓间的一长串的不平等的斗争是如何创造了特殊的国家机构以及对国家的要求。我们注意到了有多少欧洲国家的最终的组织的集中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在欧洲内部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我们见到了战争以及准备战争对国家结构的其他特点的深刻影响。所有这些观察都导向结论——模糊但是有帮助的——即第三世界的国家形成应该是显然不同的,在强制和资本之间的变化了的关系应该为那个差异的性质提供线索。

当代经验应该以什么方式不同于欧洲过去的经验?在几个世纪的在国家形成的资本密集道路、强制密集道路和资本化的强制道路之间的分歧之后,几个世纪前欧洲国家开始集中起来;战争和相互影响引起了这集中。尽管共享的殖民地经历给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强加了共同的特性,然而,至今没有大的同质化发生在它们当中。相反,任何研究欧洲国家形成的学生几乎都会注意到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差异。差异标志了包括巨大的古老的中国和很小的崭新的瓦努阿图*、包括了富裕的新加坡和非常穷困的乍得(Chad)等任何种类。我们不可能成功地概括这样一个同质化系列的经历。而且,根据任何飞思遐想,并非所有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是“新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屹立于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存在的国家之中。暹罗/泰国有许多世纪的岁月,而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把它们和1945年来形成的国家排列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它们最近才在欧洲斗争创造和决定的国家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员资格。

然而,更为仔细地看看:准确地说什么是关于第三世界的同质化。它们的组织结构并非那么像市民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世界上国家的组

* Vanuatu,西南太平洋岛国,旧称新赫布里底群岛。——译者注

织上的形式特征大约在上个世纪引人注目地集中于一点;对某种西方模式或者另一种的采纳已经变成在获得国家体系中的以前成员承认的实际上的先决条件。现在的 160 多个被承认的国家覆盖了比 1500 年的 200 多欧洲国家(包括城邦国家、城邦帝国、联盟、王国、领地帝国以及更多)要窄得多的组织范围。除了相对集中的联盟和非常虚弱的王国,那些曾经一度繁荣的政治形式几乎都消失了。在 1500 年之后,大规模交战的压力和大规模调解的谈判驱使所有的欧洲国家向着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转化。从“内部的”国家形成到在欧洲盛行的“外部的”国家形成的转移继续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而且在世界上非常不同的部分给国家强加了一个共同的定义。当代国家结构,从狭义上看,在法庭、立法机构、中央机构、战场管理、常规军队、专门的警察力量和公共服务的全套设置方面彼此很像;甚至在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混合经济之间的差异也未能超出这些共同的特性。

然而这样的形式上相似的组织根本不以相同的方式运作。差异在于表面上不能区别的法庭、立法、政府机关或者学校的内部运行和政府机构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在欧洲的经验中,国家采取在外部战争的紧急事件和国民百姓的要求之间进行协调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国家的组织都适应当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正如现在的民族国家以它们自己的形象来塑造新参与者,当地的适应却发生在市民与国家的关系之中。近来在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的强制环境间的差异对国家形式结构的影响比它过去的要小得多,但是对市民与国家的关系的影响甚至更大。在那个方面,当代世界仍然是格外多样化的。

第三世界存在吗?当然拉丁美洲、中东和东亚国家在内部组织和在世界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方面差异很大。从这样一个粗糙的复合的范畴出发的理由在于这个事实:低收入地区的国家长期受着欧洲及其分支的形式上的控制,它们通常采取欧洲或者美国的组织形式的模式,它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它们很少能够施加控制的超级大国的斗争,并且构成了和国家体系中的新参与者的联盟的不稳定的但是周期性发生的集合。(Ayoob 1989)在向非欧洲世界延伸中,国家体系并非简单地保持不变;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独立国家的进入以和以前欧洲经验的对比能够说

明的方式改变了这个体系。

那么从当代第三世界的经验和那些长期记录已经可以利用的民族国家的比较当中我们还会有所收获。至少,这一比较会帮助我们采取两个有用的步骤:(1)抛弃已经证明是错的国家形成的观念(在浪费时间把它们运用于当代经验之前);(2)增强我们的判断力,在现在发生在世界上比较贫困地方的国家的形成、转化和变形中分辨什么是与众不同的,什么是常见的。

反思欧洲经验,我们也许期望发现什么会发生在当代世界?考虑到欧洲内部国家形成的多样性,我们没有理由预期一个简单的变化轨道。但是我们也许有理由从欧洲推断出:

- 强制和资本的相对分布对国家形成道路的重大影响;
- 大的城市群的存在和不存在时的显著不同的变化方向;
- 战争和准备战争对国家结构的创造和改变的强烈作用;
- 通过(a)财政结构和(b)武器和军事人员的来源来协调那些作用;
- 国家权力通过中央机构的建立、对用于购买军事手段的信贷和征税的依赖的增加以及和国民百姓就那些手段的讨价还价的平民化;
- 国家组织形式的从“内部的”到“外部的”决定的趋势的继续。

总之,和大多数欧洲国家形成的情形是如此的不同,自然,这些仍然只是适应性的假说。然而它们大大地改进了旧的观念,那种观念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不知何故将会简单重复最有效的西方民族国家的理想化的经验。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和遗产

那么,是什么把当代世界的国家形成和过去的国家形成区别开来?尽管20世纪的战争比以往的伤亡更大,战争在特点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1945年以来,大规模的内战(常常得到大国的支持和煽动)在世界上已经变得比在欧洲经验中的更加常见。核武器以及其他危险的威胁

已经纳入大的战争的可能的成本。在几乎全球规模上的两极的国家体系的形成影响了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前景。根据国家之间关系的数量随着国家的数量在算术上的增长而在地理上增加的原则,仅仅相互联系但是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的增殖使得国家体系变得复杂。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国家体系和参与战争的国家。作为交战国的公民,作为战争区域的居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感受到了战争的冲击。那场战争打破了所有杀戮、财产毁灭和使人民流离失所的记录。通过在广岛(Hiroshima)和长崎(Nagasaki)投掷原子弹,美国首次在历史上把具有在几天之内毁灭全人类的潜力的早期武器引进到战争中。

我们能够合理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放到 1938 年(当时日本和俄罗斯开始打仗,而德国在吞并波兰、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或者 1939 年(当时德国入侵波兰,然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在每一种情况下,日本在 1945 年的投降标志着该战争的相对利索的结束。也许 1 500 万的战场死亡人数以及另外 2 500 万作为战争直接结果的死亡人数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在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的最具毁灭性的交战状态。维持至少 1 000 的战场死亡人数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波兰、美国、苏联、比利时、巴西、中国、南斯拉夫、荷兰、罗马尼亚、意大利、新西兰、法国、南非、希腊、挪威、蒙古、日本、德国、匈牙利和芬兰。(Small and Singer 1982:91)这场战争给日本、中国的重要地区和欧洲大部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战争结束时,两个国家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遭受了相对轻的损失(例如,40.8 万战场死亡人数,和德国的 350 万相比),但是是在一次重创的萧条之后动员了巨大的工业力量。毫不奇怪,美国(在战争中变成甚至更加强健的工业巨人)在世界国家体系中夺取了优势地位。苏联的崛起是一个很大的谜。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创(750 万的战场死亡人数,大概 2 000 万的总死亡人数,以及 60%的工业力量的丧失),但是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组织。(Rice 1988)毫无疑问,提高了的国家能力以及苏联控制的扩大到其他东欧国家,有助于解释两极世界的另一极。以前的同盟几乎立即变成了敌

人,这在四个世纪里第一次阻碍了总体上的和平解决。结果,战争中的失败者如日本和德国长期遭受着胜利者的军事占领,只是慢慢地在国家体系中重新获得成员身份。事实上,胜利者和打败者只是在占领中、临时的国际协议、部分的条约以及实际上的承认中零碎地解决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和规模,加上它的两极结果,压倒了国际体系提出类似1503年以来结束大的欧洲战争的总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国家形成的战后的过程大大不同于以前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的殖民地整个地转变为正式独立的国家方面。形势有利于欧洲人的退出:苏联在欧洲人殖民化的大部分地区没有殖民地,美国的殖民地也很少,而欧洲国家正忙于从战争创伤中恢复。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附属国要求和赢得了承认为自治的实体。光1960年比利时属刚果(the Belgian Congo)[现在的扎伊尔(Zaire)]、贝宁(Benin)、喀麦隆、中非共和国(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乍得、刚果、塞浦路斯、加蓬(Gabon)、科特迪瓦(Cote D'Ivoire)、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马里(Mali)、尼日尔(Niger)、尼日利亚(Nigeria)、塞内加尔、索马里(Somalia)、多哥(Togo)、上沃尔特(Upper Volta)[现在的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都在被承认为独立国家后不久加入了联合国。

与此同时,苏联,特别是和美国,延伸了它们的军事基地、军事援助计划和在全世界的情报设备的网络。(Eden 1988)例如,在东亚,美国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替代了非军事化的日本的军事力量,它重新组织并且经营了韩国的军队,并且资助中国的国民党军队(既在其失败了的大陆战役方面也在其撤退去控制台湾方面)。(Cumings 1988, Dower 1988, Levine 1988)而且,在1945年到1984年间,美国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给韩国、另外56亿美元给台湾,相比之下给整个非洲的援助总和是68.9亿美元,给整个拉丁美洲的援助总和是148亿美元。(Cumings 1984:24)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国家以显然很小的麻烦放弃了它们的封建君主的权位。除了阿尔及利亚(Algerian)独立斗争和印度支那冲突的早期阶段外,最激烈的战斗总是发生在不止一个集团争夺新国家的统治权的地方、解放了的部分人民要求自己的国家的地方、争权者的分裂引起了大国

的广泛干预的地方；中国、巴基斯坦、马来亚、肯尼亚、塞浦路斯、亚丁(Aden)、婆罗洲(Borneo)、韩国、越南、菲律宾共和国、卢旺达(Ruanda)、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提供了明显的例子。联合国从事新成员进入国际的国家体系的登记和管理的工作。

因此在 1945 年以来的时期里，我们可以把联合国在任何时间节点上的成员国数当作世界的国家体系的近似。这种近似是不完善的：瑞士、韩国、朝鲜、摩纳哥(Monaco)、图瓦卢(Tuvalu)以及几个其他个体(units)表现得像国家而不属于联合国，而白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共和国(直到最近的民族主义的骚乱，以前整个地是苏联拥有的附庸)作为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运用的权力的让步属于联合国成员国。但是，总而言之，这个组织包括了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并且吸收了新的国家(在它们在国际事务中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治时)。

图 7.1 提出了联合国成员国从 1945 年的该组织的创立到 1988 年间的地理分布。这个经历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国从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国家——旧的欧洲国家体系及其延伸出发，减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败国，并加上几个西方之外的重要国家。由于欧洲的和平解决方案依次出现、加勒比海国家开始获得独立和国际承认，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国家数量适度地增长。但是在 1955 年后亚洲国家以比西方国家的进入要快得多的速度进入联合国。从 1960 年以来非洲国家在新进入数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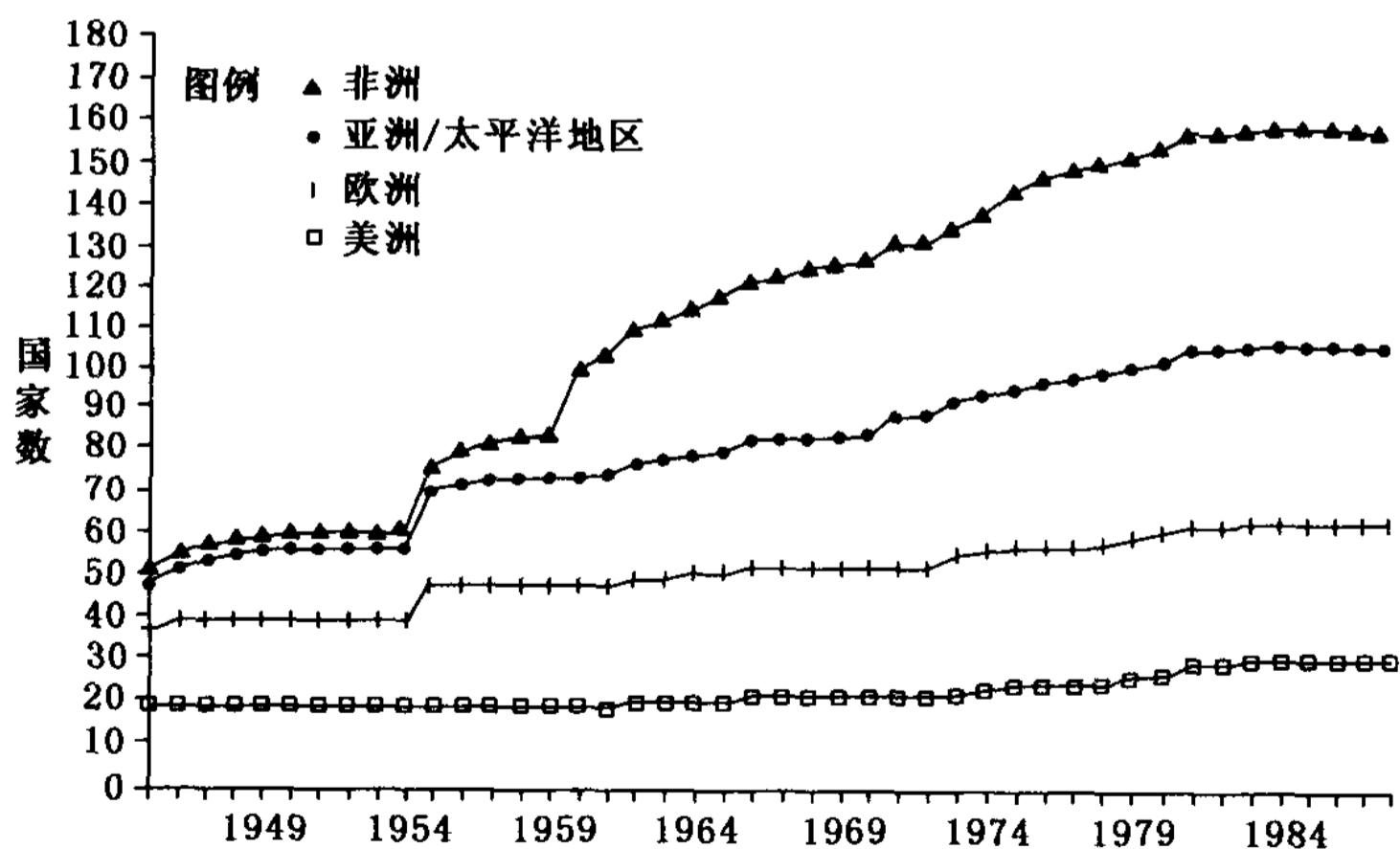


图 7.1 1945—1988 年联合国成员国的地理区域

占优势。平均来说,新进入国家遵循着强制密集的道路走向国家。撤出的殖民地强权身后留下很少的积累的资本,但是给其接任的国家赠送了从它们以前建立来维护其当地政府的镇压力量中抽取和塑造的军事力量。

相对地装备精良并且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那时擅长于平民百姓的控制和反对起义的战斗而不是国家间的战争。一旦欧洲拆除了它们自己的政府机构,军队、教会和西方集团常常是在国家领土上运行的最有效的组织。而且,那些武装力量有着显著的特征:它们的高级职位行列迅速地充满了以前在殖民地军队中占据下级职位的人员。它们常常继续着殖民地国家建立的招募方式,不成比例地利用一种语言、宗教和/或者地区的人口,从而变成了尖锐的种族敌对的工具或场所。例如,直到1966年尼日利亚的(Nigerian)军队使自己远离明显的地区的区分或者种族的划分。但是随着1966年1月的军事政变,裂痕开始展现。在7月,来自北方的军官联盟领导了另一次政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从军队和政权中驱逐(特别是来自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人(Ibos)。不久(1967年5月)东部,如比夫拉(Biafra),爆发了公开的反叛,非洲最血腥的内战之一开始了。(Luckham 1971:17—82)

除非在有超凡魅力的国家领导人有意的控制下,第三世界的军队通常抵制文职人员的控制。高级将领经常感觉到并且说,他们比纯政治家更懂得国家的使命需要什么以及在完成该使命的过程中如何维持秩序。直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国家通过在国际市场出售商品产生财政收入,在海外购买武器,并且接受来自大国的军事援助,武装部队却喜欢远离对文职政府批准的税收和征募的依赖。

然而,出口国家的军队能够保持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它们和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分形成的(或者未能形成的)联合,依赖于出口计划的成功。在玻利维亚,锡业大亨(他们依靠出口收入过着悠闲的生活并且在国内建立的牢固联系很少)的封闭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和锡业税收的武装查封。(Gallo 1985)

而且,战争的特点在1945年后变化很大。尽管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几乎消失,但在整个世界上致命的战争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频繁。表7.1展示了1893年以来的这种趋势,以给定年份的涉及至少1000人战场死

亡的战争中的战场死亡的千人为单位表示。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总数波动很大。然而数字清楚地展示了几个趋势：在一般战争时期死亡人数的集中；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国际的国家体系，体系之外的战争稳定或者下降；内战作为战场死亡人数的不规则的根源的越来越突出。新的内战数量从在世纪之初的每年大约 1 万战场死亡人数上升到在 1937 年到 1947 年间的每年 10 万死亡人数，然后在后来的三十年里大约围绕 10 万人数的标志上下波动。

表 7.1 (1893—1980) 给定年份中的涉及至少 1 000 人的
战场死亡的战争中的战场死亡人数

时 期	战争所在地				平民百分比
	国家之间	体系外	内战	总数	
1893—1903 年	30	96	112	238	47.1
1904—1914 年	8 860	0	270	9 130	3.1
1915—1925 年	161	83	506	750	67.5
1926—1936 年	213	0	955	1 168	81.8
1937—1947 年	16 292	100	1 161	17 553	6.6
1948—1958 年	1 913	50	372	2 344	15.9
1959—1969 年	1 250	0	1 830	3 080	59.4
1970—1980 年	78	73	820	921	89.0

资料来源: Small and Singer 1982:134, 263。

在 20 世纪, 战场死亡人数掩盖了由战争造成的越来越大的损失。对平民定居点的轰炸和炮击消灭了越来越多的非战斗人员人数, 更不用说他们的谋生的手段。在战争期间和战后, 国家开始前所未有地转移或者甚至驱赶百姓。而且有预谋地杀害全部人口的企图——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政治谋杀——从曾经一度似乎骇人听闻的失常变成了政府的常规手法。在 1945 到 1987 年间, 由国家代理人执行的有预谋地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在全世界大概引起了 700 万到 1 600 万人的死亡, 比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国内战争的直接交火中死亡人数还要多。(Harff and Gurr 1988)

1945 年后发生的国内战争有时源于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总的斗争。更常见地它们来自特殊的宗教、语言和领土集团自治的要求或者

想控制某个现存的国家要求。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随着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幅稳定的、相互排斥的国家领土的完整的地图,民族主义在战争中已经变得更加突出;被排斥的民族的掌权者寻找机会摆脱其他民族。

与此同时,大国日益增多地干预国内战争,通过确保同情的派别获胜来寻求那些控制国家的人们的结盟和合作。在20世纪70年代,实质的内战在安哥拉(Angola)、布隆迪(Burundi)、柬埔寨(Cambodia)、危地马拉(Guatemala)、伊朗(Iran)、约旦、黎巴嫩(Lebanon)、尼加拉瓜(Nicaragua)、巴基斯坦、菲律宾、罗得西亚和斯里兰卡爆发;仅在它们其中的一个国家(危地马拉),外部国家没有以实质性的方式干预。(Duner 1985: 140)1980年结束时,战争遍布菲律宾、安哥拉、危地马拉、阿富汗、萨尔瓦多(El Salvador)、尼加拉瓜、柬埔寨、莫桑比克和秘鲁。在大多数的这些国家,美国、苏联,或南非至少是从边缘上涉及了。尽管20世纪80年代和以前几十年相比提供了一些喘息机会,伊朗和伊拉克战争的毁灭性(也许100万战场死亡人数)、其他斗争在这十年的延续,使得在1991年的下一个时间间隔将不可能完成建立一个向下的趋势。

可利用的武器带来了新的毁灭程度,正如核武器的扩散用灭绝来威胁着整个世界。此刻,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印度明确地有它们自己的核武器。除此之外,德国、以色列、巴西、阿根廷、巴基斯坦和日本正在处理铀,这使得它们至少处于核军事力量的惊人的接近之内。其他表面上无核的国家并没有在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因此仍然是核能力的积极的候选人——包括西班牙、以色列、智利、古巴和南非。那么,大约世界上承认的国家的10%,包括最大的国家,要不部署核武器,要不保留这样做的权利。战争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仁慈。[泰勒(A. J. P. Taylor)用令人心寒的对核威胁的提醒来结束他的别的方式的闲话《战争如何结束》:“然而,别担心。第三世界将会是最后的”:Taylor 1985:118]与此同时,非核战争也在迅速增加。

战争的持续增长伴随着国际疆界的固定。除了少数几个大的例外,跨越边界的军事征服结束了,国家间停止了为争议领土而打仗,边界部队也从其防范直接进攻的努力转向了对渗透的控制。陆军(以及,为了此事,海军和空军)日益集中注意力于对平民百姓的压制、起义者的战斗和

权力的争夺。结果,随着其边界变得更加安全,政府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那些控制国家的人们把所有人口都当成他们的敌人,战争以巨大的速度产生难民(常规的估计把世界上的难民数字确定到 1970 年的 800 万和 1980 年的 105 万:Zolberg 1981:21)。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全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 20 世纪 60 年代在那个时代里带来了最大的转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去殖民化和新的国家进入国际体系的速度加快了,内战在其毁灭性方面以及其在所有战争中的份额大大地增加了,在拉丁美洲、亚洲和中东的军事力量增强了,为了控制非洲国家的军事斗争也迅速地增长。古巴导弹危机证实了美国 and 苏联的大致的战略均势,也稳定了它们在自己的边境周围相互排除影响的要求。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是,军人变得日益陷入国家的权力斗争中。因此,让我们把焦点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地方。

第三节 军人的崛起

尽管论述第三世界的军队总是比政治或者经济发展的分析更具尝试性和不连贯性,在此西方的分析也常常采取“成熟”的策略的含蓄模式。在这样的策略里,他们假定,无罪职业军人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但是明显从属的地位;这种模式是直接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国家形成的上几个世纪的经验得出的。那么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描述那条道路,将会或者能够从印度尼西亚或者刚果现在的军事条件引导到适合稳定民主的条件。那项工作需要解释偏离喜爱的道路的进一步的工作——特别是,令人迷惑不解的道路,在此道路上许多殖民地领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幸运地有了表面上民主的代议制政府,然而很快转向了军人统治。

大多数分析家和爱德华·谢尔斯(Edward Shils)一起认为,“当议会的民主政权发生摇摆时,军人统治是几个可行的并且明显稳定的替代之一。这些政权栽倒在其上的继承的和新产生的障碍比起这些国家的军队

精英的雄心更加坚定,尽管后者是不重要的”。(Shils in Johnson 1962:9)因此政治的发展和军事的发展融成了相同的问题。两种观点都溶化于怀疑主义、矛盾和绝望。

在比如非洲和南美洲的第三世界地区,一个学西方历史的学生必然会注意到在一方面,有着西方模样的20世纪的军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人政治的残余流行之间、在代议制政府机构和随意使用国家政权反对平民之间、在明显的传统的官僚和为了个人利益广泛运用政府组织之间的明显的断裂。这些断裂在那些最近脱离殖民地统治的国家里比第三世界的其他部分更加显而易见。和欧洲历史明显的教导截然相反,大政府、独裁统治以及军事化现在看来似乎是紧密联系的。

三十年前,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主张文职人员控制军队通过两个不同的过程发生,一个是不稳定的,一个是稳定的。不稳定过程是这个或者那一个文职集团使军队服从政府机构、宪法或者某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权力斗争;亨廷顿给予这个过程一个奇怪的名字——“主观性”控制。“客观性”控制,在他的眼中,来源于最大化军队的职业化和承认政治之外的独立的军事领域。“在历史上,”亨廷顿说,“客观性控制的要求来自军人职业,主观性控制的要求来自各种各样的渴望最大化他们在军队事务上的权力的文职集团”。(Huntington 1957:84—85)自相矛盾地,通过干预军队的职业化来寻求增加自己的权力的文职人员因此促进了军队夺取权力。根据这个主张,有一个有利于军队的观念,即军队的政治权力小和军队职业化程度高,有利于文职的控制,而不利于军队的观念是,军队的政治权力大和军队的职业化程度低有利于军队的控制。

这种把军队的政治权力插入到军队控制的解释,把循环的成分引入了论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检查亨廷顿认为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因素来打破这个循环:军队和其他权力集团的个人的从属关系,直接处于军官集团控制之下的资源,军官集团和文职权力机构的分等级的相互贯通,军官集团及其领导的威望和声望。因此如果一个军官集团主要是从统治阶级之外招募来的,我们会期望它拥有相对小的政治权力,拥有较少的非军事资源受其支配,拥有较少的非军事的办公室,并且少有受欢迎的部下。

亨廷顿是在一个关于第三世界军队的职业化的和加强文职控制的乐

观主义时代写作。在亨廷顿的五年之后,西班牙裔墨西哥的作者维克托·阿尔巴(Victor Alba)在他的宣告中继续了乐观主义的调子,他宣告拉丁美洲军国主义:

已经达到在其历史上的倒数第二音节的阶段。在它的最后阶段它将消失。那个时代也许近了。在立法的和外交的行动增长的可能性和国际组织日益增加的关心的鼓舞下,拉丁美洲的强大的成分已经把铲除军国主义作为它们的主要当务之急。(Alba in Johnson 1962:165—166)

然而这太平盛世却姗姗来迟。尽管有在巴西和阿根廷对军队大的控制、智利的皮诺切(Pinochet)政权的结束和在巴拉圭(Paraguay)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的个人的统治的垮台,24 个大的拉丁美洲的和加勒比海的国家中的 9 个仍然给予其武装力量广泛的权力和自治。而且,在幕后,南非的军队依然构成要认真对付的政治力量。

当作三十年前的预言,亨廷顿的分析表明,只要有利于军队的观念已经出现,军队的政治权力已经下降以及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已经上升,文职的控制就应该变得更加有效。在另一方面,如果军队的控制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广泛,那么我们会发现不利于军队的观念已经获得了有利的形势,军队的政治权力已经上升,并且军队的职业化已经下降。在那些预言中有些东西似乎是错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世界上的国家中军队的控制已经上升,但是军队的政治权力,根据亨廷顿的标准,肯定已经扩大,而不利于军队的观念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加流行,而且军队的职业化几乎肯定地提高了。为了澄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审视军事化的国家在世界的国家体系中的位置。

第四节 历史视野中的今日军队

在 16 世纪开始并且只是结束于最近,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地化、商业联系的苦心经营和直接谈判把世界的其余部分纳入了它们的体系。大多

数近来的加入者通过去殖民地化作为独立的演员参与到这个体系,从而建立了按照西方路线设计的管理结构、财政体系和武装部队;以前殖民地的名称、津贴和服装反映了那些国家的影响。然而复制出机构表并不能保证新的国家将会和旧的一模一样。没有比第三世界的军队的行为更为清楚的地方。贫穷国家的军队在许多方面像富裕国家的军队。但是大体上,它们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干预更为直接和频繁,对公民的权利有着更加明显的破坏结果。为什么会这样?

回想一下欧洲国家形成的主要的自相矛盾的话:对战争和军事能力的追求,在创建了作为某种副产品的民族国家之后,导向政府和国内政治的平民化。我曾经说过,此类事情发生是因为五个主要理由:因为建立和支持军事力量的努力导致国家的代理人去建立庞大的由市民充当工作人员的榨取机构,而且那些榨取机构转而牵制和抑制武装力量;因为国家的代理人和控制着有效的参战所需资源的市民集团讨价还价,在讨价还价中,他们允许市民集团对国家提出可行的要求,这进一步抑制了军队;因为国家在战时能力的扩大给那些在战争中没有遭受巨大损失的国家带来了在战争结束时的扩张能力,而且那些国家的代理人通过开展新的活动或者继续他们已经开始的作为紧急措施的活动来利用这样的形势;因为战争努力的参与者,包括军事人员获得了国家对他们要求的补偿,这些要求在战时受到了压制或者是相互同意而延缓的,但是在复员时又得以恢复;最后因为战时的借贷导致了国家债务的巨大增长,这转而产生服务官僚机构并促进了国家对国家经济更大的干预。

在一个欧洲的漫画历史中,这故事将会以四个板块出现。在第一个板块中,国王披着盔甲,手执长剑,招募和统帅自己的陆军和海军,那些军队在为他的服务中保持个人的忠诚。在第二个板块中,国王身着华丽军服,但是和雇佣兵头目签约来租用雇佣兵为他打仗。在第三个板块中,国王穿着完全不适合打仗的豪华服装,和将军们及战争部长们(他们在复杂的市民占优势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行协商。在最后一幕我们看到国王(他现在可能是伪装的总统或者首相)身着西装,不仅和他的成员协商,还要和由主要的市民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适当构成的代表们磋商。(这四个板块标有熟悉的副标题世袭制、经纪人时期、民族化时期和专门

化时期。)固然,这幅平民化的连环漫画册的文本用各种逼真程度描绘了不同的国家经历;比起荷兰或者俄罗斯,它更适合德国的经历。但是它可以被当作欧洲国家的平民化的示意性的总结。

欧洲国家形成的另一个总的特征值得我们注意。如果仅仅因为战争和战争的解决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结构和边界,那么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任何具体国家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形成早期民族国家的组织结构主要是作为可能的统治者和他们试图要统治的人民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而显著发展的。然而,随着欧洲国家体系的巩固,成批的国家开始决定战争的结果,从而决定从战争中崛起的国家的组织结构。因此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时彻底地重组了那些国家,维也纳议会(the Congress of Vienna)重新绘制了地图来包含以前不存在的荷兰王国,加上大大重构的普鲁士、撒丁(Sardinia)、巴伐利亚、巴登和奥地利。欧洲从国家形成的相对“内部的”过程转向相对“外部的”。

这种向外部的转移持续到 20 世纪。只要从三个方面看一看 20 世纪国家形成的过程就会发现它们是外部的:许多新的民族国家是作为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财产而形成的;许多国家是在其他强大得多的国家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的管理机构的;国家的议会——联合国是其最新的体现——批准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它们作为国际的国家体系的独立成员的存在。结果之一就是 20 世纪的国家边界的日益减少的灵活性。除了作为由许多国家协商谈判的总的和平解决的一部分,征服将导致任何国家边界的大的重新划定这一现象变得可能性越来越少。近来,危地马拉声称对整个伯利兹(Belize)拥有主权,委内瑞拉(Venezuela)声称对部分圭亚那(Guyana)拥有主权,但是美洲的其他国家不会容忍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领土攫取。虽然战争、游击队和别的形式继续非常频繁地发生,许多国家没有面临严重的外部的军事威胁。这意味着许多军队很少有希望参加战争。它们专用于内部控制。

第三世界的军队特别吸收了欧洲或者美国的模式,援助和训练以比欧洲国家大得多的程度干预相互的军队的形成。例如,在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和德国训练了许多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Chile)和秘鲁的军官。在战后,美国接管了这个任务。(Nunn 1971)这

种外部的干预给了拉丁美洲军队同其潜在的对手和选定的敌人相比的异常的机动性。

在欧洲,国家形式的强迫接受发生在对政权的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冲击时。真的,大多数从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形成的国家,曾经更加不稳定地比它们的北方邻国拥有稳定的民主,也许人们会主张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后来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易受法西斯主义影响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北欧,芬兰、挪威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后来的独立并没有阻止它们建立相对持久的政权。(参见 Alapuro 1988)

然而,在 1945 年以来的世界,外部强迫接受和不稳定的关系似乎有所上升。在统治者从商品出口中或者大国军事援助中抽取财政收入的能力允许他们忽略和他们的国民百姓讨价还价的地方,庞大的国家大厦在缺乏来自公民的重大同意或者支持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由于缺乏在具体国家机构和人口中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牢固的联系,那些国家变得很容易遭受强制夺取政权和在政府形式上的突然变化。例如,在 1955 年已经独立的世界上的最贫穷的国家中,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较高的政府开支的份额(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是外部影响的结果)预言了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更为频繁的政治变化,正如在 1950 到 1960 年间更为频繁的政权变化预言了在随后十五年里的政府开支的更大的份额。(Thomas and Meyer 1980)这些情况引起了军队的集结并引起了军队追求权力。

外部影响和政治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最可能是曲线的,其中有在中间达到最高点的不稳定性和/或者外部控制的变化程度。另一方面,外部影响和军队控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外部影响的极端形式就是军队占领;只要占领持续着,占领下的政权就会留在原地不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于以前的一般战争,因为没有结束于总的解决方案;它在德国、奥地利、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留下了拖延了几年的军事占领。在战后的年代里,西方大国——无法比拟地,苏联和美国——在国外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军队数量。在 1987 年,29 个国家在某些其他国家的领土正式地驻扎军队。美国有 25 万军队在德国、5.4 万在日本和 4.3 万在韩国,而苏联部署了 38 万军队在民主德国、11 万在阿富汗、6.5 万在匈牙利和 6 万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占领者数量上领先:

苏联:730 090 军队在国外;

美国:492 500;

越南:190 000;

英国:89 450;

法国:84 450;

古巴:29 250。

令人惊讶的是越南(有着据估计 14 万军队在柬埔寨,另有 5 万在老挝)和古巴(有着 2.7 万军队在安哥拉,其他军队分散在刚果、尼加拉瓜和也门:Sivard 1988:12—13)。尽管占优势的国家有时派出军队是为了阻止或者扭转权力的改变,但是它们的存在基本上减少了政权进一步变化的可能的机会。

第五节 军事的积累

世界上众多国家对军事的投资是日益迅速。在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员之后,军费在人均基础上显著上升,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在 1960 年和 1987 年间,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人均军费开支增长了几乎 150%,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上升大约 60%。(Sivard 1988:6)然而,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军事预算实际上从 1960 年 GNP 的大约 6.9% 下降到 1984 年的 5.5%;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这个比例从 3.6% 上升到 5.6%;贫穷国家目前正把它们贫乏的收入中比富裕世界充裕收入中更大的份额,花费在武器和军队上。(“富裕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民主德国、芬兰、法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苏联、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贫穷国家”包括所有其他国家。)

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在它们对军费的投入方面差异很大。表 7.2 提供了详细数据。在 1984 年的人均开支上,世界花费领先者是北美、华沙条

约国家和中东,而在花费在军事上的 GNP 的比例上,中东远远把其他国家甩在后面。在这个可疑的竞赛中的冠军是伊拉克,有据估计 GNP 的 38.5% 投入到军事活动,阿曼(Oman),有 27.9%,以色列,有 24.4%,沙特阿拉伯,有 22%,北也门和南也门,有 16.9%和 15.1%,叙利亚(Syria),有 14.9%,和伊朗,有 14.6%;只是在那一点上,这个清单摆脱中东延伸到安哥拉、苏联、蒙古、利比亚、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李殊勋(Suhoon Lee)考察了 1960 年、1970 年和 1980 年的六十个第三世界国家,他发现军费上升的最强的预示指标首先是国家间战争的参与,第二,取决于外贸。(Lee 1988:95—111)这一发现强调了中东国家的易受攻击的地位,在中东石油和战争交织在一起。

表 7.2 世界地区的军费和军事力量,1972—1986 年

地 区	人均军费(美元)			军费占 GNP 的比例			在军事控制下的国家比例		
	1972	1978	1984	1972	1978	1984	1972	1978	1984
北 美	346	468	935	6.3	4.9	6.1	0.0	0.0	0.0
拉丁美洲	12	22	31	1.9	1.5	1.6	54.2	54.2	37.5
欧洲北约	108	237	280	3.8	3.6	3.8	7.1	7.1	7.1
华沙条约	204	311	631	9.0	8.2	9.6	0.0	14.3	14.3
欧洲其他	56	121	181	2.8	2.3	2.4	0.0	0.0	0.0
中 东	55	250	441	12.2	12.2	17.9	25.0	37.5	37.5
南 亚	4	5	9	4.0	2.8	305	50.0	50.0	50.0
远 东	12	30	34	3.3	2.7	2.8	62.5	62.5	56.3
大洋洲	98	156	276	3.1	2.4	3.0	0.0	0.0	0.0
非 洲	7	22	30	3.0	3.6	3.9	52.3	51.1	64.4
世 界	58	97	161	5.4	4.5	5.6	38.3	40.1	40.8

资料来源: Ruth Leger Sivard,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1974 年版、1981 年版、1983 年版和 1988 年版。

同样,1960 年以来在世界上所有富裕地方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保持稳定不变,即使每个士兵、水手或者飞行员的费用已经突飞猛进,而在比较贫穷的国家 1960 年以来军队在数量上大致翻了一番。(Sivard 1986: 32)在 1960 年,0.61%的世界人口在军队服役;到 1984 年,这个数字稍微下降到 0.57。然而,在贫穷国家,这个比例从 0.39 上升到 0.45;较富裕

的国家仍然有着较高比例的军队在服役,但是那些比例在下降而较贫穷的国家在攀升。例如,在 1964 和 1984 年间,圭亚那的军事力量(不包括警察)从整个人口的 0.1% 上升到 1.8% (根据 Danns 1986:113—114 计算);当以前的殖民地的离开的帝国国家留下的维持秩序的低级武装转化为它们自己的发展完备的陆军、民兵和海军时,类似的扩大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军人和平民人口的比例上中东领先世界,接着是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美。个别的冠军包括越南(2.1%)、伊朗(2.4%)、叙利亚(2.7%)、伊拉克(3.5%)和以色列(4.3%);4.3% 意味着在 23 个人中,包括妇女、男人和孩子,就有 1 个军人。这样的程度接近了瑞典在 17 世纪早期的强烈的军事化。

而且,武器流动的世界模式在过去 1/4 世纪里有很大的转变。出口的绝对数量迅速地扩大,从 1960 年的大约 25 亿美元增长到 1983 年的 373 亿美元。(Sivard 1986:32)在大国的军事援助刺激下,武器日益流入第三世界。武器的大量运输主要是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体系发展到由富裕国家出口到贫穷国家的体系。在 1965 年,世界上的较穷的部分正在接受国际所有武器运输的大约 55%;到 1983 年,这比例是 77%。(真的,巴西和以色列那时正在开始建立自己的严密的武器工业,但是它们没有一个挑战了美国、苏联、法国或者英国的武器销售优势。)在那时,中东国家每年进口约人均价值 106 美元的武器,相比于大洋洲的 19 美元,欧洲北约的 11 美元。事实上,许多能够用石油支付的中东国家,正接受着所有运输到第三世界的武器的大约一半。

然而,在购买武器方面中东并非唯一的。关于亚洲的其他地方,理查德·唐特(Richard Tanter)总结道:

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遭受过比有组织的暴力更大的苦难:在 1960 年到 1982 年在全世界的 1 070 万死于和战争相关原因的人们中,几乎一半是亚洲人。甚至在 1975 年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武器仍然在流入这个地区,而且以和以前一样高或者通常比以前还高的程度流入。而且,军人政府在亚洲已经变成规范而不是例外,它们对社会结构达到了比早些时间更大的渗透。从工业化的生产国家进口到这个地区的武器系统和日益增长的国内生产的高级武

器都具有更大的破坏能力。(Tanter 1984:161)

在1972年和1981年间,在中东之外的所有亚洲国家之间,只有缅甸的军费开支,以不变美元计算,是下降了;在朝鲜、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以不变美元计算,军费开支增长了至少一半。在亚洲及其他地方,军事活动的规模正在沿着几乎每个维度增长。

第六节 掌权的军人

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军事组织,是否欧洲经验会引导我们期望平民化的过程继续?我们有某种迹象说明它不会。假设我们用“军人控制”来指称下列因素中的无论哪一个的存在:由军官们执掌关键的政治领导权、戒严令的存在、由安全部队行使的法庭职权以外的权威、对武装力量缺乏中央政治控制、或者被外国军事力量占领(Sivard 1986:24;要想一套更加成熟的也是一套较难完全根据经验运用的标准,参见Stepan 1988, 93—127)。缺乏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民对国家的控制;当下面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发生时,平民化就出现了:

- 由军官执掌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下降;
- 戒严令的中止;
- 安全部队法庭职权以外的权威的抑制;
- 对武装力量的集中控制的增加;
- 外国武装力量的占领的结束。

在中东,伊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阿拉伯共和国遇到了军事控制的考验;在拉丁美洲,智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在欧洲,土耳其也许只和波兰。正如这清单表明,这标准包括许多并没有按照该术语的严格意义的军事政府的国家,而且该标准建立在关于武装力量的权力和自治的可争议的判断上。例如,在危地马拉,1985年以来选举的平民政府名义上进行着统治。然

而,在内巴(Nebaj)的印第安中心,一位宗教工作人员告诉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这里有市长,有议员,而且有法律机构。但是毫无疑问军队拥有优先权。在此没有一位当选者有超过任何穿军装者的权威。选举在此没有影响。”(Kinzer 1989:34)大多数拉丁美洲的例子属于这个灰色区域:形式上的民主,军人权力。然而,如果我们缩紧标准,军事国家的趋势和地区分布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自然地,“军人控制”这个术语适用于许多不同种类的政权。托马斯·卡拉海(Thomas Callaghy)否认扎伊尔[尽管由蒙博托(Mobutu)将军领导]处于军人统治之下。他声称在国家的军人领导和平民领导之间的差异和“独裁的、组织上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行政国家”的共同性质相比没有太大的意义,“这种国家汲取了很多的中央集权的和社团主义的殖民地传统,是由强势的个体统治者结合起来,经常是松散地并且以一种不稳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国家正在成为非洲的主要类型(Callaghy 1984:45)。他也承认在非洲军人有额外的机会夺取权力。“然而,这些显著地早期现代的,软弱地制度化的军事力量,”他报导说,“在非洲的早期现代的国家和社会的环境中是相对强有力的”。(Callaghy 1984:44)因此在非洲和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军事扩张似乎促进而不是阻碍军人统治。这个过程并不是像它在欧洲那样进行的。

根据我较早设立的标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约世界上国家的 40% 生活在军人控制之下,而且这比例在缓慢上升。从一个地区到一个地区的差异是显著的:在拉丁美洲所有政府的大约 38% 是军人政府,而且这个比例在下降(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的迅速上升之后);在中东 38%,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25% 上升;在南亚稳定在 50%,在远东轻微地波动在 60%,在非洲 64% 而且还上升。形形色色的军人控制在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变成了政府的标准形式,特别是在南亚、东亚和非洲。一个地区的国家处于军人控制的比例和那个地区的去殖民地化的新近程度相联系。许多最新的国家自从获得或者重新获得其主权以来,除了军人统治外知之甚少。正如 1990 年的加纳人在他们的三十年的独立时间里已经在军人控制下生活了十八年,而且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大的政变。

然而,并非所有的军事国家都是新的国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包

括那些由军人管理的国家,自从19世纪早期以来是作为形式上独立的单元而存在的。事实上,它们都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而且,古老的泰国提供了一个军人统治的教材案例。暹罗,正如那时它被称呼的,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它的军事政府而非常突出。在1932年军人们推翻了君主,并且从那时起的大部分时间统治着这个国家。在1932年到1982年的五十年里,军官充当首相有四十年;在那个时期暹罗/泰国经历了九次成功的政变和七次以上流产的政变;政变和政变企图不成比例地集中在1945年以来的时期。(Chinwanno 1985:114—115)在来自美国的慷慨援助下,泰国的军人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在1972年和1982年之间,武装部队从大约3万增长到23.3万人——扩张了七倍——不包括估计的50万预备役和60万的准军事力量。(Chinwanno 1985:115)这些武装力量经营了许多农村发展计划并且促进了和共产主义游击队作战的准军事团体的形成。

泰国人曾经一度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许多其他的国家已经赶上了泰国。运用和鲁斯·西瓦德(Ruth Sivard)的相似的标准,塔鲁克德尔·曼利鲁沙曼(Talukder Maniruzzaman)(1987:221—222)计算了六十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1946年到1984年间的所有独立岁月中的有军人政府的比例。领先者排列如下:

80—100%:泰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尔及利亚、埃及、扎伊尔、布隆迪、叙利亚。

60—79%:巴拉圭、苏丹、上沃尔特、阿根廷、贝宁、中非共和国、多哥、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 guinea)、危地马拉、伊拉克、刚果人民共和国、马里、缅甸、韩国、巴西、索马里、孟加拉国、也门阿拉伯共和国(Yemen Arab Republic)。

40—59%: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加纳、印度尼西亚、洪都拉斯、马达加斯加、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利比亚、柬埔寨、苏里南(Suriname)、尼日尔(Niger)。

曼利鲁沙曼忽略了像海地的案例,在那里杜瓦利埃(Duvalier)家族不仅拥有军衔而且使用公共的和私人的军队恐吓平民百姓;因此他低估了军人控制的广泛性。1946年以来,普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军人的手中度

过了其一半的独立岁月。

随着军人控制的上升,在第三世界国家政变的频率也在上升。图 7.2 传递的主要信息:从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世界某地八起或者十起计划的军事政变(它们大约一半成功)上升到 20 世纪 70 年代该数字翻一倍(并且有同样的成功率)。不像内战,政变通常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发生。四十多年里,外国干预促进了大约所有政变企图中的 7%,也阻碍了 4%。(David 1987:1—2)当然这些数字意味着几乎 90%的世界上的政治发生在没有实质性的外国干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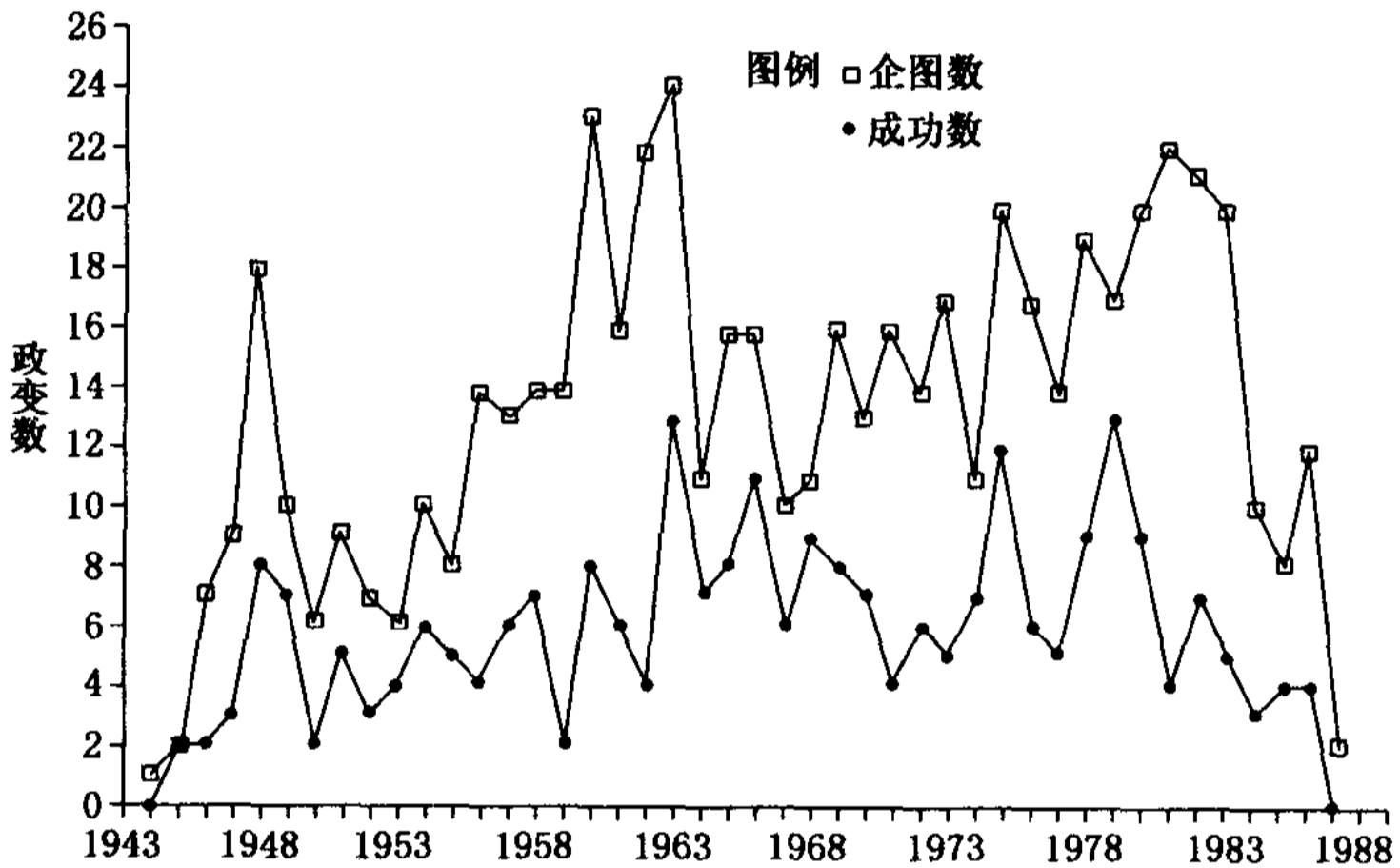


图 7.2 1944—1987 年的军事政变

政变增多了部分地是因为独立的国家增加了。图 7.3 把每年的计划的和成功的政变数和联合国成员数相比较,表明了按国家平均的频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加入之前要比加入之后高得多。图 7.4 到图 7.6 详细说明了所发生的事件:在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直到大约 1964 年,政变围绕着每三个国家每年一起政变的平均数波动很大,在那之后,然后稳定到每五个或者十个国家每年一起政变。然而,在非洲,政变在频率上从在持续的欧洲控制时期的根本没有上升到从 1959 年开始比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较高频率的按国家平均的政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升的政变频率是一个统计的幻象。相反:它意味着在 1960 年后进入联合国的国家不成比例地易受军事政变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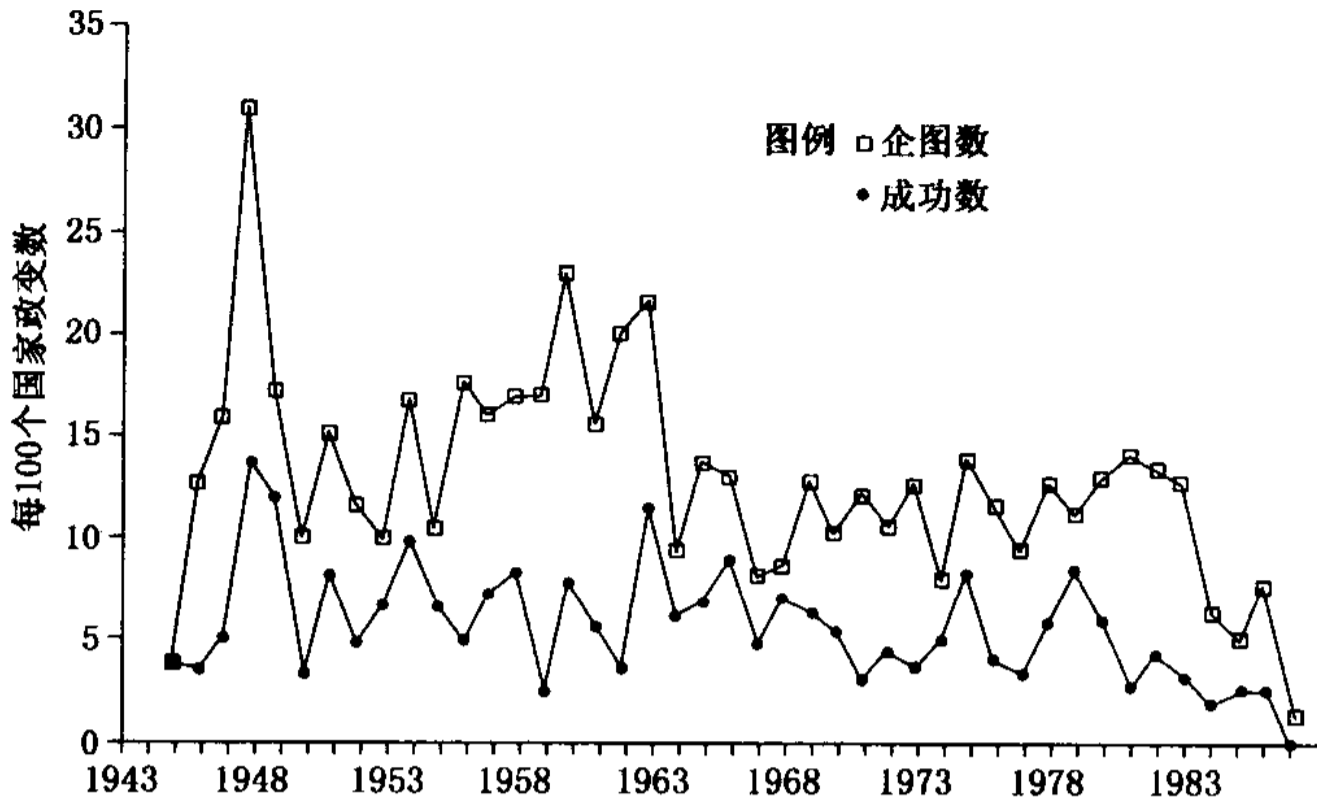


图 7.3 1944—1987 年每 100 个国家的政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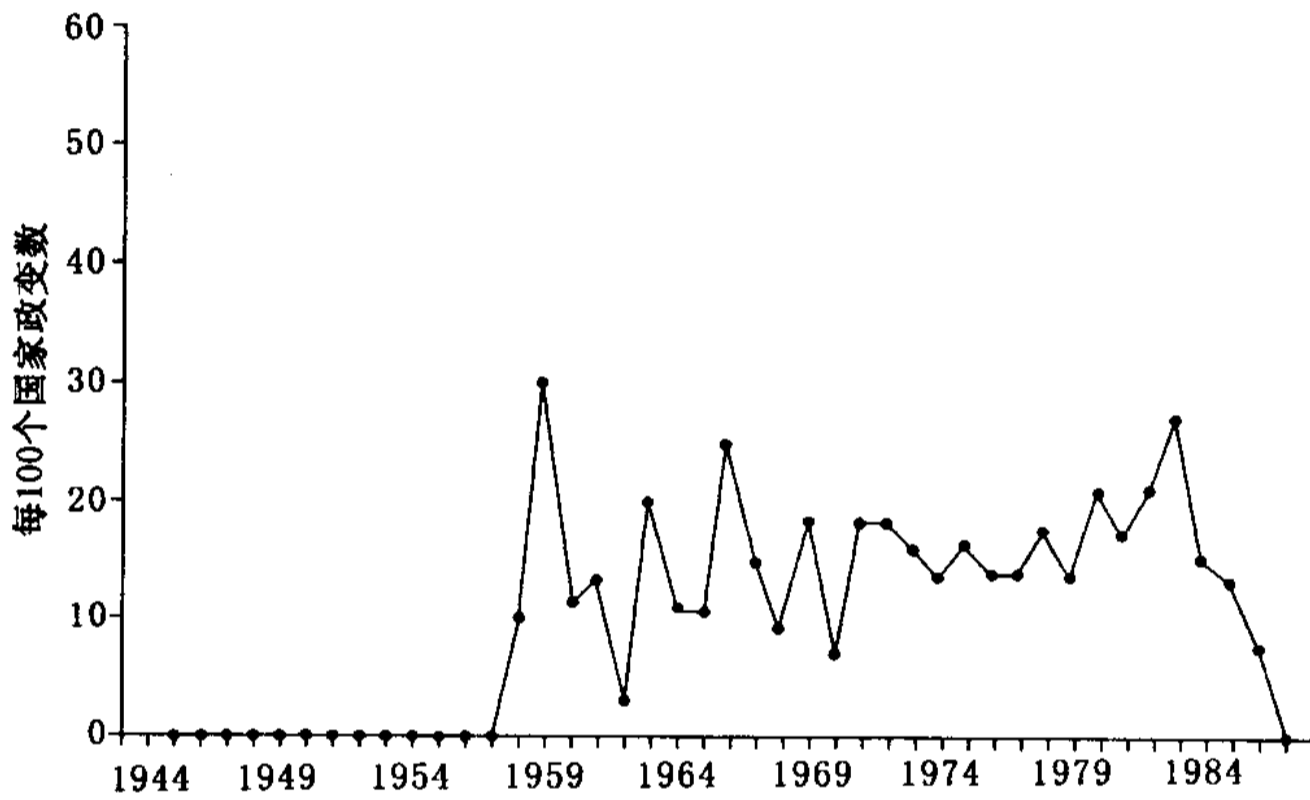


图 7.4 1944—1987 年非洲每 100 个国家的政变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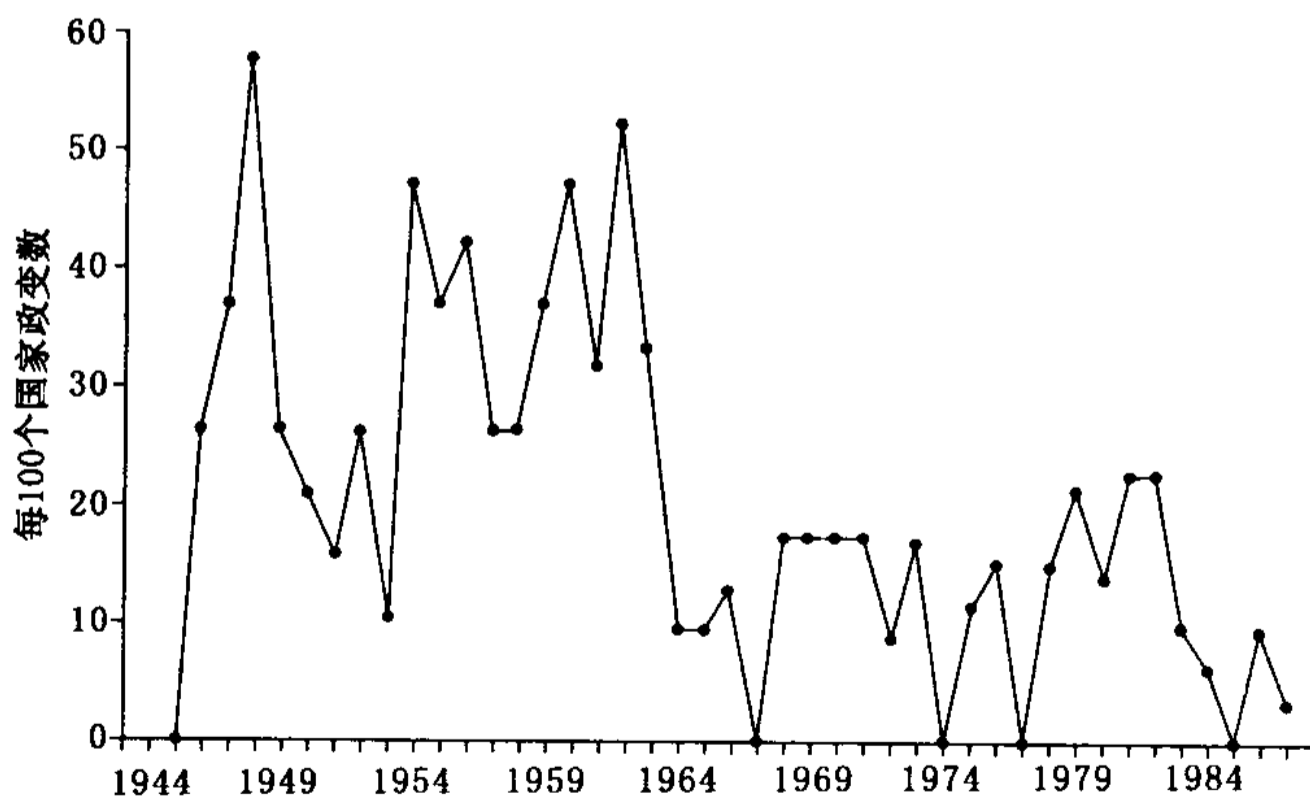


图 7.5 1944—1987 年拉丁美洲每 100 个国家的政变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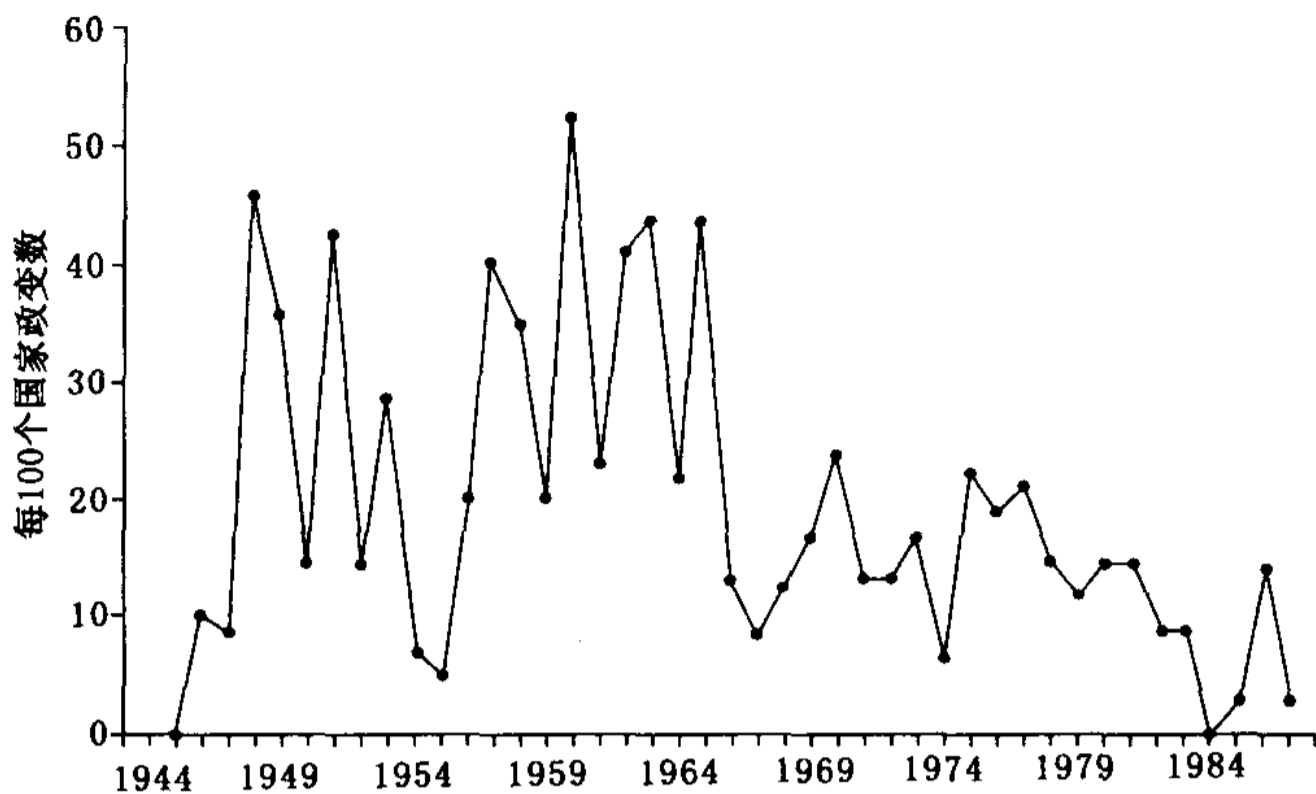


图 7.6 1944—1987 年亚洲和中东每 100 个国家的政变企图

毫不奇怪,政变的地理和军人统治的地理相一致。从 1980 年到 1987 年,世界上的政变企图发生在西班牙、北也门、南也门、埃及、巴林(Bahrain)、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玻利维亚、苏里南、阿根廷、海地、危地马拉、巴拿马、格林纳达(Grenada)、苏丹、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赤道几内亚、利比里亚、冈比亚、中非共和国、塞舌尔(Seychelles)、加纳、津巴布韦、乍得、索马里、肯尼亚、上沃尔特、坦桑尼亚、多哥(Togo)、斯威士兰(Swaziland)、喀麦隆、尼日尔、莱索托、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Guinea-Bissau)、科摩罗(the Comores)、几内亚(Guinea)、乌干达(Uganda);武装起义实际上在南也门、孟加拉国、菲律宾、阿根廷、苏里南、危地马拉、玻利维亚、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中非共和国、加纳、乍得、上沃尔特、尼日利亚、几内亚夺取了权力——政变,特别是政变企图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非洲。

究竟在 1980 年后的政变企图和成功的明显的下降是否代表了一个确定的变化还有待于观察。到目前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变化的净效果是在世界上的或多或少直接被军人控制的独立国家的份额方面有大量的增加。曼利鲁沙曼的解释表明从军人统治回到平民统治少于从 1946 年到 1981 年的每一时间间隔中的军事政变,而且它们在 1982 年到 1984 年间平衡在每年 1 比 6。在拉丁美洲,向平民控制国家转移似乎跟随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军事政变频率的下降(它本身就是相对稳定的军人政权的就职的结果)。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三个阶段:

不断地为了国家权力而斗争时期,导致了军事化方面的净增长(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相对稳定和军人统治时期(60年代到70年代晚期);军人权力的部分削减时期(1980年以来)。考虑到在拉丁美洲的平民化的反复的不成熟的宣告,我们不能相信1980年以来的反转会继续下去。(Rouquie 1987:2—3)无论如何,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国家似乎已经进入军人统治的更为稳定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政变频率的下降并没有预示从军人控制下的解放。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广泛地军事化;除拉丁美洲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很强迹象说明这种趋势正在反转、一个平民化的过程正在开始。如果这样,世界就会有所担忧:不仅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关于民族国家的“成熟”的有经验的旧的观念是错的,不仅因为第三世界战争会使用核武器或者导致大国对抗的风险,而且因为军人控制和国家对付平民的暴力是结合在一起的。

考虑官方以折磨、野蛮行径、绑架和政治谋杀的形式对付平民的暴力。在整个第三世界,根据鲁斯·西瓦德的排名,所有军人控制的国家中有一半“频繁地”使用暴力对付其平民,而非军人国家只有1/5这样做。这些差异在拉丁美洲、中东和远东比在南亚和非洲更大。同样,对选举权的限制在军人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在非军人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普通常见得多。而且这种关系看上去像原因和结果:当军人获得权力,平民的权利和人权就会受挫。任何重视政治代表权和保护公民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人士都应该为全世界的军事化担忧。

第七节 军人如何获取权力?

在欧洲国家体系的几个世纪的平民化之后,如果那些最近加入该体系的国家正在走向军人统治,什么可能解释这种转向?让我们清楚一点: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多样性,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能详细地说明军人权力在每个国家的上升。对次撒哈拉(sub-Saharan)非洲,塞缪尔·德卡罗

(Samuel Decalo)否认军人的力量及其一致和大的夺取国家权力的倾向有任何关系;相反,他认为,“许多非洲国家的军队[包括]一群由多种的社团的、种族的和个人怨屈激励的,对一小撮相互竞争的不同等级的军官拥有基本的顾客忠诚的独特的武装阵营”(Decalo 1976:14—15),伴随着驱使它们企图政变的内部竞争,而麦克斯韦·奥乌苏(Maxwell Owusu 1989)把加纳独立后的政变纳入长期的反抗卑劣首领的民粹主义的传统。然而,鲁思·科利尔(Ruth Collier)指出,比起一党的优势通过在独立之前选举成功而成长起来的地方,非洲军人更为经常地在这样的国家夺取政权:一个派别把一党的统治强加于其他派别,或者在独立时有一个代表许多种族划分的多党体系。(Collier 1982:95—117)众多保护人和客户的链接和种族分裂的共存显然使得非洲国家易于受到军人权力的伤害,但是在由民族联合和政党的限制之内。

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在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所占分量较小。关于拉丁美洲,根据塞缪尔·菲奇(J. Samuel Fitch)的说法:

关于军事政变的先决条件,一个日益增长的一致出现了。当军官们相信危机形势存在,政变就会发生。公共秩序混乱、对政府有敌意的公共意见、对军队习惯利益的威胁、平民总统违反宪法、有义务的政府对管理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明显无能,或者重大的“共产主义的威胁”将会增加军人的危机感。个人的野心和个人的联系也许会影响个别的军官,但是决定举行一场军事政变一般来说是习惯的决定,反映了在整个武装部队的高层内部的对政府表现的集体评价。(Fitch 1986:27—28)

那么,在世界范围,在转向特殊国家和地区历史来考察军人霸权的准确道路之前,我们只能希望先辨明那些使得军人权力更容易或者更加可能的条件。三个主要的可能性涌入我的脑海。

第一,第三世界的平民占优势的组织也许有充分的频率因为军队不在场的接管而失败。二十五年前,注意到军队在第三世界平民政治里干预增多的西方政治分析家倾向于那个解释。

第二,外部国家给予第三世界军事组织的不成比例的支持也许会给予这些组织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面对其竞争者的额外的力量。美国军事援

助计划的激进的批评者常常表达了这种解释。

第三,广泛发生在西方的谈判的过程和军队的约束也许在此不会发生,因为国家从其国家之外的大国获取其军事手段,以商品或者政治屈服为回报。或者所有三种情况可能立即发生。

我们缺乏这三个可能性正在发生的可靠的证据。在1960年到1982年之间的35个非洲国家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的仔细分析表明这些因素促进了干预:

单一种族群体在军队的统治;

高昂的军费开支伴随着频繁地对政府的反对者的制裁;

政治多元主义的缺席;

独立前低下的选举产出;

农业人口比例低;

首都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产业工作职位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缓慢;

GNP中出口比例低;

各种商品出口量下降。(Johnson, Slater and McGowan 1984:635)

尽管这些混杂的特点影响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探索原因的统计研究,这个清单听上去似乎是某些循环的主题。更为重要地是,它描述了作为有利于军事干预的军人自治和经济危机的结合。那些作者本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动荡”有利于军事干预,而“政治参与”会阻止它。他们说道:“似乎在那些有势力的人内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统治,从而相对好地对付了过去十年来非常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国家,[这些国家将其外围因素(peripherality)降低到某种程度],稍微加强了它们的平民结构,比那些有势力的人没有对付好上述环境的国家经历了较少的军事干预。”(Johnson, Slater and McGowan 1984:636)虽然这些因素的每一个本身都值得讨论,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清楚地展示了在其中国家变得或多或少易受军事接管的历史过程。

让我们搞清楚。国家内典型的分裂从世界上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根本上相差很大,在有野心的军人和平民中的团体的实际的结盟相应地也差异很大。种族分裂在当代的非洲和南亚的国家里关系重大,但是在

当代的拉丁美洲国家里则关系小得多。在伊斯兰教之内或者之外的宗教区分在中东引起了大多数大的冲突。而且,在军人统治已经盛行的地方,武装力量本身内部的竞争频繁地引起对国家权力的争夺。阿根廷在 1987 年 4 月 15 日的未遂政变和此后代表军队中的一部分人抵制执行前军人独裁统治下对人权的侵犯(Bigo et al. 1988:56—57),斐济 1987 年 5 月 14 日的政变发生,“清楚地是为了保护斐济本土的斐济人社群的特殊利益”,反对群岛上的印度人的接近多数的选举权力(Kelly 1988:399),布隆迪 1987 年 9 月 3 日的政变使一个军队派别反对另一个派别。(Bigo et al. 1988:65)在这层次上,每一个军人政权和每一次未遂的军人对国家权力的夺取都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结构和以前的历史。然而,如果没有具体的历史,我们不能解释具体的军人政权的历程,我们仍然能够合理地问道,是否 1945 年以来的某些世界范围的变化使得军人攫取政权在全世界更为切实可行和有吸引力,从而有助于解释军人政权在全世界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三种假设的过程(平民机构的失败、外界对军人的支持、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谈判的最小化)中的任何一种是否真实地在当代世界发生。我们应该找到答案。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最近的经历和使欧洲平民化的条件之间的对比,提出了一个关于什么可能会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大部发生的重要的思考。这就是这种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极的、接着早期的三极的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建立,加强了大国之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结盟的竞争,以及不让第三世界的任何部分中立的趋势。竞争促使大国,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为许多国家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军事谋略。

作为回报,大国,或者它们内部的主要利益集团,接受诸如石油的商品、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支持。有时候,是来自武器销售的利润。在那些国家,军事组织在规模上、力量上和功效上不断增长,而其他组织则在原地踏步或者萎缩。军事组织的相对的生存能力使得它们对雄心勃勃但是身无分文的青年具有吸引力,因此军队从商业、教育和市民的公共管理中汲取了大量人才。因此军人们发现越来越容易攫取对国家的控制,而平民领导人则发现越来越难于制约他们。形形色色的军人独裁(*pretorianism*)——主张寡头政治的、激进的、或者群众的(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标

签)出现了。军事化到处盛行。

这种思考可靠吗?我们有详细的战后政治历史的国家的经验给予它某种支持。极端情况包括“南北朝鲜”,在那里,外部大国对当地军人的大量支持造成了对国家经济的铁腕控制,直到经济扩张的真正成功开始削弱军事霸权。(Amsden 1985, Cumings 1984, 1988, Deyo, Haggard and Koo 1987, Hamilton 1986)例如,韩国朴正熙(Park Chung-Hee)是以前日本占领军中的军官,在1961年攫取了权力。朴正熙有意地着手建立日本风格的“富裕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Launius 1985:2)。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两个主要原因:因为朝鲜从1907年到1945年是高度控制的日本殖民地,其中的朝鲜官员在新的政权中很容易进入掌权职位,而且因为美国占领军——今日仍然留在韩国——支持这个计划,并且参与了对反对的工人和学生的牵制。

发生在1950年夏朝鲜北方军队进入南方时的革命的土地重新分配清算了作为可能的反对军事霸权的另一个来源的地主。(Cumings 1989:12)尽管韩国经历了几个短暂的在美国主持下的名义上的民主的时期,1961年的国家政变明确地把军人送上了宝座。在军人的控制和美国的倡导下韩国建立起一个低工资、特别瞄准日本和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以同样的方式,尽管伴随着较少的经济成功,苏联长期在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卫星国里保持军事存在和监督。

可能除了巴拿马、古巴和洪都拉斯,对国家军队从而对国家的直接的外国控制在拉丁美洲并没有接近东亚的极端。拉丁美洲国家自从使自己在两个世纪前独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以来就一直维持着自己的很强的军队干预政治的传统。然而,持久的政体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更加流行。它们采取两种非常不同的形式: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或者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的个体的、客户式的统治,以及流行于庇隆之后的(post-Peron)阿根廷和巴尔加斯之后的(post-Vargas)巴西的军人的“制度上的”控制。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把许多加勒比海的和中美洲的国家置于其“军事监护”下,自由地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去维持或者恢复

它所喜欢的政权。(Rouquie 1987:117--128)然而,直到那时,既没有美国资本也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深深地延伸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非常频繁的南美的国家政变很少吸引美国的直接干预。随着古巴革命和初始的苏联-古巴合作,肯尼迪政府开始重新定义其拉丁美洲政策;从 1962 年开始,美国的军事援助比以前变得更加集中和更加制度化。美国的军事计划也变得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拉丁美洲的军队和首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美国军队在次大陆的 19 个国家有着重要性不同的军事任务,它们的存在常常是军事装备销售或者贷款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Rouquie 1987:132)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军事援助从 1953 年到 1963 年的大约 4 000 万美元上升到 1964 年到 1967 年每年大约 12 500 万美元。(Rouquie 1987:131)这一存在通过巩固那些已经掌握权力的军事政权有助于减少军队在拉丁美洲夺取权力的频率。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开始撤走它对常驻军队的支持时,朝向平民化的较小趋势才开始到来。

巴西是一个明显的恰当的例子。尽管自从军队在 1889 年推翻巴西帝国以来,军队一直盘旋于平民政治之上,直到 1964 年的“四月革命”,它并未攫取对国家的直接的持久的控制。但是那时军人统治的政权使巴西向美国资本、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在冷战时期的巴西-美国合作开放。军人控制持续到 1985 年。在 1982 年的地区选举中,反对党领导人夺取了关键的省级领导职位,在 1984 年军队权力的温和的反对者坦克雷多·内维斯(Tancredo Neves)赢得了巴西总统职位。去军事化开始了,但是带给军队重大的补偿性的收获:扩大的国内武器工业和在国家军事预算上的增长。美国并未直接地干预巴西的平民化,但是它日益增加的对人权的关心以及它日益减少的对处于下降趋势的军人们的支持肯定有助于为此创造条件。

邻近的苏里南在其从荷兰独立出来的五年之内达到了军人统治,但是它的军人们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Sedoc-Dahlberg 1986)从 1975 年独立到 1980 年军事政变,苏里南的三个主要的政党代表着其占优势的种族群体:印度斯坦(Hindustani)、克利奥尔(Creole)、爪哇人(Javaness)。但是在军队内部的一系列的劳资纠纷之后,一支由军士领导的 600 人的

部队夺取了对国家的控制,新政府开始接受来自古巴的大量的援助,并且在政治上和古巴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军队扩大了其数量,组织了大约3 000人的人民之兵(People's Militia)部队用于内部控制,并且保持大约整个人口的1.4%在服役,是低收入国家的世界平均数的三倍多。巴西的领导,对在他们的侧翼存在左派国家感到惊慌,在1983年开始了一个安排,根据这个安排“苏里南将向巴西销售稻谷和氧化铝来换取足以使苏里南的军队在规模上翻一番的武器弹药”(Sedoc-Dahlberg 1986:97),而且苏里南也将缓和它的社会政策。来自古巴和巴西的援助的结合有助于提高军队在苏里南内部的机动空间,允许它们统治而无需广泛的社会基础。

然而利比亚遵循了另外一条军人统治的道路。(Anderson 1986: 251—269)意大利帝国主义造成了一块充满敌意和显著不同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的单独的领土。沙努西(Sanusi)的头领伊德瑞斯(Idris),在1951年独立时他成了国王,主要从昔兰尼加获取支持;他在从北非驱逐意大利的联合努力中的合作给予他超过黎波里塔尼亚竞争对手的决定性的政治优势。没有明确的民族国家出现在独立的利比亚。相反,重叠的扩大的家族通过保护人的身份(patronage)来统治。石油的财政收入使他们富足,帮助了一定范围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使得国王和他的总督们不用建立实质性的中央官僚机构来进行统治。小小的利比亚皇家军队形成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英国人作战的部队,但是被来自部落人口的省的安全部队和美国、英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所遮蔽。尽管有盎格鲁血统的美国人存在,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ār al-Qadhafi)上校在1969年领导了一次成功的国家政变。确实,对石油财政收入的控制使得卡扎菲可以驱逐英国人和美国人,根除大多数旧的统治者,使国家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执行帮助其他地方的新生的革命政权的计划,并且继续他的前辈的避免庞大的中央机构的努力。这个转变了的国家小心翼翼地开始了向苏联献媚和反对美国强权的运动。然后一种民族主义支持了脆弱的国家并且证明了军人统治的合理性。

在韩国,美国的占领直接地塑造了这个战后国家。在巴西,美国不断变化的对拉丁美洲军队的定位影响了其政治转变但决没有支配其军人政权的历史。尽管有美国军队的存在,利比亚转向了军人政权。军人权力

的条件和结果从第三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变化很大。大国的竞争和干预在任何具体的政变和任何具体的军人政权的维持中只起了支持的作用。但是第三世界和大国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似乎对在整个世界的军人控制的总体节奏上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到那种程度上,如此的国家体系也大为不同。

如果在国家军队方面的大国的作用和干预有着本分析指出的影响,朝向平民化的一条道路似乎是清楚的。它有两个分支:减少大国增强第三世界国家军事力量的竞争,或者把目标国家和那种竞争隔离开来。它包括促进国家的市政机构和大多数公民之间的协商。建立有秩序的税收体系、公正的管理和对公民作出响应,大概会加速这个过程。为服兵役者开放可行的职业选择也会如此。可能,正如阿尔弗雷德·斯地藩(Alfred Stepan)主张的,巴西增加主要武器出口工业,通过平民机构、投资利益以及和平民人口的讨价还价的增长,有着减少其将军们的自治从而加速了某种民主的自相矛盾的效果;更一般地(而且,人们也许可以希望,较少好战地),政府对扩大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参与的增加可能会促进平民化。(Alfred Stepan, 1988:84—85)决不是简单重复欧洲的经验;近来,推测起来,我们能够避免那个经验的某些残忍性。但是许多冷静反思欧洲国家形成的机会使其更加清晰。

第八节 结 束 语

自然地,我对这些主题的处理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有我的所有较早的断言,它回到了某种形式的有智力的殖民地化,回到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欧洲国家走出了一条公共生活平民化的自己的道路,那么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也能够和应该如此——只要它们或者它们的资助人让欧洲过程展开。它忽略了造成军人-平民关系如此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地理政治的差异:在中美洲或者加勒比海的美军军队的经常的直接干预的威胁,石油对许多中东经济的中心作用,南非在它北面国家范围内的广泛延伸,作为

它们邻国政治中的一种因素的日本、韩国等的工业扩张。它忘记了作为军人权力的促进者的种族的分裂和冲突。我的把当代军事化放到历史的视野的努力,冒了这样的风险:放射出如此强烈的光芒以致它实际上遮蔽了其主题的微妙,消灭了它的光和影的实际图案。我的辩护是简单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军人权力在第三世界的上升并非简单是国家形成的自然阶段,以前经验告诉我们的东西随着国家成熟将会逐渐经历。

无论如何,当代的军事化不是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所能够明白说明的仅有的重要课题。这个过程出于其本身的兴趣也值得注意,只是因此民族国家的欧洲体系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所有西方人的以及大多数非西方人的生活。我希望,本书展示了欧洲国家形成的极大的偶然性,也确实展示了民族国家对政治组织的其他形式的最终胜利的偶然性。只是16世纪在国际战争(这些战争自然地是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和土耳其人、中国人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的规模和费用方面大的扩张,给予民族国家超过在欧洲一直盛行到那时的帝国、城邦国家和联邦的确定的优势。

欧洲人也不是沿着单一的道路走向民族国家的。作为集中的资本和集中的强制在欧洲大陆不同地方的相对优势的一个函数,三种有点显著不同的转变模式——强制密集、资本密集和资本化的强制——同样为统治者、地主、资本家、工人和农民标志出深刻不同的经历。沿着这条道路,曾经存在的大多数国家消失了,其余的国家在形式上和行为上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在资本家占上风的地区和时期,通常分裂的国家会抵制中央集权化,给予代表其优势阶级的官方机构以很大的空间。在18和19世纪庞大的市民军队增长之前,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进行战争动员(特别是海上战争),然而正如它们曾经那样相对较少创造出持久的国家机构。

相反,地主占优势的国家更常常产生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为纯粹从未商业化的经济中榨取战争手段的努力造成了广泛的管理机构并在统治者和他们拥有土地的同盟者之间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极端的情况下,正如在波兰四个或者五个世纪里的例子,地主的分量淹没了皇家政权并促使其僵化或者垮台。

在国家形成的资本密集和强制密集的道路之间,资本和强制的较平

稳的平衡确保了阶级斗争,但是在像法国和英国的少数几个例子中开辟了通向形成有能力创造和支持庞大武装力量的民族国家的道路。那些少数的幸存者对所有其他国家设立了战争的标准,在把欧洲国家体系、民族国家的欧洲种类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起了不成比例的作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曾经是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渐控制了整个地球。由于该体系起源于欧洲,仔细考察欧洲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起源、特点和局限。

审视把欧洲国家送入一个新时代的变化的所有更多的理由正如我在 1992 年春季所写的那样。无法设想的事发生了。1998 年以来,苏联首先从在阿富汗和美国的深刻的,如果说是不直接的,冲突中撤走了它的军队,然后分裂成其组成的许多共和国,其中有些接着开始分裂。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是不牢固的联合体中的独立国家)在核武器、克里米亚(Crimea)和黑海舰队的归属问题上相互发出动武的声音。南斯拉夫分裂成了塞尔维亚和另一半圆的逃离的非塞尔维亚人的共和国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融入了它的更大的更富裕的德意志邻国和过去的敌人。其他东欧和中欧的国家在不同程度的斗争之后否定了它们的社会主义政权,在近来脱离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和斯洛伐克部分之间的裂痕开始出现。军人统治的前景在苏联影响的地区内的几个国家内出现。

事情远并非仅仅如此。伴随着苏联的消亡,美国领导着几个欧洲国家对伊拉克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回应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朝着接近经济统一的方向又迈进了几步,而邻近的国家——包括几个最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热烈地竞争着以某种形式纳入欧共体。在此范围内,迅速和相互依赖,这些转变类似于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重大改变,这些改变通常来自以前大的战争(如在 1815 年到 1818 年,1918 年到 1921 年,或者 1945 年到 1948 年)的解决。就好像冷战不仅仅是一个隐喻。

如果这些变化有联系,它们是如何联系的?毫无疑问,中心的联系连接着三个结构:美国、苏联和欧洲共同体。基于总体上不相等的经济基础,美国人和苏联人四十年来围绕着相互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竞争来组织它们的外交政策。这两方在阿富汗的干预(美国人通过支持游击队反对

苏联支持的政权,苏联通过财政援助和直接军事参与)证明了美国阻挠苏联胜利的能力,如不是建立亲美政权,而是损耗苏联的财力、人力、士气和军事声誉。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掌权,他不仅仅开始组织从阿富汗撤军。而且他把苏联的非军事化延伸到停止武力镇压在华沙条约区域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和把苏联经济从军事生产转向民用生产的总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深深地威胁了苏联的军事、情报和党的组织,它们打开了通向苏联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向往的有吸引力的欧洲共同体的道路。与此同时,它们迅速地 and 显而易见地削弱了苏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其他沿着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的合作者的权威。当戈尔巴乔夫避免对那些地区的卫星政权的挑战者进行军事干预时,反对浪潮风起云涌。

自治或者独立的要求在其他国家和国家的下属地区迅速增长,否则早期的脱离就会被遗忘。下属共和国和苏联内部的相互联系的种族团体的领导人,有力地向外外部国家求助,引用神奇的民族自决原则。因此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迅速地脱离尚存的苏联。后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脱离南斯拉夫获得了同样的支持。

在他自己动摇的国家里,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不仅仅来自他正在削弱的军队、情报和党的组织的反对,而且还来自两个其他关键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苏联内部许多管理部门内的民族主义者和假民族主义者的竞争的团体——格鲁吉亚、奥塞梯(Ossetia)、摩尔达维亚(Moldavia)、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甚至列宁格勒(Leningrad)。第二个群体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者,他们最终聚集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以前的莫斯科的党的书记)周围。众多的民意测验和新创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有竞争的选举的举行,给了改革者安慰和联系。1991年8月,由旧的组织成员发动的一次流产的政变由于军队的倒戈、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改革者的一致反对而失败;然而,紧随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辞职,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合体的首领成了引人注目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为名义上联盟的许多共和国,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脱离了。冷战不仅结束了,冷战中的超级大国之一也灰飞烟灭了。

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如果这一章的推理成为现实,冷战的敌对行为的下降将会减少非欧洲国家和大国集团结盟、武装自己以换取商品和政治忠诚、建立或维持军人政权、在全世界干预内战的压力。它也应该加速欧洲人创建的国家体系的消亡,这种体系是欧洲人在世袭制时代、经纪人时代和民族化时代创建,然后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把它强加给几乎整个世界的。如果这样的话,世界就有一个空前未有的和平重建的机会。

这个体系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看到了形式上自治的国家的时代正在经历的某些迹象:联合国的僵局、持久的军事经济集团为迅速变化的联盟所取代、诸如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的市场联系的整体形成、资本的国际化、其资本到处都有而又到处没有的公司的兴起、在现存国家中的自治和民族的要求(那些国家最终能把它们压成以前蛋糕的粉末)、美国和苏联转向内部关心、在苏联内部的民族的激活、一个本质上非军事化的国家——日本达到实质上的世界强国、中国将把它巨大的组织的、人口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延伸到世界的其余地方。欧洲人造就的国家体系并非总是存在。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它的讣告将难以撰写。一方面,我们看到欧洲市民生活的安定和或多或少典型的政治机构的形成(两者都是由对军事力量的追求所驱动的国家形成的副产品)。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战争日益增加的毁灭性、国家对个人生活的普遍干预、无可比拟的阶级控制的工具的创立。消灭国家,创建黎巴嫩。强化国家,创建朝鲜。直到其他形式取代民族国家,别无选择。真正唯一的答案是,使民族国家的巨大力量远离战争,转向正义、个人安全和民主的创立。我的探索没有展示如何完成这艰巨的任务。然而,它展示了为什么这个任务是紧迫的。

参 考 文 献

- Abel, Wilhelm, 1966 *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 Eine Geschichte der Land-und Ernährungswirtschaft Mitteleuropas seit dem hohen Mittelalter*. Hamburg and Berlin: Paul Parey.
- 1974 *Massenarmut und Hungerkrisen im vorindustriellen Europa*. Hamburg and Berlin: Paul Parey.
- Aberg, Alf, 1973 "The Swedish Army, from Lutzen to Narva" in Michael Roberts, ed.,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New York: St Martin's.
- Abu-Lughod, Janet, 1987 "Did the West Rise or Did the East Fall? Some Reflections 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orld System," Working Paper 50,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delman, Jonathan R., 1985 *Revolution, Armies, and War: A Political Histor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Adelmann, Gerhard, 1979 "Die ländlichen Textilgewerbe des Rheinlandes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Rheinische Vierteljahrsblätter* 43:260—288.
- Ågren, Kurt et al., 1973 *Aristocrats, Farmers, Proletarians. Essays in Swedish Demographic History*. Uppsala: Almqvist and Wiksell. *Studia Historica Upsaliensia*, 47.
- Aguero, Felipe, 1984 "Social Effects: Military Aut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ernatives* 10:75—92.
- Alapuro, Risto, 1976 "Regional Variation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Agrarian Population into the State of Finland, 1907—1932,"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215—242.
- 1985 "Interstate Relationships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 Perspective," in Risto Alapuro et al., eds, *Small States in Compara-*

- tive Perspective. Essays for Erik Allardt*.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 1988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Finland*.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Alestalo, Matti and Stein Kuhnle, 1984 "The Scandinavian Rout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Research Report no. 31, Research Group for Comparative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Helsinki.
- Ames, Edward and Richard T. Rapp, 1977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axes: A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161—178.
- Amsden, Alice 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Lisa, 1986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M. S., 1988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 1618—1789*. London: Fontana.
- Anderson, Perry, 1974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LB.
- Andrén, Anders, 1989 "States and Town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Andrews, Kenneth R., 1984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48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toine, Michel, 1970 *Le Conseil du Roi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V*. Geneva: Droz.
- Apter, David and Nagayo Sawa, 1984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s and Social Protest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rdant, Gabriel, 1965 *Théorie sociologique de l'impôt*. Paris: SEVPEN. 2 vols.
- 1975 "Financial Policy and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of Modern States and Nations,"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righi, Giovanni, 1985 ed., *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 The Politics of South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 Artéus, Gunnar, 1982 *Krigsmakt och Samhälle i Frihetstidens Sverige*. Stockholm: Militärhistoriska Förlaget.
- 1986 *Till Militärstatens Förhistoria. Krig, professionalisering och social förändring under Vasasönernas regering*. Stockholm: Probus.
- Attman, Artur, 1986 *American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orld Trade, 1600—1800*. Göteborg: Kungl. Vetenskaps-och Vitterhets-Samhället.

- Aubert, Jacques and Raphaël Petit, 1981 *La police en France. Service public*. Paris: Berger-Levrault.
- et al., 1979 *L'Etat et la police en France (1789—1914)*. Geneva: Droz.
- Aydelot, Philippe, Louis Bergeron and Marcel Roncayolo, 1981 *Industrialisation et croissance urbaine dans la France du XIX^e siècle*.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Ayoob, Mohammed, 1989 "The Third World in the System of States: Acute Schizophrenia or Growing Pai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67—79.
- Bade, Klaus J., 1982 "Transnationale Migration und Arbeitsmarkt im Kaiserreich. Vom Agrarstaat mit stärker Industrie zum Industriestaat mit stärker agrarischen Basis," in Toni Pierenkemper and Richard Tilly, eds, *Historisch Arbeitsmarktforschung. Entstehung, Entwicklung und Probleme der Vermarktung von Arbeitskraf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Badie, Bertrand, 1980 *Le développement politique*. Paris: Economica. 2nd edn.
- and Pierre Birnbaum, 1979 *Sociologie de l'Etat*. Paris: Grasset.
- Bai, Shouyi, 1988 ed., *Précis d'histoire de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 Bairoch, Paul, 1977 *Taille des villes, conditions de vie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Paris: 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1985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 dans l'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 Baker, Brenda J. and George G. Armelagos, 1988 "The Origin and Antiquity of Syphilis," *Current Anthropology* 29:703—737.
- Ballbé, Manuel, 1983 *Ordé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1812—1983)*.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 Barfield, Thomas J., 1989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Barnett, Corelli, 1974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A Milit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Surv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970.
- Batchelder, Ronald W. and Herman Freudenberger, 1983 "On the Ration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Centralized Stat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1—13.
- Bates, Robert H., 1988 "Lessons from History, or the Perfidy of English Exceptional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France," *World Politics* 40: 499—516.
- Baxter, Douglas Clark, 1976 *Servants of the Sword: Intendants of the Army, 1630—70*.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aynham, Simon, 1986 ed., *Military Power and Politics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 Bean, Richard,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203—221.
- Becker, Marvin B., 1966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Emerging Florentine Territorial State," *Studies in the Renaissance* 13:7—39.
- 1988 *Civilit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300—1600*.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er, Francis A., 1974 *How Much War in History: Definitions, Estimates, Extrapolations and Trends*.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ries, 02—030.
- Beer, Samuel H., 1974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eik, William H., 1985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dix, Reinhard, 1977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vised edn.
- Berend, Iván, 1988 "The Place of Hungary in Europe: On the Identity Concept of the Intelligentsia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Ráckeve, Hungary.
- 1982 *The European Peripher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780—1914*.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o.
- and György Ránki, 1977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o.
- Berg, Maxine, Pat Hudson and Michael Sonenscher, 1983 eds, *Manufacturer in Town and Country before the Fac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st, Geoffrey, 1982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London: Fontana.
- Bethell, Leslie and Ian Roxborough, 1988 "Latin America betwee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old War: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1945—8 Conjunctur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67—189.
- Bigo, Didier, 1988 *Pouvoir et obéissance en Centrafrique*. Paris: Karthala.
- Gaëtan de Capele, Daniel Hermant and Nicolas Regaud, 1988 "Les conflits intermittents: Les coups d'état, les litiges frontaliers," *Etudes Polémologiques* 46:53—75.
- Binney, J. E. D., 1958 *British Public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1774—9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irnbaum, Pierre, 1988 *Stat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sson, Thomas N., 1966 "The Military Origins of Medieval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1:1199—1218.
- Black, Cyril, 1966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lack, Jeremy, 1987 ed., *The Origins of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nburgh: John Donald.
- Blechman, Barry and Stephen S. Kaplan, 1978 *Force without War. U. S.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Blickle, Peter, 1988 Unruhen in der st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00—1800. Munich: Oldenbourg.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vol. I.
- Blockmans, Wim P., 1978 "A Typology of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in Late Medieval Europ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4:189—215.
- 1988a "Alternatives to Monarchical Centralisation: The Great Tradition of Revolt in Flanders and Brabant," in Helmut Koenigsberger, ed., *Republiken und Republikanismus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Oldenbourg.
- 1988b "La répression de révoltes urbaines comme méthode de centralisation dans les Pays-Bas bourguignons," in *Rencontres de Milan (1er au 3 octobre 1987): Milan et les États bourguignons: deux ensembles politiques princiers entre Moyen Age et Renaissance (XIV e—XVII es.)*. Louvain: Centre Européen d'Études Bourguignonnes (XIV e—XVI es.).
- 1988c "Patronage, Brokerage and Corruption as Symptoms of Incipient State Formation in the Burgundian-Habsburg Netherlands," in Antoni Maczak, ed., *Klientelsysteme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Oldenbourg.
- 1988d "Princes conquérants et bourgeois calculateurs. Le poids des réseaux urbains dans la formation des états," in Neithard Bulst and Jean-Philippe Genet, eds, *La ville, la bourgeoisie et la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Blok, Anton, 1974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1860—1960. A Study of Violent Peasant Entrepreneur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lom, Grethe Authén, 1977 ed., *Urbaniseringsprosessen in orden*.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3 vols.
- Blum, Jerome, 1964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theneum.
- 1978 *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elcke, Willi A., 1967 "Wandlungen der dorflichen Sozialstruktur Während

■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

-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in Heinz Haushofer and Willi A. Boelcke, eds, *Wege und Forschungen der Agrargeschichte*. Frankfurt a/Main: DLG Verlag.
- Böhme, Klaus-Richard, 1983 “Schwedische Finanzbürokratie und Kriegsführung 1611 bis 1721,” in Goran Rystad, ed., *Europe and Scandinavia: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Lund: Esselte Studium.
- Bohstedt, John, 1983 *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 1790—181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is, Paul, 1981 “Aperçu sur les causes des insurrections de l’Ouest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in J.-C. Martin, ed., *Vendée-Chouannerie*. Nantes: Reflets du Passé.
- Boli-Bennett, John, 1979 “The Ideology of Expanding State Authority in National Constitutions, 1870—1970,” in John W. Meyer and Michael T. Hannan, ed.,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0 “Global Integration and the Universal Increase of State Dominance, 1910—1970,” in Albert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ond, Brian, 1983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870—1970*.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osher, J. F., 1970 *French Finances, 1770—1795. From Business to Bureau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ssenga, Gail, 1988a “City and State: An Urban Perspective on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Keith Michael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1.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Oxford: Pergamon.
- 1988b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s corporations: Trois exemples lilloi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3:405—426.
- Boswell, Terry, 1989 “Colonial Empires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Colonization, 1640—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80—196.
- Boxer, C. R., 1965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New York: Knopf.
- 1969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Knopf.
- Boyd, Andrew, 1987 *An Atlas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Methuen. 8th edn.
- Brady, Jr, Thomas A., 1985 *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 1450—15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udel, Fernand, 1979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e—XVIIIe siècles*. Paris: Armand Colin. 3 vols.

- Braun, Rudolf, 1960 *Industrialisierung und Volksleben*. Zurich: Rentsch.
- 1975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 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8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Canton of Zurich,” in Charles Tilly, ed.,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30—75.
-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04:25—92.
- 1985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in T. H. Aston and C. H. E. Philpi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John, 1989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Knopf.
- Brewer, John D. et al., 1988 *The Police, Public Order and the State. Policing in Great Britain, Northern Ireland, the Irish Republic, the USA, Israel, South Africa and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 Brower, Daniel, 1977 “L’Urbanisation russe à la fin du XIX e sièc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2:70—86.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1981 *The War Trap*.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629—652.
- Bulst, Neithard and Jean-Philippe Genet, 1988 eds, *La ville, la bourgeoisie et la genèse de l’Etat moderne (XII e—XVIII e siècles)*.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Bünger Karl, 1987 “Concluding Remarks on Two Aspects of the Chinese Unitary State as Compared with the European State System,” in Stuart Schram, ed.,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Published for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b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Burke, Peter, 1986 “City-States” in John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8 “Republics of Merchant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Jean Baechler, John A. Hall and Michael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

- ford: Basil Blackwell.
- Busch, Otto, 1962 *Militarsystem und Sozialleben im alten Preussen 1713—1807: Die Anfänge der sozialen Militarisierung der preussisch-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 Callaghy, Thomas M., 1984 *The State-Society Struggle. Za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lvert, Peter, 1970 *A Study of Rev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ameron, Iain A., 1977 "The Police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7:47—75.
- Cammack, Paul, 1988 "Depend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in P. F. Leeson and M. M. Minogue, eds,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Crossdisciplinary Theme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nak, William L., 1984 "The Peripheral State Debate: State Capitalist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3—36.
- Carsten, F. L., 1954 *The Origins of Prus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arter, F. W., 1972 *Dubrovnik (Ragusa), A Classic City State*. London: Seminar Press.
- Carver, Michael, 1980 *War since 194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Centre de la Méditerrané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69 *Villes de l'Europe méditerranéenne et de l'Europe occidentale du Moyen Age au XIX e siècle*. Saint-Brieuc: Les Belles Lettres.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de Nice, nos. 9—10.
- Chandler, Tertius and Gerald Fox, 1974 *3000 Years of Urban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hapman Herrick, 1988 "The French State in the Era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Look at the Recent Scholarship," Working Paper 63,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Charlesworth, Andrew, 1983 ed., *An Atlas of Rural Protest in Britain, 1548—1900*. London: Croom Helm.
- Chase-Dunn, Chris,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Econom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hesnais, Jean-Claude, 1981 *Histoire de la violence en Occident de 1800 à nos jours*. Paris: Robert Laffont.
- Chevalier, Bernard, 1982 *Les bonnes villes de France du XIV e au XVII e siècle*. Paris: Aubier Montaigne.
- Chinwanno, Chulacheeb, 1985 "Militarization in Thai Society," in Peter Wallen-

- steen, Johan Galtung and Carlos Portales, eds, *Global Militariz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Chisolm, Michael, 1962 *Rural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Chittolini, Giorgio, 1989 "Cities, 'City-States' and Regional States in North-Central Italy,"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Chorley, Katherine, 1943 *Armies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Choucri, Nazli and Robert C. North, 1975 *Nations in Conflict*. San Francisco: Freeman.
- Church, Clive H. 1981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Cipolla, Carlo, 1965 *Guns, Sails, and Empi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Early Phases of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 New York: Pantheon.
- 1976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New York: Norton.
- Claessen, Henri J. M., 1984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Early State," *Current Anthropology* 25: 365—379.
- 1985 "From the Franks to France-The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Henri J. M. Claessen, Pieter van de Velde and M. Estellie Smith, eds,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Massachusetts: Bergin and Garvey.
- 1988 "Changing Legitimacy," in Ronald Cohen and Judith D. Toland, eds, *State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vol. VI.
- Clark, Sir George, 1969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States," in F. L. Carsten, ed.,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5: The Ascendancy of France, 1648—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Gordon L. and Michael Dear, 1984 *State Apparatus. Structures and Language of Legitimacy*. Boston, Massachusetts: Allen & Unwin.
- Clark, Samuel, 1984 "Nobility, Bourgeoisi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elgium," *Past and Present* 105:140—175.
- Clausewitz, Carl von, 1968 (Anatol Rapoport, ed.) *On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First published in 1832.
- Clayton, Anthony, 1988 *France, Soldiers and Africa*. London: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 Coale, Ansley J. and Susan Cotts Watkins, 1986 eds,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bb, Richard, 1970 *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hn, Jr, Samuel Kline, 1980 *The Laboring Classes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hen, Youssef, Brian R. Brown and A. F. K. Organski, 1981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State Making: The Violent Creation of Ord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5:901—910.
- Collier, David, 1979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Ruth B., 1982 *Regimes in Tropical Africa. Changing Forms of Supremacy, 1945—1975*.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lins, James B., 1988 *Fiscal Limits of Absolutism. Direct Taxation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ninel, George C., 1987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rxism and the Revisionist Challenge*. London: Verso.
- Connelly, Owen, 1965 *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 New York: Free Press.
- Contamine, Philippe, 1984 *War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rench version published in 1980.
- Cornette, Joël, 1988 "Le 'point d'Archimède'. Le renouveau de la recherche sur l'Etat des Financ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5:614—629.
- Cornwall, Julian, 1977 *Revolt of the Peasantry 1549*.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Corrigan, Philip, 1980 *Capit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Marxist Theor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Quartet Books.
- and Derek Sayer, 1985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orvisier, André, 1976 *Armées et sociétés en Europe de 1494 à 1789*.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Cox, Robert W., 1987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zzi, Gaetano and Michael Knapton, 1986 *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nell'età moderna. Dalla guerra di Chioggia al 1517*. Turin: UTET.
- Cronin, James, E., 1988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Working Paper 64,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Crosby, Alfred W., 1986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40.
- 1988 "Korea and the War Settlement in Northeast Asia," Working Paper 65,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89 "The Abortive Abertura: South Korea in the Light of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Left Review* 173:5—32.
- Curtin, Philip D., 1984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usack, Thomas R. and Wolf-Dieter Eberwein, 1982 "Prelude to War: Incidence, Escal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1900—1976,"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9:9—28.
- Dann, Otto, 1983 "Die Region als Gegenstand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3:652—61.
- and John Dinwiddy, 1988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Hambledon.
- Danns, George K., 1986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Guyana," in Alma H. Young and Dion E. Phillips, eds, *Militarization in the Non-Hispanic Caribbea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David, Steven R., 1987 *Third World Coups d'Eta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awson, Philip, 1972 *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France, 1789—17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calo, Samuel, 1976 *Coups and Army Rule in Africa. Studies in Military Styl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kker, Rudolf, 1982 *Holland in beroering. Oproeren in de 17de en 18de eeuw*. Baarn: Amboeken.
- Dent, Julian, 1973 *Crisis in Finance: Crown, Financiers,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 Dessert, Daniel, 1984 *Argent, pouvoir, et société au Grand Siècle*. Paris: Fayard.
- Dewey, Horace, 1988 "Russia's Debt to the Mongols in Suretyship and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249—70.
- Deyo, Frederic, Stephan Haggard, and Hagen Koo, 1987 "Labor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42—53.
- Deyon, Pierre, 1979a "L'Enjeu des discussions autour du concept de 'proto-industrialisation'," *Revue du Nord* 61:9—15.

- 1979b “La diffusion rurale des industries textile en Flandr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Revue du Nord* 61:83—95.
- 1981 “Un modèle à l’épreuve, le développement industriel de Roubaix de 1762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Revue du Nord* 63:59—66.
- Dickson, P. G. M. , 1967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 Diehl, Paul F. and Gary Goertz, 1988 “Territorial Change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103—122.
- Dijk, H. van, 1980 *Wealth and Property in the Netherlands in Modern Times*. Rotterdam: Centrum voor Maatschappijgeschiedenis.
- Dix, Robert, 1983 “The Varieties of Revolu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15: 281—293.
- Dobb, Maurice, 1963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Rev. edn.
- Dodgshon, Robert A. , 1987 *The European Past. Social Evolution and Spatial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Dohaerd, Renée et al. , 1983 *Histoire de Flandr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Brussels: Renaissance du Livre.
- Donia, Robert J. , 1981 *Islam under the Double Eagle: The Muslims of Bosnia and Hercegovina, 1878—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Eastern European Monographs, Boulder, Colorado.
- Dower, John W. , 1988 “Japan: Legacies of a Lost War,” Working Paper 66,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Downing, Brian M. , 1988 “Constitutionalism, Warfa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eory and Society* 17:7—56.
- Doyle, Michael W. , 1986 *Empir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oyle, William, 1986 *The Ancien Regime*. Atlantic Highland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 Duchacek, Ivo D. , 1986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of Politics. Within, Among, and Across Natio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Duffy, Michael, 1980 ed. ,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1500—180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Studies in History, 1.
- Dunér, Bertil, 1985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 the 1970s*. Aldershot: Gower.
- Dunford, Michael and Diane Perrons, 1983 *The Arena of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s.
- Dunn, John, 1972 *Modern Revolu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a Po-*

- litical Phenome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Plessis, Robert S. and Martha C. Howell, 1982 "Reconsidering Early Modern Urban Economy: The Cases of Leiden and Lille," *Past and Present* 94: 49—84.
- Durandin, Catherine, 1989 *Révolution à la Française ou à la Russe. Polonais, Roumains et Russ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Eckhardt, William, 1988 "Civilian Deaths in Wartime," forthcoming in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20 (1989).
- Eden, Lynn, 1988 "World War II and American Politics," Working Paper 68,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Egret, Jean, 1962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Glencoe, New York: Free Press.
- Elias, Norbert, 1982 *Power and Civility*. New York: Pantheo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 Elliott, J. H., 1963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Arnold.
- 1970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ton, G. R., 1975 "Taxation for War and Peace in Early-Tudor England," in J. M. Winter, ed.,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Jos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Eric J., 1983 *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 Early Industrial Britain, 1783—1870*. London: Longman.
- Evans, Peter and John D. Stephens, 1989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17:713—746.
- Faber, J. A. et al., 1965 "Population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A Historical Survey," *A. A. G. Bijdragen* 12:47—114.
- Fernandez Albaladejo, Pablo, 1989 "Cities and the State in Spain,"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Fijnaut, Cyrille, 1980a "Les origines de l'appareil policier moderne en Europe de l'Ouest continentale," *Déviance et Société* 4:19—41.
- 1980b "Die 'politische Funktion' der Polizei. Zur Geschichte der Polizei als zentralen Faktor in der Entwicklung und Stabilisierung politischer Machtstrukturen in West-Europa," *Kriminologisches Journal* 12:301—309.
- Finer, Samuel E., 1975 "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The Morphology of Military Regimes,” in Roman Kolkowicz and Andrzej Korbonski, eds,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Regim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Fischer, Dietrich, 1985 “Defense without Threat: Switzerland’s Security Policy,” in Peter Wallensteen, Johan Galtung and Carlos Portales, eds, *Global Militariz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Fitch, J. Samuel, 1986 “Armie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1975—1985,” in Abraham F. Lowenthal and J. Samuel Fitch, eds, *Armie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Flora, Peter et al., 1983, 1987 eds,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2 vols.
- Fontenay, Michel, 1988a “Corsaires de la foi ou rentiers du sol? Les chevaliers de Malte dans le ‘corso’ méditerranéen au XV^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35:361—384.
- 1988b “La place de la courtes dans l’économie portuaire: L’exemple de Malte et des ports barbaresqu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3: 1321—1347.
- Forrest, Alan, 1975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rastié, Jean, 1966 “Observazioni sui prezzi salariali dei cereali e la produttività del lavoro agricolo in Europa dal XV al XX secol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78:422—430.
- Frank, André Gunder, 1978 *World Accumulation, 1492—178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fort, Henri et al., 1946 *The Intellectual Adventure of Ancient Man. An Essay on Speculative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êche, Georges, 1974 *Toulouse et la région Midi-Pyrénées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vers 1670—1789)*. Paris: Cujas.
- Freedman, Paul, 1988 “Cowardice, Heroism and the Legendary Origins of Catalonia,” *Past and Present* 121:3—28.
- Fremdling, Rainer and Richard Tilly, 1979 eds, *Industrialisierung und Raum. Studien zur regionale Differenzierung im Deutschland des 19. Jahrhunderts*. Stuttgart: Klett-Cotta.
- Friedmann, David, 1977 “A Theory of the Size and Shape of 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59—78.

- Fueter, Edward, 1919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2—1559*. Munich: Oldenbourg.
- Gallo, Carmenza, 1985 “The State in an Enclave Economy: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Bolivia from 1900 to 1950,”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sociology, Boston University.
- Garcin, Jean-Claude, 1988 “The Mamluk Military System and the Blocking of Medieval Moslem Society,” in Jean Baechler, John A. Hall and Michael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Garmonsway, G. N., 1953 tr. and ed.,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London: J. M. Dent.
- Genet, Jean-Philippe and Michel Le Mené, 1987 eds, *Genèse de l'état moderne. Prélèvement et Redistribution*.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1946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yer, Michael, 1988 “Society, State, and Military Apparatus in Germany, 1945—1955,” Working Paper 67,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Giddens, Anthony, 1985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llis, John, 1970 “Political Decay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789—1848,” *World Politics* 22:344—370.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591—614.
- Gledhill, John, Barbara Bender and Mogens Trolle Larsen, 1988 eds, *State and Societ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London: Unwin Hyman.
- Gokalp, Iskander and Semih Vaner, 1985 “De l'empire à la république: regards sur la Turquie,” *Cahiers du Groupe d'Etudes sur la Turquie Contemporaine* 1: 92—102.
- Goldstein, Joshua S., 1988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1986 “Introduction: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Revolutions,” in Jack A. Goldstone, ed.,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San Diego, California: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Gooch, John 1980 *Armies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ran, Thorvald, 1988a "War Settlement in Norway," Working Paper 61,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1988b "A Critique of State Autonomy in Norwa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University of Bergen.
- Greene, Thomas H., 1974 *Compar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Greer, Donald, 1935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w, Raymond, 1978 ed.,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State," 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reyerz, Kaspar von, 1989 "Portuguese *conversos* on the Upper Rhine and the *converso* community of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Social History* 14:59—82.
- Guénée, Bernard, 1985 *States and Rulers in Later Medieval Europ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Gugler, Josef, 1982 "The Urban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Revolu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7:60—73.
- Guillerm, Alain, 1985 *La pierre et le vent. Fortifications et marine en Occident*. Paris: Arthaud.
- Guilmartin, Jr, John F., 1988 "Ideology and Conflict: The Wa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453—160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721—48.
- Gurr, Ted Robert, 1981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3: 295—353.
- 1986 "Persisting Patterns of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Foundations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Coercion," in Margaret P. Karns, ed., *Persistent Patterns and Emergent Structures in a Waning Century*. New York: Praeger Special Stud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and Desmond S. King, 1987 *The State and the City*. London: Macmillan.
- Gutmann, Myron P., 1980 *War and Rural Life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749—770.
- Hagen, William W., 1988 "Capitalism and the Countryside in Early Modern Eu-

- rope: Interpretations, Models, Debat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13—47.
- Haimson, Leopold and Charles Tilly, 1989 eds, *Strikes, Wars, and Revolutions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ir, P. E. H. , 1971 "Deaths from Violence in Britain: A Tentative Secular Survey," *Population Studies* 25:5—24.
- Hale, J. R. , 196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West: Diplomacy and War," in G. R. Potter,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1: The Renaissance, 1493—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8a "Armies, Navies, and the Art of War," in G. R. Elton, ed.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2: The Reformation 1520—15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8b "Armies, Navies, and the Art of War" (*sic*), in R. B. Wernham, ed. ,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3: The Counter-Reformation and Price Revolution, 1559—16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Renaissance Armies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e Venetian Proveditorial System 1509—1529," *Journal of Italian History* 2:11—31.
- 1983 *Renaissance War Studie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 1985 *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1450—1620*. New York: St Martin's.
- Halicz, Emanuel, 1987 "The Polish Armed Forces and War, 1764—1864," in Stephen Fischer-Galati and Béla K. Király, eds, *Essays on War and Society in East-Central Europe, 1740—1920*. Boulder, Colorado: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 Hall, Peter and Dennis Hay, 1980 *Growth Centers in the European Urban System*. London: Heinemann.
- Hamilton, Clive, 1986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Korea*.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Hamilton, Earl J. , 1950 "Origin an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Debt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o, vol. 2*. Milan: Giuffrè.
- Harding, Robert R. , 1978 *Anatomy of a Power Elite: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of Early Modern Franc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rff, Barbara and Ted Robert Gurr, 1988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359—371.
- Hart, Marjolein't, 1984 "In Quest for Funds: State and Tax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Fr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Workshop o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Salzburg.
- 1985 "Hoe de staat zijn raison d'être verloor. Staat en revolutie in Frankrijk

- 1775—1789,” *Mens en Maatschapij* 1985:5—25.
- 1986 “Tax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utch State, 17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Vlaams-Nederlandse Sociologendagen, Amsterdam.
- 1987 “Salt Tax and Salt Trade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Jean-Claude Hocquet, *Le Roi, le Marchand et le Sel*.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 1989a “Credit and Power. State Mak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etherland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Leiden.
- 1989b “Cities and Statemaking in the Dutch Republic, 1580—1680,”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Haskins, Charles Homer, 1915 *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 Headrick, Daniel R., 1981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chter, Michael and William Brustein, 1980 “Reg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atterns of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061—1094.
- Henning, Friedrich-Wilhelm, 1977 “Der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im agrarischen Bereich,” in Reinhart Koselleck, ed., *Studien zum Beginn der modernen Welt*. Stuttgart: Klett-Cotta.
- Heper, Metin, 1985 “The State and Public Bureaucracy: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7:86—110.
- Hermant, Daniel, 1987 ed., “Les coups d’État,” *Etudes Polémologiques* 41: entire issue.
- Hernández, Francesc and Francesc Mercadé, 1986 eds, *Estructuras Sociales y Cuestión Nacional en España*. Barcelona: Ariel.
- Hespanha, António Manuel, 1986 “Centro e Periferia nas Estructuras Administrativas do Antigo Regime,” *Ler História* 8: 35—60.
- 1989 “Cities and the State in Portugal,”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Hinrichs, Ernst, Eberhard Schmitt and Rudolf Vierhaus, 1978 eds, *Vom Ancien Régime zu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Forschungen und Perspektiv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Hirst, Derek, 1986 *Authority and Conflict. England, 1603—165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tchins, Keith, 1988 “Rumanian Peasantism: The Third Wa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Ráckeve, Hungary.
- Hobsbawm, E. J.,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 Hocquet, Jean-Claude, 1982 *Le sel et la fortune de Venise*. Lille: Université de Lille III. 2 vols.
- Hohenberg, Paul and Frederick Krantz, 1975 eds, *Transition du féodalisme à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l'échec de l'Italie de la Renaissance et des Pays-Bas du XVIII^e siècle*. Montreal: Centre Interuniversitaire d'Etudes Européennes.
- and Lynn Hollen Lees, 1985 *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100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lsti, K. J., 1985 *The Dividing Discipline. 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Boston, Massachusetts: Allen & Unwin.
- Holton, R.J., 1986 *Cities, Capitalism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Allen & Unwin.
- Hood, James N., 1971 "Protestant-Catholic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the First Popular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245—275.
- 1979 "Revival and Mutation of Old Rivalrie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82: 82—115.
- Horowitz, Donald L., 1980 *Coup Theories and Officers' Motives. Sri Lank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uweling, Henk and Jan G. Siccama, 1988 "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87—102.
- Howard, Michael, 1976 *War in Europe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 Lynn, 1978 *Revolution and Urban Politics in Provincial France. Troyes and Reims, 1786—17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 Vintage.
-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nd Jorge I. Domínguez, 1975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Vol. III, 1—114.
- Hutchful, Eboe, 1984 "Trends in Africa," *Alternatives* 10:115—138.
- Immich, Max, 1905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660 bis 1789*. Munich and Berlin: Oldenbourg.
- Ingrao, Charles W., 1987 *The Hessian Mercenary Stat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Reform under Frederick II, 1760—17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

- sity Press.
- Israel, Jonathan I., 1982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Hispanic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Jackman, Robert W., 1976 "Politicians in Uniform: Military Government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1078—1097.
- 1978 "The Predictability of Coups d'Etat: A Model with African Dat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1262—1275.
- Janos, Andrew,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Backwardness on the European Peripheries, 1780—1945,"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Ráckeve, Hungary.
- Janowitz, Morris, 1964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 Jacques Van Doorn, 1971 eds, *On Military Intervention*. Rotterdam: Rot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1977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lkan National States, 1804—1920*.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Jervis, Robert, 1988a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40:317—349.
- 1988b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80—90.
- Jespersen, Leon, 1985 "The *Machtstaat* in Seventeenth-century Denmark,"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0:271—304.
- Jessenne, Jean-Pierre, 1987 *Pouvoir au village et Révolution. Artois 1760—1848*.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 Johnson, John J., 1962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Thomas H., Robert O. Slater and Pat McGowan, 1984 "Explaining African Military Coups d'Etat, 1960—198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622—640.
- Johnston, R. J., 1982 *Geograph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 Jones, Colin, 1980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French Army Under the Ancien Regime," in Michael Duffy,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1500—1800*.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Studies in History, no. 1.
- Jones, D. W., 1988 *War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William III and Marlboroug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Juillard, Etienne and Henri Nonn, 1976 *Espaces et régions en Europe Occidentale*.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Kann, Robert A., 1980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526—1918*.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 Keeney, Barnaby C., 1947 "Military Serv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England, 1272—1327," *Speculum* 4:534—549.
- Kellenbenz, Hermann, 1975 ed., *Agrarisches Nebengewerbe und Formen der Re-agrarisierung in Spätmittelalter und 19./20. fahrhundert*.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 1976 *The Rise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Continental Europ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Wiedenfeld and Nicolson.
- 1981 "Marchands de l'Allemagne du Sud, médiateurs entre le Nord-Est et l'Occident européen," i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d'Histoire*. Nice: Laboratoire d'Histoire Quantitative, Université de Nice.
- Kelly, John Dunham, 1988 "Fiji Indian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Fiji: from the Pacific Romance to the Coup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399—422.
- Kennedy, Gavin, 1974 *The Militar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Duckworth.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nnedy, William, 1964 *English Taxation 1640—1799. An Essay on Policy and Opinion*.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First published in 1913.
- Keohane, Robert O., 1986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nd Joseph S. Nye, Jr. 1975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vol. VIII, 363—414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 Kettering, Sharon, 1986 *Patrons, Brokers, and Clien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ck, Edward L., 1983 "World-System Properties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Internal War Linkages,"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11: 185—208.
- and David Kiefer, 1987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ld System on War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7:34—48.
- Kidron, Michael and Dan Smith, 1983 *The War Atlas, Armed Conflict-Armed Peac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Kiernan, V.G., 1973 "Conscription and Society in Europe before the War of 1914—18," in M. R. D. Foot, ed., *War and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

- our and Memory of J. R. Western, 1928—1971*. London: Elek Books.
- Kim, Kyung-Won, 1970 *Revolution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4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 Kinzer, Stephen, 1989 "Guatemala: What Has Democracy Wrough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6, 1989:32—34, 50—51.
- Klare, Michael T. and Cynthia Arnson, 1981 *Supplying Repression. U. S. 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Regimes Abroa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 Klaveren, Jacob van, 1960 "Fiskalismus-Merkantilismus-Korruption; Drei Aspekte der Finanz-und Wirtschaftspolitik während des Ancien Regim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47:333—353.
- Kirchheimer, Otto, 1965 "Confining Con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964—974.
- Kliot, Nurit and Stanley Waterman, 1983 eds,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Groom Helm.
- Koblik, Steven, 1975 *Sweden's Development from Poverty to Affluence, 1750—1790*.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ohut, Zenon E., 1988 *Russian Centralism and Ukrainian Autonomy. Imperial Absorption of the Hetmanate, 1760s—183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Konvitz, Joseph W., 1985 *The Urban Millennium: The City-Building Process from the Early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Carbondale, Illinoi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Korpi, Walter,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rasner, Steven D., 1978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rekic, Barisa, 1972 *Dubrovnik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A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1987 ed., *Urban Society of Eastern Europe in Premodern Time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riedte, Peter, 1982 "Die Stadt im Prozess der europäischen Proto-Industrialisierung," in Pierre Deyon and Franklin Mendels, eds, *Proto-Industrialisation:*

- Théorie et réalité*. Lille: Université des Art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 1983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s Medick and Jurgen Schlumbohm, 1977 *Industrialisierung vo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Gewerbliche Warenproduktion auf dem Land in der Formationsperiode des Kapit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Kula, Witold, 1960 “Secteurs et régions arriérés de l’économie du capitalisme naissant,” *Studi Storici* 1:569—585.
- Kyle, Jörgen, 1988 “Peasant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ral Society and the Swedish Assignment Syste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Magnus Mörner and Thommy Svensson, eds, *Classes, Strata and Elites. Essays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dic and Third World History*. Göteborg: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Göteborg. Report No. 34.
- Lachmann, Richard, 1987 *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adero Quesado, Miguel Angel, 1970 “Les finances royales de Castille à la veille des temps modernes,”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755—788.
- Ladewig Petersen, E., 1983 “War, Finance and the Growth of Absolutism: Some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of 17th Century Denmark,” in Goran Rystad, ed., *Europe and Scandinavia: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Lund: Esselte Studium.
- Lane, Frederic C., 1958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401—417.
- 1966 “The Economic Meaning of War and Protection,” in *Venice and Histor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C. Lane*.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2.
- 1973a *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73b “Naval Actions and Fleet Organization, 1499—1502,” in J. R. Hale, ed., *Renaissance Venic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Lang, James, 1979 *Portuguese Brazil. The King’s Plant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anger, William L., 1969 *Political and Social Upheaval, 1832—185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Lapidus, Ira, 1967 *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3 “The Evolution of Muslim Urban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

- ciety and History* 15:21—50.
- Laqueur, Walter, 1968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3:501—507.
- Larson, Reidar, 1970 *Theories of Revolution, from Marx to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 Launius, Michael A., 1985 "The State and Industrial Labor in South Kore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6:2—10.
- Lebrun, Francois and Roger Dupuy, 1987 eds, *Les résistanc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Imago.
- Lee, Su-Hoon, 1988 *State-Building in the Contemporary Third World*.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Le Goff, T.J.A. and D.M.G. Sutherland, 1984 "Religion and Rural Revol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Overview," in János M. Bak and Gerhard Bencke, eds, *Religion and Rural Revol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Léon, Pierre, François Crouzet and Raymond Gascon, 1972 eds, *L'Industrialisation en Europe au XIXe siècle. Cartographie et typologie*. Paris: E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 Lepetit, Bernard, 1982 "Fonction administrative et armature urbaine: Remarques sur la distribution des chefs-lieux de subdélégation en Franc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Institut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I, Recherches et Travaux*, 11:19—34.
- 1988 *Les villes dans la France moderne (1740—1840)*. Paris: Albin Michel.
- Levack, Brian P., 1987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State. England, Scotland, and the Union, 1603—170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evi, Margaret, 1983 "The Predatory Theory of Rule," in Michael Hechter, e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ine, David, 1987 *Reproducing Famil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Steven, 1988 "War Settlement and State Structure: The Case of China and the Termination of World War II," Working Paper 62,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Levy, Jack S., 1983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1989 "The Causes of War: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 forthcoming

- ing in Philip Tetlock et al., eds,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Archibald R., 1988 *Nomads and Crusaders A. D. 1000—1368*.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and Timothy J. Runyan, 1988 *European Naval and Maritime History, 300—1500*.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Gwynne, 1978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and Colin Lucas, 1983 eds,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John Wilson, 1974 ed.,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gren, Jan, 1985 “The Swedish ‘Military State’, 1560—1720,”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0:305—36.
- Lindner, Rudi Paul, 1981 “Nomadism, Horses and Huns,” *Past and Present* 92: 3—19.
- 1983 *Nomads and Ottomans in Medieval Anatolia*. Bloomington, India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 Livet, Georges and Bernard Vogler, 1983 eds, *Pouvoir, ville, et société en Europe, 1650—1750*. Paris: Ophrys.
- Löwy, Michael, 1989 “Internationalisme, nationalisme et anti-impérialisme,” *Critique Communiste* 87:31—42.
- Luard, Evan, 1987 *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ucas, Colin, 1973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Claude Javogues and the Lo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The Crowd and Politics between *Ancien Régime*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0:421—457.
- Luckham, Robin, 1971 *The Nigerian Militar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Authority & Revolt, 1960—196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Armament Culture,” *Alternatives* 10:1—44.
- Lüdtke, Alf, 1980 “Genesis und Durchsetzung des modernen Staates: Zur Analyse von Herrschaft und Verwaltung,”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0:470—91.
- Luterbacher, Urs and Michael D. Ward, 1985 eds, *Dynamic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Lynn, John 1984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1794*.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89 “Introduction: The Pattern of Army Growth, 1445—1945,”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Urbana.
- Lyons, G. M. , 1961 “Exigences militaires et budgets militaires aux U. S. A. ,”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66—74.
- Lyons, Martyn, 1980 *Révolution et Terreur à Toulouse*. Toulouse: Privat.
- Mackie, J. P. , 1964 *A History of Scotland*. Baltimore: Penguin.
- Mack Smith, Dennis, 1968a *A History of Sicily. Medieval Sicily, 800—1713*. London: Chatto & Windus.
- 1968b *A History of Sicily. Modern Sicily after 1713*. London: Chatto & Windus.
- McNeill, William H. , 1964 *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 1982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land, David, 1980 *Europe at War, 1600—1650*.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Mallett, M. E. , 1974 *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 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and J. R. Hale, 1984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a Renaissance State. Venice, c. 1400 to 16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ndel, Robert, 1980 “Roots of the Modern Interstate Border Disput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427—454.
- Maniruzzaman, Talukder, 1987 *Military Withdrawal from Poli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 Mann, Michael, 1986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ravall, José Antonio, 1972 *Estado Moderno y Mentalidad Social (Siglos *XV* a *XVII*)*.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2 vols.
- Margadant, Ted, 1979 *French Peasants in Revolt. The Insurrection of 1851*.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8a “Towns, Taxes, and State-Forma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rvine Seminar on Social History and Theory, April 1988.
- 1988b “Politics, Class, and Commun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Urban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to conference on Revolutions in Compari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88.
- Markoff, John, 1986 “Contexts and Forms of Rural Revolt. France in 1789,”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0:253—289.
- 1985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Rural Revol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761—781.
- and Silvio R. Duncan Baretta, 1986 “What We Don’t Know About the Coups: Observations on Recent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12:207—235.
- Martin, Jean-Clément 1987. *La Vendée et la France*. Paris: Le Seuil.
- Martines, Lauro, 1988 *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79.
- Marx, Karl, 1970—1972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3 vols.
- Maschke, Eric and Jurgen Sydow, 1974 eds, *Stadt und Umland. Protokoll der X. Arbeitstagung des Arbeitskreises für sudwestdeutsche Stadtgeschichts forschung*. Stuttgart: Kohlhammer.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Geschichtliche Landeskunde in Baden-Württemberg, Reihe B, 82.
- Mauersberg, Hans, 1960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zentraleuropäischer Städte in neuerer Zei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Mayer, Arno, 1981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 Mendels, Franklin, 1978 “Aux origines de la proto-industrialisation,” *Bulletin du Centr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2:1—25.
- 1980 “Seasons and Regions i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Sidney Pollard, ed., *Region und Industrialisierung: Studien zur Rollen der Region in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letzten zwei fahrhundert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Merrington, John, 1975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93:71—92.
- Meyer, David R., 1986a “System of Cities Dynamics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Nation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1:3—22.
- 1986b “The World System of Cities: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etropolises and South American Cities,” *Social Forces* 64:553—581.
- Meyer, Jean, 1983 *Le poids de l’Eta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et al., 1983 *Etudes sur les villes en Europe Occidentale*. Paris: Société d’E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2 vols.
- Meyer, John W., 1980 “The World Polity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State,” in Albert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ichaud, Claude, 1981 “Finances et guerres de religion en France,” *Revue*

-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28:572—596.
- Midlarsky, Manus, 1986 ed., *Inequality and Contemporary Revolutions*. Denver, Colorado: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Denver. Monograph Series in World Affairs, vol. 22, book 2.
- Migdal, Joel, 1974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Edward, 1975 "War, Tax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in the Late Thirteenth and Early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J. M. Winter, ed.,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Fos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ward, Alan S. and S. B. Saul, 1973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Allen & Unwin.
- Mitchell, B. 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oberg, Carl-Axel, 1962 "Northern Europe," in Robert J. Braidwood and Gordon R. Willey, eds, *Courses toward Urban Life. Arch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Some Cultural Alternates*. Chicago, Illinois: Aldine.
- Modelski, George, 1978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214—235.
- and William R. Thompson,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ollat, Michel, and Philippe Wolff, 1973 *The Popular Revolution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Allen & Unwin.
- Moore, Jr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 Moote, A. Lloyd, 1971 *The Revolt of the Judges: The Parlement of Paris and the Frond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raw, Peter, 1989 "Cities and Citizenry as Factors of State Formation in the Roman-German Empire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Mosca, Gaetano, 1939 *The Ruling Class (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 New York: McGraw-Hill.
- Moul, William Brian, 1988 "Balances of Power and the Escalation to War of Serious Disputes among the European Great Powers, 1815—1939; Some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2:241—75.
- Mueller, John, 1988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55—79.

- Mumford, Lewis,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Nef, John U., 1952 *War and Human Progr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lkin, Dorothy, 1967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tting of Military Takeovers in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230—44.
- Nicholas, David M., 1968 "Town and Countryside: Social and Economic Tensions in Fourteenth-Century Flander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0:458—485.
- Nichols, Glenn O., 1987 "Intermedia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Government Borrowing: The Case of Sir John James and Major Robert Huntington, 1675—1679," *Business History* 29:28—46.
- Nicolas, Jean, 1985 ed.,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XVIe -XIXe siècles*. Paris: Maloine.
- Nilsson, Sven A., 1988 "Imperial Sweden: Nation-Building, War and Social Change," in Sven A. Nilsson et al., *The Age of New Sweden*. Stockholm: Livrustkammaren.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nn, Frederick M., 1971 "The Latin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s of its Socio-Political Role and an Illustrative Bibliographical Essay," *The Americas* 28:135—151.
- O'Donnell, Guillermo, 1972 *Modernización y autoritarismo*. Buenos Aires: Paidós.
- 1980 "Comparative Historical Formations in the State Apparatus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717—729.
-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quist, Paul, 1980 *Violence, Conflict, and Politics in Colombi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Organski, A. F. K., 1965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Knopf.

-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Österberg, Eva and Dag Lindström, 1988 *Crime and Social Control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wedish Towns*.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Studia Historica Upsaliensia*, 152.
- Owusu, Maxwell, 1989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Reinterpreting Coups in Gha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372—97.
- Ozouf-Marignier, Marie-Vic, 1986 "De l'universalisme constituant aux intérêts locaux: le débat sur la formation des départements en France(1789—1790),"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41:1193—1214.
- Paddison, Ronan, 1983 *The Fragmented State.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ow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almer, Stanley H., 1988 *Police and Protest in England and Ireland 178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mlenyi, Ervin, 1975 ed., *A History of Hungary*. London: Collet's.
- Parker, Geoffrey, 1972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3 "Mutiny and Discontent in the Spanish Army of Flanders 1572—1607," *Past and Present* 58:3—37.
- 1975 "War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Economic Costs of the Dutch Revolt," in J. M. Winter, ed.,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Jos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6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a Myth?"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195—214.
- 1988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ker, William and Eric L. Jones, 1975 eds, *European Peasants and their Market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son, C. Northcote, 1957 *Parkinson's Law and Other Studies in Administr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 Parry, J. H., 1961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Hegemony, 1415—1715. Trade and Exploration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Third edition.
- 1966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New York: Knopf.
- Patten, John, 1973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Oxford: School of Geography. Occasional Papers, No.6.
- Peacock, Alan T. and Jack Wiseman, 1961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pper, Simon and Nicholas Adams, 1986 *Firearms and Fortifications. Military Architecture and Siege Warfare in Sixteenth-Century Siena*.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rlmutter, Amos, 1981 *Political Roles and Military Rulers*. London: Frank Cass.
- Petitfrère, Claude,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Vendée," *French History* 2:187—207.
- Pitcher, Donald Edgar, 1972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Ottoman Empir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 Platzhoff, Walter, 1928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1559—1660*. Munich and Berlin: Oldenbourg.
- Plumb, J. H., 1967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England 1675—1725*.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 Poggi, Gianfranco, 197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lisensky, Josef V., 1978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618—16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unds, Norman J. G., 1973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450 B. C. -A. D. 13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9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 150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 Sue Simons Ball, 1964 "Core-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4: 24—40.
- Powers, James F., 1988 *A Society Organized for War. The Iberian Municipal Militia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284*.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ryor, John H., 1988 *Geography, Technology, and War. Studies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649—157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llan, Brian, 1971 *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 Veni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Pye, Lucian, 1960 "The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Quester, George H., 1975 "The World Political System," vol. VIII, 199—246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

- Raeff, Marc, 1983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 1600—1800*.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ambaud, Placide and Monique Vincienne, 1964 *Les transformations d'une société rurale. La Maurienne(1561—1962)*. Paris: Armand Colin.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VI^e Section), Centre d'Etudes Economiques, Etudes et Mémoires, 59.
- Ramsay, G. D. , 1975 *The City of Lond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Elizabeth Tudo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Queen's Merchants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apoport, David C. , 1982 "The Praetorian Army: Insecurity, Venality, and Impotence," in Roman Kolkowicz and Andrzej Korbonski, eds,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Rasler, Karen A. and William R. Thompson, 1983 "Global Wars, Public Debts, and the Long Cycle," *World Politics* 35:489—516.
- 1985a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Tax Revenues, and Global Wa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491—507.
- 1985b "War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ajor Pow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513—538.
- 1988 "Defense Burdens,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ystemic Leader Cas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61—86.
- 1989 *War and Statemaking: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Powers*. Boston, Massachusetts: Unwin Hyman.
- Ratajczyk, Leonard, 1987 "Evolution of the Polish Armed Forces, 1764—1921," in Stephen Fischer-Galati and Béla K. Király, eds, *Essays on War and Socie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740—1920*. Boulder, Colorado: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 Redlich, Fritz, 1964—1965 *The German Military Enterpriser and His Work Force*. Wiesbaden: Steiner. 2 vol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Beiheften 47, 48.
- Reinhard, Marcel, André Armengaud and Jacques Dupâquier, 1968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Paris: Montchrestien.
- Renouard, Yves, 1958 "1212—1216. Comment les traits durabl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moderne se sont définis au début du XIII^e siècle,"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1958:5—21.
- Reuter, Timothy, 1978 "Introduction" to Timothy Reuter, ed. , *The Medieval*

- Nobilit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Reynolds, Susan, 1984 *Kingdoms and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900—13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Rian, Oystein, 1985 “State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Norwa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0:337—363.
- Rice, Condoleezza, 1988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tate and Society,” Working Paper 69,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Ringrose, David R., 1983 *Madrid and the Spanish Economy, 1560—185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erts, Michael, 1979 *The Swedish Imperial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E. A. G., 1969 ed., *Backward Areas in Advanced Countries*. London: Macmillan.
- Roider, Karl, 1987 “Origins of Wars in the Balkans, 1660—1792,” in Jeremy Black, ed., *The Origins of Wa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nburgh: John Donald.
- Rokkan, Stein, 1975 “Dimension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A Possible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Variations within Europe,”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d Derek W. Urwin, 1982 eds, *The Politics of Territorial Identity. Studies in European Regionalism*.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 Roksandic, Drago, 1988 “Agrarian Ideologies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in Yugoslavia, 1918—1941,”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Ráckeve, Hungary.
- Romano, Salvatore Francesco, 1963 *Storia della mafia*. Milan: Sugar.
- Roscoe, Paul B. and Robert B. Graber, 1988 eds, “Circumscrip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1:403—511.
- Rosenau, James N., 1970 *The Adaptation of Nation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Political System Behavior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McCaleb-Seiler.
- Rosenberg, Hans, 1958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Harriet G., 1988 *A Negotiated World: Three Centuries of Change in a French Alpine Commun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osenberg, William G. and Marilyn B. Young, 1982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Rothenberg, Gunther E. , 1988 "The Origins, Causes, and Extension of the Wa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771—794.
- Roubaud, François, 1983 "Partition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1830—1840)," Institut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Recherches et Travaux* 12:33—58.
- Rouquié, Alain, 1987 *The Military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le, James B. , 1988 *Theories of Civil Violenc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loff, Dieter, 1985 *Wie Kriege beginnen*. Munich: C. H. Beck.
- Russell, Conrad S. R. , 1982 "Monarchies, Wars, and Estates in England, France, and Spain, c. 1580—c. 1640,"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7: 205—220.
- Russell, D. E. H. , 1974 *Rebellion, Revolution, and Armed For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ussell, Jocelyne G. , 1986 *Peacemaking in the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Russell, Josiah Cox, 1972 *Medieval Regions and their Cities*.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 Russett, Bruce, 1970 *What Price Vigilance? The Burdens of National Defens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ystad, Goran, 1983 ed. , *Europe and Scandinavia : Aspects of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Lund: Esselte Studium.
- Sales, Núria, 1974 *Sobre esclavos, reclutas y mercaderes de quintos*. Madrid: Ariel.
- 1986 "Servei militar i societat: la desigaultat enfront del servei obligatori, segles XVII—XX," *L'Avenç* 98:721—728.
- Scammell, G. V. , 1981 *The World Encompassed. 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c. 800—1650*. London: Methuen.
- Schama, Simon, 1975 "The Exigencies of War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95—1810," in J. M. Winter, ed. , *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fos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evill, Ferdinand, 1963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2 vols. First published in 1936.

- Schissler, Hanna, 1978 *Preussische Agrargesellschaft in Wandel. Wirtschaftliche, gesell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von 1763 bis 1847*.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 Schmal, H., 1981 ed., *Pattern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since 1500*. London: Croom Helm.
- Schmoller, Gustav, 1896 "Die Epochen der Getreidehandelsverfassung und politik," *Schmollers Jahrbuch* 20:695—744.
- Schram, Stuart R., 1985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Published for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b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 1987 ed.,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Published for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b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 Schultz, Patrick, 1982 *La décentralisation administrativ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Nord (1790—1793)*.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lle.
- Schulze, Hagen, 1987 ed., *Nation-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Leamington Spa: Berg.
- Schumpeter, Joseph, 1955 *Imperialism,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eridian.
- Schwartz, Robert M., 1988 *Policing the Poor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cott, James,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William, 1973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 Searle, Eleanor, 1988 *Predatory Ki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Norman Power, 840—1066*.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doc-Dahlberg, Betty, 1986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Military Regime in Suriname," in Alma H. Young and Dion E. Phillips, eds, *Militarization in the Non-Hispanic Caribbea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Segal, Daniel A., 1988 "Nationalism, Comparatively Speaki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301—321.
- Shennan, J. H.,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uropean State, 1450—1725*.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Shils, Edward, 1962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The Hague: Mouton.
-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d-Ahmed, Mohamed, 1984 "Trends in the Middle East," *Alternatives* 10:

139—60.

Sivard, Ruth Leger, 1974—1988 *World Military and Social Expenditures*. Washington, DC: World Priorities. Annual publication.

Skinner, G. W. , 1964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3—43.

—— 1977 ed. ,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71—92.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all, Melvin and J. David Singer, 1982 *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1816—1980*.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Smith, Adam, 1910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Dent. 2 vols. First published in 1778.

Smith, C. T. , 1967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Europe before 1800*. London: Longmans.

Smith, Carol A. , 1976 “Analyzing Regional Systems,” in Carol A. Smith, ed. , *Regional Analysis*. Vol 2: Social System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orokin, Pitirim A. , 1962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III. Fluctu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Bedminster.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Spuler, Bertold, 1977 *Rulers and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London: Bowker. 3 vols.

Steensgaard, Niels, 1974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1 “Asian Trade and World Market: Orders of Magnitude in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d’Histoire*. Nice: Laboratoire d’Histoire Quantitative, Université de Nice.

Stein, Arthur A. , 1978 *The Nation at War*.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88 “War Settlement, State Structur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orking Paper 60,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 and Bruce M. Russett, 1980 “Evaluating War: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in Ted Robert Gurr, ed. ,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Stepan, Alfred, 1988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 1963 "Institutions of Privac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Police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150—60.
- 1983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toessinger, John G. , 1974 *Why Nations Go to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 Stohl, Michael, 1976 *War and Domestic Political Violence. The American Capacity for Repression and Reaction*.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 Stoianovich, Traian, 1970 "Model and Mirror of the Premodern Balkan City," *Studia Balcanica*. III . *La Ville Balkanique XVe-XIXe Siècle*, 83—110.
- 1981 "Mode de production maghrébin de commandement ponctuel," i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d'Histoire*. Nice: Laboratoire d'Histoire Quantitative, Université de Nice.
- 1989 "The Segmentary State and *La Grande Nation*," in Eugene D. Genovese and Leonard Hochberg, eds,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Stone, Bailey, 1981 *The Parlement of Paris, 1774—1789*.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tone, Lawrence, 1947 "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7:103—120.
- 1965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83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English Society, 1300—1980," *Past and Present* 101:22—33.
- Strayer, Joseph, 1970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ndin, Jan and Eric Soderlund, 1979 eds, *Time, Space and Man: Essays in Microdemography*.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 Sutton, F. X. , 1959 "Represen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System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1—10.
- Tanter, Richard, 1984 "Trends in Asia," *Alternatives* 10:161—191.
- Taylor, A. J. P. , 1985 *How Wars End*.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Taylor, Peter J. , 1981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he World-Economy" in Alan D. Burnett and Peter J. Taylor, eds, *The Politics of Territorial Identity*. New York: Wiley.
- Taylor, Stan, 1984 *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 Tenenti, Alberto, 1967 *Piracy and the Decline of Venice, 1580—1615*.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e, Marek, 1984 "Milit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Deepening Trends," *Alternatives* 10:93—114.

- Therborn, Goran, 1978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London: NLB.
- Thibon, Christian, 1987 "L'ordre public villageois: le cas du Pays de Sault (1848—1914)," in *Société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t des Révolutions du XIX^e e Siècle, Maintien de l'ordre et police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au XIX^e e siècle*. Paris: Créaphis.
- Thomas, George M. and John W. Meyer, 1980 "Regime Changes and State Power in an Intensifying World-State-System," in Albert Bergesen, ed., *Studie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 ———, Francisco O. Ramirez and Jeanne Gobalet, 1979 "Maintaining National Boundaries in the World System: The Rise of Centralist Regimes," in John W. Meyer and Michael T. Hannan, ed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System.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1950—1970*.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ompson, I. A. A., 1976 *War and Government in Habsburg Spain 1560—1620*. London: Athlone Press.
- 1982 "Crown and Cortes in Castile, 1590—1665," *Parlements, Estates and Representation* 2:29—45.
- Thompson, William R., 1988 *On Global War.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and Gary Zuk, 1986 "World Power and the Strategic Trap of Territorial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0:249—67.
- Tilly, Charles, 1983 "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 Europe, 1500—1900," *Theory and Society* 12:123—143.
- 1984 "Demographic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Proletariat" in David Levine, ed., *Proletarianization and Family Life*.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1985a "War and the Power of Warmake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Elsewhere" in Peter Wallensteen, Johan Galtung and Carlos Portales, eds, *Global Militariz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1985b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The Contentious French*. Cambridge: Belknap.
- Louise A.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Louise A., 1971 "The Food Riot as a Form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23—57.

- Timberlake, Michael, 1985 ed. ,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Economy*.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Torres i Sans, Xavier, 1988 "Guerra privada y bandolerismo en la Cataluña del Barroco," *Historia Social* 1:5—18.
- Torsvik, Per, 1981 ed. , *Mobilization,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s and Nation-Building. A Volume in Commemoration of Stein Rokkan*.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 Tracy, James D. , 1985 *A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Habsburg Netherlands. Renten and Renteniers in the County of Holland, 1515—1565*.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reasure, Geoffrey, 1985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1648—1780*. London: Methuen.
- Trexler, Richard C. , 1980 *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rotsky, Leon, 1965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Gollancz. 2 vols.
- Tucci, Ugo, 1981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L'Age vénitien des épices," i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d'Histoire*. Nice: Laboratoire d'Histoire Quantitative, Université de Nice.
- Turner, Bryan S. , 1988 "Religion and State Formation: A Commentary on Recent Debat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322—333.
- Ultee, Maarten, 1986 ed. , *Adapting to Condition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Urlanis, B. Ts. , 1960 *Voin'i i narodo-naselenie Evrop'i*. Moscow: Izdatel'stvo Sotsial'no-ekonomicheskoy literatur'i.
- Van Creveld, Martin, 1977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9 *Technology and War From 2000 B. 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Vaner, Semih, 1987 "The Army," in Irvin C. Schick and Ertugrul Ahmet Tonak, eds,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rhulst, Adriaan, 1989 "The Origins of Town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Pirenne Thesis," *Past and Present* 122:3—35.
- Vialr, Pierre, 1962 *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 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des structures nationales*. Paris: SEVPEN. 3 vols.
- Vovelle, Michel, 1987 ed. , *Bourgeoisies de province et Révolution*.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87.

- Vries, Jan de, 1973 "On the Modernity of the Dutch Republic,"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91—202.
- 1974 *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 1500—1700*.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73 "On the Modernity of the Dutch Republic,"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91—202.
- 1976 *The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8 "Barges and Capitalism.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the Dutch economy, 1632—1839," *A. A. G. Bijdragen* 21:33—398.
- 1984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keman, Jr, Frederic, 1985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vols.
- Waldmann, Peter, 1989 *Ethnischer Radikalismus. Ursachen und Folgen gewalt-samer Minderheitenkonflikt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 Waley, Daniel, 1969 *The Italian City-Republics*. New York: McGraw-Hill.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 Walker, Mack, 1971 *German Home Towns. Community, State, and General Estate 1648—1871*.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lensteen, Peter, Johan Galtung and Carlos Portales, 1985 eds, *Global Militariza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1988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New York, and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1988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615—628.
- Watkins, Susan Cotts, 1989 *From Provinces into N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tson, J. Steven, 1960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760—18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vol. 12.
- Webber, Carolyn and Aaron Wildavsky, 1986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Expendi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Weber, Max, 1972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Fifth edition.

- Wedgwood, C. V. , 1964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Jonathan Cape. First published in 1938.
- Wendt, Alexander E. ,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35—370.
- Werner, Ernst, 1985 *Die Geburt einer Grossmacht-die Osmanen (1300—1481)*. Vienna: Böhlhaus.
- Wheatcroft, Andrew, 1983 *The World Atlas of Revolution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 Whitney, Joseph B. R. , 1970 *China: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search Paper 123.
- Wickham, Chris, 1988 "The Uniqueness of the East," in Jean Baechler, John A. Hall and Michael Mann, eds, *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ijn, J. W. , 1970 "Military Forces and Warfare 1610—1648," in J. P. Cooper, ed. ,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4: The Decline of Spai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1609—48/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kenfeld, Jonathan, 1973 ed. , *Conflict Behavior and Linkage Politics*. New York: David McKay.
- Wilson, Charles, 1968 *The Dutch Republic and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cGraw-Hill.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 Winberg, Christer, 1978 "Population Growth and Proletaria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in Rural Sweden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Sune Akerman, ed. , *Chance and Change.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in the Baltic Area*. Odense: Odense University Press.
- Winter, J. M. , 1986 *The Great War and the Brit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tt, Peter-Christian, 1987 ed. , *Wealth and Taxation in Central Europe*. Leamington Spa: Berg.
- Wong, R. Bin. , 1983 "Les é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n Europe Occidental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38:234—258.
- and Peter C. Perdue, 1983 "Famine's Foes in Ch'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291—332.
- Wright, Quincy, 1965 *A Study of War*.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vised edn.
- Wrightley, E. A. , 1969 *Population and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 and R. S. Schofield, 1981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yczanski, Andrzej, 1981 "La frontière de l'unité européenne au *XVII* ème siècle: Liens — cadres — contenu," in *Actes du Colloque Franco-Polonais d'Histoire*. Nice: Laboratoire d'Histoire Quantitative, Université de Nice.
- Wyrobisz, Andrezej, 1989 "Power and Towns in the Polish Gentry Commonwealth: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 Young, Alma H. and Dion E. Phillips, 1986 eds, *Militarization in the Non-Hispanic Caribbea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Zagorin, Perez, 1982 *Rebels and Rulers, 1500—16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vols.
- Zimmerman, Ekkart, 1983 *Political Violence, Crises and Revolutions*. Cambridge: Schenkman.
- Zinnes, Dina, 1980 "Why War? Evidence on the Outbreak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ed Robert Gurr,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 Zolberg, Aristide, 1968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New States of Tropical Af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70—87.
- 1978 "Belgium" in Raymond Grew, ed., *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0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tates: France and Engl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2:687—716.
- 198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Mary M. Kritz, Charles B. Keely, and Silvano M. Tomasi, eds, *Global Trends in Mi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Staten Island,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 1987 "Beyond the Nation-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Jan Berting and Wim Blockmans, eds, *Beyond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Macro-Political and Macro-Societal Change*. Aldershot: Avebury.

译 后 记

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份翻译“作业”。英文原著初读上去觉得浅显易懂,然而着手翻译时却遇上了不少困难。首先是原著涵盖欧洲上千年历史,其中出现了许多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有的非常生僻,无从查考。从词形和涉及国家、地区上判断,可能来自不同的语言,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遇上这种情况,只有四处请教。请教不成者,只好以英文发音译出并首次出现时附上原词。其实,有些词汇、句子在中文中难以确切表达。这就是翻译中的不可译性。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虽然翻译作品不能像专著那样算作科研成果,但是既然要译就要向读者负责,要以“信、达、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点,有时一个词一句话也要花上一两周时间。即使如此,在交稿之际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唯恐有错误导读者。

当代世界的民族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直是政治学领域令人着迷却又充满挑战的问题。蒂利以他独特的深邃的目光,丰富的历史素养,以古论今,纵横千年欧洲历史,采用实证的方法对该问题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蒂利认为战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和战争准备导致了强制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而作为战争必需资源的强制和资本的分布及其集中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国家形成的道路。战争加速了城市的形成,而城市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本书1990年初版,1992年出了修订本,到目前为止,共印刷了14次之多。足见其影响之大。

人不能免俗,在译作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对给予帮助的人表示感谢。如果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译作是不可能顺利翻译出版的。徐晓明先生在选书和联系版权和编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他还给予译者经常的督促;另外,在翻译过程中,关于专业术语的译法,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专家,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还要向本书作者查尔斯·蒂利表示感谢!感谢他为译作撰写了中文版序。

魏洪钟

2007年4月12日